

匡亚明 主编

唐明邦

著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邵雍评传

觀物篇之十一



運以運

元始也其數

十二歲十二周星爲運運者時之行也隨天左旋
歲三百六十周辰爲世世者變之終也一日十二
辰晝夜遷移不常歲所積十歲則四千三百二十

南京大学出版社

Critical Biography Series of Chinese Thinkers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SHAO YONG

Tang Mingba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ISBN 7-305-03302-2

A standard barcode for the ISBN 7-305-03302-2.

787305 033025 >

ISBN 7-305-03302-2/B · 162

定价：22.80 元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邵雍评传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邵雍评传/唐明邦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12(2001.2重印)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7-305-03302-2

I. 邵... II. 唐... III. 邵雍(1011~1077)—评
传 IV. B24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1999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邵 雍 评 传

唐明邦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 210093)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08 千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2000

ISBN 7-305-03302-2/B·162

定价: 22.80 元

(南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退换)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霞林

组 员 王 湛 陈万年 石启忠 韩星臣
洪银兴 冯致光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光训	丁莹如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	
席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副主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孝萱	巩本栋	时惠荣	张永桃
陈 振	茅家琦	林德宏	周勋初
洪修平	蒋广学(常务)		潘富恩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

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页。

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覆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之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页。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1页。

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穿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

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

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振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

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自序

邵雍是十一世纪的著名思想家。那时，中国已进入后期封建社会，尚处于相对发展时期。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仍有重大发展。北宋前期百年内，社会相对稳定，经济颇为繁荣，科学技术取得惊人成就。思想文化领域涌现大批出类拔萃的人物，有社会改革家王安石、范仲淹，史学家欧阳修、司马光，词人苏东坡、黄庭坚、柳永，创造发明家沈括、苏颂、毕昇。尤其是哲学界人才辈出，诞生了“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卓越风流人物，同时活跃在北宋历史舞台上，群星灿烂，光彩夺目。

邵雍同当时许多杰出人物相比，具有显著特点。他不求闻达，终生不仕，身居陇亩，心忧天下，埋头著述，撰写《皇极经世》。既是思想家、史论家，又是诗人。他所隐居的“安乐窝”，谈笑有鸿儒，往来多布衣；酌古论今恢宏江山气度，醉酒吟诗怡然风月情怀。

邵雍学术思想，气象恢宏，在几个重要领域，大胆地转换主题，开拓思想境界，创立新思想。他潜心哲学研究，一不辩名教自然，二不论空无本体，放眼六合，玄思宇宙，倡导“神生数，

数生象，象生器”的象数学；阐述“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的太极本体论。

邵氏易学思想，别开生面，传承陈抟《先天图》，创立先天象数学，以《易传》为依归，以象数为基础，创制精妙易图，以之“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开宋代图书学之先河。

邵雍醉心古史，纵其史慧，放论古今。不为《史记》、《汉书》体例所拘挛，创立元会运世之史纲，阐述皇帝王伯之递嬗，呕心沥血，编纂世界历史年谱和中国历史年鉴，总结历史兴衰，评说社会治乱，臧否历史人物，上下数千年，剥复否泰，如数家珍。

邵雍吟诗三千首，编为《击壤集》，独具风格，世号“康节体”。以诗论理，而有哲理诗；借诗评史，写下咏史诗；吟风啸月，留下脍炙人口的田园诗。读其诗，若见其人。“西自昆仑东至海，其中多少不平声”，坦露内圣外王的仁者情怀；“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犹自歌”，一派风流潇洒的隐士风度。

《皇极世经》堪称中国思想史上的奇书，玄思异想，古所罕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抑之者贬为“空中楼阁”，尊之者谓其“学达性天”。儒道兼综的“经世”宏论，发前人所未发。邵雍其人，“安乐窝”中隐居三十年，洛阳城里，“行窝”二十家；达官显贵邀为座上嘉宾，里巷姑嫂，亲切呼之“家先生”；政治上超脱，思想上开拓，生活上洒脱。书名“经世”而不赖以用世；诗标《击壤》，乃自别于大雅。怀奇才，写奇书，诚然北宋一怪杰。

唐明邦

一九九七年元旦于云鹤书房

内 容 简 介

邵雍是北宋时代著名思想家、易学家、史学家和诗人。隐居洛阳，创立“易外别传”的先天易学，影响深远。《皇极经世》是其代表作。

本书是作者总结 20 世纪研究邵雍思想的学术成果，撰写的关于邵雍思想的综合性著作，对邵雍的生活时代、生平事迹、政治思想、人生哲学、先天易学、后天易学、认识论、思维方法诸方面作了客观评述，充分展示邵雍的思想风貌和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与成就。

书中还有先天易学先驱者、隐士、道士、道教学者陈抟的评传。

A Brief Introduction

Shaeyong was a Chinese famous thinker, schooler On I Ching, hisforion and paet in Song Dynasty,BC 10 Century. He lived Luoyang secretly, and founded Xiantianyxue (The prior learing of I Ching)," an other Out of I Ching" the learing effected tremendouly. The book Huang Ti Ting shi was his most important work.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wrote a synthesized Work about Shaoyony's thought after suming up achievements of school to study Shaoyong's thought in China in 20 century, and give a obiective reniem for Shaoyong's living tin-les, living activity, Political thoughts, Living philosophy, Xiantianyxue (The eriar learing of I Ching), Houtianyxue (The Portnatal leering of I Ching), Epistemology, The way of thinking ect. This book fully reveabed Shaoyong's style of sprite and his actievments and status in chinese hisfory of thought.

It contains also A critical biogyraphy of Chentuan, who was a pioneer of shiantianyxue (The prior learing of I Ching), hermit, taonist scholar.

A CRITCAL BIOGRAPHY OF SHAOYONG

CONTENTS

- Chapter I Shaoyong's Time
- Chapter II Shaoyong's Living story (the first)
- Chapter III Shaoyong's Liring Storg (the second)
- Chapter IV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s and Living Philosophy
- Chapter V Shaoyong's Works
- Chapter VI Xiantianyixue (The Prior Learng of I Ching)
 - Cosmic Ontology and its Changing Princiles
- Chapter VII Xiangshuxue (The Learng of draf an Mathemetics)
 - Mathemetics Draf about Evolution of Things in Cosmos
- Chapter VIII Yuanhuiyunshi—— A Chronide in History of World of Covering Cosmos
- Chapter IX Emperors and Dukes—— The new Historic Almanace in China
- Chapter X Houtianyixue (The Dostnafal tearing of I Ching)
 - The now Theory of Natural Philocophy
- Chapter XI Epistemology of "Oberving an Object from Itself"
- Chapter XII Thinking ways in Huang Ti Ting Shi
- Chapter XIII Eualuation of Shaoyong's Thought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nex: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Chentuan

Chapter I Go into the Taoist gate

Chapter II Look Down at Dukes on Husan Mountain

Chapter III Teach I Tu (The Picture of I Ching)

Chapter IV Comprehend "Neidan" and Go toward a Profound realm

Appendices

Index



作者简介

唐明邦 重庆市忠县人，1925年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周易研究会会长、中国周易学会顾问、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会长，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主讲中国哲学史、中国辩证法史、中国哲学文献、易学源流举要、道教文化研究等课程。著有《李时珍评传》、《本草纲目导读》、《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主编《周易评注》、《周易纵横录》、《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国古代哲学名著选读》等，参与编撰《中国哲学史》、《中国辩证法史稿》、《易学基础教程》、《易学与管理》等。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

责任编辑：蒋广学
装帧设计：张守义

目 次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1)
自序.....		(9)

邵雍评传

第一章 邵雍生活的时代.....	(3)
一、权集中央.....	(4)
二、经济的繁荣.....	(9)
三、科学文化进步	(14)
四、社会矛盾与思想变迁	(20)
第二章 邵雍的生平事迹（上）	(26)
一、身居畎亩 心高天下 ——青少年时期（1011—1039）	(27)
二、拜师学艺 精通易图 ——青壮年时期（1040—1048）	(31)

三、开馆授业 著书立论	
——中年时期（1049—1061） (38)
第三章 邵雍的生平事迹（下） (45)
一、安乐窝中 隐居顺志	
——晚年时期（1062—1077） (45)
二、交游贤俊 讲学为乐 (50)
三、激流中安享十年快活 (59)
第四章 社会政治思想和人生哲学 (65)
一、社会政治思想与政治态度 (65)
二、人生哲学 (76)
第五章 邵雍的著作 (92)
一、《皇极经世》——重要哲学著作 (92)
二、《渔樵问对》——哲学对话录 (99)
三、《击壤集》——毕生诗歌总集 (102)
第六章 先天易学——宇宙本体及其运化准则 (111)
一、《先天图》及其内涵 (112)
二、太极运化的“环中”原则 (120)
三、太极衍化的数理表现 (131)
第七章 象数学——宇宙万物衍化的数学图式 (142)
一、先天象数学的基本图式 (143)
二、先天之数的“体用变化”论 (161)
三、先天易学的“合一衍万”法则 (166)
第八章 元会运世——弥纶天地的世界历史年谱 (172)
一、世界历史年谱及其编制原则 (173)
二、世界历史年谱的其他文化内涵 (179)
三、对“元会运世”学说的评价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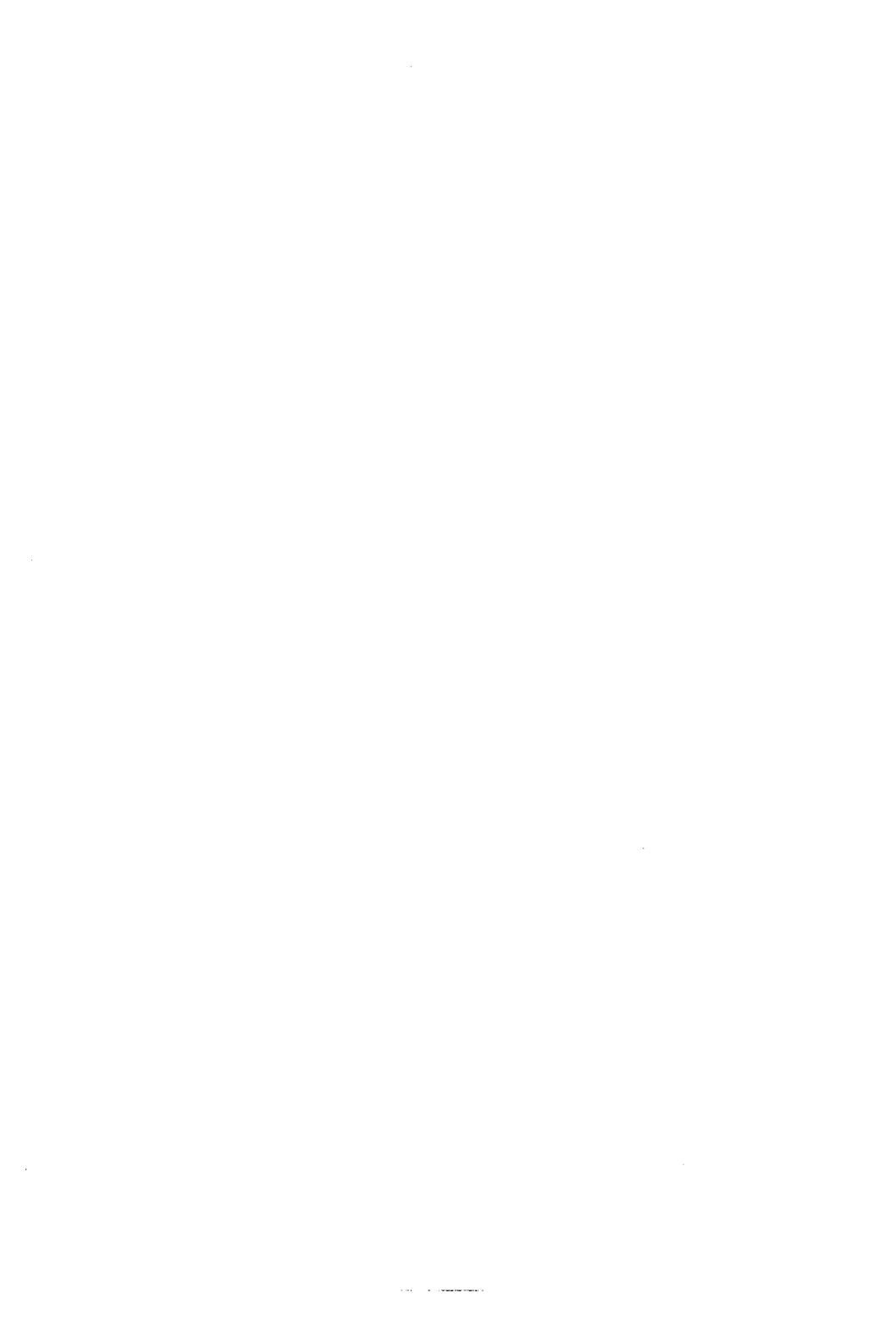
第九章 皇帝王伯——别开生面的中国历史年鉴……	(190)
一、皇帝王伯崇尚道、德、功、力……………	(191)
二、“午会”前九运的历史演变 ………………	(197)
第十章 后天易学——自然哲学新论……………	(207)
一、先天之学心也 后天之学迹也……………	(207)
二、上经重天道 下经重人事……………	(215)
第十一章 “以物观物”的认识论……………	(226)
一、人灵于物 学际天人……………	(227)
二、以物观物 不以我观物……………	(230)
三、观物明理 即象见意……………	(237)
第十二章 《皇极经世》的思维方法……………	(243)
一、关于宇宙结构的创造性探索……………	(244)
二、万物皆变的变易观……………	(248)
三、“四块八段以为《易》”的形而上学锢疾……	(252)
第十三章 邵雍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259)
一、邵雍的历史贡献……………	(259)
二、后世对邵雍思想的评价……………	(261)
结束语……………	(269)

附：陈抟评传

第一章 “图南”未遂遁玄门……………	(277)
一、志在“图南”时不利……………	(279)
二、隐居武当参玄理……………	(282)
三、潜修华山悟大道……………	(287)
四、秘传易图启后学……………	(297)

第二章 高卧华岳傲王侯	(299)
一、傲视王侯 坚持政治疏远.....	(300)
二、勉为帝师 略陈济世箴言.....	(309)
第三章 承传易图留后世	(320)
一、《先天图》与先天易学	(321)
二、《易龙图》与天地之数	(332)
第四章 参悟内丹指玄机	(345)
一、《无极图》中悟丹道	(346)
二、《指玄篇》里授功法	(354)
附 录	(362)
一、易图选粹.....	(362)
二、邵雍年表.....	(386)
三、参考书目.....	(409)
索 引	(410)
人名索引.....	(410)
词语索引	(416)

邵雍评传



第一章 邵雍生活的时代

邵雍（1011—1077）是11世纪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易学家和诗人。11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仍处于发展阶段。邵雍生活的时代，北宋建国一百年期间，封建制度高度发展，全国出现自唐代天宝之乱以来，未尝有过的安定局面，经济相当繁荣，科学、文化有很大进步，封建知识分子生活在百余年来未有的和平安定日子里。尽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边境少数民族不时侵扰，统治集团存在或明或暗的斗争，毕竟未引起全社会骚动和知识阶层的困惑。当时的历史环境为一大批卓越人物的成长，提供了良好机遇。

11世纪，中国在经过唐末、五代近百年动乱之后出现了王夫之所谓的堪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媲美的北宋建隆（960—976）之治，“统一天下，民用宁、政用乂、文教用

兴”^①。在人心思治、人心思定的历史趋势下，中国知识分子焕发出无穷的创造力，施展了卓越的才华。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文化名流茁壮成长，人数之多，成就之大，超越前代。百年之内，彪炳于史册者，有政治改革家范仲淹（989—1052）、王安石（1021—1086）；文学家苏东坡（1037—1101）、黄庭坚（1045—1105）；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欧阳修（1007—1072）；科学家沈括（1031—1095）、苏颂（1020—1101）；李诫（？—1110）、思想家李觏（1009—1059）、周敦颐（1017—1073）、张载（1020—1078）、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邵雍也是文化名流的代表之一，以其思想的特出，而与周、张、二程合称北宋道学五子。一大批文化名流在11世纪诞生绝非偶然。11世纪的中国社会，为他们创造了什么样的历史舞台，值得深入研究。

一、权集中央

从9世纪中叶唐末黄巢起义后，经过五代十国，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割据、战乱不休的动荡年代。人民颠沛流离，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960年，身为后周精锐部队统帅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开封东北面）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宋王朝。他决心顺应历史潮流，结束分裂混乱局面，建立统一的国家。赵匡胤立国后，继承后周的雄厚经济力量和强大军队，花十余年时间，统一了荆南、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实现了统一全国的

^① 《宋论》。

愿望。

鉴于造成五代十国社会混乱的根源，北宋王朝决定从政治、军事、财政三大方面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首先，集中军权。赵匡胤十分了解，五代时期，多次发生将士拥立君主的事件，他自己正是利用这种方式夺得政权的。欲求政权稳定，必先防止武将专权，为此，他采取了三项重大措施，一是“杯酒释兵权”。961年，北宋刚建国，赵匡胤与赵普订策集中兵权，召集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慕容延钊等宴饮。席间赵匡胤说道：“人都愿意富贵，无非是想多积金钱，纵情享受。你们为什么不辞去官职，选繁华地区做节度使，买上等田宅，广置产业，多蓄歌儿舞女，饮酒欢乐，君臣间两不猜疑，永保富贵，不很好么？”石守信等听后，立即叩头谢恩，交出兵权，去外地做有名无实的节度使，从而解除了朝廷的一项心腹隐患。二是集兵权于枢密院。将全国兵力分为四种，禁军、厢兵、乡兵、藩兵。禁军乃召募全国精锐而建立的职业兵，是全国主力军，北宋初年这种禁卫军约有20万，其中10万集中于京师，10万派驻外地；厢兵是府州之兵，不归节度使指挥；乡兵是地方武装；藩兵是改编的归顺部队，驻守边疆。乡兵、藩兵，多无训练，装备亦差。四种兵力的指挥权集中于枢密院，实际上只受皇帝主管、调遣。三是实行“更戍法”，主张所有禁军士兵当“习勤苦，均劳逸”。即派驻外地的禁军，实行定期轮换，或三年一换，或二年一换，甚至半年一换，名为“更戍”；禁军家属长驻京师，军官升迁，必调离原驻地。如此则“将不专其兵”，以解除藩镇之患。这些措施对于防止武人叛乱的确有效。但兵权过分集中，造成严重不良后果，那就是“兵无常帅，帅无常

师”。“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将帅领兵，没有长期打算；新换之将，在兵士中毫无威信，对士兵缺乏训练，一旦御敌，将不知其兵，则不可能有正确指挥；兵不知其将，焉能为之舍生效力？这样的军队极端缺乏战斗力，外敌入侵，常吃败仗。宋朝军队不断扩充，太祖时 37 万余，太宗时扩为 66 万余，真宗时为 91 万，仁宗时高达 125.9 万。其中禁军所占比例，由 50% 上升为 66%，结果是“将骄兵惰，空耗赋税。竭天下之财，养无用之兵，兵愈多而国势愈弱”。金兵南下，如入无人之境；皇帝下诏勤王，竟无兵可用。

第二，巩固中央。北宋初年，从巩固政权，防止内部叛乱出发，宋王朝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制度。中央设立六大部分，统摄政治、军事、财政大权。设立中书省，为最高政治领导机构，由宰相总管政事，不得参与军事；设立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由枢密使主管军国机务；以上称为二府，是主要权力部门。政事与军事分权，宰相与枢密使各自向皇帝上奏，互不相谋。设立三司，为最高财政机构，统筹国家财务，三司使号称计相，位次宰相。以上为三足鼎立的实权机构。此外，设立御史台，为全国最高监察机构，纠察中央及地方官员的行为，考课朝官得失；设立谏院，对朝政得失提出谏议，同御史台一起，控制朝廷官员言路，实际上后来成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工具；还设有学士院，集翰林学士若干人，专为皇帝起草诏书，参与制定国策，实为皇帝的智囊团。北宋朝廷采用大权集中的原则，由皇帝直接控制全国政、军、财大权以及朝官言行。特别是枢密使亦常以文臣充任，实行以文制武策略，保证了军政大权的高度集中。既杜绝了唐代宦官专权之弊，也未采取设立特务机构的办法，即有效地实现

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尽管其出发点在巩固赵氏王朝，客观上则有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维护了全国的统一。王夫之在《宋论》中称赞道：“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① 赵匡胤重用文官，推行文官制度，派朝臣取代节度使，实行以文制武策略，是从他的切身体会出发的。武将拥立新主，常是社会动乱的根源。赵匡胤予以坚决制止，很有必要。《宋史》写道：“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② 在赵匡胤看来，朝臣外遣，难免贪污腐化，行为不轨，但比起武将来，对中央的危害要小得多。他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③ 从人民立场看，贪浊的文臣哪怕只有一个，对百姓的祸害也是极大的；在朝廷看来，百个贪浊的文官也不及一个叛变武臣的危害。北宋重用的文官，大多从五代时期旧官僚中挑选而来，用高官厚禄，吸引他们为新王朝效力，无异采取赎买政策，以扩大封建统治基础。北宋王朝的中央机构日益扩大，文武官员日益增多，导致政府机构臃肿，冗员增多，工作瘫痪，俸禄、赏赐不断增加，造成财力危机。正所谓“恩逮于百官唯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余”^④。重文轻武的文官制度，以文制武的统治政策，造成“武人丧气，文官贪污”的社会风气，如此维持

① 《宋论·太祖一》。

② 《宋史·职官志》。

③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

④ 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5页。

和平统一局面，是十分危险的。

第三，集中财权。在集中兵权、巩固中央的同时，宋王朝十分注意集中财权。参照唐代财政制度，作出新的改进，将唐的盐铁、度支、户部三套机构集中为三司，成为全国最高财政领导机构，统筹国家财务。盐铁掌管坑冶、商税、茶、盐等工商收入，及修河渠、造军器等大宗开支；度支掌握各种财政收支、粮食漕运；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酒榷及上供。北宋改变唐代以来地方财政管理制度，不再按留州、递使（节度使）、上供中央三股分摊的管理办法，一律由中央派转运使直接管理，除留一部分供州县政府支用外，全部输送中央，由中央统一开支，使朝廷掌握经济命脉；北宋初期平定江南各国时，对其财富大量收夺，还派人组织官庄，直接从事生产，增加收入。所以北宋初年，出现过“府库充溢”的好景况，大量支出后，政府尚有大半节余。财力集中固然增强了国力，可是也带来种种弊端，主要是各级官员从中贪污、受贿，生活奢侈浪费。皇帝为笼络文武官员，经常赏赐无度；凭着经济实力雄厚，对外敌入侵，不采取抵抗政策，而采取委曲求全的宽容政策，动辄答应向辽和夏输送大量岁币。到仁宗时，全国财政收入与支出刚好平衡，已无剩余；到英宗时，开始出现亏空。治平二年，全国岁入超过北宋初年五倍，尚不足开支，造成财政危机，这种危机日益发展，将难以收拾。国库空虚，只好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各地起义此伏彼起，进一步激起政治危机，北宋前期虽有100年承平时期，实际上是一种表面现象，这样的社会稳定是相当脆弱的。

不难看出，北宋王朝发展封建统治经验，成功地实现了

统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带来了许多有利形势，巩固了全国的统一，防止了分裂割据，保障了社会在长期混乱之后的相对安定，采取和平方式抵制了外侮。然而造成的弊端是不可忽视的，兵惰将骄，战斗力削弱；官僚机构庞大，统治瘫痪；“府库充溢”，助长了享乐腐化，这些弊端，形成封建统治的痼疾，后患无穷，有识之士无不扼腕。此时的邵雍，乐于置身度外，不问世事，满足于表面的社会安定。在他 60 岁左右写下一首《插花吟》，“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①坐对名花美酒而开怀畅饮，活显出一位隐者的风月情怀。

二、经济的繁荣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保障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稳定状态。北宋时期，自然经济开始变化，商品经济较之唐代有较大发展，中小城市比唐代增多，货币流通量大为增加，对外贸易也更兴盛，后期封建社会经济一度呈现繁荣景况。

首先，农业经济有较大发展。影响农业的土地占有制和剥削方式有明显变化。唐以前的土地世袭占有制度，受农民战争的冲击已基本上消失。北宋时土地允许私人购买，土地占有主要靠契约关系，农民租种地主和国家的土地，以缴纳实物地租为主，过去占主要地位的劳役地租形式，已退居次要地位。农民对地主不再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享有更大人身自由。这是宋代农业生产较过去有更大发展的根本原

^① 《击壤集》卷十。

因。

北宋时期，一度出现小康局面，还靠庄园经济大发展。那时官田较多，有屯田、营田、官庄、职田、仓田、学田等，同私有庄田一样，招佃户租种，普遍出现租佃制，农民同地主或庄园主实行分租，比较容易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管分租制的剥削率仍在100%以上，毕竟给农民一种希望。私田不断发展，佃户日益增多，真宗时，全国三分之一以上人口是佃户，仁宗时，增为二分之一以上；英宗时，六分之五的田地都落到庄园主手里。庄园制土地占有成为绝对支配形式，农民终年劳动，“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

宋代允许私人垦田，这是刺激农业发展的又一因素。唐末农民战争及五代十国的混乱，人民颠沛流离，地主逃亡，留下大量荒地无人耕种。朝廷规定：“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① 农民可以从庄园分离出来，另立户籍，国家予以承认。因此垦田数量逐年增加。开宝末年（975）全国垦田只295万余顷，天禧五年（1012）增到524万余顷，自皇祐至治平不到20年，垦田数成倍增长。治平三年（1066）天下主客户总计有1418万余户，人口2050万以上。宋初不到50年，垦田数增加一倍，户数增二倍。客户编入户籍，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徒附”，提高了农民的社会地位，激励了生产热情，促使小农经济得以迅猛发展。

此外，宋代农业发展，还有赖另外两个因素：一是大量兴修水利，加强农业灌溉，利于旱涝保收；一是大力推广从

^① 《宋史·食货志上一》。

越南引进的优良稻种“占城稻”，这种稻种，早熟、抗旱力强，“不择地而生”，不止南方可种，北方也可推广，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在北方，政府还组织农民植树防沙，互助打井，调剂耕畜与劳力，促使农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农业生产的安定发展，为封建统治打下了稳固基础。

第二，手工业、商品经济大发展。宋代手工业生产远远超过唐代，出现了一些新的行业，有的发展为较大的手工业工场，有了雇佣劳动者，不少商品出销到海外；在官营铸钱工场已实行计件工资，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宋代工业发展显著的，首推矿冶业，全国有 270 余处，开采、冶炼金、银、铜、铁、铅、锡，还有汞，岁课比唐代增加数倍。铜是铸钱所需，唐代岁产 60 余万斤，北宋已达 2000 余万斤；铁是制造兵器和农具的重要原料，唐代只产 200 余万斤，北宋达到 800 余万斤；金与汞，唐代尚无岁课记录，北宋已大量生产。北宋纺织业也很有名，产品有丝织品缕、罗、绡、锦等 42 类，河北路出产的绢，享有“衣被天下”的美誉。开封、洛阳、润州（江苏镇江）、梓州（四川三台）都有规模巨大的纺织工场，不少产品为出口所需。印刷业和造纸业是北宋新兴行业，从雕板印刷，发展为活字印刷，印刷品质量精，数量大。宋初成都刻印《大藏经》5048 卷，雕板 13 万块，国子监刻经史著作有 10 多万块。杭州刻印的书籍最为精良，不少宋版书成为当今庋藏珍本。为适应印刷需要，造纸业大为进步，江南成为造纸业中心，徽州黟、歙二县生产的纸，质量最精，50 尺一幅的大型纸张匀薄如一。最好的纸可用以印制纸币。中国闻名世界的瓷器，宋代已达鼎盛时期，开封的官窑，汝州的汝窑，禹州的钧窑，定州的定窑，是驰名中外的四大瓷业

中心，其质量之精美，无与伦比，特别是青瓷已发展到高峰。除了供皇室及豪绅巨富享用外，还大量出口。宋代的造船业空前繁盛，造船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太宗时，各州岁造运船 3000 艘，有战船、漕船、使船、龙船、商船、游船等不同型号，最大者称“万石船”，远洋航海有“客舟”，可载 2000 斛粟，还有号称“神舟”者，比“客舟”大三倍。此外制盐、制茶、酿酒业也特别发达，这都是国家专卖产品，在国家税收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生产繁忙景况可想而知。至于制造军用物品和兵械的工场，规模之大、技术之精，不言而喻。总之，手工业的发展到宋代已达到新的水平，除满足国防和人民生产、生活日用外，还有大量精美商品，供给世界各国人民。

第三，商业和对外贸易繁盛。农业、手工业的发达，促成了商品交换的繁荣，城镇的增多，城镇人口的增长。当时的东京是全国最大城市，有 18 万户，常住人口 30 多万，还有大量流动人口，如往来官员、商人、手工业者、小贩、奴仆等。驻军也不算户籍。东京比汉唐时代的京都民户大大增加。繁华的都市生活，“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市有各种店铺，还有定期集市贸易。东京既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交通中心。“每一交易，动即千万”，其繁荣景象，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了生动描绘。与东京媲美的还有四川成都、陕南的兴元（南郑），年收商税都在 40 万贯以上。年税在 20 万贯以上的城市有梓州、绵州、遂州、汉州、利州五处，都在四川境内；年税在 10 万贯以上和 5 万贯以上的三、四等城市，各路都有，如北方的秦州、太原、真定、京兆、大名（北京）、洛阳（西京）、密州、晋州；东南的苏州、杭州、江宁、

扬州、楚州、襄州；沿海的广州、泉州、福州等。还有星罗棋布的小市镇，称墟或集，是定期交易的场所、城乡交流的桥梁，为活跃城乡商品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兴盛，北宋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陆路贸易，仍靠唐以来的陆上丝绸之路，通往西域，远至欧洲；海路贸易，比过去发达，从广州通往越南、印尼远至大食（阿拉伯）；从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高丽；登州是通高丽的重要口岸；后来福建的泉州，出口也日益繁盛。这些出口海岸，商船云集，往来繁忙，外国商人络绎不绝。出口的物品多是药材、香料、瓷器、丝织品、文具、书画；进口商品多是香料、药物、珠贝、象牙、犀角、珊瑚、苏木、玳瑁等。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加强了货币流通，铸钱任务十分繁重，唐代每年铸钱数十万贯，宋代每年铸钱五百至六百万贯，还闹“钱荒”。唐代金银开始流通，到宋代金银已成为通行货币。硬货币不便携带，开始设立“便钱务”，作为汇兑机构。商人将钱交到务里，领券（汇票）到外州兑换现金，保证当日付现。太宗末年，东京便钱务每年收兑商人的便钱多达170余万贯，相当于政府一年之内铸造铜钱总数。真宗时，便钱数量已高达280余万贯，商业之繁盛可见一斑。北宋在货币发行上有一项世界首创，就是发行“交子”，即世界上首次发行的纸币。起初由四川商人创造，为便于货币携带。1023年改由政府发行，由朝廷在四川、潞州、陕西设立“交子务”，官印交子，通行全国，比金属制造的货币方便得多。发行交子原有定额，以铁钱作现金准备，两年一次以旧换新，禁止民间私造。后来发行数量无限，交子日益贬值，引起人民不满。

三、科学文化的进步

北宋前期，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促成了科学文化的长足进步，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首先，科学技术的进步彪炳史册。北宋中期，百年太平盛世，中国科学技术的新发展，远远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十大科技发明创造引人注目，成为世界之最。

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是举世公认的三大发明，对世界文化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火药的发明，以及火箭、火球、火蒺藜、火炮等新式武器的出现，不止改进了进攻武器，更重要的是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影响战略战术的重大变化；指南针运用于航海，解决了航海技术的一个关键问题，使航海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创造，为人类信息的传播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前途。近代西方著名科学家对三大发明作了公正的历史评价，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说：“我们若要观察新发明的力量，效果和结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了。这四种发明将全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都改变了，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四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①

制瓷技术，是公认的世界绝技。青瓷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绝妙境界，钧窑（河南禹县）青瓷，在青色釉中，闪现霞光

^① 培根：《新工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3页。

或彩云似的紫红色，变化无穷，精美绝伦；汝窑（河南临汝）青瓷驰名世界。白瓷技术亦达很高水平，“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造型优美，彩饰丰富，成为上供、出口的上等产品，富有极高的实用、观赏、收藏价值。

应县木塔是现存世界木结构的最高建筑。在山西应县佛宫寺，建于辽代，已有 900 多年历史，塔身八角九层，自地面至塔顶高达 67.31 米。多层柱子叠接而上，每层外檐柱都与下层平座层柱同一轴线，但比下层外檐柱向塔心退入约半柱径。各层向内递收，使塔身稳定，增加抗风抗震能力。玲珑古塔，经元明两代多次地震考验，仍巍然屹立，反映了十一世纪高层木结构建筑的卓越成就。

《营造法式》是世界最早的建筑学专著。此书于 1068 年开始编撰，1091 年由李诫（？—1100）重修完成，全书 36 卷，357 篇，3555 条，对历代工匠流传的经验及当时建筑技术成就，作了全面系统总结。关于建筑工程施工程序、定额等作了明确规定，带有法令性质。该书图文并茂，有房屋仰视平面图、横剖面图、施工仪器图等多种。关于木结构的各种比例，体现了宋代对建筑力学有关问题的认识水平。对于构架的侧向稳定性、纵向稳定性、结构整体性的增强，都予以认真重视。此书是古代建筑技术向标准化、定型化方向发展的标志。

“二项式系数法则”的最早发现。十一世纪数学家贾宪注解《九章算术》，撰《黄帝九章算法细草》，首先展示了“开方法本源图”，不仅列出各高次方展开式各项系数，并指出求这些系数的方法。这幅图理应称为“贾宪三角”。贾宪的开方法，又称“增剩开方法”，可求得任意高次展开式系数，也

可用之进行任意高次幂的开方。这是一项数学上的杰出创造。它的发现比欧洲早四百多年。欧洲称它为“巴斯加三角”，认为是法国数学家巴斯加（1623—1672）的首创。贾宪的创造为宋元四大数学家（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攀登世界数学高峰铺了道路。

水运仪象台是巧夺天工的天文仪器。北宋自 965 年至 1092 年，不到 100 年，先后铸成 5 架巨型浑仪，每架用铜 2 万斤左右。苏颂（1020—1101）和韩公廉于 1088 年制成的水运仪象台，是世界意义的天文仪器的代表作。以枢轮为原动轮，由水力推动，使一套复杂精密的齿轮系统持续转运，各种仪器同步协调转动，浑象自动演示天象，浑仪自动跟踪天体，报时机自动击鼓报时，或出现木人按声象自动显示时刻的推移。水运仪象台高 36.65 尺（12 米），宽 21 尺。《宋史》称赞：“占候测验，不差晷刻，昼夜晦明，皆可推见，前此未有也。”^① 它的制造反映了机械制造技术的精密和天文观测的科学水平，堪称当时世界上天文仪器的杰作。

《证类本草》是 11 世纪中国百科全书。北宋中期，共完成 4 部本草著作：先有《开宝本草》（973—974），《嘉祐本草》（1057—1063），《图经本草》（苏颂编 1020—1102），最后经唐慎微修订成《证类本草》（1086—1094），是当时药学最高成就。载药 1746 种，分为 13 类。首标药名，下附药图，说明其性味、主治、收采季节、炮制方法、产地与形态，旁及诸家注释，成为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的蓝本。此种书不止有药学价值，对植物、动物研究也极有价值，故达尔文称

^① 《宋史·苏颂传》。

《本草纲目》为 16 世纪中国百科全书。与编修本草工作同样重要的，有校正医书局的设立，1057 年集中大批专家学者，有掌禹锡、林亿等参加，工作 10 年，共校订医书 10 余种，于 1066 至 1077 年间刊行。现存《素问》、《难经》、《伤寒论》、《金匱要略》、《脉经》、《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等重要医学典籍，都是那次整理刊印留传下来的。

泉州洛阳桥的建立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桥在洛阳江入海口处，江面开阔，水急浪高，工程极为艰巨，建于 1053 至 1059 年，全长 834 米，宽约 7 米，46 个桥墩。桥身全用长条石梁架设，桥基采用抛巨石入水，堆积成宽 20 米，高 3 米，长 1 里的水下石堤，然后在石堤上立桥墩。当时无水泥，胶固桥墩采用在桥墩处水下石堤上“繁殖蛎房”（一种贝类动物），利用牡蛎的石灰质贝壳附着在石块间繁殖的特性，胶固石块。用生物加固桥基的妙法，世界上没有先例。在江底抛巨石筑桥基的办法，是现代桥梁建筑所谓“筏形基础”的先驱。建桥所用大石梁，重达数十吨，很难安装，可能是先将石梁安上木排，随着海潮涨落安到桥墩上，这种技术是近代浮运施工法的先例。洛阳桥是宋代惊人智慧的结晶。至今屹立海岸，令人惊叹。

北宋初期和中期，科学技术创造远不止以上 10 项。不难看出邵雍生活的时代，中国人具有惊人的聪明才智和巨大创造力。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邵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对开阔胸襟，增长智慧有重要影响。邵雍著作中反映了不少具有合理因素的科学观点，如他说：“日望月则月食，月掩日则日食”，“月体本黑，受之日之光而白。”又说：“月者日之影也。”他还用阴阳消长的易学思想解释一些天文现象，说道：

“阳消则生阴，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阴盛则敌阳，故日望而月东出也。”这些观点尽管不是科学解释，毕竟是科学探索的进步表现。

从北宋前期 100 年的科学进步，可以得到两点结论，首先，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同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相结合，指南针同先进的造船技术相结合，火药的发明同精巧军械制造业结合，在中国，在世界，都开创了一个千年文化的新纪元。在人类文化进步中意义远远超出这些科技局部应用的意义。其次，新的科学技术发生的影响，往往不限于技术本身，它必将激发人类思维方式或速或迟的变化与进展，北宋时代新儒学——道学（或理学）的诞生，同科学的进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不足为奇的。

北宋前期，文化教育的发展出现新局面。宋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建立在文化教育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当时的文化教育，在三大方面有着时代特色、开创精神。书院的创立有划时代意义，北宋普遍设立学校，除中央有太学作为最高学府外，州有州学，县有县学，学校培养的人才，经过科举考试，选拔为候补官吏；学生往往“以先圣之宫墙，为干禄之捷径”。“有志之士，不屑以此为学”^①。书院成为自由讲学的场所，出现了白鹿洞等四大著名书院。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描述当时书院盛况指出：“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授徒，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书院讲学者

^① 王夫之：《宋论·真宗一》。

多是当朝名士，鼓励学员独立钻研，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往往形成独特学风。当时讲学名家孙复和胡瑗，在社会上有重要影响。孙复（992—1057）“四举而不得一官，筑居泰山之阳，聚徒著书，种竹树栗”。^① 教学成就很大，培养的学生有学者石介（著有《徂莱文集》），政治家文彦博、范纯仁（均为宰相）。胡瑗（993—1059）在太湖一带讲学，自成特点，“以道德仁义教诸生”，注重“明体达用”，“因材施教”。分科教学，有“经义”科，选心性疏通，可任大事者，为之讲明“六经”；“治事”科，让一人治一事，兼通一事，如治民以安生，讲武以御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教等。“夙夜劳瘁，二十余年”，“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②。学校在提高人民文化素质，书院在培养杰出人才方面各有成就。

北宋在科学文化方面的普遍繁荣，促进了文献的编辑与出版，出现了几部有首创性的学术丛书和类书。首先是《太平御览》，1000卷，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类书。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开始编撰，七年完成。广征博引，收罗佚文，保存了许多原始资料，具有较高文献学价值。其次是《大藏经》的刻印，隋代开始编辑的《大藏经》，以往只靠手抄，收藏不广，北宋雕板印刷，利于收藏。还有空前的《道藏》，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7）初年，命王钦若领校，按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七部分类，凡4359卷，不少道经保存了原本，为尔后《道藏》的修订作了承先启后的贡献。还有气派宏伟的《册府元龟》1000卷，为北宋完成

① 《宋元学案·泰山学案》。

②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

的另一巨型类书，辑录历代君臣事迹，按事件人物，分类编辑，共 31 部，1104 目。王钦若主修，大中祥符六年（1013）完成。取材丰富，足以校补旧史。大型学术、文化著作的收集、整理、分类编辑与印刷出版，反映了太平盛世的文化繁荣景象。

北宋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宋词成为与唐诗媲美的特定的文学形式。当时产生了范仲淹、宋祁、王安石、欧阳修、晏殊、柳永、苏东坡、黄庭坚、秦观等一大批著名词人；或轻柔沈丽，忘情于山水；或雅俗共赏，谱市井之新声；或气势恢宏，刚健中含婀娜情怀；或凄婉绵恻，意细言长而音韵和美。词的空前发展，两宋流传之词共两万余首，词家愈千人，词牌 870 多个，大大超越唐及五代。词取代了诗，成为最富于创造性，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学样式，把特定时代的民族心理，民族感情作了真实的描绘，令人从其美妙韵律中，倾听出伟大民族的心声。

四、社会矛盾与思想变迁

尽管北宋初期和中期，出现了百年太平盛世，国家空前统一，社会相对安定，经济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创造迭出，教育文化更加进步，这一切并不能表明社会矛盾不复存在，相反，北宋时期的三大社会矛盾日甚一日，时时扣人心弦。统治者常常用太平兴国、大中祥符、天禧、治平、熙宁等年号来自我安慰和自我表彰，骗取人民的好感，实际上种种社会矛盾，犬牙交错，弄得北宋统治者一天也不安宁。

首先，民族矛盾的时紧时松。北宋时期，中国境内呈现

几个民族政府并立局面，北有辽、西有夏、东北有金，民族矛盾相当尖锐。宋初统治者，采取先南后北战略，集中力量平定南方，实现全国统一，对北方的民族威胁采取妥协立场，关系紧张时，总是用输送钱帛的办法，求得辽夏的退让。较大的事件，有 979 年和 986 年的宋辽之战；1004 年，订立“澶渊之盟”，宋每年送辽绢 20 万匹，银 10 万两；1042 年辽乘宋对西夏用兵之危，以武力威胁，宋又每年增送绢 10 万匹，银 10 万两。1075 年，辽再威胁宋，又割河东（山西北部）700 里地予辽。与此同时，雄踞西北方的西夏是宋的大威胁，1034 年后，宋与西夏长期战争，禁军增到 42 万人，造成物价飞涨，财力困乏，农业受到严重破坏，1044 年议和，宋每年送夏银 7 万余两，绢 15 万余匹，茶 3 万斤；但不久，1068 年到 1085 年又起战争。两次大战，宋军死了 60 万人。对辽夏斗争的失败，是由于宋统治者将主要军力用于对内镇压造成的。

第二，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宋王朝为了巩固统治，养了大批官吏和军队，各级官吏奢侈成风，赋税徭役重担，都落到农民肩上。农民遭受地主的租佃剥削和高利贷盘剥；土地兼并，造成大批农民破产，大商人肆意压榨，物价飞涨。农民无法生活，忍无可忍，被迫揭竿而起。早在北宋建国之初，就有 965 年后蜀士兵的起义反抗，965 至 966 年间阆州农民起义，973 年渠州农民李仙等的起义，终于酿成 993 年茶农王小波、李顺起义，王小波提出战斗口号鼓舞起义农民，“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起义军纪律严明，“所至一无所犯”。王小波壮烈牺牲后，农民军攻入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李顺自号大蜀王。宋军经两年激战终于剿灭起义军，但各地小规模农民起义仍连绵不断。真宗、英宗时期，王朝日益腐

败，农民士兵起义不绝。“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先后有 1000 年的益州戍卒起义，建国号大蜀，意在继续王小波、李顺的农民革命事业；1005 年，逃亡兵士王长寿在陈留起义；1007 年，宜州士兵陈进领导起义，拥立卢成均为帅，号南平王；1043 年，京东路驻军士兵王伦领导起义，王伦着黄衣，立年号，置官职，“所过楚、泰等州，连骑扬旗，如入无人之境”。1043 年，陕西大旱，饥民达二三百万，商州农民张海发动起义，自陕南经豫西到鄂北，千里地带燃起义军烈火，1044 年，驻保州禁军，不堪军官虐待而起义；3 年后，贝州士兵和农民联合起义，起义领袖王则占领贝州后，建国号安阳，称东平王。农民士兵起义虽先后被剿灭，却暴露出北宋前期表面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严重社会危机。这一社会危机，又不断加深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第三，北宋党争或明或暗。在社会危机与民族矛盾交织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愈演愈烈，部分具有政治远见的政治家，主张改革政治，摆脱财政困难，缓和社会危机，增强国防力量，主要目标是抑制豪强兼并，迫使富商大地主承担税收，以解财政之危。这就是范仲淹、王安石掀起的两次社会改革运动。可是另一部分官僚大地主、豪强势力，为维护既得利益，拼命反对改革，寸步不让，千方百计扼杀改革运动。仁宗时，范仲淹最早提出厚农桑，减徭役，修武备，择长官等十条改革方案；欧阳修也主张改革，都遭到大官僚地主的反抗而流产；神宗鉴于社会危机更加严重，决意重用王安石实行新法，从 1064 年开始，逐步推行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以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限制高利贷者的盘剥，改善政府财政收入，缓和

社会矛盾；推行保甲法、保马法、置将法、设军器监，以实现耕战结合，克服“更戍法”的流弊，改进军器制造技术，目的在整顿军队，增加国防力量。王安石变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矛盾，改善了财政，增强了兵力。王安石抱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反潮流精神，锐意进行社会改革，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无愧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新法的推行，限制与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一些利益，引起他们的代表人物——保守派官僚的反对，从而爆发了新旧两派的竞争。这一竞争，早在范仲淹针对时弊上《百官图》(1036)讽刺吕夷简，被指为朋党时即已开始，经过反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1043)，到反对王安石的熙宁(1069—1085)变法而白热化，先后延续近半个世纪，不少新政人物被排斥打击，北宋社会亦日益腐朽无可救药。围绕竞争的不止是一场尖锐政治斗争，同时也是旷日持久的严重思想斗争。

北宋前期的思想变迁。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科学的进步，文化的勃兴，必然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北宋建国百年内，中国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历史时期。同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思维路数大不相同，宋代理学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弥纶宇宙，终始古今的博大气象。

北宋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都有一个横空出世的博大气象。他们惯于放眼六合，宏观宇宙，视野辽阔，心胸宽广。思想家中邵雍也好，周敦颐也好，张载也好，立论恢宏，气冲斗牛，其博大气象，可谓盛矣。周子《通书》，放论六合，

终始古今，“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邵子《皇极经世》，“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①。元会运世细推演，皇帝王伯大铺抒。张子倡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气宇轩昂，何等豪放。同史学家司马光“资治通鉴”垂教千秋的博大气概，文学家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雄伟胸襟，相互呼应，彼此衬托，共同谱写出北宋前期的时代最强音。

其次，出入佛老，更新儒学的融通精神。

中华民族早就培养了“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包容意识的光荣传统。北宋思想家将之发扬光大。北宋前期由道学五子开创的新学风，人们谓之新儒学。其所以如此，盖因此时的儒学形成一种新特点，它是儒非儒，融合佛老而创立新体系，儒中有道，道中有佛，佛中有儒。通过儒道佛三教互涵，在新的理论基础上熔铸改造，终至三学合一而别开生面，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汲取佛老思想之所长，融会贯通而形成更加精巧的思辨哲学。

第三，探赜索隐，玄思本源的本体论思想。

中国哲学发展史，宋以前多强调宇宙生成论，宋以后，突出探讨宇宙本体论。早在唐代，韩愈就神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一脉相承的“道统”，令人耳目一新；可是他未能从本体论高度对封建纲常伦理作出哲学论证。北宋五子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扬弃了两汉的神学目的论和玄

^① 《观物内篇》之二。

学、佛教的空无本体思想，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化生万物而变化无穷的宇宙本体。周敦颐称之为“无极”，主张“无极”而“太极”，太极者，“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从而建立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本论；张载称之为“太虚”，主张“太虚即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从而建立“一故神，两故化”的唯物主义气本论；邵雍称之为“太极”，主张“太极一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从而建立了“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的先天象数学。

北宋前期哲学思想的这些新特点，邵雍的《皇极经世》反映尤为突出。他的哲学旨趣，在本天道以明人事。远则弥纶天地，描绘出元会运世的宇宙进化年表，近则终始古今，编织了皇帝王伯的中国历史年表。从一个简单明白的先天八卦图，妙悟神契而衍化为先天象数学的庞大思辨体系。北宋建国一百年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先启后，明显转折的特殊历史时期，它为一大批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稳定而繁荣的历史舞台，让他们驰骋思想的骏马，去攀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新高峰。邵雍以一介寒儒，身居畎亩，心忧天下，其苦心积虑经营的先天象数学尽管曾被喻为一座不落实际的“空中楼阁”，它却是在时代开拓精神激荡之下应运而生的思想产物。

第二章 邵雍的生平事迹（上）

十一世纪，中国出现了一位易学名家，名叫邵雍。他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易学家，并有史学家气派，兼诗人气质。身为匹夫，志在畎亩；交通王侯，心忧天下。达官显贵，引为知己；里巷妇孺，呼之为“家先生”。

邵雍是一位哲学家。名列北宇道学五子，宋明理学创始人之一。他玄思宇宙，吞吐六合，创元会运世之说，探讨宇宙生成变化、衰亡的过程，编撰了世界演变年表，发前人之所未发。

邵雍是一位易学家。五经之中，独钟《易经》，但又非正统易学。其思想特点在于，是易、非易、非非易；以《易传》为根基，以象数为中心，以易图为张本，首创先天易学，自成体系，朱熹称之为“易外别传”。

邵雍是一位史学家。他对中国历史，上自唐虞，下及五代，都有研究，厚今薄古，厚积薄发，创立皇帝王伯史论体系，探讨中国历史发展，品评王朝盛衰，臧否历史人物，编列中国历史年谱，自成一家之言。

邵雍是一位诗人。赋江山气派，抱风月情怀，以诗评史，以诗明理，以诗寄兴，居“安乐窝”，写《击壤集》，不尚辞藻，不事夸张，出口成章，晓畅如话，自成“康节体”。

邵雍兼有数术特长，指中尘寰，未卜先知，扑朔迷离，令人钦仰，后人加以神化，俨然降世仙家。然从不以数术名家，一派儒者气象，清代帝王褒之“学达性天”。

邵雍具有多方面的思想成就，而其一生事迹又十分平凡。尽管家境贫寒，生活道路并不十分坎坷；身居社会大改革时期，政治上未遭受重大厄运。极平凡的一生，造就不平凡的人物，不能不令人惊异。

一、身居畎亩 心高天下 ——青少年时期（1011—1039）

邵雍，字尧夫，谥康节，人称康节先生。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卒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享年67岁。

邵雍出生在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祖先是范阳人，今河北涿州。父亲邵古（988—1067），母李氏。其父知诗书，明音

韵，为人忠厚，少有言笑，终身隐居乡野，不曾作官。邵雍出生在河北祖籍，地点在今涿州市大邵村。那是辛亥年十二月廿五日戌时。他后来写了一首《生日吟》：“辛亥年，辛丑月，甲子日，甲戌辰；日辰同甲，年月同辛，吾于此际，生而为人。”为避乱，后随父迁居衡漳（今河南林县），那儿至今有康节村，因康节幼年在此生活而命名。

邵雍 12 岁那年，随父亲迁居共城（今河南辉县），他的少年时期在共城度过。共城境内有座苏门山，远近闻名，山上林木葱笼，十分幽美；山下有一个百泉湖（又名百源湖），泉水喷涌，碧波荡漾。邵雍的家就在苏门山上，百泉湖边。那时，雍家甚贫苦，只同父亲母亲在山坳里结一座茅屋居住，在山前开荒种地为生。他长大后，曾经每天上山打柴，生火煮饭，穿粗布衣，吃杂粮粥，父亲教他读书，过着耕读生活。

少年邵雍，聪颖好学，读书十分刻苦。一捧书本就忘记一切。热天读书，虽身如火烤，也不摇扇纳凉；冬天读书，手脚冻得麻木，也不愿生炉取暖；家里没有舒适床铺，困倦时，常席地而卧，自以读书为乐。后来他说：“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① 这种读书为乐的好学精神，是他从小养成的。

少年邵雍，“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②。他曾经雄心勃勃，立大志向，准备学业有成，干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他刻苦学习，潜心研究传统文化典籍，饱览经史百家著作。邵雍读书，不死记硬背，必有自己独到心得才罢休，常是冥思苦想，深研书中至理，决不满足于牢记现成结

① 《观物外篇》第十二。

② 《宋史·邵雍传》。

论。讨厌那种老师讲、学生记的教学方法。他觉得那样学习的方法，不可能增长才智，于未来的事业是没有补益的。这就是他在《观物外篇》中讲的：“记问之学，未足以为事业。”^①邵雍不满足于“记问之学”，重在独立思考，尤其注重读现实社会这一本大活书。他在积累了相当的史地知识之后，曾经外出游学。他说：“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独未及四方。”^②于是走出家门，投身社会，西跨黄河、汾水，南渡淮河、汉水，“周游齐鲁宋郑之墟”^③。涉大川，登名山，广交朋友，访问人间四方事，开阔眼界，洗涤胸襟，熟悉世事，精通人情，游学数年，思想日渐成熟。他游学四方日久，母亲李氏盼儿归来，神情恍惚，以至“倒诵佛书”，邵雍得知，急忙回家。邵雍游学归来，不禁叹道：“道在是矣。”自认为经邦济世，待人接物之道，已了然胸中，只期待有朝一日能跻身仕途，大展鸿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不久母亲去世了，他在苏门山同父亲相依为命，继续过着穷苦生活。

邵雍成了一位有志青年，久受儒家思想熏陶，站在儒家立场，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以潜心名教为乐。正如他后来回忆的：“予自壮岁，止于儒术，谓人世之乐，何尝有万之一二在，而谓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④他敬佩的是尧舜、大禹、汤武等典范人物的治世修身准则。他说：“昔者孔子语尧舜，则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语汤武，

① 《宋史·邵雍传》。

② 《宋史·邵雍传》。

③ 《宋史·邵雍传》。

④ 《伊川击壤集序》。

则曰：‘顺乎天而应乎人’，斯言可以该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①他认为大禹之所以贤能，贵在虚心学习，他说：“人患乎自满，满则止也。故禹不自满假，所以为贤。虽学亦当常若不足，不可临深以为高也。”^②他以古圣贤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头脑里全是儒家的道德价值观念。

邵雍自小热爱《周易》，他认为学习《周易》不应当只引用讲解其辞句，贵在融会贯通，善于应用。他十分佩服孟子，认为他并未直接引用《周易》上的辞句，其实最善用《易》。他写道：“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始为知《易》。孟子著书，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可谓善用《易》者。”^③邵雍后来著书贯彻这种思想，他的易学，很少直接引用《周易》文辞，全在独立发挥自己的思想，建立自己的易学体系。这是他青少年时期就养成的学风。

邵雍早年为学，特别注重祖国历史。对数千年文明史，有深入研究，博学强记。于古代史事了如指掌，谈之如数家珍。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他都有独立看法。后来写《皇极经世》，编了一套详细的历史年表，建立了自己的皇帝王伯相递嬗的历史观，评论不同时代历史演变的规律性。其丰富的历史知识，是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积累的。他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是经世致用。

邵雍的学风很可取，认定做学问是为了未来的事业；不

^① 《观物内篇》之七。

^② 《观物外篇》第十二。

^③ 《观物外篇》第十二。

能关在书斋里，要周游四方，去寻求至道；学《易》要善于应用，读史贵在经世，这是封建社会里有志青少年的努力方向和应有抱负。所以朱熹曾经评论说：“康节本是要出来有为的人。”^①邵雍在一首诗中也不无感慨地回忆道：“当年有志高天下，尝读前书笑谢安。”^② 谢安是晋朝名流，少有重名，坚不入官，常挟妓以游，40岁以后才出仕。后为征讨大都督，率侄谢玄大破苻坚于淝水。邵雍所笑者是少年时期的谢安，不如自己“有志高天下”。

青少年时代的邵雍是笃志好学，关心世事，树立远大志向，扩充经邦济世之才，雄心勃勃的人物。身居陇亩，心高天下，满腹经纶，准备出来干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

二、拜师学艺 精通易图 ——青壮年时期（1040—1048）

宋仁宗宝元三年（1040），邵雍30岁。母亲去世，他守丧于苏门山百源之上，汲水烹饪以养父亲，善尽孝道，闻名乡里。这一年对邵雍来说是出乎意料的转折性的一年。一个偶然的机缘，结识一位奇人，改变了邵雍的去向，影响终身。

这位奇人，名叫李之才（?-1045），字挺之。之才初为卫州获加主簿，权共城令。有一天，这位县令听说邵雍在苏门山躬耕苦读，颇有才华，又能克尽孝道，十分赞赏，就亲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

^② 《击壤集》卷五《代书寄友人》。

自上山来会见他。李之才进门，见邵雍正在看书，说道：“早就听说你志向不凡，专心攻读诗书。以读书为乐，今日一见，果然如此。”邵雍说道：“村野匹夫，读书之外，别无乐趣。”之才说，“你可不是读死书的人，未知儒学之外，对物理之学有无兴趣？”邵雍向他请教了物理之学的入学门径。过了数月，李之才又来会见邵雍，同他谈物理之学的心得，邵雍的思想开始有所领悟。之才高兴道：“物理之学你是有点门径了，你可知还有性命之学吗？”邵雍回答道：“物理之学尚未入门，性命之学更不着边际，请老师赐教。”^①从此，邵雍正式拜李之才为师，转向钻研物理性命之学。踏上影响自己学业方向的第一步。

李之才究竟是什么人？原来他是进士出身的一位数术家。曾从他的老师穆修那里学得一手绝学——《周易》数术学。这种学问，起于汉代京焦之徒，一直在民间流传，深受道教青睐。直到五代时期的道教祖师陈抟（890？—989）才将这种学问公开传授给种放（956—1015），种放传给他的弟子穆修（？—1032），穆修再传给李之才。邵雍已是陈抟的四传弟子了，他们师徒之间秘密传授的易学，同通行的《周易》思想体系并不相同，其中心思想来自一幅所谓《先天图》。

邵雍得到这幅秘传的《先天图》不容易。李之才从穆修那里得来就经过艰苦的过程。穆修也是一位隐士，此人性格十分孤僻，平日里不苟言笑，少与人接触，显得十分威严；李之才经常遭到他的呵斥、怒骂。李之才不管老师如何严厉，总是十分恭敬，千方百计讨老师喜欢。经过穆修长时间考验，

^① 见《宋史·邵雍传》。

认为李之才果有决心，堪称自己的高足，终于把《易》学传授给他。因此李之才非一般“学而优则仕”的儒者可比。

李之才来到共城，虽身为县令，却在暗中物色有灵根的人，作为自己的易学弟子。听说邵雍清贫好学，很有孝心，又具大志，所以主动到邵雍家来访问，一见果然不凡，经过认真考虑，接受邵雍的拜请，决定收他为弟子。

李之才并不是一开始就教邵雍学《易》，而是先让他读《春秋》，这是试探，看邵雍的天分如何。说什么物理之学、性命之学，都只是让邵雍扩充多方面的思想文化知识，锻炼他的思维方法，为钻研陈抟老祖传下的易学，做好文化知识方面的准备。物理之学本是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围，在中国的古代，主要是指天文、地理、历法、阴阳五行等方面的知识，探讨宇宙万物发生发展的奥妙；性命之学，原先是儒家提出的人性论、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主张尽性知天知命；后来成了道教专门研究的问题，即关于人的自然本性（即命）和后天修养的思想品德（即性）的关系，讲如何修身养性，以求长生久视。这性命之学，的确是道教祖师陈抟长期研究的课题。李之才要求邵雍先研究物理之学和性命之学，这可能是陈抟、种放、穆修师徒传道的共同要求，目的在于将弟子从儒学中争取出来，物理之学、性命之学，是同儒家传授的内圣外王之学大相径庭的。儒学的目标是要把人培养成为贤人君子，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投身社会成为出将入相之才，即封建社会的各级候补官吏，走的是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物理、性命之学，孔子、孟子等儒学大师平时是不大讲述的，故孔子的弟子曾说：“夫子之文章可

得而闻也，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①因为“性与天道”属于物理、性命之学，孔子一般不谈。

早先，邵雍一直是学习儒家典籍，此时拜李之才为师，可说是改换门庭，走上另一条人生道路。他的意志是不是十分坚定呢？李之才自然要经过一番考察，决不会轻易把自己得来的学问传给靠不住的人。邵雍不负李之才的期望，开始认真学习《周易》，“写《周易》一部，贴屋壁间，日诵数十遍”。^②把《周易》的经文、传文逐字逐句弄明白，熟记于心，力图心领神会，再求名师指点。李之才见他研究物理、性命之学日渐上路，不禁喜上心头，师徒之间情谊日笃。

不久，李之才离开共城，调任河阳司户曹，邵雍就跟随老师去河阳，住在州学内。因家境甚贫，无钱买灯油，为了学习，宁肯炒菜不放油，将食油用去点灯。有一天，一位军官自京师派往戍边，见邵雍如此刻苦学习，说道：“谁苦学如秀才者！”^③派人送给邵雍一百张纸、十支笔。邵雍再三推辞，终于接受了。邵雍追随李之才，虚心向他请教，用当年李之才侍候穆修的恭敬态度侍候李之才，“虽野店，饭必瀯，坐必拜”^④。李之才经过长期考察，见邵雍对“五经大旨”已融会贯通，决定进一步向他传授《易》学。这就是《宋史·李之才传》所说的“既可语五经大旨，则授《易》终焉”。可是，天不假年，在邵雍投师的第六年（1045），李之才就去世了。

① 《论语·公冶长》。

②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一。

③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一。

④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

那时邵雍已 35 岁，潜心学道，尚未结婚。邵雍在老师去世后，继续沿着他指引的学术路线前进，全靠自己独立钻研，益发刻苦。对《易》特别下功夫。“三年不设榻，昼夜危坐以思”^①。力求有新的领悟。

邵雍“昼夜危坐以思”，果然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折，从接受儒家的纲常名教，转入接受道家和道教的《易》学传统，放弃孔孟之道的经邦济世宏愿，一心钻研《先天图》及先天之学。思想路线发生巨大转变之后，他仍然十分自负，扬言：“欲为天下屠龙手，肯读人间非圣书。”他所指的“非圣书”，就是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所传授的一套易学数术之书。他的思想已似一匹脱缰的野马，什么书籍都要看。他的观点是这样：“天下之言读书者不少，能读者少。若得天理真乐，何书不可读？何坚不可破？何理不可精？”^②好一个“何书不可读”！可见他这时如饥似渴，广泛阅读各类著作，当然已不全是儒家经典，而涉及物理性命、数术之学了。这从他后来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来。

邵雍侈言“何坚不可破？何理不可精”！究竟他继承师说所要破的“坚”、所要精的“理”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看得明白，就是那个神秘的《小圆图》，他叫《伏羲先天八卦图》。邵雍的《易》学，同通行的《周易》思想文化有很大区别，关键就在这幅《易》图上。邵雍描述《小圆图》的奥妙就是“乾坤定上下之位，坎离列左右之门”。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同《说卦传》论述的方位完全不同。详细内容，我们将在剖

^①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一。

^② 《观物外篇》第十二。

析邵雍先天易学时论述。须注意的是，这个“小圆图”的理论，实际上是邵雍综和三方面的内容而来。首先，来自陈抟传下来的《先天图》；其次，来自李之才的卦变说；第三，还包含汉代易学家们的卦气说。邵雍参照三方面的易学思维模式，进行独立思考，加以新的发挥，从而创立一套系统的先天象数学，影响后代。

邵雍既崇拜老师李之才，更崇拜其祖师陈抟。陈抟乃五代及宋初道士，字图南，自号扶摇子。这名字与号都取自《庄子·逍遙游》。举进士不第，乃隐居武当山，好《易》，常手不释卷；善饮，能睡，人号睡仙。后移居华山，赐号希夷。相传著《无极图》刻于华山石壁，传其弟子者为《先天图》。抟为道教祖师之一，世称陈抟老祖，不少宫观有其塑像。陈抟传授的《易》学，与众不同。邵雍的儿子邵伯温曾评论说：“希夷《易》学，不烦文字解说，只有图以寓阴阳之数，与卦之生变。”^①这一特点，对邵雍影响极大。邵雍崇拜陈抟，用心研究其《先天图》，把陈抟的画像藏之家中，顶礼膜拜，陈抟留下的墨迹，也被当作至宝。《观希夷先生真及墨迹》诗中写道：

未见希夷真，未见希夷迹；
止闻希夷名，希夷心未识。
及见希夷迹，又见希夷真；
始知今与古，天下长有人。
希夷真可观，希夷墨可传；

^① 《经世辨惑》。

希夷心一片，不可得而言。^①

邵雍认为陈抟的思想高深莫测，“不可得而言”，正因如此，要加以深入研究，将先天学阐发透彻。

陈抟的思想，不止来自《周易》，更来自老庄，属于道家思想体系，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邵雍要继承发扬陈抟思想，就必须深入研究老庄。所以邵雍对老子和庄子也十分钦佩，并有独到见解。他称赞老子说：“老子知《易》之体者也，五千言（《老子》）大抵明物理。”^② 可见他十分看重《老子》的自然哲学，并将它同《周易》的自然哲学体系融会贯通。邵雍也称赞庄子善通物。他写道：“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此尽已之性，能尽物之性也。非鱼则然，天下之物皆然。若庄子者善通物矣。”^③ 本来庄子与惠子针对“鲦鱼出游从容”，辩论人能否知鱼之乐的问题。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反驳道，“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一辩论是很有名的。显然邵雍完全站在庄子一边，同意庄子“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人能知鱼之乐。这表明邵雍受道家思想影响已相当深了。

邵雍同李之才相处，时间并不长，引起思想上的变化却很大，促使他将儒家思想同道家思想结合，《易》与老庄融合，尽管这种结合在唐代以前早已开始，但经过结合而创立新思想体系者，在邵雍之前还不多见。邵雍由此开创新的宋明道

^① 《击壤集》卷四。

^② 《观物外篇》第十二。

^③ 《观物外篇》第十二。

学，这是他往后所要完成的任务。

庆历年间，之才去世后，邵雍曾到洛阳附近汤家开馆设教，亲自体察洛阳山水之美，开始萌发到洛阳定居的念头。还去京师开封一趟，又回到苏门山。不久病了一场，在病中深入反思了许多问题，仔细检查了自己未来的学术思想道路。直到这时，因为家贫，他已 38 岁，没有结婚，潜心学术，顾不上个人生活问题。

三、开馆授业 著书立论 ——中年时期（1049—1061）

仁宗皇祐元年（1049），邵雍 39 岁，举家自共城迁居洛阳。这里成为他后半生生活的地方。这时邵雍全家四口人，除了父亲，还有继母、庶弟。迁居洛阳，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他的学术思想日益成熟，开始深思精虑，营建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邵雍迁居洛阳，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的学生张岷在《邵氏行状略》中对此有过记述，写道：“（邵公）年三十余，来游于洛，以为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观四方之士，乃定居焉。”^① 显然他所看中的是西京洛阳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优越性，有利于自己的思想发展。从共城迁居洛阳，得到学生侯绍曾的帮助。这位学生后来为武涉知县。起初没有力量新建房屋，就暂时借住在天宫寺里。邵雍在天宫寺设馆教学，陆续来了不少学生，由于他教书深受学生欢迎，状元之

^① 《伊洛渊源录》卷五。

子、中散大夫之子等都来投师，名震西京。邵雍一面讲学一面深研《易》理，提高自己的学术思想水平。

在早期的学生中，有一位姜愚字子发，京师人。他与邵雍同岁，却拜邵雍为师称门生，后来成了太学博士。那时（1053）邵雍已43岁，尚未结婚，姜子发就同另一学生张穆一起说服邵雍，希他早日娶妻。他们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先生年逾四十不娶，亲老，无子，恐未足以为高。”邵雍对他们说：“贫不能娶，非为高也。”于是子发告诉他，同学王允修的妹妹很娴淑，配先生很恰当。穆之也说：“只要先生答应，一切费用聘礼等全由我来承担。”邵雍同意了，娶了王氏夫人。两年后（1055）生下儿子名伯温。邵雍45岁才有了儿子，十分高兴，写了一首诗以作纪念：

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为人父。
鞠育教诲诚在我，寿天贤愚系于汝。
我若寿命七十岁，眼前见汝二十五。
我欲愿汝成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①

迁居新地方，家境贫困。朋友和门生多方援助，替他在履道坊西、天庆观东买了一处房屋，蓬荜环堵，不避风雨。一位姓赵的谏议官主动把自己在汝州叶县的田地借给邵雍家耕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邵雍躬耕以养父母，空时就教学生和自己的儿子。他的名气不断增大，门生、朋友日益增多，生活环境不断改善。

^①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一。

迁居洛阳早期，朋友不多，知心者少，邵雍曾慨叹，“居洛八九岁，投心唯二三”。后来就不同了。主动与他结识的人，有不少东京和西京的大小官吏，他们当中有：谏议刘元瑜（君玉）、吕献可（静居）、王益柔（胜之）、少卿张师锡、吴执中、太丞张师雄、学士王起（仲儒）、侍讲李育（仲象）、郎中姚奭（周辅）、刘龙图之子秘监刘几（伯寿）、修撰刘忱（明复）等，这些早期朋友，往往带着他们的弟子前来向邵雍请教，自称门生，对他十分尊重。在邵雍教育影响下，的确成长了一批有为人才。这对邵雍是莫大安慰。

迁居洛阳后，家境贫困状况虽然尚未摆脱，毕竟有了可供安心研究学问的环境；已有妻子，可慰平生；又有朋友、弟子可与问难，推动自己学术思想发展，逐步着手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于此时结合培养弟子，在三个主要方面推进了自己的学术思想，渐次突出他的思想特点。

首先，《易》学方面有新发展。

邵雍的易学，继承他的老师，发展陈抟所传《先天图》，建立一套先天象数之学，这是同《周易》原有思想体系大不相同的。同王弼以来的正宗易学，主要在象数与义理方面存在显著区别。王弼重义理，主张废除象数，以老庄思想解易，唐代加以沿袭，形成易学研究的主流；王弼扫象言理，把汉代易学家们建立的一套卦气、纳甲、爻辰学说，统统抛弃了。从此，人们对易学象数思维的特点，绝口不谈，久之，连唐代有影响的、反映汉代易学思想特点的易学著作《周易集解》，已不为人所知。邵雍所接受的一套易学，可说是王弼扫象言理以后，象数易学在民间的潜流，有些内容只易学家们师徒之间口耳相传，主要的图象为少数道教人物所掌握，不

轻示人。相传陈抟的易图就是由道士传给他的。邵雍继承师法，专心在象数易学、特别是数学上下功夫。他与王弼不同，主张借象数阐明易理，对于被玄学化的那套义理，基本上不谈。邵雍毕竟善于哲学思考，同汉易象数学又有很大区别，他力图阐发易图中的哲理，象数只是他利用的形式，这样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罕见的。

邵雍的后学张行成，指出邵雍所传先天易学，共有 14 幅易图，后来失传了。他从四川找了回来，这 14 幅图中，有象图 1 幅——《乾坤相交图》，数图 1 幅——《坎离相交图》。象图演化出《四象运行图》1 幅，数图演化出《八卦变化之图》8 幅，共是 11 幅，加上《有极图》、《分两图》、《卦一图》，共 14 图。见于张行成所著《周易变通》，是否邵雍先天图真传？已不可考。这些图中，有一部分载于《宋元学案·百源学案》，名为《八卦次序之图》、《八卦方位之图》、《六十四卦次序图》、《六十四卦圆图》、《六十四卦方图四分四层图》、《康节卦气图》。这是比汉代《周易》象数学家所构造的卦气、纳甲、爻辰、八宫卦次等图更有意义的一些图象，图象中所蕴含的义理比汉代象数学的图象丰富。不难想象，邵雍在构造这些图象时颇费心血，少不了昼夜苦思，绞尽脑汁，反复琢磨。由于未正式出版，故皆亡佚。后学收集整理，真伪实已难辨。即是后学创作，归功邵氏，亦未为过，因在其著作中，大都可见其端倪。后世称邵雍为易学大师，都在肯定其对先天易学的开拓功绩。邵雍借助这些易图，表述了他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元会运世的宇宙生成史观和皇帝王伯的中国历史观。同汉代周易象数学家们用易图显示的思想内容大有区别。可以想象，构造先天学易图在邵雍固然前无古人，借易图阐

明自己的宇宙观、历史观，更是空前绝后。从哲学上看来，这些易图所反映的易学象数思维模式，比它所直接论述的思想内容更有认识论上的价值，难怪他所创造的《六十四卦圆图》和《六十四卦方图》后来传入西方，引起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浓厚兴趣，予以高度评价。这是邵雍始料不及的。

其次，开始涉猎佛学。

邵雍初到洛阳，借住天宫寺。此乃佛教寺庙，庙中和尚不时向他请教，他又常到龙门石窟参观，拜访少林寺、白马寺，开始受佛教思想感染。虽然邵雍不喜欢佛教，但对佛教的基本文化知识仍不免多加涉猎，并受其思想影响。唐代以来，儒、道、佛三教思想，不断相互容摄涵化，援佛入儒、援佛入道已大有人在。邵雍思想中容纳某些佛学思想不足为奇。邵雍所反感的是佛教不结婚，讲苦行，重修炼等宗教清规。他的儿子邵伯温谈到其父对佛学的态度时写道：“论文中子（王通）谓佛为西方之圣人，不以为过。于佛老之学未尝言，知之而不言也。”^① 邵雍写《乾坤吟》一诗，以表示自己的修道方法：“道不远于人，乾坤只在身；谁能天地外，别去觅乾坤。”^② 这同禅宗所说的：“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其思路与措词何其相似。邵伯温说他父亲对佛学“知之而不言”，这是中肯的。

第三，发挥道教思想。

《先天图》乃传自道士陈抟，邵雍思想日益同道教思想接

① 《河南邵氏闻见前录》卷十九。

② 《击壤集》卷十三。

近。每天焚香静坐，修心养性，俨然道士行径。对道教养生功法颇有体会。诗云：“廓然心境大无伦，尽此规模有几人？我性即天天即我，莫于微处起经纶。”^① 又云：“天地与身皆易地，己身殊不异庖牺。”^② 这是道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将人身与天地乾坤相比拟，人体自有一太极，同伏羲八卦方位无异。正是道教内丹说的反映。

邵雍有些思想神秘莫测，大抵来自道教。他说：“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节可以观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贵之哉！”^③ 人说有些道士善通天文地理，屈指一算，可知过去未来，同邵雍的观点十分相似。邵雍对占星术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天圆而地方。……天覆地，地载天，天地相函，天上有地，地上有天，天奇而地偶。是以占天文者，观星而已；察地理者，观山水而已。”^④

总之，邵雍迁居洛阳后，其学术思想日益发展。不断探讨宇宙、历史的变化，从事著作。他的《皇极经世》未必在这时脱稿，但是可以想见，大体已在这一时期定下框架。构造了基本图式，只待不断充实修改。他的得意门生张岷论述其毕生的学术造诣，写了一段较全面的评论：“先生治《易》、《书》、《诗》、《春秋》之学，穷意言象数之蕴，明皇帝王伯之道，著书十余万言，研精极思三十年。观天地之消长，推日

^① 《击壤集》卷十九。

^② 《击壤集》卷十九。

^③ 《观物外篇》第十。

^④ 《观物外篇》第八。

月之盈缩，考阴阳之度数，察刚柔之形体。故经之以元，纪之以会，始之以运，终之以世。又断自唐虞，讫于五代，本诸天道，质以人事，兴废治乱，靡所不载。其辞约，其义广，其书著，其旨隐。呜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毕矣。”^①知师者莫如弟子，张岷之论，确非虚美。邵雍毕生潜心学术，营造了《皇极经世》的独特思想体系，本之易学象数，准之自然、社会历史，着眼于政治的兴衰。虽然这种自然观、历史观并不正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毋宁是一种应运而生的历史产物。大凡在中国社会制度发生重大改革的关头，总有一些思想家出来探讨历史的命运，提出新的历史观。周秦之际，邹衍的“五德终始”论，汉代董仲舒的“三统说”，都是当时政治需要的产物。邵雍的苦心孤诣，并不是徒劳的，预示了宋代一场重大社会改革的兴起。邵雍中年时期正是他学术思想的成熟期，也是他构建经世理论的定型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邵雍的学术道路，尚未结束。

^①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

第三章 邵雍的生平 事迹（下）

一、安乐窝中 隐居顺志 ——晚年时期（1062—1077）

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壬寅），邵雍52岁。这一年在邵雍生活历程中，是极不平凡的，因为他欣然迁居“安乐窝”。从此他在安乐窝中生活16年，隐居顺志，诗酒自娱，结交权贵，谈古论今，气度非凡，颇富传奇色彩。

原先邵雍住在履道坊西、天庆观东的田园庐宅。房屋破旧，生活寒苦。后来弟子增多，名声大震，一些退居洛阳的达官贵人，为尊敬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学者，慷慨解囊，为他在天宫寺西、天津桥南，筑此新居。承首的是洛阳地方长官

王宣微，他利用五代节度使安琦珂故宅的地基，郭崇韬废宅的余材，盖了30间新房，请邵雍迁居以度晚年。原任宰相富弼致意门客孟约，又为邵雍在安乐窝对面买了一座花园，园中池水荡漾，竹影婆娑，奇花异木，交相辉映，甚是清幽。邵雍迁入新居后，写诗向王宣微致谢。诗云：

嘉祐壬寅岁，新巢始孱功。
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宫。
槛仰端门峻，轩迎两观雄。
窗虚响潺涧，台迥灿伊嵩。
好景尤难得，昌辰岂易逢。
无才济天下，有分乐年丰。^①

自从迁入安乐窝，邵雍生活更加安定，一面接待来来往往的及门弟子，一面从事著述，认真修改所著《观物内篇》，花更多的工夫推演元会运世的世界年表和皇帝王伯的中国历史年谱，不时写一些咏史诗和山林诗。正如他在《弄笔》诗中写的：“行年五十二，老去复何忧”，无忧无愁，过着自在日子。

这座远近闻名的安乐窝，实际上成为当时洛阳封建士大夫等高人雅士谈今论古，吟风弄月的雅集之地，也是邵雍培养弟子的教育场所。这是一座相当宽阔的私人园林，主要由三位达官为他张罗而成，其地契是司马光的户名，园契是富弼的户名，庄契是王拱辰的户名。住进十年之后，等各种契

^①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一。

券办理停当，正式赠给他，才取得所有权。这时他重新写一首长诗答谢司马光（温公）、富弼（韩公）、王拱辰等至交好友。诗云：

重谢诸公为买园，买园城里占林泉。
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
嘉祐卜居终是僦，熙宁受券遂能专。
凤凰楼下新闲客，道德坊中旧散仙。
洛浦清风蘸满袖，嵩岑皓月夜盈轩。
接篱倒戴芰荷畔，谈麈轻摇杨柳边。
陌砌铜驼花烂漫，堤连金谷草芊绵。
青春未老尚可出，红日已高犹自眠。
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
敢于世上明开眼，会向人间别看天。
尽送光阴归酒盏，都移造化入诗篇。
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尧夫笔似椽。¹

昔日道德坊中人，而今成为凤凰楼下的新闲客。又有一个长生洞，是邵雍闭门谢客，读书修炼的地方。他在“七千来步平流水”的林园中，倒戴芰荷，轻摇谈麈，“尽送光阴归酒盏，都移造化入诗篇”，朝袖清风，夜迎皓月，安享清福，其乐无比。

移居安乐窝的第6年（1067），邵雍57岁的时候，老父去世了。其父邵古老先生，已享79岁高寿，于治平四年正月

¹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一。

初一日去世。临终之前，除夕夜，他的长子邵雍、次子邵睦和长孙邵伯温（方7岁）守候在病床边，邵古对他们说：“我等不到新年到来就要去另一世界了。”邵雍等听后，放声痛哭。邵古反安慰他们说：“吾儿以布衣名动朝廷，子孙皆力学孝谨，吾瞑目无憾，何用哭！”^①因为他平日爱用大杯饮酒，此时命他们酌酒，以饮酒告别。邵雍斟上一大杯酒献上，他父亲一饮而尽，再斟一杯献上，只饮了一半，留下遗嘱说：“吾生平不害物，不妄言，自度无罪。即死，以肉祭，勿做佛事乱吾教，勿令吾死妇人手。汝兄弟候我就小殓，方令家之人哭，勿叫号俾我失路。”看来邵古老先生死前头脑十分清醒。生前不信佛，故不准请僧人做道场。临死不准女人接近他；刚死之时，不准哭，那会令他迷路。不用说，邵雍一一依从。他把父亲葬于伊川神阴原，是他同程颢（正叔）一起用五音择地法选定的墓地，不用《葬书》上讲的那套“阴阳拘忌之说”。先是小殓，直到当年十月三日正式入葬，打开棺材，其尸“颜貌如生”^②。

正当邵雍居父丧的悲痛日子，不到二年又发生另一悲痛事。他的同父异母弟弟邵睦才33岁，忽然因病无治死了。刚葬父亲，又葬弟弟。这位弟弟，虽是异母所生，因少邵雍25岁，对邵雍十分尊敬，平日靠邵雍教他学习，他视邵雍如师父。邵睦去世，使邵雍失去一位得力助手，甚为悲痛，有诗悼念道：“慈父前年忽倾逝，尔弟今年命还促。独予奉母引四

①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二。

②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二。

子，日对几筵相向哭。不知肠有几千尺，不知泪有几千斛。”^①接连发生家庭不幸，大大抵消了邵雍在安乐窝的欢乐心情。

熙宁二年（1069），还在王安石主持变法的酝酿阶段，朝廷下诏，令地方官举荐隐逸之士。当时的洛阳名流，希望邵雍出来做官，报效朝廷，都被邵雍一一拒绝了。先是富弼刚任宰相，示意大卿田斐请邵雍出山，邵雍没有答应。写诗表示感谢。接着文彦博（潞公）官洛阳，以两府礼召之，他亦不往。再后，王拱辰官洛阳，推荐邵雍与常秩二人，均不应命。现在神宗初即位，朝廷正式下诏荐举隐逸，于是御史中丞三司副使吴克（后为宰相）同龙图阁学士祖无择共同推举邵雍，除秘书省校书郎、颖川团练推官，邵雍再次表示推辞，朝廷不允许，只好勉强应命，然后称病不赴任。写两首诗答谢朋友。其一曰：

生平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
断送落花安用雨，装添旧物岂须春。
幸逢尧舜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
六十病夫宜揣分，监司无用苦于陈。

再一首云：

却怨乡人未甚知，相知深厚又何直。
贫时与禄是可受，老后得官更难为。
自有林泉安素志，况无才德动丹墀。

^① 《击壤集》卷六《伤二舍弟无疾而化》。

苟扬若守吾儒分，免被韩文议小疵。^①

邵雍一再辞官，决心隐居终生，在安乐窝作“瓮牖”一室，读书燕居其下。“旦则焚香独坐，晡时饮酒三四瓯，微醺便止，不使至醉”。尝有诗云：“斟有浅深存燮理，饮无多少系经纶，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②还有一首诗，题为《闲居吟》，表明他对自己的隐居之地十分满意。诗云：“闲居须是洛阳居，天下闲居皆莫如。文物四方贤俊地，山川千古帝王都。”^③

二、交游贤俊 讲学为乐

邵雍虽然隐居，不问政事，实则最便于以平民身份与达官显贵时相往来；一些退休或暂时失意的显贵，又因其同一介布衣交往而避免引起政治上的猜疑。二者各有方便，相互安慰，建立鱼水深情。这时同邵雍时相往返者，有三位最显赫的人物，司马光、富弼、吕公著。三人都位居宰相，却与邵雍结为知交，传为佳话。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赠温国公，谥文正。英宗朝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时升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因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熙宁四年（1071）退居洛阳。司马光是知名史学家，正主持编撰《资治通鉴》；他也是一位易学家，

^①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一。

^②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

^③ 《击壤集》卷三。

写有易学著作《潜虚》，亦属“易外别传”的图书之学。他同邵雍有着多方面的共同语言。

司马光退居洛阳后，在尊贤坊买田二十亩，建了一座大园林，名曰“独乐”。独乐园同安乐窝相去不远，二人时相过从。司马光兄事邵雍，引为同乡，他说：“光，陕人；先生，卫人。今同居洛，即乡人也。有如先生道学之尊，当以年德为贵，官职不足道也。”¹ 正如法国著名东方学家里奈·洛鲁塞特（1885—1952）所描述的：“邵雍则是一位飘逸的梦想家。……邵雍拒绝出仕，而满足于在其陋室中接待当时的卓越人物，其中有历史学家兼宰相的司马光，每当被宫廷的激烈生活弄得疲惫不堪的时候，他就常到邵雍这里来寻得片刻的安宁。”² 有一天，司马光约邵雍同游崇德阁，等了许久，邵雍不到，遂写了一首诗以抒感慨：“淡日浓云合复开，碧崇清洛远萦回。林端高阁望已久，花外小车犹未来。”邵雍到后，随即和了两首。其一云：“君家梁上年时燕，过社今年尚未回。请罚误君凝峙久，万花深处小车来。”另一首写道：“天启夫君八斗才，野人中路必须回。神仙一语难忘处，花外小车犹未来。”³ 邵雍对司马光半是恭维，半开玩笑，二人情深意洽，形于笔端。又一次，司马光着深衣（居家常礼服），自崇德寺书局散步洛水堤上，因过康节天津之居，让人向邵雍通报说：“程秀才来访。”邵雍一见，不是什么程秀才而是司马温公，便

1.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一。

2. 《中华帝国的崛起与繁荣》，《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108页。

3.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一。

问道：“为何通名程秀才？”司马光笑着答道：“司马氏原出自程伯休父，故也可姓程。”这次又留诗一首云：“拜表归来抵寺居，解鞍纵马罢传呼。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草软波清沙路微，手携筇杖着深衣。白鹭不信忘机久，见我犹穿岸柳飞。”邵雍也少不了依韵和诗寄兴，诗云：“冠盖纷纷塞九衢，声名相轧在前呼。独君都不将为事，始信人间有丈夫。风背河声近示微，斜阳淡泊隔云衣。一双白鹭来烟外，将下沙头却背飞。”^① 不难想见，司马光脱掉紫衣金带，挥去传呼，独自穿着便衣散步，来到邵雍门前，自称程秀才求见。此情此景，他同邵雍是多么随和的态度。二人平日言谈若非十分投合，怎致如此。邵雍有懒起习惯，曾写《懒起吟》诗一首：“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忻起，帘外落花撩乱飞。”司马光读了很喜欢，请邵雍写来贴在帘上。《击壤集》中，他们二人唱酬的诗篇不少。温公尝问康节曰：“某何如人？”康节曰：“君实脚踏实地人也。”^② 温公听了很满意。说明二人相知甚深。

邵雍同富弼（1004—1083）的关系也非同一般。王安石变法期间，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除了司马光，还有富弼、吕公著、文彦博（1006—1097）等，都纷纷离开朝廷，来到洛阳，或是遭贬、革职，或是主动请辞，为的是同新党划清界限。这些头面人物萃集洛阳，俨然成为在野内阁。他们把洛阳当作避风港，同隐居不仕的邵雍在思想感情上有着许多共鸣。富弼本是洛阳人。早在庆历三年（1043）就同范仲淹一

^①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一。

^②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一。

起推行过“庆历新政”；后为贤相，封郑国公。熙宁二年（1069）再次拜相，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求退居洛阳养病。他在洛阳修了一座堂皇的府第，离安乐窝很近。富弼说：“自此可时相招矣。”邵雍说：“某冬夏不出，春秋时，间过亲旧问。公相招，未必来；不召，或自至。”富弼一般是谢客求见的，却对儿子说：“康节先生来，随时相见”，把他作特殊客人看待。有一天，富弼同邵雍相会于后园，谈论天下事，很投合，兴奋之至，不觉独步走下堂来了。邵雍也不起迎，反而指着两位公差笑着说，“你忘了拄拐杖了”！富弼看到邵雍已年高，劝他学些修养功夫，邵雍说：“可不能学人胡走乱走啊！”^①一天，邵雍突然驾车去访问老友富弼，到了府上，二人一面饮酒，一面闲谈，因谈得很投机，不觉到了深夜，忽然一阵风雨，邵雍不愿留宿，冒雨而归。富弼写诗以记当时深情。诗云：“先生自卫客西畿，乐道安闲绝世机；再命初筵终不起，独身穷巷寂无依。贯穿百代尝探古，吟咏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访，醉和风雨夜深归。”邵雍随即吟诗一首云：

道堂闲话尽多时，尘外杯觞不浪飞。
初上小车人已识，醉和风雨夜深归。^②

有一次，富弼面带忧愁，问邵雍道：“先生猜猜看，我在忧虑什么？”邵雍当即说：“是不是因为王安石罢了相，吕惠

^①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一。

^②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一。

卿参知政事，怕他比安石更凶暴呢？”富弼说：“正是”。邵雍说：“公无忧。安石、惠卿本以势力合。惠卿安石势利相敌，将自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不久，惠卿果然以种种手段加害王安石。富弼称赞邵雍说：“先生识虑绝人远矣！”有一次，高僧颙修开堂说法，富弼、吕晦叔欲往参加。司马光认为不妥，希望邵雍加以劝阻。他说：“富公果往，于理未便。某后进，不敢言，先生曷止之。”邵雍说，时间已来不及了。第二天，富弼果然参加。后来邵雍见到富弼，笑问道，“听说皇王欲用裴晋公礼请你再次出山。”弼曰：“你看我年老多病还能出山吗？”邵雍说：“要是有人说，皇上要你出来做官，你推病不出；和尚开堂说法，你却能参加，能说这不对吗？”富弼惊恐地说：“啊！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原来抗旨不出，是会给政敌以口实的。邵雍为老友着想，的确思虑周到。

邵雍的另一好友，是后来当了宰相的吕公著（1018—1089），公著字晦叔，卒谥申国公。神宗时为御史中丞，因反对推行青苗法，攻击吕惠卿，罢官。退居洛阳，与康节、温公时相往来。但他总是沉默寡言，终日相处，不过几句话。有一天对康节长叹道：“民不堪命矣。”其所叹者是王安石推行新法，尽起用一些年轻的“险薄之士”。康节对他说：“王介甫（安石）者远人，公与君实（司马光）引荐至此，尚何言？”吕公著自责道：“公著之罪也。”^① 吕公著有三个儿子，希哲、希积、希纯，均师事邵雍，同邵雍之子伯温交情甚笃。

当时洛阳人才荟萃。邵雍除与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王拱辰等显要人物交游外，还常同一些风华正茂的年轻学者谈

^① 《河南邵氏闻见前录》卷十二。

道论学。他们当中有倡导宋明理学的鼎力人物，张载（1020—1077）、程颢（1032—1085）和程颐（1033—1107）。张载在开封讲易学，后与二程会面，切磋学问。不时同二程一起去看望这位易学界长辈。二程兄弟住处离安乐窝很近，与邵雍可说是同一里巷中人，又都热爱易学，常去向他请教。不过他们对邵雍讲的那套先天象数学不大感兴趣，邵雍比二程长20余岁，他们称得上忘年交。邵雍很想把自己所长的数学教与二程，可是见面谈话都是关于易学义理和社会问题而不涉及数学。程颐对他的学生说：“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年余，世间事无所不问，惟未尝一字及数。”程颢明确表述，邵雍想教他们数学，他们听邵雍对别人说过，要学数学须要20年不做官，也就不敢问津了。他说：“尧夫数学欲传与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学须得二十年。”¹还说：“尧夫初学于李挺之，师礼甚严，虽在野店，饭必襕，坐必拜。欲学尧夫亦必如此。”²很显然，二程只是把邵雍看作同里巷的尊长，并不愿从严格意义上拜他为老师。他们的老师是理学名家周敦颐（1017—1063）。老师健在，弟子是不得轻易改换门庭的。不过，程颢同他弟弟不同，对邵雍的数学不是毫不过问，有时还不妨试一试。《宋元学案》记载：“明道（程颢）闻先生（邵雍）之数既久，甚熟。一日，因监试无事，以其说推算之，皆合。”³在二程中，邵雍对程颢更加推崇，把他列为洛阳四贤之一。写了一首《四贤吟》来表彰他们各自的特点。

¹ 《伊洛渊源录》卷五。

²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

³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

彦国（富弼）之言铺陈，晦叔（吕公著）之言简当。
 君实（司马光）之言优游，伯淳（程颢）之言条畅。
 四贤洛阳之望，是以在人之上。
 有宋熙宁之间，大为一时之壮。^①

邵雍所说的四贤，只是指当时在洛阳的四位名人，都是不满意王安石新法，退居洛阳而同邵雍来往最亲密的朋友。程颢也题词恭维邵雍等人说：“君实笃实，晦叔谨严，尧夫放旷。”^②

尽管邵雍的朋友积极反对熙宁变法，不同王安石合作，邵雍本人同四贤的态度仍是有区别的。他对新法持保留态度，并不主张同新党激烈冲突，而竭力加以调和，从以下几件事中反映出来：1064—1067年间，有一次邵雍同客人在洛阳天津桥上散步，忽闻有杜鹃啼声，邵雍当即“惨然不乐”。客问何故？邵雍说：“洛阳向来没有杜鹃，而今有杜鹃啼，是不良预兆。”客问这是什么原因，邵雍用地气变化作解释说：“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地气之先者也。《春秋》书‘六鹢退飞’、‘鶗鴂来巢’，气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于北，南方疾病瘴疟之类，北人皆苦之也。”^③邵雍预感到一场政治变革不可避免，却以自然现象作征兆，用天人感应思想来说明这场变革不以人

^① 《击壤集》卷十九。

^② 《二程遗书》卷六。

^③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三。

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他坚持的一种唯心史观。正因为他认为这场政治斗争不可避免，也就不再去坚决反对，而采取缓和态度。熙宁变法开始后，官场发生重大变化，新党上台，旧党隐退，邵雍冷眼旁观，吟诗写照云：“几家大第横斜照，一片残春啼子规。”另一诗中写道：“流莺啼处春犹在，杜宇来时春已非。”^①

熙宁三年，王安石主持变法，遣派不少“新进少年”，到各地推进新法，引起州县地方官不满。邵雍闲居洛阳，“门生故旧，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归。”他们写信给邵雍征求意见。邵雍站在调和立场，开导他们说：“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何益耶？”^②投劾是向上级部门递交揭发领导者罪行的行状，是弹冠离职的激烈对抗行为，邵雍认为这样激烈冲突没有益处，不如采取缓和态度，表面上奉行新法，在可能的情况下略加变通，予以宽缓。他认为这样做对朝廷、对人民都有益处。

邵雍不想取罪王安石，对某些情势尽量回避。有一次，王宣微的儿子茂直宴请王安石的弟弟王平甫和反对新法的吴处厚，请邵雍参加。邵雍连忙以身体不适，推辞了。事后向茂直解释说，我之推辞是有原因的。吴处厚爱发激烈言论，他当着王平甫大骂王安石，必定难堪，故尔回避。茂直说：“先生料事如神。昨天，处厚在席间诋毁安石，他弟弟差点要告到官府，我苦苦劝解，才算平息。”^③ 邵雍同王安石的弟弟平

^①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三。

^② 《宋史·邵雍传》。

^③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二。

甫相处甚好，平甫当时为西京（洛阳）国子监教授，不时同邵雍相游，他对邵雍的印象不错。他把邵雍的为人处世之道告诉王安石，王安石很高兴地说：“邵尧夫之贤不可及矣。”^①说明邵雍虽未积极支持推行新法，但对其折衷调和态度，王安石是十分理解的。

邵雍擅长数学，从不轻易教人，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更是被他拒之门外。当时受到王安石器重的，有位博学善文的章惇（1035—1105）。此人在邵雍面前“纵横议论，不知敬”，想邵雍传授他数术之学。邵雍拒绝了，对他说：“须十年不仕乃可。”还有一位邢恕（和叔）是程颢的学生，吕公著推荐他任崇文院校书，因非议新法，被贬官，很想邵雍教他数术之学，也被邵雍拒绝了。这两个人后来都被列入《宋史·奸臣传》。《宋元学案》云：“百家谨按：先生数学，不待二程求，而欲与之；及章惇、邢恕，则求而不与。盖兢兢乎慎重其学，必慎重其人也。上蔡云：尧夫之数，邢七要学，尧夫不肯，曰：徒长奸雄；章惇不必言衍矣。”^②邵伯温回忆当时邢恕向他父亲学数术的情况说：“邢和叔亦欲从先君学，先君略为开其端倪，和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学，未有许多言语，且当虚心涤虑。然后可学此。”邢恕离开邵雍时，留别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圮下每惭呼孺子，床前时得拜庞公。”邵雍以诗作答云：“观君自比诸葛亮，顾我殊非黄石公。”^③

^①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一。

^②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

^③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

邵雍隐居洛阳，交游甚广，向无贵贱亲疏之分。学生不少，谁忠厚，谁奸诈，自有分寸。对数学不是任何人都教授，必慎重选择对象。因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士大夫都乐于同他亲近，向他求教。程颢在《邵尧夫先生墓志铭》中写道：“（尧夫）讲学于家，未尝强以语人，而就问者日众。乡里化之，远近尊之，士大夫过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家。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贤。”又云：“接人无贵贱亲疏之间。……与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乐道人善，而未尝及恶。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①

三、激流中安享十年快活

从熙宁元年神宗即位，王安石上书主张变法，到邵雍去世，约十年光景。这十年，从社会政治情况看，是北宋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从邵雍的生活情况看，却是他声望最高，心情最愉快的日子，难怪他的好友程颢（明道）曾说：“邵尧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乐。”^②

邵雍在安乐窝中，自己规定了“时有四不出，会有四不赴”的生活原则。所谓四不出，就是大热、大冷、大风、大雨不出门；所谓四不赴，是指公会、葬会、生会、醵会不参加。每岁二月出游，四月渐热即止；八月天凉出游，十一月天渐寒即止。他在一首诗中说：“有时自问自家身，莫是羲皇

① 《二程全书·明道文集》。

② 《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一。

已上人。日往月来都不记，只将花卉记冬春。”^①

邵雍出游，让人推着小车。“每出，人皆倒屣迎致。虽儿童奴婢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争具酒馔，问其所欲。不复呼姓，但名曰：‘吾家先生至也’”。^②

洛阳有十二家富豪，仿照安乐窝为邵雍修建别墅，号曰“行窝”。准备随时接邵雍留宿。所以他死后，有乡人在挽诗中写道：“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邵雍去到“行窝”，的确同主人家中融洽无间，“其家妇、姑、妯娌、婢妾有争竞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欢心。于是酒肴竞进，宴饮数日，复游一家”^③。这些轶事说明邵雍当年在民间有很高威信，赢得各界人士的尊敬。邵雍写了一首《小车行》记载当年盛况：

喜醉岂无千日酒，惜冬还有四时花。
小车行处人欢喜，满洛城中都似家。^④

还有一首《风吹木叶吟》，写道：

风吹木叶不吹根，慎勿将根苦自陈。
天子旧都闲好住，圣人余事冗休论。
长年国里神仙侣，安乐窝中富贵人。

① 《击壤集》卷十一。

②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二。

③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二。

④ 《击壤集》卷八。

万水千山行已遍，归来认得自家身。^①

邵雍六十岁后，始穿隐者之服，“乌帽、綵褐，见卿相不易也”。司马温公依《礼记》着深衣，冠簪、幅巾，縕带。每出，朝服乘马，用皮匣储深衣随其后，入独乐园则衣之，曾谓康节曰：“先生可衣此乎？”康节曰：“某为今人，当服今时之衣。”^②

邵雍在洛阳，夏居安乐窝，冬居云溪洞。成天与“四物”相亲。这就是著书、饮酒、焚香、吟诗。《安乐窝中四长吟》写道：

安乐窝中快活人，闲来四物幸相亲。
一编诗逸收花月，一部书严惊鬼神。
一炷香清冲宇泰，一樽酒美湛天真。
太平自庆何多也，惟愿君王寿万春。^③

一编诗，指《击壤集》；一部书，指《皇极经世》，一诗一书凝结了邵雍平生的思想感情。他那坦荡幽闲的人生，玄思宇宙的情怀，在其中裸露无遗。一炷香，献在陈抟老祖画像面前，用以帮助自己凝神静思，修身养性；一樽酒，是他安顿人生的慰藉品，借酒吟诗赏月，其乐融融。邵雍在洛阳的幽闲生活，另一《小车吟》描述得更加生动：

^① 《击壤集》卷七。

^②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二。

^③ 《击壤集》卷九。

自从三度绝韦编，不读书来十二年。
 大甑子中消白日，小车儿上看青天。
 闲为水竹云山主，静得风花雪月权。
 俯仰之间俱是乐，任他人道似神仙。^①

邵雍的晚年，只在休闲中度过，学孔子韦编三绝，将《周易》读得烂熟，十二年来再不读书了。犹如春蚕到老，只吐丝，不食桑叶。在小车儿上逍遥，过着神仙般日子。

邵雍喜欢用诗来记叙自己的年华。其《六十三吟》写道：“行年六十有三岁，齿发虽衰志未衰。耻把精神虚作弄，肯将才力妄施为？”^②熙宁八年，写了《六十五岁新正自贻》：“予家洛城里，况在天津畔。行年六十五，当宋之盛旦。……凉风竹下来，皓月松间见。面前有芝兰，目下无冰炭；坐上有余欢，胸中无交战。冬夏既不出，炎凉徒自变。荣辱既不入，富贵徒自衡。恶闻人之恶，乐道人之善。”^③邵雍 67 岁这年，预感到自己的悠闲日子快要结束了，写了《自贻吟》：“六十有七岁，生为世上人。四方中正地，万物备全身。天外更无乐，胸中别有春。”^④

熙宁十年，邵雍 67 岁。六月，微疾。有一天午觉醒来，说他做了一个梦，“吾梦旌旗鹤雁自空而下，导吾行乱山，与

^① 《击壤集》卷十二。

^② 《击壤集》卷十。

^③ 《击壤集》卷十四。

^④ 《击壤集》卷十九。

司马君实、吕晦叔诸公分别于一驿亭”¹。

邵雍病危，“气日耗，神益明”。富弼请医生，送药慰问。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前往探望。邵雍笑着对司马光说，“我可要经历一场生命的转化了。”温公说：“先生不至如此吧！”邵雍说：“生死不过一种平常的事罢了。”张载问邵雍，“先生相信推命？我为你推一次。”邵雍说：“若天命则知之，世俗所谓命则不知也。”张载说：“那先生已知天命，还有何可说。”程颢说：“先生至此，他人无以为力，愿自主张。”希望他自己安排一下后事。邵雍说：“平生学道，岂不知此；然亦无所主张。”七月初四日，邵雍用大字写了一首诗，可谓自我论定：

生于太平世，六十有七岁。
俯仰天地间，浩然独无愧。²

当天夜里五更时分，邵雍与世长辞，死前还预测到将收复幽州。交待将他葬于伊川，他父亲的墓后，司马光等原先共议将其葬于洛阳近效邙山，他不同意。

邵雍死后，河南尹贾昌衡言于朝，朝廷当即颁诏，追封秘书省著作郎官衔，并赠粟帛以示抚恤。宋哲宗时，由欧阳修之子欧阳棐向朝廷奏议请谥，云：“（邵雍）虽深于象数，先见默识，未尝以自名也。其学纯一而不杂，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浑大，不见圭角，其自得深矣。”哲宗赐谥“康

¹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一。

² 《邵康节先生外纪》卷二。

节”。温良好乐曰“康”，能固所守曰“节”。^①

理学名流程颢为写《邵尧夫先生墓志铭》，铭曰：“呜呼先生，志豪力雄。阔步长驱，凌高厉空。探幽索隐，曲畅旁通。在古或难，先生从容。有问有观，以沃以丰。天不愁遗，哲人之凶。鸣皋在南，伊流在东。有宁一宫，先生所终。”^②

这位玄思宇宙，留心经世哲理的易学大师经历六十七个春秋，在急流中安享十年神仙快活日子的安乐先生，长眠于今河南省伊川县平等乡平等西村。东临伊水，西依紫荆山。墓碑题曰：“宋先儒康节邵夫子墓”。墓前石坊一座，横额“安乐佳城”。为邵雍生前为墓地命名；石坊北面有山门，联曰：“删后无诗，啸月嘲风留击壤，画前有易，蹑根探窟见先天”^③。

明代思想家洪自诚，十分欣赏邵雍的思想与为人，写了一段很好的评议：“事莫大于揖让征诛，而康节云：‘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人能以此胸襟眼界，吞吐六合，上下千古，事来如沤生大海，事去如影灭长空，自经纶万变而不动一尘矣。”^④以此评价邵雍一生的胸怀眼界，颇为得体，邵雍得此异代知音，可谓幸矣。

^① 《二程全书·明道文集》。

^② 《古共邵氏宗谱》。

^③ 邵康节文物保护伊川基金会编：《易圣故里通讯》第1期。

^④ 《菜根谭·评议》。

第四章 社会政治思想 和人生哲学

生活在北宋中期的邵雍，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历史人物。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能十分敏锐地观察当时的历史政治形势，蒿目时艰，深体民瘼，指陈时弊，常能入木三分，适乎历史发展的洪流，未尝不认识社会改革的重要。然而，他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缺乏投身社会历史发展洪流的勇气，选择的是一条远离社会政治斗争的人生道路。邵雍是一位儒者，其思想情趣又倾向于道家，可说是非道非儒，亦道亦儒的社会贤达。是平民，又是贤达。交通王公显贵，不离村野匹夫。矜江山之气度，饱风月之情怀，堪称北宋一怪杰。

一、社会政治思想与政治态度

邵雍用他创立的“皇帝王伯”或“道德动力”四段论的

历史观来看待北宋时期的社会政治。其政治思想浸透着批判意向，悲婉情结，提出过一些有针对性的政治见解，但他在现实生活中，始终保持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批评现实，而又逃避现实，似隐非隐，洁身自好，实现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周易》情志。其政治思想的批判性，同其政治倾向的脱离现实性，形成鲜明的思想反差，从而铸成这位“安乐窝”人的特殊性格。

首先，邵雍提倡“治必通变”的政治主张。

尽管邵雍认为当今世界离天地终结尚饶有时日，毕竟人类最美好的时代已成过去。如日丽中天之后，必趋西垂；花繁似锦之后，日益枯萎。人世衰垂之日显，社会乃今不如古。邵雍这种悲观情绪，是当时北宋王朝政治形势感染而来。他虽处北宋全盛时期，而朝廷正受到腹背夹攻。外有辽和西夏的入侵，国力单薄，只得屈辱求和；内有农民起义，国库空虚，难度危机。邵雍认为社会在变化，政治原则亦当随之变化，这是符合易学“唯变所适”思想原则的。《观物外篇》写道：“为治之道，必通其变，不可以胶柱，犹春之时，不可以行冬之令也。”^① 为治“必通其变”，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儒学观点是不同的。按照这一原则，邵雍对北宋社会改革家们的变法图强主张理应持支持立场。他主张一切政治举措，当权其轻重，合乎时宜。他说：“权所以平物之轻重，圣人行权，酌其轻重而已。”^② 这就是说，时代不同，政治情况有变化，人们对待现实社会制度的原则也应相应变化，一

^① 《观物外篇》第九。

^② 《观物外篇》第九。

切当“合其宜”，而不可以胶柱。从“合其宜”的原则出发，邵雍认为“君天下者”可以“改命”，否定了所谓天命不可更改的说法。他发挥《易传》“革命”观念，指出：君命有四种历史状况。“所以自古当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摄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摄命者，革而革者也。”^① 主张天命可以改革，本来是可取的，不过他心目中的改革，同政治家们顺乎历史潮流而提出的改革主张是有所区别的，从他的政治态度上充分反映出来。

邵雍不只认为治世之道，有因有革，必通其变；尤其强调世道之变，主要反映在两大方面。从人心来看，有重义与重利之别；从社会状况来看，有治世与乱世之分。

邵雍用《周易》的卦象变化，来表述治与乱的转化，他说：依《序卦传》的卦序，“夬”以后是“姤”，表明乱生于治；“剥”以后是“复”，表明治生于乱。治世与乱世总是相互交替出现的，社会的变迁，世道的变化，逃不出一治一乱的循环往复，永恒的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明白这一原理，人们就可早作预防，不要待大乱临头，惊惶失措，束手无策。邵雍指出，治世与乱世的出现不是毫无迹象可寻的，总有某些先兆。社会的尚言与尚行，人心之尚义与尚利，可以作为先兆之一。他说：

夫天下将治，则人必尚行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言也。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尚言则诡谲之

^① 《观物内篇》之五。

风行焉。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①

用社会人心及伦理道德风尚的变化，来作社会治乱的晴雨表，这本身就是一种因果倒置的思维方法，并未抓住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不从社会经济利益的冲突、阶级矛盾激化的程度去看社会治乱的根源，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现象。这是邵雍按照自己设定的“道、德、功、力”四维历史法则，来裁决社会演化态势的思想的延伸。在邵雍看来，自周、秦汉以来，中国历史均处于伯（霸）道之世，其特点是尚力、尚争，千多年来一直是弱肉强食的扰攘之世，始终居于乱世之中。他回顾历史说：

夫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吴尝破越，而有轻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骄齐之志。贪婪攻取，不顾德义，侵侮齐晋，专以诈力为事，遂复为越所灭。越又不之鉴，其后为楚所灭。楚又不之鉴，其后复为秦所灭。秦又不之鉴，其后复为汉所灭。恃强凌弱，与豺虎何以异乎？^②

“不顾德义”，“专以诈力”，就是自吴越至秦汉的历史变迁的原因。这是邵雍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极为浮浅的结论。说它

^① 《观物内篇》之七。

^② 《观物内篇》之六。

浮浅，是因为这种结论完全不顾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及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内容，讲不讲“德义”，用不用“诈力”，都不足以概括当时历史前进的动力。尽管如此，邵雍强调以人心向背，作评断社会治乱的标准之一，是有一定价值的。他说：“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汤以功有天下，殷纣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虽时不同，其成败之形一也。”^①以功得天下者，是得民心也；以虐失天下者，是失民心也。邵雍认为民心之向背对社会政治有决定性影响，是有道理的。他以秦汉之际民心的向背为例，强调说：“是时也，非会天下民厌秦之暴且甚，虽十刘季，百子房，其如人心未易何！且古今之时则异也，而民好生恶死之心非异也。”^②假若人心向秦，虽十刘季，百子房也不可能亡秦；秦之亡，亡于人心之向汉。这种分析含有相对真理性，它否定了英雄造时势的说法，意识到人民力量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决定作用。尽管这种分析脱离阶级分析的具体内容，只从抽象的“人心”立论，并不科学，但比起天命论、英雄史观、三统循环史观仍有可取之处。他坚持这种以善恶论成败的唯心史观，得出结论说：

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乎周秦汉楚哉？择乎善恶而已。是知善也者，无敌于天下，而天下共好之；恶也者，亦自矜无敌于天下，而天下共恶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乎周秦汉楚哉！择乎善恶而

^① 《观物内篇》之六。

^② 《观物内篇》之八。

已。^①

善与恶是一对伦理学范畴，不同历史时代，善与恶的标准都有不同内容，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善与恶，对一个阶级来说是善，对另一阶级来说就可能是恶；对剥削阶级来说是恶，对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来说则是善，阶级利益不同，善恶的观念就不同。善与恶是对人们行为的一种价值判断，在阶级社会不存在所谓普遍的善恶标准。邵雍以善与恶，功与虐，义与利等道德观念来评断历史的治与乱，人物的成与败，国家的兴与亡，并没有找到评断历史发展动力的真正标准。难怪他在现实社会矛盾面前，对王安石领导的社会改革，显得左右为难，莫所适从，只好采取回避态度。

其次，邵雍回避现实的政治倾向。

邵雍对现实政治斗争力图回避，但从其诗文中仍可反映出一定倾向。宋代学者指出“康节以品题风月自负，然实强似《皇极经世书》”^②。他的诗句中，蕴藏着他对当时社会的愤激之情，例如他在《题黄河》一诗中写道：

谁言为利多于害，我谓长浑未始清。
西自昆仑东至海，其间多少不平声。^③

“不平声”说的是黄河，影射的是现实。非常委婉，不露痕迹，

① 《观物内篇》之六。

② 《朱子语类·邵子之书》。

③ 《击壤集》卷二。

却又表达了自己内心世界对现实的看法。朱熹曾经评论陶渊明的诗，他说：“渊明诗，人皆说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说得这样语言出来？”^① 这话对于评论邵雍的某些诗篇，不无参考价值。邵雍的《感雪吟》更值得玩味：

旨酒佳肴与管弦，通宵鼎沸乐丰年。
侯门深处还知否？百方流民在露天。^②

虽不及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那么尖锐有力，震人心弦，但也同样反映了作者对豪门歌舞升平，平民流离失所的社会现实的愤懑心情。这也透露了邵雍在吟花弄月之余，仍不忘对社会状况的忧伤。

邵雍本是一介寒士，对于与自己境况相同的儒士及其自鸣清高的性格，充满共鸣。《答人书》反映了这种情怀：

卿相一岁俸，寒儒一生费。
人爵固不司，天爵何尝匱？
不有霜与雪，安知松与桂！
虽无官自高，岂无道自贵！^③

“卿相一岁俸，寒儒一生费”，这是事实，反映了封建社会里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

② 《击壤集》卷十四。

③ 《击壤集》卷四。

高官厚禄者与穷困儒生境况的鲜明差异；说儒生们都是以“道自贵”，这又未免夸张，实是一种鲁迅形容的阿Q的精神自慰而已。

邵雍还有一篇《伤心行》，对世道凌夷不古，人心麻木不仁，即欲针砭之，亦难以济事，感到十分沉痛。诗云：

不知何铁打成针，一打成针只刺心。
料得人心不过寸，刺时须刺十分深。^①

《皇极经世》蕴含了邵雍针砭时弊的金玉良言，他觉得并未为人了解；他对王安石主持的新法，有过不同意见，亦未见采纳，但又无可奈何，只得暗自伤心。他的《安乐窝铭》就抒发了这种无可如何的情绪：

安莫安于王政平，乐莫乐于年谷登。
王政不平年不登，窝中何由得康宁？^②

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在他同司马光、吕公著等私下议论新法时，表现得十分明显。邵雍虽不曾露骨地批评新法，但新法推行中的种种情况，他有自己的见解。《吕氏家塾记》评论邵雍说：“开口论天下事，虽久存心事务者，不能及也。”^③邵雍既深通历史，又精于世故，若能用世，当为贤才，这一点，

^① 《击壤集》卷六。

^② 《击壤集》卷十三。

^③ 《邵子全书·附录》。

近代思想家魏源对之有极高的评价。他写道：“伊川其圣中之伯夷乎！得其清，并得其隘；康节其圣中之柳下乎！得其和，并得其不恭。使伯夷而用世，其才未必伊尹；使柳下而用世，其功不亚于太公。”^①

邵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的不满情绪，反应从不强烈，只在《无酒吟》中，直接有所表露。

自从新法行，尝苦樽无酒。
每日宾朋至，尽日闲相守。
必欲丐于人，交亲自无有。
必欲典衣买，焉能得长久？^②

在《酒少吟》中也有“未饮先忧尽，虽斟不敢倾”的牢骚话。新法初行之时，有些人受旧党思想影响，欲投劾而去，邵雍对此持折衷、劝阻态度，要求他的门生故旧不必采取过火行为。足见邵雍对新法从来不采取猛烈反对态度，这一点是同司马光等不同的。《宋元学案》记载邵雍同司马光在评论旧党人物傅尧俞时，二人观点有所区别。司马光盛赞傅氏，说他具备“清、直、勇三德，人所难养”。邵雍则强调：“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温。”表明别人对新法采取直而勇的激烈反对立场，他是持保留态度的，“不激”、“能温”，正是邵雍自己的立场。由于这种立场，他能同司马光等保持融洽的私人关系，并在新旧两党激烈斗争中，过着安闲清淡的生活。

①）《魏源集·默觚·学篇二》。

②）《击壤集》卷七。

所以程颢说道：“邵尧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乐！”^①说他“安然取十年快乐”，这是有充分证据的。邵雍自己的不少诗篇，反复作了印证。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山川。
寻常巷陌犹簪发，取次亭园亦管弦。
人老太平春未老，莺花无害日高眠。^②

邵雍能在急流中享受十年快活，故他对北宋王朝的统治相当满意，把它看作太平世道，对五代离乱而言，真是“云开复见天”，所以他不论社会如何，只管“日高眠”，做个“快活人”。安乐窝中，打发日子的只有“四物幸相亲”：

安乐窝中诗一编，自歌自咏自怡然。
安乐窝中一部书，号云皇极意何如？
安乐窝中一炷香，凌晨焚意岂寻常。
安乐窝中酒一樽，非唯养气又颐真。^③

诗、书、香、酒是邵氏自我陶醉的“四物”，一编诗，吟花弄月；一部书，评古论今；一炷香，静坐养神；一壶酒，自我陶醉。自寻其乐，得其所哉！与世无争，有何不快！

^① 《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一。

^② 《击壤集》卷十五《观盛化吟》之一。

^③ 《击壤集》卷九。

邵雍并不只满足于现实，更歌颂北宋王朝开国百年来出现了五大太平盛事，是唐虞而下从所未有的。第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第二，“克服天下，在即位之后”；第三，“未尝杀一无辜”；第四，“百年方四叶”；第五，“百年无心腹患”。¹ 这些多是无原则的歌颂，说“未尝杀一无辜”，“百年无心腹患”，是不顾历史事实的妄谈。说“百年方四叶”，是指自宋太祖赵匡胤立国（公元960年）至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百年之间只换了四个皇帝，此乃事实，可能这话说于此年之前；此后，不到十年，换了两个皇帝，英宗（1064年即位）和神宗（1068年即位），并开始熙宁变法（1068—1076）。

邵雍对北宋开初一百年的统治很满意，故《观盛化吟》诗云：

吾曹养拙赖明时，为幸苦多宁不知。
天下英才中遁迹，人间好景处开眉。
生来只惯见丰稔，老去未尝经乱离。
五事历将前代举，帝尧天下固无之。²

他的儿子邵伯温当时对他说，“未尝经离乱”，这话是否说得太过？他却回答说：“吾老且死，汝辈行自知之。”

宋仁宗嘉祐八年，邵雍53岁。他写了《登高顶》一诗，对当时太平景象歌颂道：

¹ 《河南邵氏闻见前录》卷十八。

² 《击壤集》卷十五。

九州环绕若棋枰，万岁崇高看太平。
四海有人能统御，中原何复有交争。
长忧眼见奸雄辈，且愿自为尧舜氓。
五十三年荒没事，如今方喜看春耕。^①

总之，邵雍看到“流民”的痛苦，“寒儒”的穷困，意识到统治阶层的麻木，难闻天下不平之声，而自己却欲超脱这一切而隐居安乐窝，盲目歌颂什么“王政平”，“年谷登”，“能统御”，“无交争”。吟风赏月，醉里乾坤，做一安乐窝中“快活人”。这不只反映了他的人生观，原来他自有一套与当时一般士大夫们不同的人生哲学。

二、人生哲学

邵雍的人生哲学比较特殊，保持着江山气度的儒者风范，无愧为北宋道学家之一。《宋史》将他列入《道学传》，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合称北宋五子。但就其生活情趣来看，更多地显示了风月情怀的道家气象，他师事陈抟的三传弟子李之才，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后人将他与道士陈抟并称，其著作与诗集都编入《道藏》。在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历史状况下，产生了具有复杂个性的历史人物，其人生哲学的两面性，值得剖判。

^① 《击壤集》卷五。

先看邵雍的儒者风范。

他写过一篇长诗，《君子吟》（八首），按儒家道德标准，划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标准就是义与利之分，尚德尚力之分，作福作威之分，好善好恶之分。诗曰：

君子与义，小人与利；与义日兴，与利日废。
君子尚德，小人尚力；尚德树恩，尚力树敌。
君子作福，小人作威；作福福至，作威祸随。
君子乐善，小人乐恶；乐恶恶至，乐善善归。
君子好誉，小人好毁，好毁入怒，好誉入喜。
君子思兴，小人思毁；思兴召祥，思毁召怪。
君子好与，小人好求；好与多喜，好求多忧。
君子好生，小人好杀；好生道行，好杀道绝。^①

把人间的善恶报应理想化，程式化。殊不知作福反召祸，作威反得福；乐善者不祥，乐恶者得逞，都是常有的社会现象；人世间重义者终身受累，重利者洋洋得意，更是人们经常碰见的社会态势。邵雍的《君子吟》，只反映他遵循儒者设定的道德信条，并劝导人们竭诚信从。

《寒夜吟》也表露他严以责己，宽以待人的儒者气概。

天加一倍寒，我添一重被。
不出既往言，不为已甚事。
责己重以周，与人不求备。

^① 《击壤集》卷十六。

唯是大圣人，能立无过地。^①

邵雍把儒家的圣人，作为自己努力追求的典范，宽厚、仁慈、温和，是其待人准则。《仁者吟》写得更明白：

仁者难寻思有常，平居慎勿恃无伤。
争先路径机关恶，退后语言滋味长。
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后必为殃。
与其病后能求药，不若病前能自防。^②

少做“快心事”，待人要宽厚，这种仁者心肠，邵雍在临终之时，还耿耿于怀，用以规劝程颐。《宋元学案》记有一节对话。程颐问，先生从此永别，还有何话说？邵雍以两手加额，作了比试。程颐不解其意，问他：“此为何意？”邵雍回答说：“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耶？”^③短短一段话，刻画了邵雍与世永别前的心胸，劝人作忠厚仁者，存宽容精神。切记“争先路径机关恶”，坚信退后一步天地宽。他还写了一首《路径吟》：“面前路径勿令窄，路径窄时无过客。过客无时路径荒，人间大率多荆棘。”^④

邵雍自许一生只是“诚明”见性，这是宋代理学家发明《中庸》思想，着重提倡的心性之学的中心内容。《中庸》谓

^① 《击壤集》卷九。

^② 《击壤集》卷六。

^③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

^④ 《击壤集》卷十六。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这是说，人生来具有“诚实无欺、明白识物”的本性。这种本性容易丧失，教育的目的正是使人回复明白事理、真实无妄的天赋本性。有了“诚明”本性，乃可通达事理，明照天下。邵雍在《诚明吟》中写道：

孔子生知非假习，孟轲先觉亦须修。
诚明本属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①

这既是邵雍道德修养的法门，也是在认识论上的体悟。人生哲学的要妙，只在发明本性，不假外求。《安乐窝中自贻》，要求自己“不作风波于世上”，安于自己的造化，不图富贵荣华。

物如善得终为美，事到巧图安有公！
不作风波于世上，自无冰炭到胸中。
灾殃秋叶霜前坠，宝贵春花雨后红。
造化分明人莫会，枯荣消得几何功！^②

不尔虞我诈，勿勾心斗角，平平淡淡过日子，慎勿平地起风波，心安理得，自无矛盾介心胸。

邵雍深信他的人生哲学，符合“先圣”教诲，决非“浅丈夫”行径。安乐窝中，只有一樽酒，一卷书，自我安慰，自我欣赏，“自无冰炭到胸中”。《安乐窝中吟》（13首）作了充

^① 《击壤集》卷四。

^② 《击壤集》卷八。

分表白，其二首云：

安乐窝中事事无，唯存一卷伏羲书。
倦时就枕不必睡，醒后携筇任所趋。
准备点茶收露水，提防合药种鱼苏。
苟非先圣开蒙客，几作人间浅丈夫。^①

为坦露自己逃避现实，诗酒自娱的生活情调，他曾写下著名的《打乖吟》。

安乐窝中好打乖，打乖年纪合挨排。
重寒盛暑多闭户，轻暖初凉时出街。
风月煎催亲笔砚，莺花引惹傍樽罍。
问君何故能如此？只被才能养不才。^②

“打乖”有明哲保身、偷闲作乐之意。在扰攘不宁、风波迭起的封建社会里，人们最难获得的是自我心理平衡，《打乖吟》一出，引起不少达官、士大夫的共鸣。一时间，富弼、司马光、吕希哲、程颢等都纷纷和韵，传为美谈。

邵雍看破人间炎凉世态，富贵荣华无异过眼云烟，一时风流人物，尽是匆匆过客。他劝导人说：“行人莫动凭栏兴，无限英雄浪白头。”^③ 朱熹评论邵雍说：“邵尧夫六十岁，作

① 《击壤集》卷九。

② 《击壤集》卷九。

③ 《击壤集》卷六《留题龙门》。

《首尾吟》百三十余篇，至六七年间终。渠诗玩侮一世，又是一个‘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之意。”^① 四时行，百物生，是孔子当年开导弟子的话，意思是一切听其自然就行了。朱子还指出：“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其花草便是诗，直卿云：‘其诗多说闲静乐底意思’，……所以明道（程颢）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之说。”^② 邵雍不是没有经邦济世之才，只是缺乏经邦济世之志，撰写了《皇极经世》，研究了古代经邦济世的宝贵经典——《周易》，评论了历代风流人物，交游当世达官显贵，显示了北宋道学家的儒者风范。谈笑既有宏儒，往来亦有白丁。只是“玩侮一世”，不足以治天下国家。这是他的人格特点使然，并不是什么人生悲剧。因为在他的人格陶冶中还有道家气象这一面。

再看邵雍的道家气象。

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仍自歌。
花见白头人莫笑，白头人见好花多。

这是邵雍《击壤集》卷八《南园赏花》诗的第二首，好一幅酒仙气派。在这儿，人们虽然看到他时髦地披上了正统儒学的外衣，但他的思想情调却又和庄子没有什么不同。

邵雍不是道士，胜似道士，不惹俗气，尽得逍遙。处于风波迭起的社会，过着神仙自在的生活。《自作真赞》活脱脱描述了他那“闲往闲来”的气概：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

② 《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

松桂操行，莺花文才。
江山气度，风月情怀。
借尔面貌，假尔形骸。
弄丸余暇，闲往闲来。^①

所谓“丸”，指太极。“弄丸”的目的在根据先天八卦太极图，撰写《皇极经世》，这是他平生唯一的学术任务。邵雍交待自己“儒风一变至于道”的思想变化，写了《安乐窝中吟》十三首，其第九云：

安乐窝中不甚贫，中间有榻可容身。
儒风一变至于道，和气四时长若春。
日月作明主日，人言成信信由人。
唯人与日不相近，过此何尝更语真。^②

安乐窝中一团和气，四时如春，悠悠天地，只有人与太阳是真实的存在。这正是道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境界。《击壤吟》更描述了这位“洞中仙”的生活情趣：

人言别有洞中仙，洞里神仙恐妄传。
若俟灵丹须九转，必求朱顶更千年。

① 《击壤集》卷十二。

② 《击壤集》卷十。

长年国里花千树，安乐窝中乐满悬。
有乐有花仍有酒，却疑身是洞中仙。^①

耳闻悠扬的音乐，眼观袅娜的花枝，唇饮芳香的醇酿，无须九转灵丹，自有神仙乐趣，何须在洞中苦苦修炼。《后园即事》写得更具体：

太平身老复何忧，景爱家园自在游。
几树绿杨阴乍合，数声幽鸟语方休。
竹侵旧径高低进，水满春渠左右流。
借问主人何以乐，答云殊不异封侯。^②

杨柳郁郁葱葱，林禽啁啾对语，幽径在竹林中蜿蜒，流水叮咚作响，真是一幅富有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主人漫步其间，乐也陶陶，不是神仙，胜似神仙，不欲封侯，胜过封侯。邵夫子此话说得何其逼真。

道家气象，重在少思寡欲，超脱世俗生活，不计是非荣辱。《省事吟》中道：“虑少梦自少，言稀过亦稀。帘垂知日永，柳静觉风微。但见花开谢，不闻人是非。何须寻洞府，度岁也应迟。”^③邵雍在不少诗中，反复宣扬他不学佛专重道，大谈他的养生哲学。

邵雍反对学佛，是从儒家思想立论。《观物外篇》说：

① 《击壤集》卷八。

② 《击壤集》卷五。

③ 《击壤集》卷十一。

“佛氏弃君臣、父子、夫姤，岂自然之理哉？”^①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答谢他的友人，申明不语禅。诗云：

浩浩长空走日轮，何须苦苦辨根尘。
鹏程万里非由驾，鹤算三千别有春。
铅锡点金终属假，丹青画马妄求真。
请观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②

这是说世间万事万物，明明白白存在着，如日照长空，何须像佛家那样苦苦地去辨别哪是幻哪是真？说假未必假，求真难得真。言外之意是不如人天统一做个逍遥自在人。在另一首诗《学佛吟》中描述他学佛时自寻烦恼的心态。

饱食丰衣不易过，日长时节奈愁何？
求名少日投宣圣，怕死老年亲释迦。
妄欲断缘缘愈重，徽求去病病还多。
长江一片常如练，幸自无风又起波。^③

看来邵雍晚年一度欲学佛，未悟止观法门，断不了诗酒自娱之念，欲去烦恼，反增烦恼，得到的心灵体会，只似长江平如练，“无风又起波”，到头来还是一心尊道。邵雍学道，不重外丹服食，只重心性修养，以“道法自然”为准则，去

① 《观物外篇》第十二。

② 《击壤集》卷七《崇德阁下答诸公不语禅》。

③ 《击壤集》卷十四。

欲存真，图个清闲自在，乐在其中。

邵雍的道家养生法则，不外去欲、主静、养心三方面。他的许多诗篇反复有所表白。

首先，去利欲是养生的第一关。若为人欲束缚，难入道家清闲境界。他在《观物外篇》中写道：“为学养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诚，则无所不能。天地之道直而已，当以直道求之。若用智数曲径以求之，是屈天地而徇人欲也，不亦难乎！”^① 就是说一切当任其自然，不应当用机巧诈变的智数去满足人欲要求，那样会违反人的自然本性，于养生最为有害。如何才能去人欲？《爽口吟》列举四大戒条：“爽口之物少茹；爽心之行少虑；爽意之言少语；爽身之事少做。”^② 这就是说，贪食山珍海味，必至“爽口物多终作疾”；“爽意之言少语”，乃可“言稀过亦稀”。

人欲冲动，往往爱占便宜，求自己满足，机心萌动，风波迭起，此是养生之大患。陈抟曾经讲过几句名言，“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处不可再去”。又说：“落便宜是得便宜。”邵雍对这几句话，牢记于心，诚心奉行。曾有诗云：“珍重至人尝有语，落便宜是得便宜。”认为可以终身行之，所谓“落便宜”，指的是不用机心去营求个人物质欲望及功名利禄的满足，听其失落种种方便。正因克去私欲，不假营求，不起机心，顺其自然，乃能长生久视，名节无亏；如此，反是“得便宜”。得失之间，相反相成。正符合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哲理。邵雍所追求的只是抛却世事，赢得清闲。诗云：

① 《观物外篇》第十二。

② 《击壤集》卷十六。

仙掌峰峦峭不收，希夷出后遂无俦。
能斟时事高抬手，善酌人情略拨头。
画虎不成心尚在，悲麟无应泪横流。
悟来不必多言语，赢得清闲第一筹。^①

邵雍认为悟道养生，只从去人欲，得清闲入手。那些凡夫俗子成天忙忙碌碌，求神问卜，心劳日拙，忙而无功，到头来只在歧途上徘徊。《闲行吟》写道：

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
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
列子御风徒有待，夸父逐日岂无疲。
劳多未有收功处，踏尽人间闲路歧。^②

其次，注重静养功夫。对此，朱熹十分佩服。宋明道学家，无不主静，此是儒家吸收佛老思想，发展《中庸》“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的原理。主静既是养生要道，也是认识论原则。荀子早就主张“虚一而静”，追求认识论中的“大清明”境界。守静入定，是邵雍一贯坚持的功夫。朱子云：“邵康节，看这人极会处置事，被他神闲气定，不动声气，须处置得精明。他气质本来清明，又养得来纯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时，都在紧要上用。被他静极了，看得天下

① 《击壤集》卷九《谢宁寺丞惠希夷樽》。

② 《击壤集》卷七。

之事理精明。尝于百源深山中辟书斋，独处其中。王胜之常乘月访之，必见其灯下正襟危坐，虽深夜如之。若不是养得至静之极，如何见得道理如此精明。”^①邵雍认为静养入定，是进入仙乡的捷径。《何处是仙乡》吟道：

何处是仙乡？仙乡不离房。
眼前无冗长，心下有清凉。
静处乾坤大，闲中日月长。
若能安得分，都胜别思量。^②

在安乐窝中静处，百事不加思量，摆脱冗杂事物牵挂，心旷自然神怡，还去何处寻仙乡！

《风月吟》中，邵雍指出，要得心静，就当不计荣辱，只在清风明月中找自由天地。

凉风无限清，良司无限明。
清明不我舍，长能成欢情。
终朝三褫辱，昼日三接荣。
荣辱不我与，何得能有惊。^③

《周易》晋卦卦辞说：“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是说卫国的康叔封，用周成王赐给他的良马进行繁殖，一日配种多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

^② 《击壤集》卷十三。

^③ 《击壤集》卷九。

次，这表明康叔之荣耀；《周易》讼卦上九爻辞云：“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是说王侯赐给的锦带（显示荣耀身份的饰物），遭到别人反对，一天被三次夺去，这是极大的羞辱。邵雍认为管他荣与辱，我都不萦于心，只在清风明月中尽情欢乐，摆脱荣辱得失之惊扰，自然心地清静，无异神仙。闲来好好睡一觉，比封侯赐金还要惬意。《依韵和刘职方见赠》云：

造物工夫意自深，从吾所乐是山林。
少因多病不干禄，老为无才难动心。
花月静对行水际，蕙风香处卧松阴。
闲窗一觉从容睡，愿当封侯与赐金。

排除世俗烦恼，不计个人荣辱，学来陈抟老祖的静卧之法，月静、风香之时，仰卧松林石上，小睡闲窗之下，如此静养，其乐无比。

第三，养生学道，尤重养心。

人多求洗身，殊不求洗心。
洗身去尘垢，洗心去邪淫。
尘垢用水洗，邪淫非能淋。
必欲去心垢，须弹无弦琴。^①

此诗抒发了邵雍对“洗心”的三重认识，心同身相比，身所染者无非外在尘垢，心的污染则是种种邪念淫行；洗心同洗

^① 《击壤集》卷十八《洗心吟》。

身相比，洗尘垢较易，用清水一冲刷就行了，洗邪淫之念与行，则很困难，须要长期修炼。去心垢的办法是什么？他借陶渊明的话说，“须弹无弦琴”。相传陶渊明深悟“大音希声”之意，家悬无弦琴一张，每当酒醉，常扶此琴以寄意舒怀。故李白曾有诗云：“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①无弦琴虽然不发声，常是“无声胜有声”，兴之所至，随意成曲，自我欣赏，其声洋洋然也。

邵雍强调养心，别有一番理由。他说：“心为太极。人心当如止水则定，定则静，静则明。”^②心之静，要如“沈珠于深渊”。任凭波涛汹涌，珠沉渊底，安然不动，这才是摄生工夫到家。《摄生吟》云：

握固如婴儿，作气如壮士。
二者非自然，皆出不容易。
心为身之主，志者气之帅。
沉珠于深渊，养自己天地。^③

这里讲的是道家养生功夫。志，指人的意识，以志帅气，就是要在炼气过程中，集中意念，加强念力，使内气沿着一定的经络运行，久之乃能炼气还神，那时就达到《老子》所谓的：“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

^① 《李太白诗》卷九《赠临洛县令皓弟》。

^② 《观物外篇》第十二。

^③ 《击壤集》卷十九。

之合而股作，精之至也。”^①即是说，修养深厚的人，好比初生的婴儿，筋骨柔弱无比，小手却握得牢固；不知男女交合之事，生殖器却自动勃起，这是精气充足之故。摄生的原则在于以意领气，使气沉丹田，犹之珠沉深渊，养心达到妙境，自会发现无限广阔的天地。《心安吟》咏其妙境云：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宽。
心与身俱安，何事能相干。
谁谓一身小，其安若泰山。
谁谓一室小，宽如天地间。^②

怎样才能达到如此奇妙境界？邵雍主张手探月窟，足蹑天根。认为“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③。朱熹解释道：“先天图自复至乾，阳也；自姤至坤，阴也。阳主人，阴主物。‘手探足蹑’，亦无甚意义。但姤在上，复在下。上，故言手探；下，故言足蹑。”^④朱子并未解释明白。其实这是就“小圆图”而言，乾巽之间为“月窟”，乃一阴将生之处；坤震之间为“天根”，乃一阳将生之处。阴为月窟，阳为天根，都是指一昼一夜之间，阴阳二气的消长变化。炼气养生之人，掌握了阴阳二气消长变化的节律，主动与之相适应，自然长生久视。清人胡渭《易图明辨》对此解释深刻：“盖人之身，天

① 《老子》第五十五章。

② 《击壤集》卷十一。

③ 《击壤集》卷十六。

④ 《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

根在尾闾，月窟在泥丸。修炼之法，夜子以心神主气海，谓之‘生药’；子后则自尾闾进火，以达于泥丸，午中则自泥丸还元，以讫于尾闾。从复姤用功，而诸卦皆到，上下往来，终而复始，和气满腔，盎然流溢，故曰：‘三十六宫都是春’也。邵子虽不事修炼，而其理固已洞彻，丹家秘宝，和盘托出矣。”^①何谓三十六宫？胡渭认为就是指先天八卦中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八数之和。故说：“三十六宫都是春，谓和气周流乎一身也。如此，则三十六宫不在纸上，而在吾身中矣。”^②这一解释是比较中肯的，符合邵雍此诗要旨。《逍遙吟》抒写了邵雍养生的终极目的，“夜入安乐窝，晨兴饮太和。穷神知道泰，养素得天多。日月任推荡，山川徒琢磨。欲求为此者，到了是谁何？”^③所谓“饮太和”，未必指饮酒，而是炼气过程中吐故纳新，调和呼吸，气沉丹田。“到了是谁何”？是说炼养工夫到妙处，就是活神仙，也就是道家推崇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

邵雍口称《诗》、《书》、礼乐，推崇尧舜、周孔，“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俨然儒者风范；但其志在逍遙，诗酒自娱，流连山川，寄怀风月，“穷神知道泰，养素得天独厚”，具有浓厚的道家气象，他的著作被编入《道藏》，是有来由的。集名儒、隐士、仙家于一身，称之为北宋洛阳一怪杰，殆不为过。

① 《易图明辨》卷七。

② 《易图明辨》卷七。

③ 《击壤集》卷七。

第五章 邵雍的著作

邵雍隐居不仕，教育弟子，从事学术思想著述，留下的著作主要有三部，《皇极经世》、《渔樵问对》与诗集《击壤集》。这些著作，反映了邵雍对易学研究的贡献，在创建宋明理学中的作用，以及他的处世待人的风雅情怀。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发生了重大影响，至今受到推崇、景仰。

一、《皇极经世》——重要哲学著作

《皇极经世》(或《皇极经世书》)是邵雍的重要哲学著作。这本书当时未能刊印，曾经散失，经后人收集整理，共10余万字，分64卷。现在通行的是《四库全书》子部数术类所收入版本。

《四库全书》将此书列入数术类，并不恰当。它的根据在于朱熹说过，《皇极经世》是“推步之书”、“易外别传”。这

样将《皇极经世》同古代星相、命理、堪舆、六壬、奇门遁甲之类的著作归入一类，大大曲解了它的思想文化价值，以至今人对它产生极大误会，以为根据这部书可以预测未来，推断个人吉凶祸福。朱熹说《皇极经世》是推步之书，意是指“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三十二，又从里面细推去”^①，并不是说它可以用来推算个人命运。事实上，《四库总目提要》对《皇极经世》的评价是自相矛盾的，先说它是一部“推步之书”，然后又不得不予以纠正，说此书“类皆立义正大，垂训深切。是《经世》一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固非谶纬术数家可同年而语也”。

《皇极经世》按其实际内容而言，共分四大部分，依《四库全书》本 14 卷，对照原本《观物篇》64 卷，其各部分的内容如下：

(一) 四库本第 1、2 卷，即《观物篇》第 1 至 22 卷，为“以元经会”；四库本第 3、4 卷即《观物篇》第 23 至 24 卷，为“以会经运”。以上 4 卷，乃邵雍按自己创立的元会运世的宇宙进化史观所推算、编制的一份世界历史年表。关于这种年表，本书将在第八章详细论述。

(二) 四库本第 5、6 卷，即《观物篇》第 25 至 34 卷，为“以运经世”。这两卷是邵雍按元会运世的宇宙演化史结合其“皇帝王伯”的中国历史观，推算、编制的一部中国历史年表。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

这一年表，上自唐尧，下至五代，逐年按《周易》卦象，对照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加以评述。关于这部分内容，本书第九章将有评述。

(三) 四库本第7至10卷，即《观物篇》第35至50卷，为“声音唱和”，按古代声律分平、上、去、入四声，各为一卷。邵雍的父亲邵古长于声韵学，邵雍继承父志，加以发挥。为什么邵雍要将这一内容纳入自己的书中？《道藏辑要·皇极经世书》在《经世声音图》注中有种解释，值得参考：“《经世》以为：万物有声、色、气、味，而色不可图，气、味不可写，惟声出于人口，可以翻切而得。故为声音图，以穷色、气、味之变，以尽动植之数，其说虽汗漫不可穷，然正声同文，乃王政之切务，亦学者所当知。自《等韵》之外，惟邵子之书最有条理。”这是说整齐声音，统一文字，乃王政之急务；语言文字不统一，对于贯彻统一的政令多有妨碍。关于这一点，由邵雍集录他父亲的著作《正音叙录》，说得更明白：“音非有异同，人有异同；人非有异同，方有异同，为风土殊而呼吸异故也。东方之言在齿舌，故其音轻而深；南方之言在唇舌，故其音轻而浅；西方之言在颊舌，故其音重而浅；北方之言在喉舌，故其音重而深。便于喉者不利于唇，巧于齿者不善于颊，由是讹正牵乎僻论，是非生乎曲说，幡然淆乱于天下矣。不正声正音，恶能正之哉？”邵雍正是受其父亲影响，要创立一种新的声韵学说，来统一声音，统一语言，以达到端正人事的目的。语言文字是人们用以传达信息的工具，语言文字不统一，会造成信息传达的障碍，邵雍的目的是想将自然的语言，转化为一种象数语言，用以运载信息，这种设想不是没有道理的。《皇极经世》力图化声音唱和为数的努

力，本非徒劳，不过只有到了当今电脑发明之后，才可能实现。

(四) 四库本第 11、12 卷，即《观物篇》第 51 至 62 卷，通常称之为《观物内篇》(共 12 篇)。这是《皇极经世》最重要的部分，综论《经世》的宇宙观、自然观、社会历史观，阐明其哲学思想，言简意赅。前面三部分都是以象数图表方式表述，这部分纯粹以逻辑方式表述，是邵雍易学思想的高度概括。

(五) 四库本第 13、14 卷，《观物篇》第 63、64 卷，即通常所称之《观物外篇》(上、下二卷)，后人将其分为 12 篇。邵雍的弟子张嶧说，《观物内篇》是邵雍手著，《观物外篇》是弟子笔录的邵雍语录。它的内容是对《观物内篇》及元会运世、皇帝王伯、先天易学、后天易学的深入阐发。张嶧指出，要想读懂邵雍的先天象数学，当先读《观物外篇》，由此入手，易于掌握要领。这一观点，后来为朱熹所认同。《观物外篇》，虽分 12 篇，并未构成系统，前后语录不甚连贯，但许多道理比《观物内篇》说得更透彻，亦开宋儒语录体著述的先河。

以上是《皇极经世》的基本结构和内容要点。此书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直到现代才弄明白。大体说来，北宋时期正宗儒学思想，称为道学，列入《宋史·道学传》的共有五位哲学家，周敦颐和他的两个弟子程颢、程颐，都讲理学，创唯心主义理学派；张载讲气学，坚持唯物主义气一元论，创立气化学说；邵雍同以上两派都不同，主要讲数学，创立新的象数易学派，虽属唯心主义思想体系，而其思维方法与众不同。尽管有人说他粹然儒宗，其思想路线更接近道家，北宋时期，理学派、气学派和数学派，成三足鼎立之势，

在学术思想上的贡献，可谓各有千秋。

人们不禁要问，“皇极经世”有什么涵义？邵雍以此名书，必有取义。邵雍之子伯温，曾经有过解释，想必是他父亲留下的遗言。他说：“至大之谓皇，至中之谓极，至正之谓经，至变之谓世。大中至正，应变无方之谓道。”^①这是邵雍对“道”的一种解释。全书所讲的道理，表现在两大方面。邵伯温说：“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伯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矣，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篇》焉。”^②这表明邵雍力求营建一个包括宇宙、自然、社会历史乃至人生哲学在内的完整思想体系，并把“道”称作是贯穿整个体系的至高法则。

邵伯温对全书体系结构有过分析，可能也是他父亲提示的要点，不妨抄录以供参考。

《皇极经世》凡十二卷。

其一之二，则总元会运世之数，《易》所谓天地之数也。

三之四，以会经运，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帝尧至于五代历年表，以见天下离合、治乱之迹，以天时而验人事者也。

五之六，以运经世，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帝尧至于五代，书传所载兴废、治乱、得失、邪正之

① 《邵子全书》卷之二。

② 《邵子全书》卷之一。

迹，以人事而验天时者也。

自七之十，则以阴阳、刚柔之数，穷律吕、声
音之数，穷动植飞走之数，《易》所谓万物之数也。

其十一之十二，则论《皇极经世》之所以为
书。^①

这里所说的“以天时而验人事”，是指按元会运世的宇宙观推定的世界历史年表。“以人事而验天时”，指的是按皇帝王伯递嬗原则而推定的中国历史年表。“论《皇极经世》之所以为书”，即《观物内篇》，通论全书要领。未列《观物外篇》。

从全书体系看，邵雍是把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糅合在一起的，无所侧重。从邵雍本人所撰《书皇极经世后》这首长诗来看，更注重的显然是中国历史年表部分。其诗云：

朴散人道立，法始乎羲皇。
岁月易迁革，书传难考详。
二帝启禅让，三王正纪纲。
五伯仗形胜，七国争强梁。
两汉骧龙凤，三分走虎狼。
西晋擅风流，群凶来北荒。
东晋事清芬，传馨宋齐梁。
逮陈不足算，江表成悲伤。
后魏乘晋弊，扫除几小康。
迁洛未甚久，旋闻东西将。

① 引自蔡元定：《皇极经世指要》。

北齐举爝火，后周驰星光。
隋能一统之，驾福于巨唐。
五代如传舍，天下徒扰攘。
不有真主出，何由奠中央。
一万里区宇，四千年兴亡。
五百主肇位，七十国开疆。
或混同六合，或控制一方。
或创业先后，或垂祚短长。
或奋于将坠，或崩于已昌。
或灾兴无妄，或福会不祥。
或患生藩屏，或难起萧墙。
或病由唇齿，或疾亟膏肓。
.....
龙蛇走平地，玉石粹昆冈。
善设称周孔，能齐是老庄。
奈何言已病，安得意都忘。^①

这篇咏史长诗虽然不是对几千年中国历史的科学概括，但也足以反映出邵雍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力图按孔子修《春秋》的章法，对 3118 年之间的历史作出自己的论断，气派是宏伟的；以经世为宗旨，用意是深刻的，既非舍史而论经，亦非舍经而论史，为以史证经立一规模。尤可注意者，当邵雍推论中国历史年表而著《皇极经世》之时，正是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司马光退居洛阳编撰《资治通鉴》之年；从“七国争强

^① 《击壤集》卷八。

梁”，到“五代如传舍”，这段历史邵雍花费的功夫最多，恰巧这也正是《资治通鉴》取法的历史经验所在。《资治通鉴》记事，起于公元前 403 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之年，旧史以此年为战国之始；终于公元 959 年，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即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宋朝的前一年。邵雍编的中国历史年表，“以运经世”所记史事，止于五代后周，“不敢论当代”，他同司马光的观点是一致的。《皇极经世》重在以史证经，对后代学者是有所启发的，它不应被称为推测历法的神秘的“推步之书”。

二、《渔樵问对》——哲学对话录

《渔樵问对》是邵雍以问答方式写成的哲学对话。此书《明史·艺文志》作《渔樵问答》，《中国丛书综录》题为《渔樵对问》。今仍依《宋史·艺文志》。

此书问对的内容，涉及自然、社会、人事诸方面，或由樵者主动提问，请渔者回答；或由渔者向樵者提问，然后自己作答。所设问题 20 多个。问题大体如下：

鱼可钓取乎？钓非饵可乎？

鱼可生食乎？烹鱼必以薪乎？

灼物之火，必待薪而后传乎？

水与火既能相济，又可相息，其用如何？

万物皆可以无心而致之，敢问其方？

何谓我？何谓物？

天何依？地何附？天地何依何附？

天下将治，人必尚行，将乱，必尚言，何也？

子知观天地万物之道乎?
予以何道而得鱼？得鱼之“六道”为何？
福可祷而求耶？
何谓分？何谓命？
亲如父子，利害犹或夺之。利害在前，奚择焉？
负薪百斤，无伤身；加十斤遂伤身，何故？
太极何物也？两仪、八卦何谓也？
“复”，何以见天地之心？“姤”，何也？
人灵于万物，何以知其然耶？
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至妙至妙者与？
人谓死而有知，有诸？
世之小人可绝乎？
人所谓才者，有利焉，有害焉，何也？
国家兴亡，关乎人才，何不择其人而用之？
治世常少，乱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

对于这些哲学问题的回答，有的与《皇极经世》内容完全相同，有的基本相近，少数不一致。还有一些《皇极经世》不曾涉及。樵者同渔者析薪烹鱼而“论《易》”，渔者侃侃而谈，樵者大开眼界，深受启发。最后写道：“钓者谈已。樵者曰：‘吾闻古有伏羲，今日如睹其面焉’。拜而谢之，及旦而去。”樵者恭维渔者为当世伏羲，这显然是邵雍以渔者自居，以伏羲自命。

《渔樵问对》涉及的 20 多种问题，都是宋明道学家们非常感兴趣的，实际上包含了王霸之辨、义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心性之辨、祸福鬼神之辨、动静之辨，君子小人之辨，理气之辨、体用之辨，格物致知之辨。邵雍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都是按太极学说、阴阳刚柔动静学说作分析。由此看来，无论渔者或樵者，都不是普通的劳动者，而是精通易理，深明世故，熟悉历史，而又敢于放言古今治乱的隐者。之所以采用渔樵问答形式，反映所讨论的问题不止是知识分子在书斋里研究的学问，而是渔人樵夫都很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日常生活中提出，却包含十分深刻的易理。说明邵雍虽是闭门研究易学，对普通人民关心的问题从未忽视。这与《皇极经世》从纯粹理论上阐发易理异曲同工，足以互相辉映。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对话形式，探讨普遍的哲理，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大创造。反映邵雍思想恢谐开朗，少有书生气。他在洛阳城中，小车一出备受欢迎，不是偶然的。

《渔樵问对》的作者，历史上曾有异议。《四库总目提要》说：“旧本题邵子撰，晁公武《读书志》又作张子，刘安上集中亦载之。三人时代相接，未祥孰是也。”表明其作者姓邵、姓张、姓刘尚难确定。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对此作了认真辨析，他根据朱熹关于《渔樵问对》的两段语录，论定它确是邵雍之作。《朱子语类》第100卷云：“康节《渔樵问对》、《无名公序》与《一两篇》书。次弟将来刊成一集。”又云“古今历家，又是推得个阳阴消长界分尔，如何得似康节说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依气’几句？”这几句话正见于《渔樵问对》。更重要的是《朱子语类》第115卷中的一段话：“《渔樵问对》或者以为非康节所著，先生（指朱熹）曰：‘其间尽有好处，非康节不能著也。’”朱熹与晁公武乃同时代人，他是在已经知道人们对《渔樵问对》的作者有争议后，作出明确肯定回答的。《渔樵问对》中有些论述，与《皇极经世》完全一致，字句不差，亦

足见二书乃同一作者，朱熹的论定是有充分根据的。

三、《击壤集》——毕生诗歌总集

《击壤集》是邵雍毕生所作诗歌总集。邵雍说他平日“四物最相亲”，其中就有：“安乐窝中诗一编，自歌自咏自怡然。”^①他除了撰写《皇极经世》，还经常咏风咏月，借诗遣兴。他说过：“林泉好处将诗买，风月佳时用酒酬。”^②《击壤集》又题《伊川击壤集》，元明时期都有单行刊本，《宋史·艺文志》著录为20卷，《邵子全书》本分为6卷；《道藏辑要》本选其重要者，合为一册，不分卷。《四库全书》著录，仍为20卷；中州古籍出版社《康节说易》本，准此。

邵雍平生所吟诗，难以计数，他自己在《击壤吟》中说：“击壤三千首，行窝二十家。”3000首是个大约数字。实际留存2000余首，还有人说只1500余首，乃版本不同所致。

邵雍长于思考哲理，并不以诗名家，但他所写的诗，在文学史上仍有相当影响，被称为平白如话的“康节体”。这一诗体的特点是随想随写，不在词藻上下功夫，写实性强，浪漫、夸张较少。长于以诗叙事，以诗说理；抒情之诗往往夹以叙事，其优点是雅俗共赏。上乘作品，得以入选《千家诗》、《宋诗三百首》；粗造之作，诗意贫乏，无异顺口溜。邵雍将诗集题为《击壤集》，有深刻用意。正如他自己解释的：“吁，独不念天下为善者少，而害善者多，造危者众，而持危

① 《击壤集》卷九《安乐窝中四长吟》。

② 《击壤集》卷十九《岁暮自贻》。

者寡。志士在畎亩，则以畎亩言，所以名之曰《伊川击壤集》。”^①邵雍出身寒微，志在畎亩，与村夫野老有着深厚感情，自以为他的诗非骚人墨客格调高雅之作，同唐尧时代康衢老人击壤而歌的格调更加接近，只不过随意捻来，宣寄情意而已。魏了翁说得对：“邵子平生之书，其心术之精微在《皇极纪世》；其宣寄情意在《击壤集》。”^②

邵雍诗的特点，不只从格调上反映出来，更从诗的内容上有突出表现。他的诗如按其内容性质加以分类，可分为哲理诗、咏史诗、隐居诗、林泉诗、酬唱诗五大类。充分反映这位哲学家精研易理，品评历史，隐居不仕，诗酒自娱的情怀。

（一）玄思易理的哲理诗

老子之后，用诗的语言来表述哲理的思想家，邵雍最为突出。《击壤集》中阐发易理的哲理诗，有数十首之多。如《大易吟》、《大象吟》、《皇极经世一元吟》、《观易吟》、《天人吟》、《天地吟》、《无妄吟》、《先天吟》等，完全是用诗来表述他独创的先天易学思想，《先天吟》、《观物吟》都不只一首。还有一些诗，不完全在论易理，而是儒家或道家经常论到的一些重大哲学问题，如《诚明吟》、《仁者吟》、《君子吟》、《仁圣吟》、《正性吟》、《义利吟》、《洗心吟》、《天意吟》、《天听吟》、《三惑》、《乐物吟》等。还有两首诗，《学佛吟》与

① 《伊川击壤序》。

② 《性理会通》卷十三。

《崇德阁答诸公不语禅》，反映他对佛学的一般看法；另一首诗，《人贵有精神吟》，是宣扬他的人生哲学的。有些诗本书在论述其先天易学时加以评述。这里不妨先谈谈他的《乐物吟》：

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鼻人之灵。
皇帝王伯由之生，天意不远人之情。
飞走草木类既别，士农工商品自成。
安得岁丰时长平，乐与万物同其荣。^①

这首诗把《皇极经世》的内容作了高度概括，并表明自己“与万物同其荣”的理想境界。七八首《观物吟》中有一首用诗句论述“人为万物之灵”的观点：“一气才分，两仪已备。圆者为天，方者为地。变化生成，动植类起。人在其间，最灵最贵。”^②有的则直述其观物论哲学思想。

（二）评说古史的咏史诗

咏史诗在我国历来受重视，成为古代诗歌中重要体裁之一。滥觞于《诗经》、《离骚》，开创于班固《咏史》，代有高雅之作，成为人民喜闻乐见之题。邵雍是历代哲学家中写咏史诗最多的一个。他有意用诗来评说自先秦至五代的历史，贯彻他的皇帝王伯递嬗的历史观。他先写了《三皇》、《五帝》、

^① 《击壤集》卷十。

^② 《击壤集》卷十七。

《三王》、《五伯》，又写了《观三皇吟》、《观五帝吟》、《观三王吟》、《观五伯吟》，反复坦述他关于皇帝王伯之世的基本论点。然后自春秋开始，直至五代，为每个时代各写一首诗，作具体评论，故有《观春秋吟》、《观七国吟》、《观嬴秦吟》、《观两汉吟》、《观三国吟》、《观西晋吟》、《观十六国吟》、《观南北朝吟》、《观隋朝吟》、《观有唐吟》、《观五代吟》。还有《观盛化吟》，是赞美宋代的。对春秋、战国历史他特别注意，又写了《齐郑吟》、《吴越吟》、《七国》等。另有一些诗是历史通论性质，如《兴亡吟》、《治乱吟》、《经世吟》等。还有一些颂赞著名历史人物的，如《荆轲吟》、《孔子吟》等。同宋代其他咏史诗一样，邵雍的咏史诗，具有议论化、散文化、哲理化的特色，抒情内容比较薄弱。值得注意的是《观棋大吟》和《书皇极经世后》二诗。前者借观棋而大发感慨，把三千年历史看作是帝王将相们精彩表演的一局棋，有进攻，有退守，有胜局，有败局。从“尧舜行揖让”，“汤武授干戈”，到“五霸共吞噬，七国相鞭笞”，直到“十姓分中夏，五家递通逵”。说明“天机不常设，国手无常施”。这是别开生面的长篇咏史诗，从来少有人称说。《书皇极经世后》称得上《击壤集》的压卷之作，作者鹰视长空，气象千里，将三千年历史变迁，王朝兴替，浓缩在一首长诗中，一气呵成，音韵铿锵，鞭挞历代昏主，赞扬治世明君，美化北宋的统一，宣扬以史为鉴的重要性。可是在今人所选编的《古诗类选·咏史诗》中，却没有一席之地。此乃选诗标准不同之故。邵雍的这一类诗，本书将在论述其皇帝王伯历史观时直接引述。

(三) 遁世取乖的隐逸诗

邵雍的朋友曾多次举荐他去做官，都被他拒绝了。他终生隐居不仕，并非没有做官的机会，而是他矢志不移的结果。他隐居洛阳郊外，写下了许多诗篇，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情趣和隐者的生活习惯，不少诗是在安乐窝中写成的。如《安乐窝中四长吟》，一次写了四首，又一次写了 13 首。还有《安乐窝铭》、《安乐窝中自讼》、《安乐窝中打乖吟》等。写他生活习惯的有《昼睡吟》、《喜饮吟》、《瓮牖吟》、《道装吟》、《小车行》、《天津幽居》、《燕堂闲坐》、《闲行吟》、《逍遙吟》、《晚步吟》、《自在吟》、《心安吟》等。其中《小车吟》一首，最能表现他的安闲生活：

有客无知，唯知有家。有家能归，其归非遐。
灵台莹静，天壤披葩。书用大笔，出乘小车。

.....

或游金谷，或泛月波；或经履道，或过铜驼。
进退云水，舒卷烟霞。揄扬风月，抬帖莺花。
性喜饮酒，欢喜微酡。饮未微酡，口先吟哦；
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无可奈何。^①

邵雍经常在诗中回顾自己的思想与生活，作为生活经验的小结，不时写出一些自贻诗，反映隐者心态，达到自我满足，心态平衡。这类诗有：《自况三首》、《岁暮自贻》、《安乐

^① 《击壤集》卷十四。

窝中自贻》、《平生与人交》、《六十三吟》、《六十五岁新正自贻》、《年老逢春》13首、《自述》等。其中《首尾吟》134首值得注意。这134首诗，是邵雍系统地回顾、总结自己一生的思想、工作、德行。每首诗均以“尧夫非是爱吟诗”一句起兴，同样，用这句诗收笔。整个组诗写到了这位思想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对酒、半醉、不寐、天津伫立、自励、得意、试笔、登阁、咏史、贊易、自喜、自负、默坐、晚望、春出、入夏、不乐、独酌、不著棋、恨月、访友、尽性、晚步、处困、慎独、喜老、慎动、谈笑等种种不同时刻的心情。抄录一首以见一斑：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闲观蔬圃时。
暖地春初才郁郁，宿根秋末却披披。
韭葱蒜薤青遮陇，蘋芋姜韭绿满畦。
时到皆能弄精彩，尧夫非是爱吟诗。^①

同这首描写闲观蔬圃，留心于韭葱蒜姜的闲散心情相反，在另一首《贊易》吟中，则纯粹用诗的语言大谈易理：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贊易时。
八卦小成皆有主，三才大备略无遗。
阴阳消长既未已，动静吉凶那不知？
为见至神功效远，尧夫非是爱吟诗。^②

^① 《击壤集》卷二十。

^② 《击壤集》卷二十。

这一大型组诗，活生生刻画出一个遁世取乖的易学家，一面在玄思宇宙，深研易理；一面寄兴于山林，陇亩。

（四）寄兴山林的林泉诗

邵雍迁居洛阳后，完全为古都洛阳的山川之美所吸引，很少远游，在他看来，只要登过华山、嵩山，看过黄河、潼关、龙门石窟，就再也用不着去游览异地风光了。他所写的林泉诗不少，都是在春秋二季外出小游时即兴之作。如：《题黄河》、《题华山》、《过潼关》、《登嵩顶》、《龙门石楼看伊川》、《上寺看南山》、《十九日归洛城路游龙门》、《秋日登石阁》、《重游洛川》、《登郡楼望山》等。反映春秋二季景物的诗较多，有《春游五首》、《秋游六首》、《初春》、《春水》、《暮春吟》、《落花短吟》、《愁花》、《垂柳》、《独赏牡丹》、《小圃逢春》、《惜芳菲》、《芳草》、《清风》、《秋夕》、《秋阁吟》、《秋怀三十六首》、《林下吟五首》、《风月吟》等。描写夏天和冬天景物的诗极少。印证了邵雍冬夏不出门的生活规律。在邵雍写的许多山林花鸟诗中，有两首诗受到诗人们的重视，一是《插花吟》，一是《南园赏花》。《插花吟》被选入《千家诗》及《宋诗三百首》。诗云：

头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
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
况复筋骸粗康健，那堪时节正芳菲。
酒涵花影红光溜，争忍花前不醉归。^①

^① 《击壤集》卷十。

这是邵雍诗酒自娱，歌颂北宋王朝的代表作。《南园赏花》曾受到法国东方学家里奈·格鲁塞特（1885—1952）的重视，他认为邵雍这首诗足以同法国19世纪象征派诗人魏尔兰（1844—1896）的名诗媲美。其诗云：

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仍自歌。
花见白头人莫笑，白头人见好花多。^①

邵雍还写了《天津感事》26首，这也尽是他切身体会的日常即景，其中不乏佳句。有一首也入选《宋诗三百首》，诗云：

烟树尽归秋色里，人家常在水声中。
数行旅雁斜飞去，一簇楼台峭倚空。^②

（五）嘤鸣求和的酬唱诗

邵雍虽隐居伊川，但不是一个自甘寂寞的人，与达官显贵、名人雅士时有交往，留下不少诗友酬唱之作。如《依韵和寿安尹尉有寄》、《十六日依韵酬福昌令有寄》、《二十五日依韵和左藏吴传正寺丞见赠》、《依韵和王不疑少卿见赠》、《依韵和刘职方见赠》、《和王安之少卿同游龙门》、《和魏教授见赠》等。还有一些纯属应酬之作，如《贺人致仕》、《与人话旧》、《答人书》、《代书寄剑州普安令周士彦屯田》、《寄毫

^① 《击壤集》卷八《南园赏花》之二。

^② 《击壤集》卷四。

州泰伯镇兵部》等。邵雍在洛阳的至交好友有司马光、富弼、程颢等，《击壤集》中同这几位唱和之诗较多，有《和君实端明花庵独坐》、《和君实端明见赠》、《和君实端明洛阳看花四首》、《赠富公》、《谢富相公见示新诗一轴》。某年二月司马光送给邵雍二坛酒，附上《二月六日送京酿二壶上尧夫》诗一首，云：“红樱零落杏花开，春物相催次第来。莫作林间独醒客，任从花笑玉山颓。”邵雍写了《和君实端明副酒之什》：“洛阳花木满城开，更送东郊双榼来。遂使闲人转狂乱，奈何红日又西颓。”^① 邵雍写了《年老逢春十三首》，司马光写了《和尧夫先生年老逢春三首》；司马光有次约邵雍登崇德阁，写了《崇德久待不至》，邵雍就和了二首。熙宁六年，富弼年满七十，写诗寄邵雍，题为《岁在癸丑年始七十正旦书事》，邵雍随即写了《答富韩公见示正旦四绝》。富弼寄给邵雍一首《十月二十四日早始见雪，登白云台闲望乱道走书呈尧夫先生》，邵雍马上回敬一首《奉和十月二十四日初见雪呈相国元老》。这些酬唱诗，一方面反映了邵雍在相国元老眼中享有崇高威望，乐于与之交游，建立亲密友情；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封建士大夫在跻身仕途时，会参与激烈的官场角逐，陷身刀光剑影之中，堪称勇猛；在暂时离开政治漩涡，退居在野，或短暂休战期间，会从某些隐者身上去寻找安慰，觅求知音，倾吐衷肠，以寄雅兴。《击壤集》不失为反映当时洛阳乡土人情、社会风尚的一面小小的折光镜。

^① 《击壤集》卷九。

第六章 先天易学——宇宙本体及其运化准则

邵雍是一位易学家，他创立了一套同传统易学大不相同的易学思想体系，朱熹称它为“《易》外别传”，人们称之为先天易学或先天象数学。在易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产生了重要思想影响。

先天易学，是相对于后天易学而说的。邵雍认为：先天易学源于伏羲氏的先天八卦；后天易学源于文王的后天八卦。先天八卦同后天八卦在次序、方位和八卦之间的关系上，都是大不相同的。先天易学和后天易学特别不同的，还在于思想体系上的差异。前者重易学象数，后者重《易经》的卦爻辞和《易传》义理。

邵雍的先天易学，探讨了许多传统易学所没有探讨过的问题。它对宇宙的本体是什么，宇宙本体如何运动变化，如

何由本体变现出万物，宇宙的发展有些什么规律，人类的历史发展又有什么规律，对这些问题都作出了独特的解释。可以说先天易学根据《周易》象数，对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变化作了新的论述。当然，这种论述既有某些智慧的闪光，同时也存在不少猜测与胡说。先天易学是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唯心主义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但它却是生长在人类认识的大树上，我们绝不可等闲视之，或置之不理。无可讳言，邵雍的先天易学远非一首引入入胜的交响曲，而是一只酸涩的苦果，从总结易学思维发展的目的出发，这只苦果还得耐心地啃下去。

一、《先天图》及其内涵

邵雍的先天易学思想体系，建立在由陈抟传授下来的“先天图”的基础上。先天图的全称是伏羲先天八卦图。此图有两种画法。一是《伏羲八卦次序图》，又称“小横图”，如图 1；一是《伏羲八卦方位图》，如图 2。

先天八卦的次序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先天八卦的方位是：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东南、震东北、巽西南、艮西北。

这一伏羲先天八卦图，具有多方面的深刻文化内涵。它代表了邵雍先天象数学的一些基本内容。其中有些内容与《易传》一致，另一些内容不见于《易传》。

第一，从《小横图》看来，伏羲八卦的次序是自然而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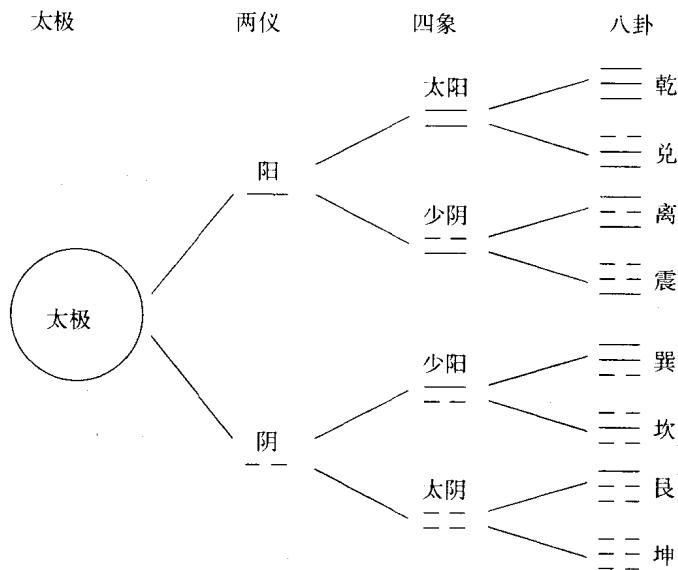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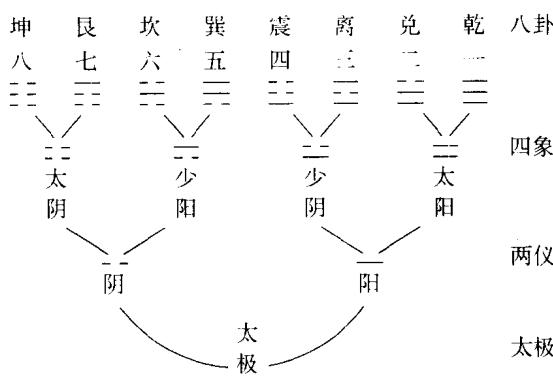


图 1 伏羲八卦次序图（小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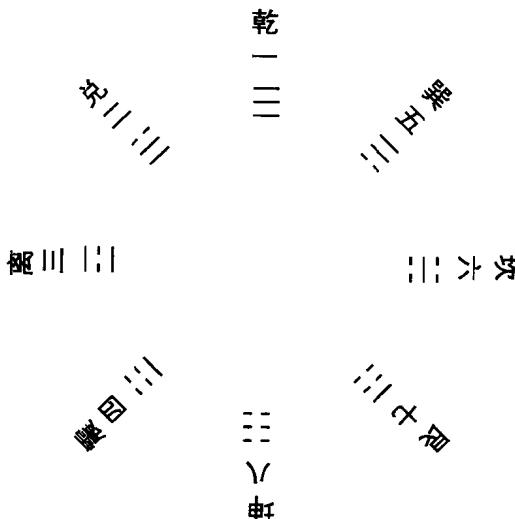


图 2 伏羲八卦方位图

形成的。先天二字表明“出于自然，不用安排”的意思。这一次序符合《易传》所说的原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① 太极乃宇宙本体，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一阴一阳是为两仪；两仪之上各生一阴一阳，而为太阳、少阴、少阳、太阴，是为四象；四象之上各生一阴一阳，而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是为八卦。此八卦次序决定伏羲先天八卦的一系列内涵，是邵雍先天易学的理论前提。

第二，先天八卦方位图的排列，是阴阳对称形式。乾对坤、兑对艮、离对坎、震对巽。这正符合《易传》阐述的另

^① 《系辞上传》第十二章。

一原理：“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对，八卦相错。”^① 八卦相错原理是先天易学所根据的基本原理之一，影响它的整个思想体系。

第三，先天八卦方位图，存在顺逆关系，乾一、兑二、离三、震四，逆时针方向排列；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顺时针方向排列。这又符合《易传》数往知来的“逆数”原则：“数往者顺”，指乾为三阳，兑与离为二阳，震为一阳；追数其往，从震到乾，由一阳、二阳、到三阳，好似由春到夏，故称“顺”。“知来者逆”，指巽为一阴，坎与艮为二阴，坤为三阴；测其所来，从坤到巽，由三阴、二阴到一阴，好似由冬到夏，故称“逆”。实际上，邵雍主张以左行为顺，以右行为逆。阴阳消长的一顺一逆，主宰万物的生长收藏，是先天易学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违反阴阳顺逆之理，万物与人类都难以健康成长。

第四，先天八卦方位，包含着《易纬》所说的“天左旋，地右转”的思想。天为阳，地为阴。先天八卦方位图中，左半圈四卦乾、兑、离、震，均为阳卦，属天；其方向是从左向右旋转，故称“天左旋”。图中右半圈四卦巽、坎、艮、坤，均为阴卦，属地；其方向是从右向左旋转，故称“地右转”。天阳左旋为顺，地阴右旋为逆，仍提示人们注重阴阳顺逆之理，以定人事之从逆。

第五，先天八卦图，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以定四方。邵雍说：“乾坤定上下之位，坎离列左右之门”。乾上为天，坤下为地；离为日，日升于东方，坎为月，月起于西方。故乾

^① 《说卦传》。

为南，坤为北，离为东，坎为西；兑为东南，震为东北，巽为西南，艮为西北。此先天八卦的空间观念与《易传》所定离南、坎北、震东、兑西的空间观念大不相同。《易传》云：“震，东方也。”“巽，东南也。”“离也者，南方之卦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① 坤与兑的方位未明示，实是坤，西南，兑，正西。

第六，先天八卦方位图同时标示一年四季的阴阳消长的节律时序，与汉代卦气学说不相同。邵雍主张：“震始交阴而阳生，巽始消阳而阴生。兑，阳长也；艮，阴长也。震兑在天之阴也；巽艮在地之阴也。故震兑上阴而下阳，巽艮上阳而下阴。”“震始交阴而阳生”谓坤三阴之后，始生一阳，是为冬至，震、离、兑乃天之阴；“巽始消阳而阴生”，谓乾三阳之后始生一阴，是为夏至，巽、坎、艮乃地之阳。春夏为阳辟，秋冬为阴阖。天地之阖辟，形成春夏秋冬四时。日之出没，月之盈亏，昼夜之长短，均以此图为依据。^②

邵雍用先天八卦方位图，将东南西北四方的空间观念同春夏秋冬四时的时间观念联系起来，形成古老的时空统一原则，能对节令变化的规律性作出某种解释，并吸收了汉代周易象数学中的合理内容，比文王八卦方位图优越。

第七，伏羲八卦方位图，还反映了“天有二正，地有二正，共用二变”的原则。先天图的四正卦为乾、坤、坎、离。兑、震、巽、艮为四变卦。乾、兑、离、震四阳卦，乃天之阳，其中有乾、离二正卦；巽、坎、艮、坤四阴卦，乃地之

^① 《说卦传》。

^② 详见《伏羲六十四卦圆图》。

阴，其中有坎、坤二正卦；故云：“天有二正，地有二正。”兑与艮相错，震与巽相错，故云：“共用二变。”二变指卦象正好阴阳相错，四正即卦象颠倒其象不变。此来源于邵雍之师李之才的卦变反对说。

第八，伏羲八卦，与人体生命运行，有密切关系。邵雍《乾坤吟》云：“道不远于人，乾坤只在身，谁能天地外，别去觅乾坤。”^① 其《先天吟》云：“先天事业有谁为，为者如何告者谁。……天地与身皆易地，己身殊不异庖牺。”^② 表明人之生命受上天下地，日东月西；天左旋，地右转，阴阳消长，四时循环的节律支配。人人身上都有“先天八卦”的痕迹。

以上是邵雍所坚持的先天图的基本内容，将一种易图赋予多方面的含义，构建一种固定思维模式，用以解释宇宙和生命的变化，是对汉代周易象数学的一种发展。在易学发展史上不失为新的贡献。

邵雍的先天象数学的形成，并非偶然。早在《易传》中易学家们就曾提到先天、后天观念，指出：对于自然规律，人不可违背，“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并未提出先天易、后天易的说法。晋代易学家干宝不知有何根据，提出先天、中天、后天之说，认为“伏羲之易，小成，为先天；神农之易，中成，为中天；黄帝之易，大成，为后天”^③。邵雍可说是受干宝的启发，提出比较系统的伏羲之卦为先天，文王之卦为后天，从而构建了一套先天易学体系。

^① 《击壤集》卷十三。

^② 《击壤集》卷十九。

^③ 何楷：《周易订诂》引。

何谓先天？邵雍是有特殊解释的。《击壤集》诗云：“若问先天一事无，后天方要着功夫。”朱熹曾转述邵雍同他学生的一段对话，对“先天”有新解释。邵雍见学生正在背诵“若问先天一事无”那两句诗，便问道：“如何是‘一事无’？”学生答曰：“出于自然，不用安排。”邵雍默认此一回答。^①由此，所谓“先天”，是说出于自然原始状态，并非人们故意安排。邵雍云：“自然而然者，天也。”^②

邵雍的先天图，据说并非他的创造，是继陈抟而来。朱熹在《周易本义·图说》中云：“右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

当然邵雍并非单纯根据陈抟的先天图，重要的在于他同《易传》思想有某些一致处。正如《宋元学案》指出的：“或曰：邵子所据，《大传》之文也。《大传》：‘易有太极’节，先天卦序也。‘天地定位’章，先天卦位也；‘帝出乎震’章，文王卦位也。……总之，图与《传》虽无乖刺，然必因《传》为此图，不当谓《传》为图说也。”^③

朱熹认为：“先天图直是精微，不起于邵子，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传。次第是方士辈所相传授，《参同契》中所言，亦有些意思。”^④

关于先天学，历来评价不一。有人肯定，也有人否定，其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

^② 《观物外篇》第六。

^③ 《百源学案·先天图辨》。

^④ 《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

哲学性质尚有待论定。当代学者张岱年教授认为：“邵雍自称其图式为‘先天图’，其学说为‘先天气’。……何谓先天？他认为他所讲的原理和他所画的图式，在天地没有出现以前即已存在，而天地出现以后的情况，不过是把这些图式表现出来而已。”^①朱伯崑先生认为：“此图式的理论意义在于说明一年四季的变化乃阴阳消长的过程。”^②刘长林对先天图所展示的宇宙发生论，作了三方面的肯定，认为邵雍以系统的逻辑结构，反映了系统的演化历史；表明宇宙的演化具有对称性；启示了在复杂系统内部，子系统的分布和变化有一定规律。这都是中国系统思维发展的重要贡献。^③

批评先天图的，清代有毛奇龄、胡渭等。毛氏撰《仲氏易》，列举先天图与传统易学有八点出入，称“先天之图，其误有八”^④。胡渭完全同意毛氏批评，指出：“仲氏八误之辨，解析无遗。总由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元无可考，而任意为之，所以来后人之弹射也。”还指责朱熹将邵子四图载入《易经》是一大错：“冠诸经首，不愈彰邵子之过乎？”^⑤又说：“自余观之，‘三索’章先父母而后六子，此两章先六子而后父母，要皆归重于乾坤，岂有六子居母前之理！此天地之大经，古今之通义，而邵子图紊乱如此，尚可信乎！”^⑥

^① 张岱年：《求真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页。

^②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卷二，第六章，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③ 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④ 针对伏羲八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而言，非单指小横图。

^⑤ 《易图明辨》卷七《先天古易下》。

^⑥ 《易图明辨》卷七《先天古易下》。

邵雍的先天图，是一个独创的宇宙发生论的理论模型，它的理论意义在于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图象，表述了整体思维特征和系统思维方法。它本是“易外别传”的一套理论体系，不应以削足适履的办法硬将其归入《周易》理论而指责它有“八大失误”。倒是应当着眼于探讨人类思维发展的特征，参照现代科学思维原则，予以客观评价。现代科学思维追求简单法则，力求以最简单的公式、原理，阐述最复杂的事物变化，爱因斯坦所毕生探索的原理正在于此。邵雍的先天图，充实了太极图，发展了易学象数思维方法，充分显示了易学象数思维的整体思维、对称法则、节律观念，有其不可忽视的理论思维价值。应当承认他那涵盖自然、社会、历史的博大思想体系，正是从这一宇宙发生论的简单理论模型展开的。

二、太极运化的“环中”原则

(一) “先天图，环中也”

邵雍对先天图作了多方面阐发，以之论证自然和人事变化的客观必然性。认为宇宙万物和人类历史的运化，自然而然，无需人为安排。这种客观必然性，先天图的图象中有其反映。

首先，邵雍阐明先天图中宇宙运化的客观法则，称作“环中”原则。他写道：

先天图者，环中也。自下而上谓之升，自上而下谓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阳生于下，

阴升于上，是以万物皆反生，阴生阳，阳生阴；阴复生阳，阳复生阴，是以循环而无穷。^①

这里所讲的“环中”概念，是借用庄子的观点，即“得其环中，以应无穷”^②。邵雍认为先天图表明了宇宙运化的“环中”原则，它可以应变万端，无有穷期。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他说：

先天之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也。图虽无文，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③

就是说，先天图尽管只是一个简单的卦象图式，没有文字说明，可是整个先天学的理论原则，全部包含在其中；他讲的所有道理，都是对先天图的阐发。

何以见得先天图中包涵着“环中”原则？邵雍的学生程大道对此有明白的表述：他说“邵子谓‘图皆自中起’，此皆字，兼方、圆图而言。天地定位，此圆图之从中起也。雷以动之，风以散之，方图之从中起也。圆图乾坤当南北之中，……方图震巽当图之中，故曰：皆从中起。”^④ 圆图指伏羲八卦方位图，从中起，谓乾南坤北当圆形之中轴，然后分东西两半；

① 《观物外篇》第三。

② 《庄子·齐物论》。

③ 《观物外篇》第二。

④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下》。

方图，指小横图，从中起，谓从图之中部震巽之间划界，分为左右两片。

有人认为邵雍所说“图皆从中起”，也指《伏羲六十四卦方图和圆图》。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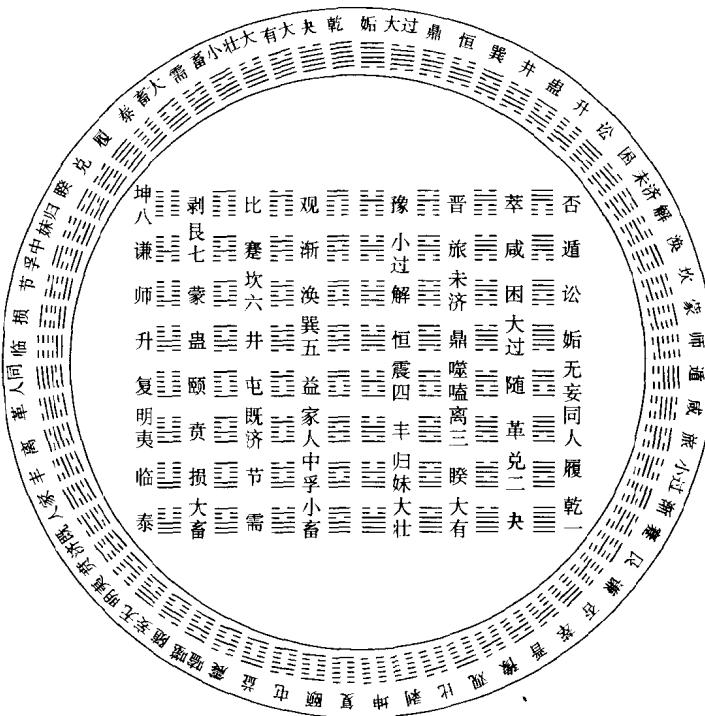


图 3 伏羲六十四卦方图和圆图

六十四卦圆图，“自中起”，指乾南坤北当图之中轴，划

分东西两半。东半自复经临、泰、大壮至夬；西半自姤经遁、否、观至剥。

六十四卦方图，“自中起”，指从图的中心到外围，将方图分为四个层次。中心一层，震、巽、恒、益等4卦。中二层，离、坎、未济、既济等12卦。中三层，兑、艮、咸、损等20卦。最外层，乾、坤、否、泰等28卦。此方图之对角线上正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伏羲八卦次序。且自内至外，层层相涵，由4，而12，而20，而28，“皆有隔八相生之妙”。^①

朱熹对此六十四卦方位图，在《周易本义·图说》中有过解说，指出其中奥妙。他说：“此图圆布者，乾尽午中，坤尽子中，离尽卯中，坎尽酉中。阳生于子中，极于午中；阴生于午中，极于子中。其阳在南，其阴在北。方布者，乾始于西北，坤至于东南；其阳在北，其阴在南。此二者，阴阳对待之数：圆于外者为阳，方于中者为阴。圆者动而为天，方者静而为地者也。”这是说先天图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从时间上看，反映了子午卯酉一日十二时辰的阴阳消长；从方位上看，反映了南北东西四方的阴阳变化。圆动为天，方静为地。天地万物变化之奥妙尽在此图中。

朱子还进一步以“对待”^②观点阐发此图的哲学内涵。指出：“圆图象天，一顺一逆，流行中有对待，如震八卦对巽八卦之类；方图象地，有逆无顺，定位中有对待，四角相对，如

^①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

^② 对立统一。

乾八卦之类。此则方圆图之辨也。”^①

邵雍坚持先天图的“环中”原则，实亦坚持“流行中有对待”的原则。这是对易学思维模式的一个贡献。后来研究易学的人，不只讲“流行”，同时讲“对待”。“流行”表示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对待”表示宇宙万物无不处于对立统一之中，这是《周易》作为辩证的“宇宙代数学”的两个基本法则。邵子先天图对此有阐发之功。“环中”原则的实质即流行、对待。不过，将图式构造原则，强加于自然，虽然偶合，仍属猜测而已。

(二) 太极——“天地之始也”

邵雍认定“图皆自中起”的“环中”原则有极其深奥的道理。那么“环中”的“中”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中就是“一动一静之间者”，非动非静的“太极”。他称“太极”为无名公，对于它不可言说，无以名之，勉强称作“太极”，他曾作《无名公传》。他在《自作真吟》中，又称太极为“丸”，“借尔面貌，假尔形骸。弄丸^②余暇，闲往闲来”^③。自认为平生事业唯在“弄丸”，即阐发太极思想。

邵雍认为“太极”是产生一切象和数的根源，是天地万物之始基，宇宙变化的终极原则。他从太极展开先天易学思想体系，论述象数及天地万物的关系。

^①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下》。

^② 谓“太极”。

^③ 《击壤集》卷十二。

《观物内篇》中，邵雍指出：“夫一动一静者，天地至妙者欤？夫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之妙者欤？”此所谓“一动一静之间者”，即是指太极，它是天地人三者运动变化的总根源。它主宰动静变化，本身只是非动非静的本体。邵雍之子伯温对此有恰当的注释。他说：“不役乎动，不滞乎静，非动非静而主乎动静者，一动一静之间者也。”^①说它“主乎动静”，表明它是天地万物动静变化的根源，一切变化由它派生；说它是“一动一静之间者”，表明它本身是超越动静、非动非静的宇宙本体。既非动非静，又亦动亦静，故称之为动静之间者。这就是先天易学的宇宙本体论。这个“太极”，邵雍又称之为“道”。

邵雍写道：

生天地之始，太极也。^②

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③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则异矣，其于道一也。^④

太极，道之极也。太元，道之元也。太素，色

①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

② 《观物外篇》第七。

③ 《观物内篇》之三。

④ 《观物内篇》之八。

之本也。太一，数之始也。太初，事之初见。其成功一也。^①

邵雍说：“道为太极”，表明“太极”同“道”是同等的概念，只是称呼不同。又说：“太极，道之极也。”仿佛太极又是比“道”更高一层的概念。无论如何，只表明太极、道，都是生天、生地，宇宙万物的本源，此外再无别的本源。邵雍关于“道”的概念，并未离开《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点。他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无声无形，不可得而见者也。故假道路之道为名。人之有行，必由于道。一阴一阳，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②

人们会问，既然“道”生成万物，那么它是否脱离万物而独立存在呢？邵雍的回答是，“道”不能脱离万物而存在。它就在天地万物自身之中。他说：

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万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天地之道，尽之于万物矣。^③

① 《观物外篇》第十二。

② 《观物外篇》第六。

③ 《观物内篇》之三。

“天地之道，尽之于万物”即是说道在万物之中，不应外物而觅道。不外物以觅道，表明“道寓于物”，邵雍哲学具有唯物论因素。邵雍解释《易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① 可见他认为理并不离物的。“道尽于物”、“理不离物”，都是很可取的观点。道和理是抽象的原则，物指具体的事物，道理寓于事物之中，是唯物主义原则。可惜邵雍并没有沿着这些思想的闪光进而构建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后来，按“道寓于物”，“理不离器”的思想原则建立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是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

邵雍提出太极乃“天地之始”的观点，引起一些议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不是如母亲生儿子一样？朱子的学生林中黄认为，“惟其包之，所以生之”。朱子曰：“包如母之怀子，子在母中；生如母之产子，子在母外。”^② 朱子的观点显然认为太极同两仪、四象、八卦是可以分离的。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其实邵雍之子伯温，对此已早作解释，他说：“有太极则有两仪、四象、八卦，以至于天地万物，固已备矣。非谓今日有太极，而明日方有两仪，后日方有四象、八卦也。虽谓之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实一时俱足，如有形则有影，有一则有二有三，以至于无穷皆然。”^③ 这表明太极同两仪、四象、八卦以至万物，是“如影随形”不可分开的。

① 《观物内篇》之三。

② 《易图明辨》卷六引。

③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

然而毕竟还有人误解。黄百家就认为朱子对太极过于笃信，将“邵传羲画，摄入《本义》中，竟压置于文象、周爻、孔翼之首，则未免奉螟蛉为高曾矣”^①。这种批评甚为不当。否认宇宙万物有其本体，对古代哲学的发展未必有利。邵雍坚持太极为宇宙万物之本体，肯定“道尽于物”，“理不离物”，对古代哲学本体论的发展是有意义的。唯心主义者的某些论述，往往成为唯物主义发展中前进的基石，提供了略加改造就利用的可贵思想资料，这是思想发展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通过批判宋明理学而将中国哲学大大推进一步，这是大家所公认的。

(三) “先天之学，心法也”

本来，邵雍主张“道为太极”，“道尽于物”，“理不离物”，对一动一静之间者，作了可取的解释，但在《观物外篇》，他又提出“先天之学，心法也”的主张，把人们的思想引向另一极端。他写道：

先天之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也。图虽无文，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②

这说明“万化万事生乎心”的“心”，是中心的心，也就

^①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

^② 《观物外篇》第二。

是先天图中居于中心位置的“太极”。“图从中起”，心法也。心为太极，万化万事生乎心，也就是生于太极。表面上看来，这个心是指“天地之心”的太极，并不专指人心，“天地之心者，生万物之本也”。^①

但邵雍又夸大人心的作用。天地之心是太极、是万化之本。人之心，居人身之中，亦为太极，亦是万化之本。《观物吟》写道：

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
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
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②

“万物备于我”是孟子坚持的唯心主义宇宙观，邵雍从“环中”原则走到心处身中，亦为太极，进而夸大心为万物之本。“人于心上起经纶”，故云“万物皆备于我”，宇宙万物是从我的心产生的。并将这种观点说成是《易》学的根本原则，它是打通人天关系的桥梁；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就在心上，故云“道不虚行只在人”。

邵雍实际上把“环中”法则，归结为人心法则，他的先天图及其变化法则出自人心，整个先天易学都是人心的创造。宇宙万物也是人心的创造，统统归“环中”法则支配。说是人心的创造，并不是指每个人的创造，而是“须信画前元有

^① 《观物外篇》第六。

^② 《击壤集》卷十五。

易”^①，那就是在卦爻画之前早已有先天易学法则，即伏羲氏心中的创造。伏羲氏不是经过“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而创造八卦的，是他的心创造了八卦及其先天图。这就把“心为太极”的命题发挥到极点，难怪他说：

物莫大于天地，天地生于太极。太极即是吾心。
太极所生之万化万事，即吾心之万化万事也。^②

太极就是心，心的原则体现于先天图，衍化出先天易学。先天易学所探寻的是人类产生之前的宇宙演化过程。在古代科学不够发达的历史条件下，人类要探索远古自然衍化的规律，要么是乞灵于神的智慧开化，要么只能靠人心的猜测，邵雍属于后者，所以易学象数被看作解释宇宙衍化过程最方便、最灵验的工具，也是通向唯心主义最方便的桥梁。“先天之学，心法也”，指的就是伏羲先天八卦图所显示的“环中”原理与数学方法。伏羲之心即是天地之心。为天地立心，就靠邵雍所阐发的先天象数学了。邵雍先天易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是比较鲜明的。

邵雍说过“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心）中”，又说“人于心上起经纶”，还说“心者，性之郛郭”。这些话都是宋明理学阐述的基本法则，所以朱熹十分欣赏邵雍，不只将他所传的伏羲先天八卦图载于《周易本义》之卷首，并称赞说：

^① 《伊洛渊源录》卷九引。

^② 《渔樵问对》。

“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康节这数句极好。盖道即理也，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是也。然非性，何以见理之所在？故曰：“性者，道之形体”；仁义礼智，性也，理也，而具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郛郭。”^①

这是称赞邵雍不只把人心看作天地万物衍化的根源，也是仁义礼智等人伦遵循的法则。心法是自然、人伦共同遵循的大法。心法如何具体演化天地万物与人伦呢？邵雍还得在数与象上大费心思。

三、太极衍化的数理表现

邵雍认为天地万物来源于宇宙本体——太极。太极实是一个精神本体。这个精神本体如何产生天地万物？邵雍认为，它首先产生一定的“数”，由数再产生象，有数有象，就有了多样化的具体事物了。先天易学的任务，就是阐发这一精神性的宇宙本体通过神秘的数显现自然界及人类历史衍化的基本规律。

（一）“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

太极产生天地万物，它本身需要运动，不动则不能生物。

^① 《朱子语类·邵子之书》。

为此，邵雍引入“神”的概念。《易传》说过：“阴阳不测之谓神”，神就是变化的意思，并非神仙的神。邵雍说：

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①

又说：

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器则变，复归于神也。^②

邵雍所说的“神”，是指宇宙本体太极的变化。太极未分化之时，是“不动”的，一经发动则显现为“神”；“生二”，指太极发动后产生阴阳二仪，故云：“二则神也。”神即是阴阳分化的表现，太极未分化则不动，分化为阴阳二端则“神”，“神”就生成二、四、八等数，就产生象。二的象是一阴一阳，四的象指太阳、太阴、太柔、太刚。八的象即是八卦。这也是对《易传》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一种说明。太极生天地、阴阳，显现为“神”。神表示太极的运动，同时表明这种运动是“不测”的。是对《易传》“阴阳不测之谓神”的思想具体化。邵雍既肯定太极不动，又说它会“生二”，这就有个难解之谜，“不动”怎能生二呢？只好说既有二就有神，所以他的学生注释说：“阴阳

^① 《观物外篇》第六。

^② 《观物外篇》第六。

神也，奇偶数也。”“神”是邵雍设定的一个不动而动，既动又不动的灵活概念。好在这个“神”决不是一种人格神，而只是一个宇宙衍化的内在动机。

太极是产生数与象的本源，生阴生阳而有神，“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一阴一阳的“二”，具有变化不测的本性，有了二，统一的太统，就有了数的分化，有了不同的数，也就产生了阴阳刚柔等爻象和卦象，也就开始衍化繁多的具体事物了。故邵雍说：“天之象数，则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则不可得而测也。”^①其“神用”不可测，是指宇宙万物千变万化，具有偶然性，不可一一指陈。

邵雍提出太极和两仪的关系，推动人们从本体上作深入思考，促使《易传》宇宙生成论向前发展，展开为“一”和“两”的关系的争论。唯物主义者张载提出的“一故神，两故化”的命题，成为典型而深刻的哲学命题，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推进一大步，从而使神或鬼神的概念，成为古代辩证法思想的一个特殊范畴。

不难看出邵雍关于宇宙衍化的理论，源于《易传》，又较《易传》大为充实发展，事物的衍化不单纯依靠理论的演绎，而作了数与象的推衍，从而发展为一套“易外别传”的数学思维体系，使古代的理论思维走上一条新的思想路线，尽管它不是建立在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基础上，却使思维的抽象化别开生面。

^① 《观物外篇》第七。

(二) “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

邵雍在制定太极的神化原则之后，竭尽心力创建自己的象数学思想体系。邵雍的博大思想体系，在中国易学思想史上，的确是没有先例的。

邵雍首先提出动静、阴阳、刚柔范畴，指出：

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交，而地之用尽之矣。^①

一动一静即太极的神化之始，生天生地之几。天地之道不外一动一静的交感作用。一阴一阳，一刚一柔，这是邵雍营造其理论体系的四大支柱，合而言之称为天地之用。即天地之道的具体体现。故邵雍云：

物之大者无如天地，然而有所尽也。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阴阳尽而四时成焉。刚柔尽而四维成焉。夫四时、四维者，天地至大之谓也。凡言大者，无得而过之也。亦未始以大为自得，故能成其大。^②

^① 《观物内篇》之一。

^② 《观物内篇》之一。

邵雍提出四时的概念，代表时间，提出四维的概念，代表空间，形成象数思想体系的时空观。成四时者为阴与阳，成四维者为柔与刚。阴阳、刚柔成为象数体系表述宇宙万物统一性多样性的关键范畴。从此，一切变化均不外此阴阳刚柔相交而形成的时空变化。太极为“一”，^① 天地为“二”，天之阴阳、地之刚柔各为“二”，合之而成“四”。邵雍的先天易学思想体系，最大的特点就在注重这个“四”，他认为“四”应是人们用以认识宇宙万物乃至人类历史变化的一把钥匙。在邵雍的象数思想体系中，言必称四。邵雍制定的《经世衍易图》和《经世天地四象图》都是按一分为二的原则，以四为基准构造出来的。如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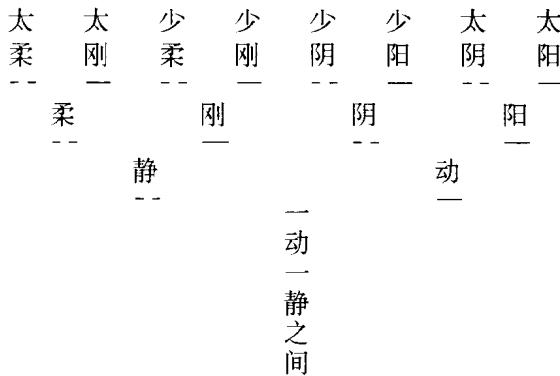


图 4 经世衍易图

^① 指一动一静之间者。

《经世衍易图》载于《性理大全》，为南宋学者蔡元定所传。他用《易传》的原理予以解释。“一动一静之间者，易之所谓太极也。动静者，易所谓两仪也。阴阳刚柔者，易所谓四象也。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少刚少柔、太刚太柔，易所谓八卦也”。其实邵雍是在《易传》思想启示下，不用两仪、四象、八卦之名，按一分为二的原则，独立作出的数的推衍。他的兴奋点不在八卦，而是天之四时与地之四维，注重四而非注重八。太阳、太阴、少阳、少阴，为天之四时；太刚、太柔、少刚、少柔，为地之四维。邵雍关于“四时”的概念，并非专指春夏秋冬四季，“四维”的概念，并非专指东南西北四方，只是用不同的数代表不同的象而已。

秋春	书	诗	易	霸	王	帝	皇				
辰	日	月	岁	运	世	会	元				
味	气	声	色	鼻	口	耳	目				
走	飞	草	木	体	形	情	性				
雨	风	露	雷	夜	昼	寒	暑				
水	火	土	石	辰	星	月	日				
柔		刚		阴		阳					
地				天							
极 太											

图 5 经世天地四象图

邵雍将《经世天地四象图》同《经世衍易图》相结合，予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以具体物象规定，对“数生象，象生器”作了明确解释。他首先解释天之“四象”：

动之大者谓之太阳，动之小者谓之少阳；静之大者谓之太阴，静之小者谓之少阴。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①

将天之“四象”规定为日、月、星、辰，以尽“天之体”，这是邵雍先天易学思想体系的四大支柱。

其次，邵雍解释了地之“四象”：

静之大者谓之太柔，静之小者谓之少柔；动之大者谓之太刚，动之小者谓之少刚。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体尽之矣。^②

将地之“四象”规定为水、火、土、石，以尽地之体，这是邵雍先天易学思想体系的又一四大支柱。

有了天、地四象，即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邵雍易学思想就奠定了八大基石。从此一切自然现象、社会历史现象，都

^① 《观物内篇》之一。

^② 《观物内篇》之一。

可以按四象、八器相互制约，阴阳刚柔生克制化的原理予以说明，天地万物成为整齐划一，有条有理、变化万端的统一体，从而完成其先天图式的宇宙生成论。

从《经世天地四象图》的具体内容，我们不难发现邵雍的宇宙生成论，不同于传统哲学中的宇宙论，而有着许多独到的特色。

第一，先天图式的宇宙生成论，不重三与五，独重四。《易传》的宇宙论，强调的是三，处处讲天地人三才统一，《洪范》以来的宇宙论，强调的是五，处处时时讲水火木金土五行的统一与生克制化。

第二，先天图式的宇宙生成论，对八卦作了新的规定，脱离了《易传》思想体系。他规定天之四象为太阳（日）、太阴（月）、少阳（星）、少阴（辰），相当于八卦中的乾（天）、兑（泽）、离（火）、震（雷）。乾为日，兑为月，离为星，震为辰，根本不符合《易传》的观点。他将地之四象规定为太刚（火）、太柔（水）、少刚（石）、少柔（土），即水火石土，相当于八卦中的巽（风）、坎（水）、艮（山）、坤（地）。巽为石、坎为土、艮为火、坤为水，同样远离《周易》八卦的卦象。

第三，为了整齐划一，进一步设定“天之变”、“地之化”，产生具体物象，更远离人们的一般常识。他说：“日为暑，月为寒，星为昼，辰为夜。暑寒昼夜交，而天之变尽之矣。水为雨，火为风，土为露，石为雷。风雨露雷交，而地之化尽之矣。”^①至于由“天之变”引伸出性、情、形、体；由

^① 《观物内篇》之一。

“地之化”引伸出走、飞、草、木，愈加显露其生硬而牵强。为了营建体系的方便，连基本常识都不顾了，不能不处处引出违心之论。遇事分成四层的方法，是邵雍思想体系的特点，同时也是其致命弱点。不是人顺从自然，而是削足适履，强迫天地万物适应邵雍制定的象数模式，这种思想体系注定是缺乏生命力的。

(三) “神一而已，乘气而变化”

邵雍的先天图式，许多地方脱离传统哲学观点。一方面，它是一种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不受传统的拘束；另一方面，它易于与传统思想脱轨，不易为人接受。有鉴于此，《皇极经世》中，对太极这一宇宙本体，不得不作出一些符合传统哲学的规定。本来他说：太极是天地之始，诸图的根源，太极为“心”。与此相反，他又说太极为气。《观物外篇》说：“本一气也，生则为阳，消则为阴。”气分阴阳，为万化之根源。气是传统哲学范畴，邵雍亦认定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气的变化。

邵雍阐述了气与神、气与物的关系，他说：

气者，神之宅也；体者，气之宅也。气以六变，
体以四分。体四而变六，兼神与气也。气变必六，故
三百六十也。^①

^① 《观物外篇》第一。

这是说万物之“体”，由气构成；万物的变化（神），是气在变化。中国哲学史上，从荀子到王充、柳宗元都是这么讲的。邵雍不得不承继这一传统。为什么说“气以六变、体以四分”？邵雍是把“气”看作阳，代表天，把“体”看作阴，代表地。他说：“参天，两之则为六；两地，又两之则为四，此天地分太极之数也。”^① 明人黄畿（粤洲）对此注释云：“气阳为天，斯神之宅，神即气之灵妙变化处也。体阴为地，又气之宅，气为体之流动充满处也。”^②

邵雍肯定宇宙的本体为太极、为元气。一气分而为阴阳，形成天与地，遵循的是太极生两仪，一分为二的法则，其变化的程序和法则，仍是“心法”，引入气化概念，同样掩盖不了他的哲学体系的先验论性质。但邵雍在其先天易学体系中，毕竟容纳了“气化”的原则。他说：

气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气而变化，能出入于有无、死生之间，无方而不测者也。^③

宇宙万物之有无、死生，均“乘气而变化”，这是对传统气化学说的继承与发挥。在邵雍刻板的数与象的推衍过程中，无疑增加了新鲜活泼的气息，完成了先天象数学同传统哲学接轨的任务。尽管这种接轨并不十分自然，因为太极衍化的

^① 《观物外篇》第一。

^② 《皇极经世緒言》。

^③ 《观物外篇》第三。

“心法”，同天地万物的“气化”，实在还存在不小的裂痕而远不是天衣无缝。“心法”所注重的是一、二、四、八这种数的“加一倍法”，即一分为二的法则；“气化”实际是“心法”的体现而已，气化所显现的物象，仍是受心法支配的，如天之日月星辰；地之水火土石；天之暑寒露雷，地之走飞草木，均未能超出四象八段之数。

邵雍的先天易学，是按“加一倍法”，依天地之象，分四块八段，以整齐划一的数学观点解易，从而形成易学史上的一个新的流派——数学易学派，与京房的八宫世应说、虞翻的卦变说都不同，与韩康伯的有生于无说、孔颖达的太极元气说也大异其趣。

邵雍先天易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将数看作决定事物本质的东西，特别注重四这个数，认为它是解开众妙之门的钥匙。把“数”无限神秘化，同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学派颇有相似之处，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目为第一原理，为生存的物质之因”。邵雍则认为“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两者相同之点在于神化“数”的力量，不同之点则在于邵雍把“数”看作宇宙本体太极神化的法则。无论二者有何区别，这两种哲学的共同特点都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它们那里，实体、物和世界的‘规定’是‘枯燥的、没有过程（运动）的、非辩证的’。”^①列宁的这一批评可谓入木三分，成为不易之论。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3页。

第七章 象数学——宇宙万物衍化的数学图式

邵雍先天易学的具体内涵，是他的先天象数学，这同汉代《周易》象数学是大不相同的。邵雍企图用主观构造的一些象数原则、象数图式，描绘整个自然演化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逻辑程序。邵雍营建的宇宙生成论，仅仅着眼于数的推演，远离客观事物发生发展的实际，大多属于主观猜测；但却同上帝创世说，“天人感应”说不一样，反映了古代哲人对宇宙衍化史、人类发展史的执著探索，在人类认识史上有一定意义。他所坚持的基本法则，程颢称之为“加一倍”法，朱熹名为“一分为二”法。其实，说它是“四分法”，或许更为恰当。无论怎么说，用这种思维方法解释八卦、六十四卦象数的形成，而又安排得十分整齐周延，不能不说这是易学史上的一种独创。何况以象数符号推求天地万物衍化的逻辑关系，予人以深刻的科学启迪，切不可以其神秘无稽而等闲视之。

一、先天象数学的基本图式

(一) “数者，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易》学发展到宋代，起了极大变化，引入太极图、河图、洛书，形成别开生面的图书学派。周敦颐大讲“无极而太极”，画出《太极图》，讲一套象学。邵雍与周敦颐不同，画出一个《先天图》，表示先天象数，不只讲象学，更着重发挥数学。邵雍自称：

君子于《易》，玩象、玩数、玩辞、玩意。象起于形，数起于质，名起于言，意起于用。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数。数立则象生，象生则言彰，言彰则意显。^①

邵雍对象和数十分重视，专门从象和数方面阐发《周易》，故其易学称为先天象数学。加上“先天”二字，是为了同汉代《周易》象数学相区别，它以《先天八卦图》为思想模式。

邵雍的象数学，按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加倍”的基本法则，进行数字的排列与组合，创造了不少图式，以之囊括宇宙万有的生成变化及其相互关系。邵雍的象数思想，究其本源来自《易传》。《系辞上》云：“参伍以变，

^① 《观物外篇》第六。

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宇宙万物莫不有一定的形象与数量，这一认识是合理的；事物的发展变化，必然伴随着形象与数量的变化，这也是自然的。如果把事物的象与数都看作客观存在，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就会推动人的认识走向深入。邵雍并非如此，他无限夸大“数”的作用，所说的“数”，只是一个先天之数。他的儿子邵伯温对其“数”，有过绝妙的描述：

数者何也？道之运也，理之会也，阴阳之度也，
万物之纪也。明于幽而验于明，藏于微而显于著，所
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也。^①

在天则为阴阳消长，在人则为治乱兴衰，不能
逃乎数也。^②

说“数”的威力在“成变化而行鬼神”，表明“数”在宇宙万物中最根本的，如果否定了这一点，就会动摇邵雍神秘的象数学的根基。

夸大“数”的神秘性，这也并非邵雍独创，肇端于陈抟。在北宋时期，可以说形成了一种热潮。北宋中期易学家刘牧在其《易数钩隐图序》中，竭力鼓吹同一观点，他说：

夫《易》者，阴阳气交之谓也。……卦者，圣

^① 《邵子全书》卷二。

^② 《邵子全书》卷二。

人设之，观于象也。象者，形上之应，原其本，则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矣。^①

刘牧比邵雍说得更加明确而坚定：“形由象生，象由数设。”宇宙万物莫不有数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形。数是决定一切的。那么，数由什么决定？邵雍与刘牧都没有说，看来只能说是先天的安排。难怪邵雍力图用一套先天象数学的思想体系去概括宇宙万物的变化，并预测未来的发展。如何显示其概括与预测的合理性？他显示图书学派的特点，苦心孤诣构造了一些重要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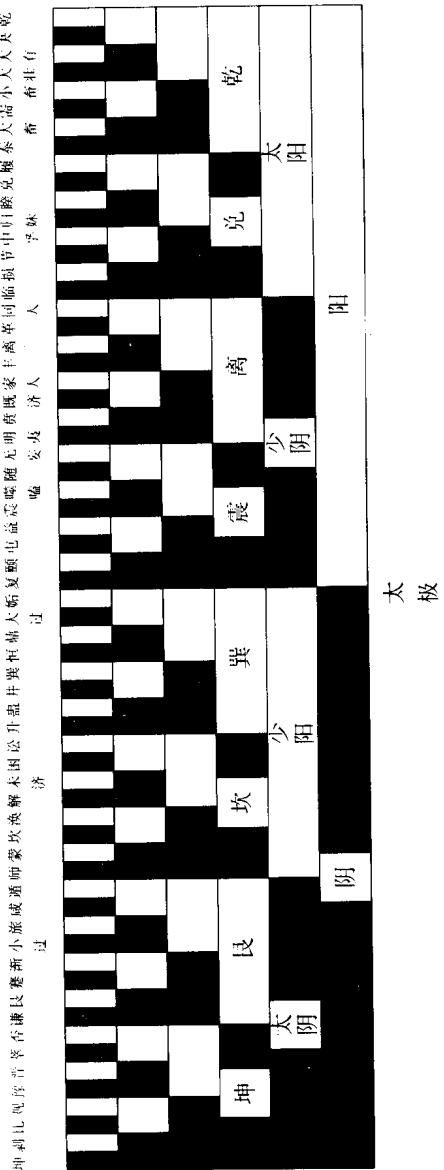
（二）大横图——阴阳分化的基本程序

邵雍的先天易学是以两个图为基础，一个是《伏羲八卦次序图》，即小横图，见于本书第六章。一个是《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又称大横图。六十四卦次序一定，方位有常，建立了时空统一观，整个理论才有着落。

大横图是在小横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横图只讲太极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按此“一分为二”（或加一倍）的原则，继续分下去，就是“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邵雍的先天象数图，到六十四之数就完成了，如图 6。此图式见于《周易本义》和《宋元学案·百源学案》。

^① 《易数钩隐图》刘牧自序。

圖6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



他所说的“八分为十六”，就是将三画之卦（经卦）变为四画之象。即在八卦之上再加一阴一阳（一偶一奇），如乾卦之上再加一阳为☰，再加一阴为☷，坤卦之上再加一阴而为☷，再加一阳而为☰。这 16 个四画之象，没有名称，在先天易学上也不加应用。无名无用之象，只表示由八卦衍化为六十四卦进程中的一个不可逾越的程序。

他所说的“十六分为三十二”，就是在四画之象上，再加一阴一阳（或一奇一偶），也就是使四画之象衍变为五画之象，将十六之数增加一倍。如将四画之象☰，加上一阴，变成☱，加上一阳，变成☲；四画之象☷，加上一阴，变成☷，加上一阳，变成☶。如此类推，由 16 个四画之象，衍变成 32 个五画之象，这些五画之象，同样没有名称，没有用处，它的象只表示由八卦衍为六十四卦过程中的一个程序。

他所说的“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就是在五画之象上，再加一阴一阳（或一奇一偶），也就是使五画之象衍变而为六画之卦（别卦）。如五画之象☱，加上一阴一阳，就是☱夬卦与☷乾卦；五画之象☷，加上一阴一阳，就是☷坤卦与☲剥卦。如此推衍，32 个五画之象，就衍变为六爻的六十四卦。

“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是《周易》固有的思想，即“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可是“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这是《周易》没有讲过的，是邵雍数学衍变的程序。八至六十四所生之象，或有名，如八卦、六十四卦；或无名，如四画之象，五画之象。四画五画之象，乃邵氏先天图式所假设，因此遭到后来学者的诟病。诟病尽管诟病，邵氏先天易学的大横图，毕竟整齐完满地画出来了，从“加一倍法”的原则上看，是

无可非议的。“一分为二”的原则，本身的确是宇宙万物演化的基本法则之一，已在哲学界取得共识。尽管在邵雍思想体系中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法则，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宇宙万物的演化进程中，它却是一个活生生的法则。因此，说邵雍先天易学的“一分为二”法则对人们的辩证思维的发展有所启迪，是不为过分的。

邵雍首创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大横图）蕴含着一些值得玩味的思想内容，在《易》学发展中增加了一些新鲜意境，不可等闲视之。

首先，从数学角度看，它突出了等比级数原则。太极等于 2^0 ，两仪等于 2^1 ，四象等于 2^2 ，八卦等于 2^3 ；四画之象等于 2^4 ，五画之象等于 2^5 ，六十四卦等于 2^6 。此种加一倍法，正如朱熹所说，“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①。六十四卦无非阴阳两仪再经过四次分化而成。

其次，从象学角度看，它凸显了阴阳、刚柔四象法则，以应《说卦》“分阴分阳，叠用柔刚”之理。邵雍讲天之四象，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地之四象，太刚、太柔，少刚、少柔。故朱熹称之为四分法。《朱子语类》说：“其数以阴阳刚柔四者为准，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只管推之无穷。”他的学生问道：“先生说邵尧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则圣人看天下皆成两片也。”朱子云：“也是如此。只是阴阳而已。”朱子说邵子“看天下物皆成四片”，根据何在？因《观物内篇》说过：“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阴阳尽而四时成焉，刚柔尽而四维成焉。夫四时、四维者，天

^① 《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地至大之谓也。”朱子“四片”之说，的确抓住邵子易学体系的特征，先天易学讲自然史、人类史的衍化，都是从“四片”着眼的。“四片”之说，也正好同《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相区别。

第三，邵雍对八卦和六十四卦的生成次序的解释，把奇偶二数在天地万物演化中的地位凸显出来，建立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别开生面的数学法则，既不同于虞翻的卦变说，也不同于韩康伯有生于无说，更不同于孔颖达的太极元气说，创立了解《易》的新流派——数学派。这种突出一奇一偶的数学方法，与近代数学中的二进位制极相似，难怪德国哲学家、二进制数学方法的创造者莱布尼兹在看到邵雍的卦图后，十分惊喜，认为与他的二进位制“完全一致”。这说明邵雍的思想方法对现代数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启迪作用。特别是有科学思维的方法论意义。这一意义在其《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大圆图）中显示尤为突出。

（三）六十四卦圆图（大圆图） ——阴阳消长、大化流行之图式

邵雍将《伏羲八卦方位图》、《小圆图》的原理加以扩大，设计了“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又称大圆图，以之说明宇宙之间阴阳消长、大化流行、万物兴衰、人事治乱之机。构成先天易学的又一基本图式，实为完整的先天图。如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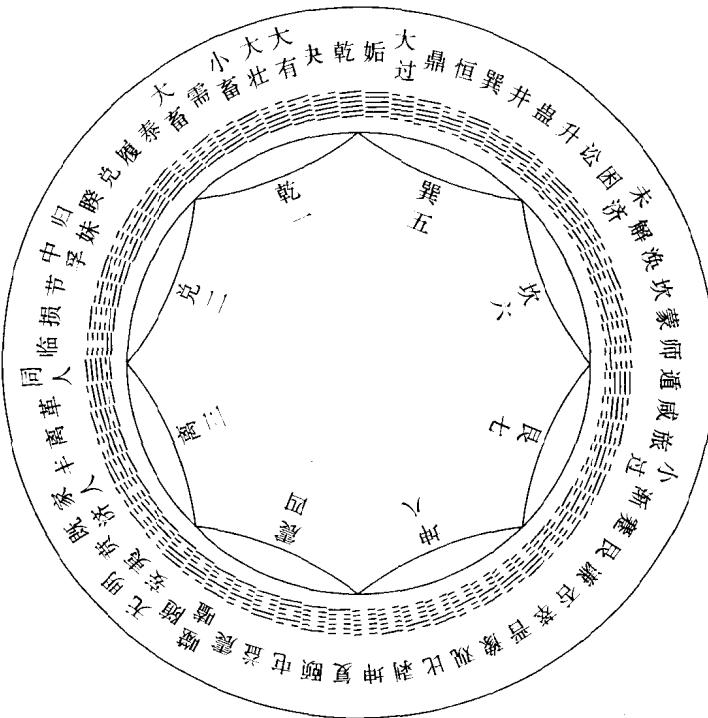


图 7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大圆图）

大圆图除了包含小圆图的全部内容，又赋予许多新的意义，以之展开先天易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细加玩索，其重要意义有五大方面。

第一，阴阳消长各有优势的原理。

大圆图首先显示“乾坤定上下之位”的基本方位，从而将圆图分为左右两半圈。左半圈从复到乾，32 卦，其内卦为乾兑离震四阳卦，故其阳爻有 112，阴爻只有 80，是阳爻占

优势；右半圈从姤到坤，32 卦，与左半圈对等，因其内卦为巽坎艮坤四阴卦，故其阴爻为 112，阳爻只有 80，是阴爻占优势。从整体看，大圆图的特点是左为阳，右为阴。然而左右双方是阴阳对等而互补的，只各有优势而已。《观物外篇》云：

复至乾，凡百有十二阳，姤至坤，凡百有十二阴。姤至坤，凡八十阳，复至乾，凡八十阴。^①

这说明天地万物阴阳消长并不均齐，却总是对等而互济，在总体上保持平衡。人们应对大化流行，作以上的宏观把握。

第二，阴阳变化有顺逆、升降之别。

将六十四卦按其内卦相同者，分为八组，每组八卦，依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次序排列，则可发现阴阳变化有顺逆、缓急之别。左半圈，乾至泰，内卦皆乾；履至临，内卦皆兑；同人至明夷，内卦皆离；无妄至复，内卦皆震；右半圈，姤至升，内卦皆巽；讼至师，内卦皆坎；遁至谦，内卦皆艮；否至坤，内卦皆坤。由此而观察阴阳升降关系，呈现如下的规律性，左半图，从复至乾，阳爻逐步上升，阴爻逐步下降；震类八卦，阳爻共 20，离、兑二类卦，阳爻各 28，乾类八卦，阳爻为 36。右半圈，从姤至坤，阳爻渐消，阴爻渐长，巽类八卦，阳爻共 28，坎、艮二类卦，阳爻各 20，坤类八卦，阳爻为 12。阳爻由多变少，则阴爻由少变多；阴爻由多变少，则阳爻由少变多。阴阳消长呈规律性变化。这就是邵雍所说的：

^① 《观物外篇》第二。

“乾三十六，坤十二，离兑巽二十八；坎艮震二十。”^① 邵雍还指出，左右两半圈的阴阳消长有顺有逆。左半圈为阳卦，由复至乾，阳爻逐渐上升，是谓“阳在阳中”，谓之“阳顺行”。右半圈为阴卦，由姤至坤，阳爻逐渐减少，是为“阳在阴中，阳逆行”。从阴爻变化来看，左半圈，由复至乾，阴爻渐减，是为“阴在阳中，阴逆行”；右半圈，由姤至坤，阴爻渐增，是为“阴在阴中，阴顺行”。故邵雍云：“阳在阴中，阳逆行；阴在阳中，阴逆行。阳在阳中，阴在阴中，则皆顺行，此真至之理，按图可见之矣。”^②

第三，阴阳变化之始，在复姤二卦。

《观物外篇》称复姤二卦为小父母，以明阴阳变化之始。写道：

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有象之后，阳分阴也。阴为阳之母，阳为阴之父。故母孕长男而为复，父生长女而为姤，是以阳起于复，阴起于姤^③。

坤为六阴，复为五阴一阳，是由坤至复，阳气从无到有，可见坤复之间，存在一个阴尽阳生这一非阴非阳的特殊一刹那，邵雍称之为“无极”。一阳已生之后，即由复至乾，为“有象之后”。一阳未生之前，指由坤返巽，为“无极之前”。邵雍所说的“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是说，阳为阴所吸收，由五

① 《观物外篇》第二。

② 《观物外篇》第二。

③ 《观物外篇》第二。

阳一阴之姤，阴吸乾之一阳，经三阳三阴之否，阴吸收乾之三阳，到六阴无阳之坤，乾阳逐步为阴所吸收。所谓“有象之后，阳分阴也”，是说阴为阳所排斥。五阴一阳之复，是坤之一阴被阳所排除，经三阴三阳之泰，阳已排除坤之三阴，到六阳无阴之乾，是坤阴已被乾阳排除尽净。邵雍将阳的上升过程，称为阳排斥阴；把阳的下降过程，称为阴吸收阳，说明阴阳之间既有相互吸收又有相互排斥的特性。乾为父。一阴生而为姤，故云：“父生长女而为姤”。坤为母，一阳生而为复，故云“母生长男而为复”。所以说“阳起于复，阴起于姤”。后来就称复姤为小父母。

第四，由阴阳之始以定“天根、月窟”。

邵雍认为把握大化流行中阴阳之始机，极为重要。他称阳之始为“天根”，阴之始为“月窟”。这对人与自然合一甚为要緊。诗云：

耳目聪明男子身，洪钧赋予不为贫。
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蹑天根岂识人。
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识天根。
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①

“天根”指一阳初生之处，在大圆图中指坤卦交震类八卦中的第一卦即复卦；“月窟”指一阴初生之处，大圆图中乾卦交巽类八卦中的第一卦即姤卦。前者称“地逢雷（震）处识天根”，后者称“乾遇巽时观月窟”。这表明坤复之际为“天

^① 《击壤集》卷十六《观物吟》。

根”，乾姤之际为“月窟”。若依小圆图，则是坤震初爻之处为天根，乾巽初爻之处为月窟。邵雍又依大小圆图而提出三十六宫之说，历来对此说有不同理会。有人从小圆图理会，认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八数相加之和为36。意为一年四时，无不可以视为春。有人从大圆图理会，认为图中有8个不易之卦（指乾、坤、坎、离、颐、中、孚、大过、小过），28个可易之卦（指一个卦体颠倒之可成另一卦）二数相加之和为36。仍然表示阴阳周流于春夏秋冬四时，修炼得法，都可视为生意盎然的春天。这一理论实为邵雍的新卦气说，虽与汉代卦气说不同，却在气功界和道家内丹术中颇有影响，并引起易学家的重视。黄宗羲《易学象数论》云：“康节因先天图而创为天根月窟，即《参同契》乾坤门户牝牡之论也，故以八卦言者，指坤震二卦之间为天根，以其为一阳所生之处也；指乾巽二卦之间为月窟，以其为一阴所生之处也。”人们用此图以把握四时阴阳消长之节律，以为人天相应之准绳，医学如此，针灸学如此，内丹、气功亦复如此，易学象数的妙用，正因其以卦象标示阴阳消长节律，有其合理性，为其他思维模式所不及。邵雍先天图中的卦气学说，同汉代卦气说有两点不相同。首先，他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冬至夜半子时阳气始于复卦，不取汉人卦气起中孚之说。其次，邵雍对十二消息卦的排列，其卦象中的阴阳消长是不均衡的，不如汉代卦气说中的十二消息卦，均衡渐进有说服力。

第五，以剥复、夬姤之变易，明天道人事之盛衰。

邵雍称阳长阴消为由乱而治，阴长阳消为由治生乱。用先天图说明天道、人事治乱兴衰的轨迹。《观物外篇》第九写

道：“天地之气运，北而南则治，南而北则乱，乱久则复北而南矣。天道人事皆然，推之历代可见，消长之理也。”这是说从先天大圆图看，左半圈为天气运行轨道，从北到南，即由复到乾，阳气渐长，阳气主事，世道则治；右半圈为地气运行轨迹，从南到北，即由姤到坤，阴气渐长，阳气日衰，阴气主事，世界则由治返乱。因此他得出结论：“复次剥，明治生于乱乎！夬次姤，明乱生于治乎！时哉，时哉，未有剥而不复，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之长，子孙其昌。是以圣人贵未然之防。是谓《易》之大纲。”^① 他以阳代表君子，阴代表小人，五阴一阳之剥，代之以一阳五阴之复，表示以治代乱；一阴五阳之姤，取代五阳一阴之夬，表示由治趋乱。治生于乱，乱萌于治，符合物极则反的法则。阴阳之推移，犹治乱之相嬗，循环往复，无有穷期。这就是邵雍先天图显示的历史循环论。

(四) 六十四卦方图——阴阳对待的网络结构

邵雍还制定《伏羲六十四卦方图》，此图亦见《周易本义》。用此图对“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② 的原理作了独特阐述，发前人之所未发。方图的构造共分四层，一层套一层，组成完满的方阵图。如附图 8。

^① 《观物外篇》第六。

^② 《说卦》。



图 8 伏羲六十四卦方图

邵雍的《大易吟》对此图所作的解释是：

“天地定位”，否泰反类。“山泽通义”，损咸见义。“风雷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济未济。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荡，为六十四。^①

^① 《击壤集》卷十七。

由内向外，中心巽震恒益四卦为第一层，其外以坎离未济既济为四隅者属第二层，再外以艮兑损咸为四隅者属第三层，最外以乾坤否泰为四隅者属第四层。

“天地定位，否泰反类”——讲第四层的特点。乾居西北，坤居东南，泰居东北，否属西南，乾坤与否泰均居于向反的方位，其卦象亦相反，故云“反类”。

“山泽通气，损咸见义”——讲第三层的特点。艮为山，兑为泽，卦象相反，而损为上艮下兑，咸为上兑下艮，卦象亦相反，所谓“见义”指其相反相成之义。

“水火相射，既济未济”——讲第二层的特点。坎为水，离为火，其性相反，固不待言；既济卦上坎下离，未济卦上离下坎，卦象、卦义亦均相反。

“雷风相薄，恒益起意”——讲第一层的特点。震为雷，巽为风，居于对角线上，成相持之势；恒卦上震下巽，益卦上巽下震，卦象相反。

此方图显示的别一特征是：自西北之乾，斜行至东北之坤，此对角线上的八卦，正好是先天八卦次序：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西南的否，斜行至东北的泰，此对角线上八卦，正是泰、损、既济、益、恒、未济、咸、否。故云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即所提到的十六卦，均在此相交的对角线上。

方图还显示第三个特点，横看直看皆有共相。将方图横看，自下而上共有八层，每层八卦，其下卦相同，最下层，下卦皆乾；第二层，下卦皆兑；第三层下卦皆离；第四层，下卦皆震；第五层，下卦皆巽；第六层，下卦皆坎；第七层，下卦皆艮；最上层，下卦皆坤。若将方图直看，自右至左共是

八行，每行八卦，其上卦皆同。其顺序亦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方图第四个特点，按内外四层看，亦横看直看均有其相。外层（第四层）共 28 卦，自乾向泰横看，下卦皆乾；自乾向否直看，上卦皆乾；自坤向否横看，下卦皆坤，自坤向泰直看，上卦皆坤。第三层共 20 卦，自兑向损横看，下卦皆兑，直看至咸，上卦皆兑；自艮向咸横看，下卦皆艮，直看至损，上卦皆艮。第二层共 12 卦，自离向既济横看，下卦皆离，自离向未济直看，上卦皆离；从坎向未济横看，下卦皆坎，自坎向既济直看，上卦皆坎。第一层，中心 4 卦，震益横看，下卦皆震，震恒直看，上卦皆震；巽恒横看，下卦皆巽，巽益直看，上卦皆巽。以上变化正好显示了“八卦相荡，为六十四”。说明 64 卦各有定位，不可愈越。而且在定位之中，又各有对待。在同一周围上的卦，总与自己成对角线的卦相对待，如外围上的 28 卦，构成 14 对，如乾与坤、需与晋、大畜与萃、泰与否、履与谦、同人与师、无妄与升、姤与复、讼与明夷、否与泰。第三圈上 20 卦，构成 10 对，第二圈上 12 卦构成 6 对，第一圈上 4 卦，构成 2 对。共是 32 对。六十四卦方图乃阴阳对待的交织图，研究对待，是先天易学的基本准则，亦乃六十四卦方图和圆图的应有之义。掌握阴阳对待这一基本法则，就可谓认识先天易学的灵魂。

（五）方圆合一图——万物流转的时空统一模式

邵雍以大圆图表述大化流行，以方图明阴阳对待。圆图象天，方图象地。以应古代天圆地方之说。进而认为天包地

外，地在天内，故将方图置于圆图之内，构成方圆合一图。《周易本义》载其图。如图 9。



图 9 经世六十四卦之数图（方圆合一图）

《观物外篇》云：“天圆而地方。圆之数起一而积六，方之数起一而积八。变之则起四而积十二也。……天变方为圆而常存其一，地分一为四而常执其方。”这段话既是谈的数学，又含有一定哲理。

邵雍用古代几何学原理来解释《方圆合一图》的机理。

“圆之数起一而积六”，是讲圆的直径与其周长的关系。圆的直径为 1，则其圆周为 3（实为 3.14159……，古代惯以“经一周三”约称），乘以 2，其积为 6。

“方之数起一而积八”，是讲正方形的边长与其周长的关系。方形的边长的 1，则其周长为 4，乘以 2，其积为 8。

“变之则起四而积十二”，是说如果将方形的四周之长，变为圆形的直径，则其圆周之长为 12。那么方与圆的关系就存在一些奇妙的规定性。如下：

“天变其方为圆而常存其一”。天之体数是 4，即太阳、少阳、太阴、少阴，4 正是地方周长之数，变而为圆的直径数，其运行流转，按径 1 周 3 之理，便变成圆之积数， $3 \times 4 = 12$ 。“存其一”是地之周长 4 去 1 则为 3， $3 \times 4 = 12$ ，乃由地之方数变为天之圆数。

“地分一为四而常据其方”。地之体数亦为 4，即太刚、少刚、太柔、少柔。4 亦正方形之周长数，分而为东南西北，其数亦为 4。

“六者常以六变”，是说圆之积数 6，再乘以 6 则为 36。10 倍之则为 360，当一年之日数。

“八者常以八变”，是说方之积数 8，再乘以 8，则为 64，当 64 卦之数。

所以邵雍云：“圆者六变，六六而进之，故十变而三百六十矣。方者八变，故八八而成六十四矣。阳主进，是以进之为六十也。圆者径一围三，重之则六也。方者径一围四，重之则八也。裁方而为圆，天所以运行；分大而为小，地所以

生化。”^① 这是说圆图代表天体运行的周期 360 日；方图代表东南西北四方。方圆合一图是时间和空间的配合。

朱熹欣赏邵雍的方圆合一图，予以解释说：

圆图象天，一顺一逆，流行中有对待，如震八卦对巽八卦之类。方图象地，有逆无顺，定位中有对待，四角相对，如乾一对坤八之类。此方圆图之辩也。^②

朱子指明圆图显示阴阳流行，方图显示阴阳对待，是画龙点睛，肯定邵雍先天图的奥妙所在，将时间的“流行”观念，与空间的“对待”观念统一起来，构成一种时空统一模式。这种时空统一模式，在先天八卦图中，已将东西南北四方同春秋夏冬四季配合在一起了。这是继承了汉代卦气说，而别出心裁。事实上，这样看待时空统一是很勉强的，方圆二图的凑合，尽管设了一些数据演算，实是徒增烦琐，并无很大说服力。唯一值得深思的是，古之先哲为探讨时空统一原理，早已呕心沥血，用心良苦。

二、先天之数的“体用变化”论

邵雍依据其伏羲先天八卦原理，说明宇宙万物衍化由简而繁的体用变化法则。表明天地万物都是按先天八卦的生成

^① 《观物外篇》第四。

^②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引。

次序演变而成。他说：“阴阳分而生两仪，两仪交而生四象，四象交而生八卦，八卦交而生万物。”^① 这是先天易学万物生成论的总纲。

“阴阳分而生两仪”，实际就是说的“太极生两仪”，两仪就是天与地，“故二仪生天地之类”。

“两仪交而生四象”，是说天与地交，而生成阴阳、刚柔四象。“四象定天地之体”。“四象交而生八卦”，是阴阳刚柔相交，而生天之四象，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地之四象，太柔、太刚、少柔、少刚。邵雍所谓天之四象指日月星辰，地之四象指水火土石，是“四象生日月之类”。

“八卦交而生万物”，万物各有其类，各有其体。类与体如何确定？邵雍认为“八卦生万物之类，重卦定万物之体”^②。即万物由八卦生为八大类，由六十四卦定万物之体，也就是由六十四卦的性质及其交互作用，决定万物不同的个体及其各异的性能。

“八卦生万物之类”——表明万物均按“四分法”，分为天之四类与地之四类。日月星辰与水火土石共八大类，决定万物的基本特性，无非阴阳、刚柔四象在各类中所占比重各有不同。邵雍又指出：“四象定天地之体。”“阴阳为天之体，刚柔为地之体。”“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水火土石交，而地之体尽之矣”。^③ 这就是说，天有四体，地有四体，八体即上述八类。所谓“八类”是按万物的特性划分的，八

① 《观物外篇》第十。

② 《观物外篇》第十。

③ 《观物内篇》之一。

体是指八种“体数”。“体数”是同“用数”相对而言的。邵雍的先天易学认为，体数同用数是不一致的。他说：

天以一而变四，地以一而变四。四者有体也，而其一者无体也。是谓“有无之极”也。天之体数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体数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无体之一，以况自然也；不同之一，以况道也。用之者三，以况天、地、人也。^①

这就是邵雍提出的“体四用三”原理。“体四”是指天之体数、地之体数各四，“用三”是指四体数可以泛用于天地人“三才”之中。四象衍而为八体，八体泛化为“三才”。形成多种多样统一的宇宙万物。

邵雍进一步由阴阳刚柔，体用变化，形成动植交通之数。关于体与用的关系，邵雍提出“体以用为本”，“用以体为基”的原则，体与用不相一致，而又互不分离。由此而探讨体数与用数的区别与联系。这就要追溯到蓍与卦的关系。他说：

蓍德圆，以况天之数，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卦德方，以况地之数，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蓍者用数也，卦者体数也。用以体为基，故存一也；体以用为本，故去四也。圆者本一，方者本四，故蓍存一而卦去四

^① 《观物外篇》第一。

也。^①

这里为了说明体用不一，而生硬地将占筮过程中大衍之数即用数，同六十四卦之数即体数结合在一起。占筮程序是“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存一不用，表明太极不参予具体变化，但它是一切变化之基础。宇宙万物，都是由这个神秘的太极“一”分化出来的。“一者数之始而非数也”，它是数的根本，是先天学神秘系统的始基。至于六十四卦为什么只用六十而存四不用？这是因为乾坤坎离四正卦为不用之卦，故其用数为六十。本来六十四卦共有 384 爻，由于乾坤坎离四卦不用，所用者只 60 卦，共只 360 爻，以应一年 360 日之数。所以《观物外篇》第八写道：

体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于三百六十，何也？以
乾坤坎离之不用也。乾坤坎离之不用，所以成三百
六十之用也。故物变易，而四者不变也。夫唯不变，
是以能变也。

邵雍不厌其烦地用大量篇幅来论证体数与用数的不一致，目的在于说明宇宙万物的杂多统一，日、月、星、辰与走、飞、草、木的千变万化，无非是天之体用与地之体用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一切的一切都由来有数。由于天与地的体数、用数的或进（相加）或退（相减），决定了人体之数所形成的用数大有区别。《观物外篇》第一，依据八卦之数推衍万物之数

^① 《观物外篇》第一。

的烦琐论证如下：

首先，阴阳刚柔之数有别，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体数均为 10，以应天干之数。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体数均为 12，以应地支之数。故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用数为 $10+10+10+10=40$ ，为阳刚之卦总数。太柔、少柔、太阴、少阴之用数为 $12+12+12+12=48$ ，为阴柔之卦总数。

其次，求阳刚之体数与阴柔之体数的方法：因天之体数、地之体数各为 4，故以阳刚之卦总数乘以 4，为 $40 \times 4 = 160$ ，是为阳刚之体数，所以说：“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体数一百六十。”以阴柔之卦总数乘以 4，为 $48 \times 4 = 192$ ，是为阴柔之体数，所以说：“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体数一百九十二。”邵雍称这种由卦数变体数之程序为“进”，即相乘。阳刚之体数同阴柔之体数相减，称作“退”。

第三，由体数衍化为用数的方法：（一）进阳刚之体数，退阴柔之体数，为阳刚之用数。由算术公式表示即： $40 \times 4 - 48 = 160 - 48 = 112$ 。所以说：“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用数一百一十二。”（二）进阴柔之体数，退阳刚之体数，为阴柔之用数。以算术公式表示即： $48 \times 4 - 40 = 192 - 40 = 152$ 。所以说：“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用数一百五十二。”

第四，由阳刚与阴柔之用数相乘，即相“唱”或相“和”，乃可求出阳刚之“变数”，与阴柔之“化数”。邵雍规定：以阳刚之用数“唱”阴柔之用数，即为日月星辰之“变数”，算式为 $112 \times 152 = 17024$ ；以阴柔之用数“和”阳刚之用数，即为水火土石之“化数”，算式为 $152 \times 112 = 17024$ 。阳刚之变数与阴柔之化数是相等的。故邵雍说：“日月星辰之变数一万七千二十四，谓之‘动数’；水火土石之化数一万七千

二十四，谓之‘植数’。”动指动物，植指植物。

第五，由动数与植数“再唱和”，而得动植之通数。 $17024 \times 17024 = 289816576$ 。所以《观物内篇》写道：“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变化，通数二亿八千九百八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六，谓之动植通数。”

邵雍的体用变化论，看来相当严整，象数推衍颇为严密，在易学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不过这个用来说明天地万物形成的数的系统，完全是由邵雍先天易学虚构出来的，认识这种既神秘又抽象的枯燥无味的数量关系，对于分析研究现实世界的日月星辰，走飞草木的具体变化与相互关系，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科学价值。因为这些枯燥的数字，一点也不反映客观事物物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而科学的认识，正在于从实际出发，揭示客观事物的质与量及其变化规律。

尽管这种象数思想体系对现实事物的研究意义不大，从易学象数思维发展的角度看，毕竟不是毫无意义。因为邵雍讲的是哲学，哲学在古代，也可能是“无用之大用”的学说，其目的只在锻炼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先天易学通过阴阳刚柔的体用变化，或进或退，一唱一和，发展了易学象数思维方法，特别对数的逻辑推演分析细微，好比数学能精密人们的思维一样，这套体用变化的数学推演方法，对人们抽象思维能力的锻炼，无疑有一定帮助。

三、先天易学的“合一衍万”法则

邵雍先天易学的“体用变化”论，是枯燥的，与现实世界相脱离，真正将其象数体系引入客观世界，是他的“合一

衍万”论。由抽象的太极，衍化为动物、植物，这一过程中的象数变化法则，是在抽象的数字背后，总算看到了鸟兽花草了，尽管这里谈到的鸟兽花草依然是十分抽象的。

邵雍在《观物吟》中指出，“一气”（实指太极）化分天地，有天地然后有动植物，而天地万物之中，人最灵贵。他还说：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
道而行。天地人物则异矣，其于由道一也。^①

这里明确地肯定客观世界既统一于道，又各有区别，物质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统一的普遍性的道，是世界万物生成变化的共同规律。其子邵伯温对“道”（太极或一）加以解释说：“天地万物莫不以一为本，原于一而衍之为万，穷天下之数复归于一。一者何，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

邵雍用“合一衍万”的法则，说明统一的太极（一气），衍化为万物的过程。他坚持“一分为二”的原则，从四象做文章。他的兴奋中心是“四”，一个神秘而紧要的“四”。他说：

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上交于阴，阴下交于
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
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
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犹根之有

^① 《观物内篇》之九。

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少，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①

天之四象指日月星辰，地之四象指水火土石。由阴阳刚柔之象，成体达用，天变地化，或进或退，有唱有和，具体的物就按照先天之数一一化生了。在《宋元学案》中，蔡西山（元定）对此化生过程有十分细致的描述：

动者为天，天有阴阳，（阳者动之始，阴者动之极），阴阳之中，又各有阴阳，故有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是为天之四象。日为暑，月为寒，星为昼，辰为夜，四者天之所变也。暑变物之性，寒变物之情，昼变物之形，夜变物之体，万物之所以感于天之变也。

这是说，天之四象日月星辰，继续变化，而有寒暑昼夜；寒暑昼夜又影响于物的性情形体，天对万物的作用是十分密切的。蔡西山又说：

静者为地，地有柔刚。（柔者静之始，刚者静之极），刚柔之中，又各有刚柔，故有太刚太柔，少刚少柔。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是为地之四象。水为雨，火为风，土为露，石为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雨化物之走，风化物之飞，露

^① 《观物外篇》第二。

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万物之所以应于地之化也。暑变走飞草木之性，寒变走飞草木之情，昼变走飞草木之形，夜变走飞草木之体。雨化性情形体之走，风化性情形体之飞，露化性情形体之草，雷化性情形体之木。天地变化，参互错综，而生万物也。^①

这是说地之四象，水火土石，继续变化而有暑寒露雷。暑寒露雷又影响于走飞草木之性情形体。最后得出结论：“天地变化，参互错综，而生万物也。”

邵雍通过先天易学的象数图式，从“一”（道、太极、一气）到“万”（走飞草木等万物），把整个宇宙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都统摄进去。“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的象数体系，对易学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发展。正如宋代理学家朱熹称道的“自有《易》以来，只有康节说一个物事如此齐整”^②。

不止如此，邵雍力图用阴阳刚柔相互交感的原理，对各类动物植物的特性说得更加具体。他说：

阳交于阴，而生蹄角之类也；刚交于柔，而生根茎之类也。阴交于阳，而生羽翼之类也；柔交于刚，而生枝干之类也。天交于地，地交于天，故有羽而走者，足而腾者，草中有木，木中有草也。各以其类推之，则生之类，不过是矣。走者便于下，飞

^①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下》。

^② 《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

者利于上，从其类也。^①

邵雍的象数学大体都是这类抽象比附的内容，表面看来头头是道，有根有据，象数推演，逻辑严密，实际上缺乏现实内容，不能诱导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有更深入的科学认识。

邵雍还用阴阳刚柔的变化来说明人的灵贵。人既同于万物，均为天地之数的体现；又高于万物，因其将天地万物阴阳刚柔之特性，备于一身。他说：

性情形体者，本乎天者也；飞走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阴分阳之谓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刚之谓也。夫分阴分阳，分柔分刚者，天地万物之谓也。备天地万物者，人之谓也。^②

在易学发展史上，汉代《周易》象数学，已建立了一套象数图式，那时的象数学，主要是将易学应用于天文历法方面，所谓卦气、纳甲、爻辰，基本上是以《周易》卦象表述日、月、十二辰、二十八宿的运转规律，还没有以之说明整个天地万物。邵雍发展图书学传统，力图用《周易》八卦阴阳消长变化的原理，对天地万物作出某些说明。其用心是在探寻宇宙变化的奥妙，而其思想方法是形式主义的。力图将万物纳入自己主观设计的一套图式，其中也包含了一些科学资料和有价值的猜测，如他所创造的《先天六十四圆图》的

^① 《观物外篇》第十。

^② 《观物内篇》第十一。

排列次序，就同近代数学中二进位制思想相吻合。他所采用的“一分为二”法，客观上符合事物变化的矛盾转化规律等。然而，从总体上考察，这一烦琐的象数学思想体系，只不过是人类认识史这株大树上一朵不结果实的花而已。

第八章 元会运世——弥纶天地的世界历史年谱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哲学家们应当予以探讨。

邵雍创制“伏羲六十四卦圆图”，作为宇宙万物发生发展的总图式、总规律。运用这个总图式、总规律去描述宇宙进化的具体程序，从而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编制了一份历史年谱。在《皇极经世》中，邵雍用了《观物篇》的前面34篇，对他编制的这份世界历史年谱作了详细记载和说明，其中《以元经会》12篇，《以会经运》12篇，《以运经世》10篇。这份世界历史年谱是先天易学原理的具体运用。这是《皇极经世》的基本内容，也是邵雍的一个突出创造。值得肯定的是：运用易学原理指导编制世界历史年谱，在易学史上这是第一次。这一创造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意义。

一、世界历史年谱及其编制原则

编制世界历史年谱，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邵雍不得不自行设立若干原则，作为编谱的指导思想。这些原则就是关于先天易学的运用。

首先，世界历史年谱以数字运算为准。

邵雍规定编制世界历史年谱突出“四”的原则，即四级运算方法。这四级就是元、会、运、世。这四个不同级别的运算单位，相当于先天图中的四象。

邵雍规定：一元等于 12 会，一会等于 30 运，一运等于 12 世，一世等于 30 年。为什么作如此规定？因为他是假定一元相当于一年。一年有 12 月，故一元有 12 会；一月有 30 日，故一会有 30 运；一日有 12 辰，故一运有 12 世；一辰有 30 分，故一世有 30 年。这条数字运算原则，可叫做“12 与 30 反复相乘”。

其次，先天图有天之四象，地之四象，合之为八象，以应八卦。故世界历史年谱不只按四级运算，而是扩充的八级运算，除了元、会、运、世，还加上岁、月、日、辰。年谱是按元、会、运、世、岁、月、日、辰八个名目相乘的原则编制的。八个名目相乘，共是 64 个项目，正符合八八六十四卦之数。这 64 个年谱项目表，称做《皇极经世图》。《皇极经世》的用语叫做：“元之元”，“元之会”，“元之运”，“元之世”，……“岁之元”，“岁之会”，“岁之运”，……“辰之元”，“辰之会”，“辰之运”，直至“辰之辰”。64 项名目如下表：

元之元	会之元	运之元	世之元	岁之元	月之元	日之元	辰之元
元之会	会之会	运之会	世之会	岁之会	月之会	日之会	辰之会
元之运	会之运	运之运	世之运	岁之运	月之运	日之运	辰之运
元之世	会之世	运之世	世之世	岁之世	月之世	日之世	辰之世
元之岁	会之岁	运之岁	世之岁	岁之岁	月之岁	日之岁	辰之岁
元之月	会之月	运之月	世之月	岁之月	月之月	日之月	辰之月
元之日	会之日	运之日	世之日	岁之日	月之日	日之日	辰之日
元之辰	会之辰	运之辰	世之辰	岁之辰	月之辰	日之辰	辰之辰

第三，邵雍认为，编年谱不只用元、会、运、世、岁、月、日、辰八种运算单位，还应结合天之四象日、月、星、辰，与地之四象石、土、火、水。元之元相应于日之日，元之会相应于日之月，元之运相应于日之星，元之世相应于日之辰。元之岁相应于日之石，元之月相应于日之土，元之日相应于日之火，元之辰相应于日之水。会之元相应于月之日，以下仿此。

第四，邵雍还规定年谱不止纳入天之四象和地之四象，还应结合先天八卦的次序。即元之元结合乾之乾，元之会结合乾之兑，元之运结合乾之离，元之世结合乾之震，元之岁结合乾之巽，元之月结合乾之坎，元之日结合乾之艮，元之辰结合乾之坤。会之元结合兑之乾，以下仿此。

第五，邵雍还规定将元之元，元之会，元之运，元之世，元之岁，元之月，元之日，元之辰等 64 项，按《先天六十四卦次序图》(大横图)的顺序自乾至坤依次排列，即乾卦元之元，夬卦为元之会，大有卦为元之运，大壮卦为元之世，小

畜卦为元之岁，……

第六，按照以上元、会、运、世的数的规定，换算出各卦所当之数。用算式表示：

元 1

会 $1 \times 12 = 12$

运 $1 \times 12 \times 30 = 360$

世 $1 \times 12 \times 30 \times 12 = 1 \times 12^2 \times 30 = 4320$

岁 $1 \times 12 \times 30 \times 12 \times 30 = 1 \times 12^2 \times 30^2 = 129600$

月 $1 \times 12 \times 30 \times 12 \times 30 \times 12 = 1 \times 12^3 \times 30^2 = 1555200$

日 $1 \times 12 \times 30 \times 12 \times 30 \times 12 \times 30 = 1 \times 12^3 \times 30^3 = 46656000$

辰 $1 \times 12 \times 30 \times 12 \times 30 \times 12 \times 30 \times 12 = 1 \times 12^4 \times 30^3 = 559872000$

按《皇极经世》的说法：元之元= $1 \times 1 = 1$ ，即乾卦之数；元之会= $1 \times 12 = 12$ ，是夬卦之数；元之运= $1 \times 12 \times 30 = 360$ ，是大有卦之数；元之世= $1 \times 12 \times 30 \times 12 = 4320$ ，是大壮卦之数。元之岁= $1 \times 12 \times 30 \times 12 \times 30 = 129600$ ，即小畜卦之数。如以年为单位，即一元为 129600 年。仿此，会之元= $12 \times 1 = 12$ ，即履 12，会之会= $12 \times 1 \times 12 = 144$ ，即兑卦 144。会之运= $12 \times 1 \times 12 \times 30 = 4320$ ，即睽 4320，以下运之元，世之元，乃至辰之辰，均按此原则换算而得出所当之数。说邵雍的先天易学实质上是数学，原因即在此。打开《皇极经世》令人如堕数的海洋里。按以上算法，以年计算，所得“辰之辰”，即“坤”卦之数为 1216192320 年，这就是天数地数的总和，也即是邵雍所设想的天地自始到终之数，到此数最后一年，天地就毁灭了。

依以上原则绘制成一张总图，就叫做《经世天地始终之数图》。附图 10 乃从 64 个数中裁取其前 16 项，以见一斑：

一一 乾一	元之元	日之日	乾之乾
一二 夬十二	元之会	日之月	乾之兑
一三 大有三百六十	元之运	日之星	乾之离
一四 大壮四千三百二十	元之世	日之辰	乾之震
一五 小畜十二万九千六百	元之岁	日之石	乾之巽
一六 需五十五万五千二百	元之月	日之土	乾之坎
一七 大畜四千六百六十五万六千	元之日	日之火	乾之艮
一八 泰五亿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二千	元之辰	日之水	乾之坤
二一 履十二	会之元	月之日	兑之乾
二二 兑一百四十四	会之会	月之月	兑之兑
二三 睽四千三百二十	会之运	月之星	兑之离
二四 归妹五万一千八百四十	会之世	月之辰	兑之震
二五 中孚一百五十五万五千二百	会之岁	月之石	兑之巽
二六 节一千八百六十六万二千四百	会之月	月之土	兑之坎
二七 损五亿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二千	会之日	月之火	兑之艮
二八 临六十七亿一千八百四十六万四千	会之辰	月之水	兑之坤
三一 同人（下仿上式）	运之元（下仿此）		

图 10 经世天地始终之数图（摘录）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总结邵雍编制世界历史年谱的数的运算法则指出：

皇极之数，一元十二会，为三百六十运。一会三十运，为三百六十世。一运十二世，为三百六十

年。一世三十年，为三百六十月。一年十二月，为三百六十日。一月三十日，为三百六十时，一日十二时，为三百六十分。一时三十分，为三百六十秒。盖自大以至于小，总不出十二与三十反复相乘而已。

邵雍将一元之数称为“《易》之生数”。他说：“日之变，含月与星、辰之变也。《易》之生数，十二万九千六百，总为四千三百二十世。此消长之大数。”^①

邵伯温根据其父邵雍思想及其编制世界历史年谱的原则，绘制了一幅《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具体地反映一元期中，世界由开辟到灭亡的过程。按一元十二会的顺序，从月子到月亥，说明元、会、运、世的数量关系及以十二消息卦表示的阴阳消长关系。如图 11（见下页）。

这一图中，表明以下基本内容：

1. 元、会、运、世，以日、月、星、辰相比附。
2. 一元 12 会，以子、丑、寅、卯……十二地支作标志。一会 30 运，以甲、乙、丙、丁……十天干重复三次作标志。一运 12 世，仍以地支标志，一世 30 岁，仍以天干重复三次作标志。
3. 12 会阴阳消长过程，用汉代十二消息卦标志，从复卦到乾卦，阳逐渐上升，一阳到六阳，阴逐步消退，从一阳五阴到纯阳无阴；从姤卦到坤卦，阴逐步生长，从一阴到六阴，阳逐步消退，由一阴五阳到纯阴无阳。
4. 邵雍指出，“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即是

^① 《观物外篇》第一。

元	会	运	世				
日甲	月子一	星三十	辰三百六十	年一万八百	复	䷗	
	月丑二	星六十	辰七百二十	年二万一千六百	临	䷒	
	月寅三	星九十	辰一千八十	年三万二千四百	泰	䷊	开物 星之巳七十六
	月卯四	星一百二十	辰一千四百四十	年四万三千二百	大壮	䷡	
	月辰五	星一百五十	辰一千八百	年五万四百	夬	䷪	
	月巳六	星一百八十	辰二千一百六十	年六万四千八百	乾	䷀	唐尧始星之癸 百八十辰 二千一百五十七
	月午七	星二百一十	辰二千三百二十	年七万五千六百	姤	䷫	夏殷周秦两汉 两晋十六国 南北朝隋唐五代宋
	月未八	星二百四十	辰二千八百八十	年八万六千四百	遁	䷰	
	月申九	星二百七十	辰三千二百四十	年九万七千二百	否	䷋	
	月酉十	星三百	辰三千六百	年十万八千	观	䷓	
	月戌十一	星三百三十	辰三千九百六十	年十一万八千八百	剥	䷖	闭物 星之戌 三百一十五
	月亥十二	星三百六十	辰四千三百二十	年十二万九千六百	坤	䷁	

图 11 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

说在第一子会与第二丑会，宇宙中还没有人类，当第三寅会

“开物”，乃有人类。人类出生之后，还经历相当长的时期，没有开化，直到第六巳会，12消息卦的乾卦主事，阳达极盛，才有中国历史上的唐尧传说时代。又过了很久，到第七午会，才进入中国历史的夏商周三代，午会时期，阳逐步衰退，乃是秦汉、三国直到隋唐五代。到了十一戌会之末，阳剥尽之后，就达到“闭物”时期，人与万物逐步失去生存条件，最后归于消亡；然后再过10800年（一会之数），当十二亥会的末年，天地也归于消亡，至此一元即告终结。邵雍的世界历史年谱实际上是借用汉代卦气学说中十二辟卦，表示世界历史长河中的阴阳消长。当阳初长、阴尚盛之时，天地开辟，未有人类；到泰卦主事时，阴阳对等调和，人物乃能生长。以后阳日益占上风，到乾卦主事（第六会），乃出现如中国的唐尧时期，人物达到极盛。从第一子会到第六巳会，是阳上升、阴衰退时期，世界历史居于上升阶段；第七午会到第十二亥会，阴日升，阳日降，世界历史日益衰退，故到十一戌会之末，达到“闭物”，人物日益归于消亡，到十二亥会之末，天地最后毁灭，一元即告结束，新的一元又开始。从思维方法上看，邵雍坚持了世界历史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但这个变化不是永远向前，而是呈抛物曲线运动形式，先是上升，逐步达到极点，再日益下降，下降到极点，天地亦归灭亡。他主张天地同人物一样，有生必有死，世界上的人物及世界本身，都不会永恒存在，万世无疆。

二、世界历史年谱的其他文化内涵

邵雍不只按元、会、运、世、岁、月、日、辰八个运算

单位计算出每个年谱单位的数，还引入以下四个参照项目：

(一) 按律吕与历法相通的原理，将 12 律引入世界年谱；
 (二) 将一年的 24 节纳入一元之中，一元 12 会，相当于一年
 12 月，每会含二节；(三)按汉代卦气学说中以卦值日的原则，
 以 60 卦表 360 日，将每月值 5 卦，变为每会值 5 卦；(四)将
 12 星辰纳入 12 会，每会值一星。邵雍将律吕、星纪、节气、
 值卦四者纳入世界历史年谱，编成《皇极经世》《以元经会
 图》12 幅，成为《观物篇》一至十二篇的具体内容。故明黄
 畿注《皇极经世》第一卷，开宗明义指出：

元一会十二，《以元经会图》如会数。凡十二图。
 每图管算各三百六十，通计四千三百二十算。……
 通十二图三百六十行，则有四千三百二十目。然则
 以元经会，而经运、经世，悉于十二图中寓之。至
 于前六图，阳长而升；后六图，阴消而降。

如此，《皇极经世》“以元经会”十二图是邵雍从宏观上描述世界历史年表的作品。

关于图中所值之卦，邵雍作了详细规定。黄畿注云：

图中之卦，每图经卦五，纬卦各六，共三十。通
 十二图的经卦六十，纬卦三百六十。纬之纬卦，二
 千一百六十。

以第一会为例，经卦五，为复、颐、屯、益、震。纬卦 30，复之纬卦为坤、临、明夷、震、屯、颐；颐之纬卦为剥、损、贲、

噬嗑、益、复；屯之纬卦为比、节、既济、随、复、益；益之纬卦为观、中孚、家人、无妄、噬嗑、屯；震之纬卦为豫、归妹、丰、复、随、噬嗑。

按以上“以元经会”的原则描述世界历史年谱，就不只是简单地运算出一个数目而已，它有更丰富的内容。黄畿在注释《观物篇》时，每会均按以上四项内容，将十二会年谱作一总览。掌握这一总览表，对于阅读《皇极经世》中十分烦琐的表格，将收到提纲挈领的效果。这是黄注的可贵之处。其总览云：

月子第一会，六阴已极，一阳初动。此时律中黄钟，日在星纪，节令冬至、小寒。卦值复、颐、屯、益、震，其象皆幽暗，及震，天辰渐分。

月丑第二会，天开于上，地辟于下。此时，律中大吕，日在元枵，节令大寒、立春。卦值噬嗑、随、无妄、明夷、贲。其象出暗向明，阴阳分，两仪立。

月寅第三会，天地开辟，人物始生。此时，律中太簇，日在娵訾，节令雨水、惊蛰。卦值既济、家人、丰、革、同人。阴阳交泰，形气化生。

月卯第四会，寅而入卯，三才既肇，气播时行。律中夹钟，日在降娄，节令春分、清明。卦值临、损、节、中孚、归妹。物色昭苏。

月辰第五会，自卯之辰，阳进于五，物际于盛。此时，律中姑洗，日在大梁，节令谷雨，立夏。卦值睽、兑、履、泰、大畜。景物繁鲜。

月巳第六会，水运既终，火德当王。此时，律中中吕，日在实沉，节令小满、芒种，卦值需、小畜、大壮、大有、夬。

物益蕃盛，有盛极难继之危。

月午第七会，阳升已极，阴息伊始。此时，律中蕤宾，日在鹑首，节令夏至、小暑。卦值姤、大过、鼎、恒、巽。物萌阴类，当南北暑寒之极。

月末第八会，阴柔漫长，阳刚退消。此时，律中林中，日在鹑火，节令大暑、立秋。卦值井、蛊、升、讼、困。物畏过盛。

月申第九会，阴柔内掩，阳刚外消。此时，律中夷则、日在鹑尾，节令处暑、白露。卦值未济、解、涣、蒙、师。物气揪敛。

月酉第十会，阴柔丽上，阳刚止下。此时，律中南吕，日在寿星，节令秋分、寒露。卦值遁、咸、旅、小过、渐。物候凄清。

月戌第十一会，阴柔大行，阳刚尽止。此时，律中无射，日在大火，节令霜降、立冬。卦值蹇、艮、谦、否、萃。物象凋落。

月亥第十二会，纯阴内积，微阳外消。此时，律中应钟，日在析木，节令小雪、大雪。卦值晋、豫、观、比、剥。物当藏息，其终而复始，贞下起元之际。

以上内容制成“以元经会”总表，如下：

月	会	阴阳消长	律吕	星次	节令	卦 值	物象
子	一	六阴已极 一阳初动	黄钟	星纪	冬至 小寒	复、颐、屯。 益、震	天辰 渐分
丑	二	天开于上 地辟于下	大吕	元枵	大寒 立春	噬嗑、随、无 妄、明夷、贲	出暗 向明
寅	三	天地开辟 人物始生	太簇	娵訾	雨水 惊蛰	既济、家人、 丰、革、同人	形气 化生
卯	四	三才既肇 气播时行	夹钟	降娄	春分 清明	临、损、节、 中孚、归妹	物色 昭苏
辰	五	阳进于五 物际于盛	姑洗	大梁	谷雨 立夏	睽、兑、履 泰、大畜	景物 繁鲜
巳	六	水运既终 火德当王	中吕	实沉	小满 芒种	需、小畜、大 壮、大有、夬	物益 繁盛
午	七	阳升已极 阴息伊始	蕤宾	鹑首	夏至 小暑	姤、大过、 鼎、恒、巽	物萌 阴类
未	八	阴柔漫长 阳刚退消	林钟	鹑火	大暑 立秋	井、蛊、升、 讼、困	物畏 过盛
申	九	阴柔内掩 阳刚外消	夷则	鹑尾	处暑 白露	未既、解、 涣、蒙、师	物气 揪敛
酉	十	阴柔丽上 阳刚止下	南吕	寿星	秋分 寒露	遁、咸、旅、 小过、渐	物候 凄清
戌	十一	阴柔大行 阳刚尽止	无射	大火	霜降 立冬	蹇、艮、谦 否、萃	物象 凋落
亥	十二	纯阴内积 微阳外消	应钟	析木	小雪 大雪	晋、豫、观、 比、剥	物当 藏息

综观此图表蕴含的文化内容，约有五端。

第一，反映古代关于律、历相应原理。此种附会，始于《吕氏春秋》，自《汉书·律历志》将律与历结合，影响中国文化千余年。古人以十二律应十二月，本无科学依据，邵雍只不过拾古人余唾。

第二，反映了古代关于十二星次与月令相关的思想。本来太阳与月亮沿黄道运行，一周相当一年。日月每年会合12次，每次会合的部位，即以一个星座为代表。分黄道360度为12段，称作十二宫。每宫的星座，即代表相会之点。这对于古代天文观测有一定意义。邵雍将其扩大，反映“以元经会”，以一星次代表一会，即10800年，根本失去星次纪月之本义。

第三，反映传统历法以二十四节表述一年季节、气候变化的规律。二十四节是我国自古以来行之有效的节令变化规律，汉代将之引入易学，建立卦气学说，邵雍沿袭之，并加以扩大，以此表述一元之中十二会的阴阳变化。

第四，反映了汉代卦气学说中以十二辟卦表述一年之中阴阳消长的规律性。邵雍以一元十二会从阴消阳长到阳消阴长的节律，并以此论述天地万物由生长、发育、极盛、渐消而至于归藏的规律性。认为阴阳调和则万物生意盎然，阳气盛则物盛，阴气盛则物衰，有阴无阳则物不能生的观点。

第五，模仿汉代卦气说，以六十卦值日用事（不采用汉代每卦值六日七分之说）。设定一年360日，每月值五卦。其卦次以先天六十四卦次序为准（乾坤离坎四正卦为不用之卦，离与坎亦不居坤至乾的中点位置）。

总之，邵雍虽纳入五项内容以充实其世界历史年谱，实

际上这都不是他本人首创，乃因袭汉人卦气、纳音、爻辰之说。这对于人们认识天地自然的演变历史，并无实质性意义。邵雍关于宇宙自然不断发展变化，有生有灭的观点，是可取的。用易学象数描述世界历史发展由上升到下降的过程，在易学史上是一突出创造。

三、对“元会运世”学说的评价

邵雍创立元会运世学说，以此编制世界历史年谱，他自己十分得意。在《皇极经世一元吟》中自我评论道：

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识。
一十有二万，九千余六百。
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
治乱与兴废，著见于方策。
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①

他编制世界历史年谱，目的在探讨人类历史治乱兴废的规律性，不尽在说明宇宙万物变化的规律。这一观点在其“皇帝王伯”的历史观中有较详尽论述。从其“元会运世”说的初衷而言，他是力图将自然史与人类史打通，找出二者发展的共同规律。整个先天易学的任务，依他自己所说，在于“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②。他所探讨的有

① 《击壤集》卷十三。

② 《观物内篇》之二。

“天道”、“地道”，也有“人道”、“物道”。《击壤集·四道吟》云：

天道有消长，地道有险夷，
人道有兴废，物道有盛衰。^①

他力图以先天易学原理，阐明“四道”底蕴。元会运世说，实是囊括“四道”的普遍原理，皇帝王伯的历史观，只是其“人道”的表现，仅仅反映“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故历代学者对其元会运世说，多有评论，见仁见智，言人人殊。

对邵雍元会运世说最早作出评论的，是与他同时的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他对此说予以肯定性评价云：

康节先生以元会运世法《春秋》之旨，立为成
规，以阴阳刚柔明“九畴”之用，衍为通纪算位，使
天地万物无逃于数，呜呼妙哉。^②

与邵雍同时的程颢、程颐兄弟，对邵雍先天易学并不以为然，但也不予以正面否定，朱熹也是这种态度。

最先反对邵雍这一套“天地人物之道”的是明代学者王廷相。他认为邵雍实是妄图用一套主观臆造的僵化的象数模式，来范围天地人物之道，此种主观臆断，“异于造化万物不

^① 《击壤集》卷十。

^② 张行成：《追录温公传易语》，《易通变》卷十二（《四库全书·术数类》）。

齐之性，戾于圣人物各副物之心，牵合附会，举一而废百者矣”^①。的确天地人物的运动变化规律，“万物不齐”，妄图用一种凝固（“胶固”）的模式加以限定，将会阻碍人们的思路，不利于对“万物不齐”的运动法则进行切实研究。

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对此套先天学理论作了尖锐批评，认为它根本违背了易学思想原则。

他针对先天易学的思维模式的缺点说：

邵子之图，如织如绘，如钉如砌。以意计揣度，
域大化于规圆矩方之中，尝试博览于天地之间，何
者而相肖也！

又云：

如邵子之图，一切皆自然律比，乘除增减，不
可移易，则亦何用勤勤于德业为耶？疏节阔目，一
览而尽，天地之设施，圣人之所不敢言，而言之如
数家珍，此术数家举万事万理而规之前定，使人无
惧而听其自始至终之术也。^②

王夫之的批评相当深刻。用一种凝固的象数模式，去限定“大化”之中的“万事万理”，只能将人们的精力引导到象数的“乘除增减”，堕入宿命论，而不再“勤勤于德业”。

① 《王氏家藏集·五行篇》。

② 《周易内传发例》十三。

因此，《中国哲学史》正确地评论道：

邵雍“元会运世”的自然史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宿命论和循环论。他虽然畅谈自然历史的“始终消长”，但这只是“象数”的排列和增减，是把臆造的“象数”系列强加于自然和人类。^①

邵雍在世界历史年谱中，肯定世界有始必有终，终久会毁灭。他说：“易之数穷，天地终始。或曰：天地亦有终始乎？曰：既有消长，岂无终始？天地虽二，是亦形气，乃二物也。”^②他认为，天地毁灭之后，新的一元又将开始，这一点有可取之处。冯友兰先生指出，这一思想，来自佛教。宗密当年引《俱舍论》讲“世界之成住坏空”，影响了道学家。“康节之世界年表，盖亦取佛学中所说之意。”^③

邵雍的世界历史年谱，对于认识天地万物的发生发展，并无科学价值。但是从易学思想发展史上看，仍有一定哲学意义，正如朱伯崑先生指出的：“他肯定整个宇宙中的事物都是有终始的，包括太阳在内都有生有灭。我们这个世界毁灭了，另一个世界又诞生了，整个宇宙是众多的世界生灭连续的过程。这是邵雍借助于易学中的辩证思维所得出的一个合乎科学的结论，是其易学哲学的一个贡献。”^④这也启示我们，对

^① 肖道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② 《观物外篇》第八。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49页。

^④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二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158页。

待邵雍易学思想体系，应当采取科学分析态度，抛弃那种僵死的、凝固的“象数”模式，那种模式是“如织如绘”、“规圆矩方”，四块八段，乘除增减，没有生气，不能推进人们实事求是地探讨天地人物“万有不齐”的客观变化规律。将其作为一部“历书”来看也是无用的。正如黄宗羲所说：“康节之为此书，其意总括古今之历学，尽归于《易》。奈《易》之于历，本不相通，硬相牵合，所以其说愈烦，其法愈巧，终成一部鹤突历书，而不可用也。”^①但只要抛弃他的形式，仍可发现其中蕴含了一点可取的东西，那就是他从易学中汲取到的阴阳有消有长，万物有生有灭，旧的过程消灭了，新的过程又会开始这样一些朴素的辩证思维法则。因此，邵雍的先天易学及其元会运世的世界历史年谱，在易学发展史上仍有一定哲学意义，不可一概否定。

^① 《易学象数论·皇极经世论》。

第九章 皇帝王伯——别开生面的中国历史年鉴

《皇极经世》顾名思义是一部“通古今之变”、经邦济世的书。邵雍之子邵伯温解释说：“至大之谓皇，至中之谓极，至正之谓经，至变之谓世。大中至正、应变无方之谓道。”可见《皇极经世》的宗旨在于探讨、阐明宇宙变易之正道，其中包含着人类历史变化的准则。邵伯温说，《皇极经世》原本十二卷，一、二卷，“以元经会”，“则总元会运世之数，易所谓天地之数也”。三、四卷，“以会经运”，“以见天下离合治乱之迹，以天时而验人事也”。五、六卷，“以运经世”，“书传所载兴废、治乱、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验天时者也”^①。

《皇极经世》中，“以元经会”部分，着重讲宇宙变化法则；“以会经运”、“以运经世”两部分，是用大量表格显示中国古史的变化过程。邵雍创立一套评议中国历史的皇帝王伯

^① 《皇极经世书论》。

历史观，用以总结概括中国三千多年历史变化的轨迹，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尚无先例。

一、皇帝王伯崇尚道、德、功、力

邵雍对中国历史有着广泛研究，力图探讨政治历史变化的规律性。他不同意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论，也不赞同董仲舒提出的“三统”循环论。另辟蹊径提出所谓皇、帝、王、伯历史变化论。他认为中国历史上自唐尧下至五代，三千多年的社会政治变化，存在皇、帝、王、伯（霸）四种政治模式，代表四个发展阶段。正如自然变化有春夏秋冬四季节律一样。按照这种历史观，邵雍编排了别开生面的中国历史年鉴。

皇、帝、王、伯四种政治历史模式的具体特点如何呢？邵雍用道、德、功、力四个字对此分别作了界定：

皇——以上古传说的“三皇”为典范。三皇即伏羲、女娲、神农。邵雍认为“三皇”之世的特点是“以道化民”，行“无为”之治。他说：“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无为、无事之谓也。……所以圣人有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①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三皇之世”，出现的第一种政治模式是“自然无为”。上以道化民，民亦以道归之。人民都乐于无为，无事，好静，无欲。

帝——以古史中的“五帝”为典范。五帝即黄帝、颛顼、

^① 《观物内篇》之四。

帝喾、唐尧、虞舜。邵雍认为“五帝”之世的特点是“以德教民”，行“禅让”之治。他说：“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夫让也者，先人后己之谓也。……能知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者，其唯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归焉。所以圣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①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五帝之世”。这时出现了第二种政治历史模式，即以礼让为先，以致揖让天下，人无贪鄙之心，一毛不苟取，在上者垂拱而治天下。

王——以历史上的“三王”为典范。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即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与武王。邵雍认为“三王”时代的特点是“以功劝民”，人民崇尚正直。他说：“以功劝民者，民亦以功归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谓也。”邵雍对于什么是正，什么是不正，有明确解释。他说：“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则谓之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则谓之贼矣。”^②“三王之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阶段，出现了第三种政治历史模式，“以功劝民”。明王以事功劝导人民，人民依正直原则行事，兴利除害，盗贼不起，杀伐不生，天下升平。

伯（霸）——以春秋时代的“五霸”为典型。五霸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宋襄公、秦穆公。邵雍认为“五伯”之世的特点是“以力率民”，崇尚智力。他说：“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归之，故尚争。夫争也者，争夫利者也。取

^① 《观物内篇》之四。

^② 《观物内篇》之四。

以利不以义，然后谓之争。”邵雍对五伯时代崇尚智力以争实利的社会政治风气，作了生动的描述，他说：“五伯者，借虚名以争实利者也。帝不足则王，王不足则伯，伯又不足则夷狄矣。”^①那时，五伯以力率民，尊王攘夷，拥兵自强，尔虞我诈，争城夺国，无有宁日，将文武之明德，抛弃殆尽。

邵雍明确指出：皇帝王伯只是一种简明概括政治历史的模式，并非仅仅指古代的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他说：

所谓皇帝王伯者，非独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而已。但用无为，则皇也；用恩信，则帝也；用公正，则王也；用智力，则伯也。伯以下，则苗蛮；苗蛮而下，是异类也。^②

他以“用无为”、“用恩信”、“用公正”、“用智力”作为四种政治历史模式的核心内容，这是对“以道化民”、“以德教民”、“以功劝民”、“以力率民”的注释。其实所谓的三皇“无为”而治，只是一种传说，是老子的一种主张。远古时期，不存在阶级分野，可称“无为”，那时氏族之间的斗争仍是残酷的。五帝的“恩信”、“揖让”，无非后人的美化，黄帝伐蚩尤，舜逐三苗，禹战共工，这类武力征战的故事都有传说；三王的“公正”，更令人怀疑，汤放桀，武王伐纣，固然得到人民拥护，夏代与商代实行野蛮的奴隶制度，难道那么“公正”？离开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而谈社会历史的演变，侈谈无

^① 《观物内篇》之四。

^② 《观物外篇》第九。

为、恩信、公正等原则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是很难令人信服的。邵雍认为人类社会越远古，人民道德越高尚，生活越自由，越不靠武力与智力；反之，社会越向前发展，道德风气反而日益堕落，日益缺乏礼让、恩信与公正，人民就难得安宁。这样的历史观，不能不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邵雍写《皇极经世》，意在警醒世人，注重汲取历史经验。他主张用皇、帝、王、伯四种政治模式去衡量历史，旨在为人们确立一个评说历史的政治标准。邵雍并非绝对地认为历史演变一代不如一代。他认为皇、帝、王、伯四种模式往往交叉出现，形势错综复杂。因此，他又衍申出十六种混合模式。在“以道化民”的三皇之治中，同样还有皇、帝、王、伯四种政治模式，这就是所谓的皇之皇、皇之帝、皇之王、皇之伯。在“以德教民”的五帝之治中，有帝之皇、帝之帝、帝之王，帝之伯。在“以功劝民”的三王之治中，有王之皇、王之帝、王之王、王之伯。在“以力率民”的五伯之治中，存在伯之皇、伯之帝、伯之王、伯之伯。用十六种混合模式评断历史形势，臧否历史人物的功绩，其用心可谓深细。邵雍对历代政治，有褒有贬；对历史人物，或臧或否，其历史观不失为“通古今之变”的象数思维模式。

邵雍对十六种混合模式，作了一般性的解释。《观物内篇》之十写道：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

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

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事也。

.....

这主要表现：道、德、功、力四种政治手段，或四种统治策略，不一定单独行使，可以交叉综合使用，但在综合使用中，总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另一方面居于补充地位。

邵雍觉得对皇帝王伯之世，单以道、德、功、力四字概括其政治态势，不免有些抽象，他更用春、夏、秋、冬四季作比喻，使之具体化，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他还采用诗歌形式，对春、夏、秋、冬所代表的历史时代作了生动描述。

“以道化民”之世，如春。春天的特点是风和日丽，万物舒展，畅发生机。其《三皇吟》诗云：“三皇之世正熙熙，鸟雀之巢俯可窥；当日一般情味好，初春天气早晨时。”^①

“以德教民”之世，如夏。夏季的情景是阳光灿烂，草木繁茂。其《观五帝吟》诗云：“衣裳垂处威仪盛，玉帛修时意思恭。物物尽能循至理，人人自愿立殊功。”^②

“以功劝民”之世，如秋。秋之景色如风扫落叶，草木凋零，其《三王吟》云：“三王之世正如秋，权重权轻事有由。深谷为陵岸为谷，陵迁谷变不知休。”^③

“以力率民”之世，如冬。肃杀之气，席卷大地，万物遭受凌迟。其《观五伯吟》诗云：“刻意尊名名愈亏，人人奔名

^① 《击壤集》卷十三。

^② 《击壤集》卷十五。

^③ 《击壤集》卷十三。

不胜疲。生灵剑戟林中活，公道财货心里归。”^①

三皇五帝之世，能否再恢复？邵雍认为，无为而治的社会，难以回复了。五帝、三王之世若能行仲尼之道，还可局部再现。他说：“羲轩尧舜虽难复，汤武桓文尚可循。事既不同时又异，也由天道也由人。”^② 肯定人力可以回天，历史由人创造。故邵雍对唐代政治十分赞赏，其《观有唐吟》诗云：“天生神武镇中央，不尔群凶未易攘。贞观若无风凜凜，开元安有令扬扬。凭高始见河山壮，入夏方知日月长。三百年间能混一，事虽成往道弥光。”^③ 面对他所说日益衰落的历史图景，这样的回忆，多少给人以一点慰藉。

邵雍不止用春、夏、秋、冬四季阴阳消长的特点形容皇、帝、王、伯四种政治模式的基本精神，还进一步引用《易》、《书》、《诗》、《春秋》四部古代经典的基本精神，附会于皇、帝、王、伯四个时期。在邵雍看来，这四部经典的产生是大有文章的。他说：

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自尧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孙五伯也。^④

^① 《击壤集》卷十五。

^② 《击壤集》卷十三《天人吟》。

^③ 《击壤集》卷十五。

^④ 《观物内篇》之六。

邵雍认为《周易》宣扬的“无思无为”境界，反映了三皇之世的文化精神；《尚书》所述尧典、舜典思想，反映了五帝之治的文化精神；《诗经》所歌颂的文王、武王事迹，表现了三王之治的文化精神；《春秋》之作使乱臣贼子惧，针砭了五伯之世的积弊。邵雍以四部经典阐明其皇帝王伯历史观，力图引用元典精神来论述自己的思想，这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不少评论家认为，邵雍创导以皇、帝、王、伯或道、德、功、力概述历史，是一种退化史观。这种评论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邵雍毕竟意识到在三千年阶级社会的历史中，充满了皇、帝与王、伯的不同政治态势，存在无为与有为，礼让与争夺，义与利，暴力与文德两种政治路线的冲突。这种历史较之“五德终始”论、“三统”循环论大大前进一步。无疑为宋明理学中天理人欲之辨，王伯之辨，义利之辨，开了先河。

二、“午会”前九运的历史演变

《皇极经世》第三大部分《以运经世》，是《观物篇》之二十五至三十四，邵雍以历史年鉴形式，详细记载了中国古代自夏禹至五代时期三千年间的历史演变。这三千年，在“以元经会”的宇宙年谱中，相当于第七“午会”。按邵雍的历史观，中国历史经历了三皇、五帝两大阶段之后，进入三王、五伯两大阶段。第七会（午会）时值姤卦，表明历史发展由乾（第六会）之姤，阳气上升已到极点，开始走下坡路。“以功劝民”之世代之以“以力率民”之世。以一年四季作比喻，相当于盛夏之后，逐步转秋入冬。在邵雍看来，午会三十运是人类社会生活日益衰落，渐至难熬的时期。邵雍只详

细表列了午会三十运中前九运的大事。此午会前九运，正是夏、殷、周、秦、两汉、三国、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等王朝的兴衰过程。《观物内篇》对此历史过程有过总的评价。他写道：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萃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者也，北五代，伯之传舍者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①

“七国”指战国七雄，称“冬之余冽”，即春秋五伯之余威。“汉王而不足”，是不够王，乃王之伯；“晋伯而有余”，是较伯稍强，可谓伯之王。“三国，伯之雄”，指汉魏吴的君主皆称伯之雄杰。“十六国，伯之丛萃”，图伯之人少有出类拔萃之辈。宋齐梁陈加后梁，是为“南五代”，皆借人之势以称伯；前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为“北五代”，有如走马灯似的传舍，托名称伯而已。隋的短暂统治，好比晋的儿子，不足于伯之王；唐的辉煌历史，好比汉的弟兄，不足于王之伯。隋之伯业如江汉，隋末诸郡，有如江汉的余波；大唐声名若日月，唐末诸藩镇，只不过占其余光。邵雍立意美化宋代的伯业，说它好比一轮红日；而唐末、宋前的五代，只是黎明

^① 《观物内篇》之十。

时刻的几点小星，伯不足道。

尽管邵雍认为历史变化越来越糟，但却将中国历史的前途寄希望于宋代，他写了《经世吟》，抒发自己的乐观情怀：

羲轩尧舜，汤武桓文，皇帝王伯，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降及两汉，又历三分；东西倣扰，南北纷纭。……非唐不济，非宋不存，千世万世，中原有人。^①

邵雍按午会三十运的次序，编排了前九运的历史年鉴。将三千多年的历史变迁，按元会运世的次序加以排列，煞费苦心。现将其所列年鉴，依午会前九运的顺序，简述于下：

午会第一运，直姤之乾，十二世，360年。自夏禹八年甲子，至夏孔甲十二年癸亥。其中大事有：禹大会诸侯于涂山，崩于会稽。夏王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后羿拒太康于洛汭。寒浞杀羿。夏臣靡灭寒浞立少康。夏王杼以后经七传而至孔甲。

午会第二运，直姤之遁，十二世，360年。自夏孔甲十三年甲子，至商祖辛九年癸亥。中有大事：夏末暴君桀当政。成汤即诸侯位而重用伊尹。夏复归都于毫。汤放桀，建国曰商。太壬立，为中宗。仲丁践位，迁于嚣。外壬崩，国复乱。河亶甲徒居相。祖乙徒居邢。祖辛立。其间治乱兴衰，莫可详考。

午会第三运，直姤之讼，十二世，360年。自商王祖辛十年甲子，至周文王受命为西伯，癸亥。中列大事如下：商王

^① 《击壤集》卷十七。

盘庚改号曰殷、迁都。武丁（高宗）以梦求傅说为相。武乙徙居河北。周文王即诸侯位。帝乙崩，次子受辛（纣）即位，囚文王于羑里，二年后释归，命为西伯。

午会第一、二、三运，正邵雍所谓“三王”之世，行“以功劝民”之治。邵雍在《观三王吟》中歌颂三王之治云：

一片中原万里余，殆非孱德所宜居。
夏商正朔犹能布，汤武干戈未便驱。
泽火有名方受革，水天无应不成需。
详知仁义为心者，肯作人间浅丈夫？^①

肯定三王德高望重，能行仁义之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未动干戈而正朔远布。可是从此以后，中国历史向五伯阶段发展，将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午会第四运，卦当姤之巽，十二世，360年。自周文王甲子，至幽王四年癸亥（公元前778年）。其中大事有：西伯伐崇，自岐徙居丰。西伯伐密须、戡黎、伐邘。武王即位，东观兵于孟津。殷纣杀比干、囚箕子，微子奔周。武王伐商杀受辛。武王崩，周公辅成王，平三监之乱，杀武庚，营成周。周公没。周召二伯行政，谓之共和（庚申。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自此始），宣王北伐猃狁，南征荆蛮，伐姜戎，败师于千亩。料民于太原。幽王立、宠褒姒。此乃古史中的西周时期。夷王以后，国祚渐衰，尚未进入五伯之世，承三王之遗绪而陵次不振。

^① 《击壤集》卷十五。

午会第五运，卦值姤之鼎，十二世，360年。自幽王五年甲子（公元前777年），至周威烈王八年癸亥（公元前418年）。由三王之世降而为五伯之世。其中大事有：幽王废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以犬戎伐周弑幽王。平王东迁洛邑，是东周之始。秦祀白帝，晋昭侯封弟，楚熊通伐随遂称王。齐桓王立。齐会宋陈蔡郑伐鲁。晋请为诸侯。周有三大丈之乱。齐伐山戎以救燕。齐攘狄、齐伐蔡，齐会盟于葵丘，齐伐管仲平周乱。秦伐晋。楚执宋襄公于会。秦晋徙陆浑之戎于伊川。秦晋之师灭叔带纳王于成周。周襄王享晋文公。襄王狩于河阳。晋会盟于践土。晋败秦师于崤。秦伐西戎破国十二。楚观兵于周郊。晋会诸侯之师救卫。晋会吴以灭逼阳。楚伐吴有功，楚会十二国之君于申。吴败楚师于乾溪。晋灭陆浑之戎。周铸大钱。晋伐楚，吴入郢。鲁以孔子为司寇，鲁会齐于夹谷，孔子去鲁适卫，孔子自卫返鲁，孔子卒。吴伐楚，越伐吴，吴灭越。晋三家兵团晋阳。晋之韩魏赵灭智伯。春秋时期五伯争雄，战乱不休，人民涂炭；当此乱世而造就圣人孔子。邵雍《观五伯吟》云：

刻意尊名名愈亏，人人奔命不胜疲。
生灵剑戟林中活，公道货财心里归。
虽则饩羊能爱礼，叹息惟闻一仲尼。^①

午会第六运，卦值姤之大过，十二世，360年，自周威烈王九年甲子（公元前417年），至汉宣帝神爵四年癸亥（公元

^① 《击壤集》卷十五。

前 58 年)。自战国初年至西汉末年。其中大事件有：田氏伐齐。魏赵韩灭晋。秦用商鞅。诸侯西贺秦。孟子为魏卿，齐用孟子为上卿。秦大败六国之师。秦大败楚师。楚怀王放屈原于江滨。齐灭宋。燕会师伐齐。秦师伐韩。秦昭襄王灭周。秦徙周九鼎于咸阳。楚齐韩燕赵皆服于秦。楚灭鲁。秦始皇称帝。秦灭楚、灭齐，罢侯置守，焚书坑儒。赵高立胡亥。陈胜吴广称王。项羽刘邦称兵。刘邦败项羽称帝。汉平梁王、淮南王之乱。吕氏临朝。周勃诛吕氏。汉文帝用陈平为相。汉景帝平七国之乱。武帝伐匈奴。在此期间，周礼崩乐坏，群雄并起；秦统一中国，乃结束纷争局面，可又短祚而亡。人民期望统一，乃有西汉之鼎盛。邵雍《观七国吟》云：

当其末路尚纵横，仁义之言固不听。
肯谓破齐存即墨，能胜坑赵尽长平。
清晨见鬼未为怪，白日杀人奚足惊。
加以苏张掉三寸，扼喉其势不俱生。^①

午会第七运，卦值大过之夬。十二世，360 年。自汉宣帝五凤元年甲子(公元前 59 年)，至晋惠帝太安二年癸亥(公元 303 年)。其中大事有：西汉末王凤王匡起义。王莽篡汉，改国号新。刘玄、刘秀称兵。赤眉起义。光武帝平隗嚣、公孙述。和帝时窦宪破匈奴，梁冀谋逆，党锢事起。窦后临朝称制。黄巾起义。王允吕布诛董卓，曹操徙帝都许昌。刘备、孙权联兵破曹操。刘备称帝、诸葛亮为相。孙权称帝、伐蜀

^① 《击壤集》卷十五。

攻魏。诸葛亮北伐。魏司马懿辅政，子司马师废魏君曹芳。司马昭弑君称晋公，子司马炎代魏。由东汉而三国鼎立再立东晋，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邵雍《观三国吟》云：

桓桓鼎峙震雷音，绝唱高踪没处寻。
箫鼓一方情未唱，弓刀万里力难任。
论兵狼石宁无意，饮马黄河徒有心。
虽曰天时亦人事，谁知虑外失良金。^①

午会第八运，卦值大过之咸，十二世，360年。自晋惠帝永安元年甲子（公元304年），至唐高宗龙朔三年癸亥（公元663年）。经南北朝的分离而到隋唐的一统。其间大事有：刘渊称帝曰后汉。石勒称赵王、称帝。桓温灭蜀、秦苻坚称天王。晋谢安大败秦师于淝水。拓拔珪登国。桓玄窃命称楚。晋自江陵还建业。刘裕代晋改元号宋。肖道成伐宋建元齐。梁武帝肖衍代齐。北齐高洋代东魏。陈霸先代梁。李渊袭封为唐公。周杨坚专制，代周称隋。隋师灭陈。杨广弑父自立。唐高祖李渊伐隋改元。秦王李世民称帝为太宗。太宗征辽东。高宗立武则天为后。邵雍《观南北朝吟》云：

方其天下分南北，聘使何尝绝往还。
偏霸尚存前典宪，小康犹带旧腥膻。
洛阳雅望称崔浩，江表奇才服谢安。

^① 《击壤集》卷十五。

二百四年能并辔，漫将夷虏互为言。^①

午会第九运，卦值大过之困，十二世，360年。自唐高宗麟德元年甲子（公元664年），至宋仁宗天圣元年癸亥（公元1023年。此年邵雍13岁。）实际列表只及十世。邵雍本着儒者只推已往，不论当代的原则，故所列大事只及五代未列宋代事。其中所列大事有：武则天改国号曰周。唐玄宗立，杨贵妃受宠，杨国忠专权。郭子仪败吐蕃。唐顺宗永贞革新。唐宪宗诛王伾、叔文。王仙芝、黄巢起义。朱全忠进封梁王并代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相继称帝。后周赵匡胤拥兵。邵雍对唐代国运鼎盛，贞观、开元之治，颇有赞扬之词，“三百年间能混一，事虽成往道弥光”于五代多有批评。其《观五代吟》云：

自从唐季坠皇纲，天下生灵被扰攘。
社稷安危悬卒伍，朝廷轻重多藩方。
深冬寒木固不脱，夫曙小星犹有光。
五十二年更五姓，始知除扫待真王。^②

午会第十运，卦值大过之井，十二世，360年。自宋仁宗天圣二年甲子（公元1024年），至明太祖洪武十六年癸亥（公元1383年）。邵雍未及论列。明人黄畿《皇极经世》注释中曾补入。

^① 《击壤集》卷十五。

^② 《击壤集》卷十五。

邵雍所创立的皇帝王伯递嬗史论，充分暴露了他的唯心史观。他按照自己的易学思想主观设计了一套格式，去硬套历史事件。何朝何代发生什么事件，都是所值之卦中应有之义的应验。以360年（六轮甲子）为一周期，打破王朝兴亡的历史格局，甚至将同一帝王的统治时期，强行分割，列入不同的运世之中。仿佛历史事件恰似一些散兵游勇，可以任人编队，一律以360年为一个方队。将散乱的历史事件编入《以会经运》表格之后，显得格外整齐，这种历史编年方法中国历史学家从未采用过。表面看来，皇帝王伯依次递嬗，很有规律，其实，并不是历史本身的客观规律，只是邵雍随意打扮历史而硬造的规矩。是将主观意志强加于历史的典型。按照这套主观规矩研究历史，绝然不可能得出任何可取的结论。只能比按帝王世系划分历史的做法造成更多的混乱。表面上，邵雍的历史年鉴很整齐，实际上是把历史搅成了一团乱麻，以此论史，完全失去“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意义。

邵雍以元会运世纪年法裁决历史的做法之所以完全错误，在于他根本不懂得历史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历史到底是谁创造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应从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去找历史变动的原因。他抱着卦气自然消长的观点来裁决历史，卦气变了，历史自然会变，实际上把易学中的卦气学说奉为绝对真理，用它来套中国历史。

不过，邵雍的历史观对人们观察历史毕竟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启示。他打破了“五德”终始、“三统”循环的古史观，提出皇帝王伯交叉的历史观，先树立四种典型，作为观察历史的标准，又用十六种混合形态，将人们的思维方法复杂化，

说明观察历史不能要求纯之又纯的形式，要有多种视角；要善于综合考察。其次，他打破了按王朝兴衰来观察历史的方法，启迪人们在观察历史时，不能绝对依据王朝更迭，可能有超出王朝更迭的东西起作用。这起作用的力量是什么，邵雍并未作探索。这倒启示人们去探索那真正超越王朝更迭而起作用的历史动力，即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打破王朝史体系而思考历史的变革，这不能不说别开生面的历史研究方法。邵雍认为历史的变化，是由阴阳消长，如果不把这个阴阳看作自然界的阴气和阳气，而看作制约历史发展的某种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推动历史前进的正面力量和阻碍历史前进的反面力量，这对于观察历史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系统，这比用天的意志决定历史、圣人的智慧决定历史，或神秘的运气决定历史，有着可取的成分。总之，邵雍用一种标准来检验历史的盛衰，这种标准是主观的，不可取，但却诱导人们跳出天命史观、天才史观、运气史观的窠臼，不能不说这是人类历史观发展的一个新的转折。不过这并不是邵雍历史观的本意，他的历史观的核心还是以一个神秘的“数”的演变来范围历史。是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历史观。他要用这一套历史观来美化宋王朝，认为宋之兴起犹如旭日东升，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所以他排列的历史年表只到五代为止，这只是无可奈何的办法。

第十章 后天易学—— 自然哲学新论

邵雍将自己独创的易学思想体系称为先天易学，与此相对应，将《周易》经传称为后天易学。他认为先天易学来自伏羲，后天易学创于周文王。邵雍既讲先天易学，又讲后天易学。他从几个方面论证先天易学高于后天易学。先天易学是根本，后天易学是先天易学的应用。先天易学以伏羲八卦次序图和方位图为准，后天易学以文王八卦次序图和方位图为准。邵雍解释的一套所谓后天易学，实际上是以《说卦传》中另一些观点为依据，自己建立的一套自然哲学，在易学发展史上树立一家之言，其中不少观点乃发前人之所未发，有一定思想价值。不过《周易》中的人文精神，他讲得很少。

一、先天之学心也 后天之学迹也

邵雍将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作了原则性的区分。前者为

“心”，即核心、基础、本质的东西；后者为“迹”，即形迹，应用、外表的东西。他说：

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出入、有无、死生者，道也。^①

这是说伏羲八卦图，乾坤定上下之位，坎离列左右之门，于不易之中含变易之本体，开大用之端，体太极于心，千变万化由是出。文王八卦，乾父坤母，六子当位，于变易中显不易之用，展示天道之迹象、四时百物之衍化。心以藏其用，迹以显其心。迹因于心，心显于迹。皆是一动一静、一阴一阳之道的表现，万物的有无、生死无不是太极（道）的出入、表里。

邵雍分析了后天易学所根据的《文王八卦次序图》的内涵，及其与《先天八卦图》的区别。《后天八卦图》同《先天八卦图》一样，也有二图，均见朱熹《周易本义》卷首。如图 12。

^① 《观物外篇》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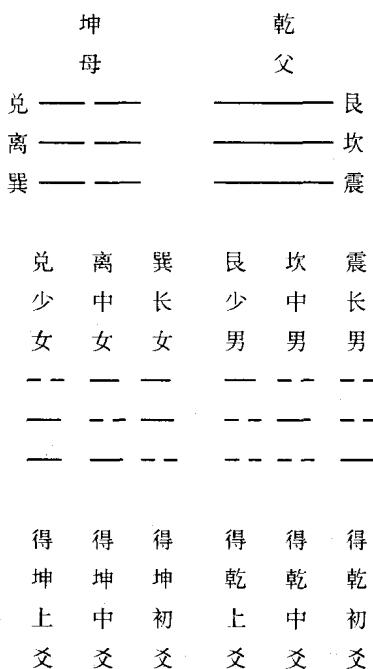


图 12 文王八卦次序图

首先，后天八卦的生成次序与先天八卦不同。邵雍根据《说卦》中乾为父、坤为母的说法。认为震一索而为长男，是得乾之初爻；坎一索而为中男，是得乾之中爻；艮一索而为少男，乃得乾之上爻。巽为长女，得坤初爻；离为中女，得坤中爻；兑为少女，得坤上爻。后天八卦之间的关系乃父母与三子三女的关系；同先天八卦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生成次序意义各别。所以邵雍在《观物外篇》中

写道：

乾坤合而生六子，三男皆阳也，三女皆阴也。兑分一阴以与艮，坎分一阴以奉离，震巽以二相易，合而言之，阴阳各半。是以水火相生而相克，然后既成万物也。^①

“合而言之”，指三阴（女）与三阳（男）相比较；“阴阳各半”是说，三男相合，成三阳六阴；三女相合，成三阴六阳。“阳卦多阴，阴卦多阳”。阴阳合和，如水火之相生亦相克，然后乃能化成万物。后天易学的这一原理，是同《易传》思想一致的。认为阴阳、父母、男女相生相克是万物生成衍化的基本原则。从而巧妙地解释了《易传》关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原理。

第二，后天八卦方位与先天八卦方位也不同。邵雍根据《说卦》“帝出乎震”一节的思想，认为“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②。他进一步对《文王八卦方位图》（图13）作了解释：

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为泰，坎离交而为既济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终于寅，离终于申，以应天之时也。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长子用事，而长女代母，坎

^① 《观物外篇》第二。

^② 《观物外篇》第五。

离得位而兑艮为偶，以应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尽于是矣。^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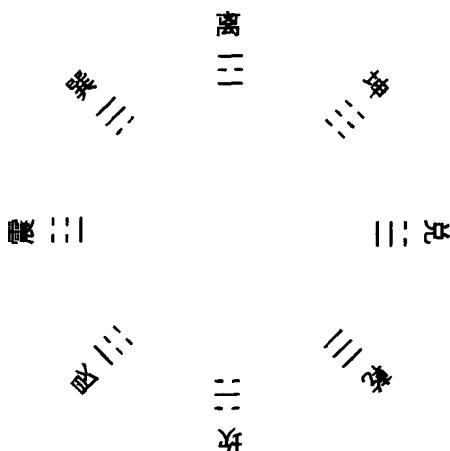


图 13 文王八卦方位图

“乾坤交而为泰”，是说先天八卦乾南坤北的卦象，泰卦坤上乾下，表明阳气上升，阴气下降，天地交泰，万物畅通。“坎离交而为既济”，是说后天八卦的卦象，上离下坎，离南坎北，水火相济，表示万物的形成。“乾生于子，坤生于午”，是说先天八卦，乾坤居南北之位。“坎终于寅，离终于申”，是以十二辰配先天八卦方位而来。“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是

^① 《观物外篇》第五。

指后天八卦方位：“长子用事，长女代母”，是指后天八卦中的震居东方生物，巽居东南，代坤而长物。后天八卦中离南坎北，是“坎离得位”，兑居西配东方之震，艮居东北与东南之巽相配，故称“兑艮相配”。邵雍认为先天八卦方位的安排是有道理的，它的特点在“应天之时”；后天八卦方位的安排也有深刻含义，它的宗旨在“应地之方”。伏羲重天道，文王重地道，先哲的智慧，尽在此二图中。总而言之，“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①。“乾坤纵”，指伏羲八卦方位图，乾南坤北，南北为纵。“震兑横”，指文王八卦方位图，震东兑西，东西为横。这是说先天八卦所反映的先天易学乃易之根本，后天八卦所反映的后天易学乃易之应用，或纵或横的差别，不止是一个方位的区别而已，有其深刻含义。

第三，后天易学所显示的时间观念也与先天易学不同。邵雍本《说卦》“兑正秋也”的说法，震代表春季，离代表夏季，兑代表秋季，坎代表冬季。震离兑坎四正卦，既代东南西北四方，又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这是汉代卦气说的基本观点，显示东方文化中时间观念与空间观念的统一。邵雍认为这正是后天易学的特点。

第四，后天易学沿袭汉易传统，将八卦方位同五行沟通，这也大异于先天易学。先天易学，不讲五行，只讲水火土石四行，认为金在石之中，木与火相连。邵雍认为后天易学与五行相合，震东方木，离南方火，兑西方金，坎北方水，巽为木，乾为金，坤、艮皆土。故《观物外篇》“生物用数第

^① 《观物外篇》第五。

八”云：

天有五辰，日月星辰与天为五，地有五行，金木水火与土为五。五行之水，万物之类也；五行之金，出乎石也。故水火土石，不及金木，金木生其间也。金火相守则流，火木相得则然，从其类也。

后天方位，与五行学说相配，是汉易卦气说的观点，邵雍的先天八卦方位，离东、坎西、乾南、坤北，不与五行发生关系，两图差别较大。故邵雍讲节令时，仍用后天八卦方位说。

第五，后天八卦方位的另一优点，同洛书九宫相应，在医学上颇有参考价值。见图 14。

四 巽	九 离	二 坤
三震	中宫	兑七
艮 八	坎 一	乾 六

图 14 文王八卦与《洛书》

传统医学中的“灵龟八法”，按八卦在九宫中的位置，将人体奇经八脉的八个穴位，纳入洛书九宫之数，结合《灵枢》中揭示的“九宫八风”原理，按时日开穴治病，八脉、八

穴，与八卦方位的关系，有如下歌诀：“坎一联申脉，照海坤二五，震三属外关，巽四临泣数，乾六是公孙，兑七后溪府，艮八系内关，离九列缺主。”足见后天八卦方位的实用价值，非先天八卦所能代替。故邵雍认为后天八卦乃先天易学之用。

第六，后天八卦方位所示的时令，经过《灵枢》创立“九宫八风”原理，为人们顺应时气提供方便之门。其说将四立、二至、二分、八个节气，分配入洛书九宫。《灵枢》原文如次：

立秋	二，玄委，西南方，(坤)；
秋分	七，仓果，西方，(兑)；
立冬	六，新洛，西北方，(乾)；
夏至	九，上天，南方，(离)；
招摇	(五)，中央；
冬至	一，叶蛰，北方，(坎)；
立夏	四，阴洛，东南方，(巽)
春分	三，仓门，东方，(震)；
立春	八，天留，东北方，(艮)。 ^①

八卦在九宫中所居方位，同于《洛书八卦图》。其中“坎一、震三、离九、兑七”之说，同《月令》、《汉书·五行志》所谓“坎六、震八、离七、兑九”之说不同；与唐一行《卦议》所引孟喜的“坎七、震九、离八、兑六”之说亦异。诸家说法有异，不可强求统一。足见利用后天八卦方位结合洛

^① 《灵枢》；《九宫八风》。

书九宫之数，这种思维方法在古代比较普遍，习以为常，因其便于记忆，仍有一定作用。故邵雍虽主先天易学而不废后天易学，是有用心的。目的在同易文化传统中的通常思维方法，既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显示其独创性；又保持一些共同点，以显示其统一性。

二、上经重天道 下经重人事

邵雍把后天易学看作文王创立的易学，它只是先天易学的应用。对于后天易学，邵雍以上下经及《易传》为根据，阐发了不少前人未发之论，力图揭示天地万物与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某些规律性。

首先，对《周易》上经与下经的宗旨作了区分。认为上经重天道，下经重人事。他说：

自乾坤至坎离，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济、未既，以人事也。《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离，终于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①

这是说《易经》以乾坤二卦为首，上经终于坎离，下经以咸、恒二卦开始，以水火相交之既济、水火不交之未济为全书的结束，这种卦次的安排，包含着符合天道、人事的“至理”。其至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以乾坤为始，是易之根本，天地定位，本立道生；天地万物皆祖乾坤；《连山》首

^① 《观物外篇》第六。

艮，《归藏》始坤，均不如《周易》并建乾坤以为首的思想深刻。（二）上经终于坎离，即突出水火在八卦中的地位，天地、日月、无非坎离，悬象昭明，其用无穷，宇宙万物与人，无不资水火为用，离开水火，万物不生。（三）下经以咸恒开篇，表明君臣相合，夫妇相配，乃人伦之始，社会之经，亦乃乾坤之用。（四）《周易》六十四卦，以既济、未济二卦为结，三阴三阳之相间，既协乾坤之体，又符水火之用。智虑周详，发人深思。所以邵雍写道：“乾坤，天地之本；坎离，天地之用。是以《易》始于乾坤，中于坎离，终于既济未济。而否、泰为上经之中，咸、恒当下经之首，皆言乎用也。”^①

《周易》之所以并建乾坤以为首，无非表明分阴分阳以立本。乾不能离坤，坤不能离乾。宇宙之间，不能只有阳而无阴，不能只有阴而无阳，阴阳二气始终相辅相成。邵雍写道：

阴阳生而分二仪，二仪交而生四象，四象交而生八卦，八卦交而生万物。故二仪生天地之类，四象定天地之体；四象生日月之类，八卦定日月之体；八卦生万物之类，重卦定万物之体。^②

这是说太极一动一静乃生阴阳二仪，二仪相交乃生四象，再交而有八卦，又交而生万物。天与地相类，均从二仪生。阴阳各有太、少之别，四象乃定，日为太阳，月为太阴，亦相为类；日之出入分昼夜，月之盈亏分晦朔，其体有定，飞走

^① 《观物外篇》第六。

^② 《观物外篇》第十。

草木，有性情形体之殊，说明生物之类别，本乎八卦。八卦重之而为六十四卦，表明万物各相交而变化无穷，六十四只是其大类之数而已。

以上可见乾坤相交生万物。如果乾坤不相交，则天地闭塞，万物不生。故邵雍写道：

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复、姤。盖刚爻柔而为复，柔爻刚而为姤，自兹而无穷矣。^①

又说：

生长类，天地成功。别生分类，圣人能成。^②

说明生人生物，皆有其类，无非禀阴阳刚柔之气。天地生长万物与人，其功皆在于阴阳二气相交，或刚或柔，一往一来，有顺有逆而变化无穷。圣人作《易》的宗旨唯在推阐其生生之道。

邵雍从后天八卦方位出发，论述乾坤二卦与六子的关系，并指出《易》之大用，唯在揭示阴阳交泰之理。

坤统三女于西南，乾统三男于西北。上经起于三，下经终于四，皆交泰之义也。乾用九，坤用六，

^① 《观物外篇》第二。

^② 《观物外篇》第二。

大衍用四十九，而“潜龙勿用”也。大哉用乎！吾于此见圣人之心矣。^①

这是说坤位西南，统巽、离、兑三女，乾位西北，统坎、艮、震三男。女从母，男从父，这是后天八卦方位安排的用心。为什么称阳三阴四？《乾凿度》云：“阳三阴四，位之正也。……夫阳道纯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阴道不纯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郑玄解释说，阳三阴四，是指方位而言，“三者东方之数”，东方日出，属阳，圆者经一而周三，故东方之数为三。“四者西方之数”，西方日入，属阴，方者经一而周四，故西方之数为四。上篇起于三，下篇终于四，三以象阳，四以法阴，无非表明乾坤为《周易》之始，乃阴阳之根本，万物之宗主，变化之父母。阴阳交泰则长养万物。圣人作《易》之用心，唯在阐发阴阳之用。

邵雍用后天易学观点解释日月运行、四时变迁、寒暑交替等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其中包含着某些自然科学知识。

以阳消阴长论日月的出入。邵雍云：

阳消则阴生，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阴盛则敌阳，故月望而东出也。天为父，日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为夫，月为妇（妻），故日东出，月西出也。^②

^① 《观物外篇》第六。

^② 《观物外篇》第七。

日没而月升，邵雍认为是阳消而阴生；逢望则月东升，他说成是阴盛则敌阳；“天左旋”比为父往前进，“日右行”比为子往后退；日东出月西出比为夫妻各主一方。这都是以阴阳、父母、夫妇等关系生硬地套在自然现象上面，如此的易之用，实为附会。但他认为：“月体本黑，受日之光而白。”^②又说：“日月之相食，数之交也。日望月，则月食；月掩日，则日食。”^②这些看法符合科学原理，反映了古代天文知识。

邵雍指出，坎离兑震四正卦，代表空间方位，同时也反映一日之间太阳运行的位置，代表时间。《观物外篇》写道：

“易”者，一阴一阳之谓也。震兑，始交者也，故当朝夕之位；坎离，交之极者也，故当子午之位。^①

这是说，“易”有交易、变易的含义。卯时日出于东方，为朝；酉时日入于西方，为夕。东方为震，坤始交一阳于下；西方为兑，乾始交一阴于上。坤交阳中而为离，居南方，当午之位；乾交阴中而为坎，居北方，当子之位。子午卯酉四时，与坎离震兑四方吻合，如后天八卦居《洛书》九宫之中的位置，正反映东方思维模式中的时空统一观。这一观点，还可以一年之中的二至二分来表述。邵雍说：

冬至之子中，阴之极；春分之卯中，阳之中。夏至之午中，阳之极；秋分之酉中，阴之中。凡三百

^① 《观物外篇》第五。

六十，中分之则一百八十，此二至二分，相去之数。^①

这是说：冬至与夏至，当子午之位，一为阴极，一为阳极；春分与秋分，当卯酉之位，一为阳中，一为阴中。将 360 度加以中分，则二至二分，相去皆 180 度。日随天行，故朝东而夕西，日随天交，故冬南而夏北。所以邵雍说：

日朝在东，夕在西，随天之行也；夏在北，冬在南，随天之交也。天一周而趋一星，应日之行也。春酉正，夏午正，秋卯正，冬子正，应日之交也。^②

这也正好阐明前述天左旋、日右行的观点，东西言日之出入，南北言日之升降。邵雍将阴阳比喻为天地的呼吸，阳为呼，阴为吸。他说，“冬至之后为呼，夏至之后为吸，此天地一岁之呼吸也。”^③ 冬夏二至，阳呼阴吸，一岁之阴阳消息，乃万物生长收藏的节律。

邵雍坚持天行无所谓昼夜的观点。认为昼夜只是人的感觉。他说：“天行不息，未尝有昼夜。人居地上，以为昼夜，……无辰不见也。”^④ 这说明，天行健，未尝止息。无论白昼

^① 《观物外篇》第七。

^② 《观物外篇》第七。

^③ 《观物外篇》第七。

^④ 《观物外篇》第三。

与黑夜，太阳总在运行之中，当其东升之后，人得而见，故称昼；当其西没之后，日照常在运行，人不得而见，乃为夜。

邵雍还指出：极南与极北，皆“万物之死地”。他说：“极南大暑，极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结，万物之死地也。夏则日随斗而北，冬则日随斗而南，故天地之交而寒暑和，寒暑和而物乃生焉。”^①“寒暑和而物乃生”，是《周易》尚“和”思想的反映，符合自然规律。

其次，邵雍易学的另一基本观点是：“万物各有太极。”宇宙万物均由太极衍化而来，又各有一太极。这一思想是深刻的。万物莫不是宇宙整体太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本身又是一个小宇宙。邵雍写道：

万物各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次，亦有古今之象，象有形则有体，体者，析乎形而已。有性则有情，情者，分乎性而已。^②

此通论万物生成，本于太极，分之为两仪、四象、八卦。方其生也，是为今，既成必有毁，则为古。或成或毁，一古一今，无非太极的运化。物生必有形体，有形体则有性情，情基于性，性载于体，人与草木鸟兽，概莫能外。性与情者，皆是阴阳刚柔之体现，为各自太极所决定。“发乎性则见于情，发乎情则见乎色”^③。“万物受性于天，而各为其性也。在人则

^① 《观物外篇》第七。

^② 《观物外篇》第十。

^③ 《观物外篇》第十。

为人之性，在禽兽则为禽兽之性，在草木则为草木之性。”^①

邵雍认为，万物之性，各从其类，以类而应。即《易传》所谓“物以类聚”。他说：

飞之类喜风，而敏于飞上；走之类喜土，而利于走下。禽虫之卵，果谷之类也，谷之类多子，虫之类亦然。^②

草伏之兽，毛如草之茎；林栖之鸟，羽如林之叶，类使之然也。^③

邵雍举出一些实例，阐明后天易学中“生生之谓易”的原理。他写道：

木结实，而种之又成是木而结是实，本非旧木也。此木之神不二，此实生生之理也。^④

又以蚕为例云：

蚕之类，今岁蛾而子，来岁则子而蚕。芜菁之类，今岁根而苗，来岁则苗而子。^⑤

① 《观物外篇》第十。

② 《观物外篇》第十。

③ 《观物外篇》第十。

④ 《观物外篇》第十。

⑤ 《观物外篇》第十。

邵雍力图以此证明动物、植物的变易有不同的过程，并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木结实而繁殖新的木，蚕变蛾又生新的蚕，芫菁结子而育成新的芫菁，总是由少变多，由旧变新，但其实质不变，此即《易》学阐明的“生生”之理。

邵雍观察了动物与植物在长生形态上的差异，决定其性命的根本区别。他说：

动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人寓于走类者何也？走类者，地之长子也，体必交而后生。……合天地而生人，合父母而生子。^②

动物怕去头，植物怕去根，这是生物学上的基本常识，邵雍指出这是动物的生命所系的关键。植物可自行繁殖，而动物必雌雄交配而后生育，这是又一区别。当然，邵雍当时的生物知识还比较贫乏，不知有雌雄异株之植物，亦不知有雌雄同体之动物。故所述“生生之理”是粗浅的。

邵雍多次声称：“万物人为贵。”他力图对此观点加以论证，然而他的论证方法是错误的。他写道：

动者体横，植者体纵，人直横而反纵也。飞者有翅，走者有趾，人两手翅也，两足趾也。飞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飞走也。故最贵于万物也。^③

^① 《观物外篇》第十。

“万物人为贵”，这个命题并不错，人为万物之灵，古人早已有此见解，可是，人同万物相比，贵在什么地方，邵雍坚持“观物”论，对此作过详细论证（见下一章）。邵雍的论证，往往只抓住一些枝节问题，用一些表面现象相比，根本不及要领。人之可贵，贵在有知识，有精神世界，有理想境界。从心理学上讲，是贵在有第二信号系统，而不是靠动物的本能行事；从生理学上讲，贵在有超越一切动物的高级神经系统；尤其应从社会学上来区分，荀子早已指出，“人有气、有生、有知而且有义”，人有社会意识，是靠组成社会群体而活动的，人不止有物质生活，还有精神生活。人所独具的社会政治生活经验，是可以通过语言传承的。邵雍的后天易学，没有深刻地阐发《周易》及易学中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对自然、社会的观察都是相当浮浅的，未能深入事物的本质。他的后天易学与先天易学一样，都难以代表中国易学所达到的理论思想高度。

综观邵雍易学思想，无论先天易学和后天易学，无可讳言，存在三大局限。

首先，他离开传统易学发展的大道，抛开《周易》经、传的丰富思想文化内容，独创一套先天易学体系，不是接着前人思想讲易学，故未能使传统易学思想在他手里得到更加丰富的发展，使本来精深的易学思想，特别是人文易学思想反而显得贫乏无力。

其次，邵雍把大量的精力花费在象数的推衍上，特别是在数学上，极力使易学别开生面，实际上把易学变成了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玩物，而不能发挥作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作用，所以邵雍易学只昙花一现，几乎成为绝学，后人很少有

新的发展，再无传承的价值，可说是陷于焦芽、绝港，的确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第三，易学的根本任务在“崇德而广业”，其基本原理是“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保合太和乃利贞”，引导人们实现“万国咸宁”的理想境界。邵雍的《皇极经世》，未始不企图教导人们学易以经世致用。惜乎他将易学变成了书斋里玩弄的游戏，不触及人们的心灵，不能引导人们去研究现实社会诸矛盾，结果他的易学只能是无原则地粉饰太平。《皇极经世》写完了，宋代社会的现状却置诸脑后。“易乃大道之原”。先天易学成为脱离“大道”的孤家哀鸣，未能予人以更深刻的思想启迪。对后代易学家来说，这一教训值得深思。

第十一章 “以物观物”的认识论

邵雍将自己的著作《皇极经世》又称为“观物篇”，是别有深意的。“观物”是邵雍研究自然和人类历史的态度，“皇极经世”是他“观物”所得的结论，也是其“观物”的终极目标。

观物，可说是邵雍用以观察分析宇宙万物及人类历史所坚持的一种基本立场和方法。邵雍力图以“观物”为准则，建立自己的认识原则。首先，明确分析了观物的主体；其次，论述了观物的基本立场；最后，阐述了观物的终极目的。这就是邵雍观物的基本内容。在这三个方面，邵雍都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观点，对中国哲学认识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人灵于物 学际天人

邵雍十分明确，观物的主体是人。人在宇宙万物之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有超出宇宙万物的特性。他首先突出观物的主体，论述人为万物之灵的观点。人为万物之灵的思想，在古代早已有了，邵雍的论述别开生面。

邵雍指出，人之所以为人，“以其至灵”。本来人也是宇宙万物中的一分子，在先天学看来，“人亦物也”，都由太极化生而来。其所以从万物中超脱出来，驾驭万物，玄思宇宙，全在于人有其他万物所不具备的灵性。他写道：

人者，物之至灵者也。物之灵，未若人之灵。物尚由是道而生，又况人灵于物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灵，故特谓之人也。^①

人灵于万物，究竟表现在那些地方呢？邵雍在《观物内篇》中分四个层次作了分析。他写道：

夫人也者，暑寒昼夜无不变，雨风露雷无不化，性情形体无不感，走飞草木无不应。所以目善万物之色，耳善万物之声，鼻善万物之气，口善万物之味。灵于万物，不亦宜乎！^②

^① 《观物内篇》之九。

^② 《观物内篇》之一。

这是从人的感觉器官具有与动物不同的特殊功能，论述人灵于万物的道理。

不止如此，邵雍进一步从人具有思维器官上，论述人灵于万物的特性。他说：

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者焉。^①

所谓“一心观万心”，“一世观万世”，是指人有抽象思维的能力，能从个别到一般，从一般到个别，并能“一世观万世”，进行历史经验的总结。

再进一步，邵雍指出“人灵于物”，还在于人有实践创造的功能。他说：

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②

这是说人能通过实践，认识自然法则（代天意），表达自然规律（代天言），开创巧夺天工的事物（天工），造出人间的奇迹（天事）。

更进一步，邵雍竭力歌颂人的理性思维的玄妙、伟大，任何物不敢望其项背。人灵于万物，就灵在有高超玄妙的理性思维。他说：

^① 《观物内篇》之二。

^② 《观物内篇》之二。

又谓其能以上认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明人事者焉；又谓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者焉。^①

“弥纶天地，出入造化”，是理性的威力，是人的智慧的高度发挥，邵雍极力推崇人的理性思维能力，认为这是人灵于万物的集中表现，是很有见地的。高扬人类的认识能力，由此将人从万物中提升出来，最有说服力。

当然，邵雍并不认为所有的人都有高尚而神妙的理性思维能力，具有此种能力者主要是圣人或至人。他认为圣人乃“兆人之人”，是超出一般人的人。他说：

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万人之人，有亿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为兆人之人，岂非圣乎？^②

那么，圣人与一般人区别何在？邵雍认为人乃“物之至者”，圣乃“人之至者”。即是说，人的高明，灵于物，只是同物相较而言；圣的高明，灵于人，是同人相比较而言的。他写道：

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

① 《观物内篇》之二。

② 《观物内篇》之二。

也。物之至者，始得谓之物之物；人之至者，始得谓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谓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谓也。^①

圣人是人类的凤毛麟角，乃“兆人之人”。他是人类最高级的优秀分子，只有圣人才具有灵性，成为万物之灵中的最灵者。人类的历史，宇宙的演化规律，似乎只有这种“兆人之人”的圣人才能理解和掌握。邵雍从人为万物之灵的思路，发挥出一套圣人乃“万人之灵”的观点，这是古代“圣人史观”、或“天才史观”在他头脑中的反映。我们承认个别杰出人物会对历史作出卓越贡献，但不能承认世界上有什么天生的圣人，所有杰出人物都是从社会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邵雍没有也不可能回答圣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这是他对“观物”主体的一种片面认识。

二、以物观物 不以我观物

在中国哲学史上，不少哲学家强调研究人的心性，形成性理之学；少有强调研究物理的自然之学。王充比较看重物理，杨泉写了破天荒的《物理论》，方以智写出《物理小识》。杨泉之后，方以智之前，看重物理，提倡研究物理之学的，主要是邵雍。他是强调物理之学的承先启后的思想家。这是由于他深受北宋时期自然科学发展影响的缘故。

邵雍明确地提出，要将主要精力花在研究“天人之际”的

^① 《观物内篇》之二。

学问上，才配得上称为治学的正道。他说：

中庸之法，自中者，天也；自外者，人也。学
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①

邵雍所说的“中庸之法”，指的是人的认识活动的法则。“自中者天”，是说认识“自中而外”，乃天之所为，是人的本性，即认识能力；“自外者人”，是说“自外而中”，乃人之所为，是人的认识作用，人既有客观的认识能力，又能发挥主观的认识作用，就应将认识的焦点放在“究天人之际”这一中心课题上，否则为学只是枉然。

首先，“究天人之际”，应达到什么目的？邵雍提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为得矣。”^② 认识活动的目的，在于揆度物理与人情两方面使物理为人所用，使人情顺应物理，心安而理得。

邵雍认为揆度物理人情，须从客观情势出发，不可单凭人的主观意愿。他说：“凡人为学，失于自主张太过。”^③ 这里包含着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不可以无“自主张”，那会随人作计，人云亦云；但另一方面，又不可“自主张太过”，那就会师心自用，脱离实际。他发挥孔子的观点，强调在揆度物理人情过程中，要做到“绝四”，即杜绝四个方面的弊端。他说：“圣人之难，在不失仁义忠信而成事业。如何则可？在

^① 《观物外篇》第十二。

^② 《观物外篇》第十二。

^③ 《观物外篇》第十二。

于绝四。”^①孔子主张人们在观察研究事物过程中，当杜绝四种认识上的弊端，即“勿意，勿必，勿固，勿我”^②。意，即主观臆断；必，乱作决断；固，固执己见；我，私心成见。邵雍对此四种弊端，作了新的分析，认为：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则一，分而言之则二；合而言之则二，分而言之则四。始于有意，成于有我；有意然后有必，必生于意；有固然后有我，我生于固。意有心，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己也。^③

说“合而言之则一”，是指意、必、固、我均是同根生，乃认识主体的毛病，脱离实际，一根于有我之私。“分而言之则二”，是说关键在于有意、有我。有意乃有必，有固出于有我。“分而言之则四”，是说意则生必，必则生固，固则生我。正确的原则当是对于物理人情，无容有心，随物而化，不知有我，天人之际，冥而为一。

邵雍指出：“物理之学，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失理而入术矣。”^④这是说如果泛观物理，缺乏至诚专精功夫，物理多有难通者；若强求通，只能是主观臆断，那是有我。认识物理而专凭私心成见，就不能认识物理，只能流于机巧法术，信口雌黄。邵雍认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圣人之性也。苟不知而强之，非情而何？失性而

^① 《观物外篇》第十二。

^② 《论语·子罕》。

情，则众人矣。”^① 圣人的特性是纯任物理之自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决不将主观成见强加于物；普通民众则不然，多任私情，脱离物理，强不知以为知，任情妄为，自欺欺人而已。

其次，邵雍卓有见识，提出“以物观物”的认识原则。主张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能含有主观成见。他说：“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② 在邵雍看来，“以物观物”，同“以我观物”，是截然相反的两条认识路线，两种认识原则。“以物观物”就会“公而明”，不杂私意，明白畅通；反之，“以我观物”，就会“偏而暗”，受主观情意左右，不会公平正直，自然昏庸糊涂。这一观点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公生明，偏生暗”的观点，来自《荀子》，邵雍用来说明“以物观物”和“以我观物”的认识结果，深化了人们对两条认识路线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主观意识同客观存在的关系。把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在邵雍眼里，圣人能够“以物观物”，常能做到“公而明”；平庸的人只会“以我观物”，夹杂着私心成见，总不免“偏而暗”。他大力提倡“以物观物”，极力反对“以我观物”，十分重视在我之外的客观实在，探求物理之学应从客观实在出发，而不能夹杂私心成见。这才能真正达到“勿意、勿我”。

邵雍提出一个认识论上的新概念，叫做“反观”，就是指“以物观物”，“不以我观物”的认识过程。他说：

^① 《观物外篇》第十二。

^② 《观物外篇》第十。

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①

邵雍所说的“反观”，类似“反映”的意识，指对于认识的对象，客观事物，要像镜子和水那样，清清楚楚，原原本本，丝毫不爽地如实反映出来，不夹杂一丝一毫主观的东西于其间。本来人们会觉得镜子和水最能不杂私意反映外物了，但邵雍认为人的反映外物，比镜子和水更高明，因为镜子和水只能反照出事物的外表，而不能反照出事物内部隐藏的特性；圣人观物则不然，不只能反映事物的外表特征，更能反映事物的内在特性。所以邵雍用“反观”的概念，使人的反映同镜和水的反映有所区别。他说：

夫鉴之所以能为明者，谓其不隐万物之形也；虽然，鉴之能不隐万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万物之形也。虽然，水之能一万物之形，又未若圣人能一万物之情也。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②

邵雍所说的“反观”，不是某种“神秘的反思”，也不是指“精神的自己反观”，只是表明圣人具有的观照万物的能力，与

^① 《观物内篇》之十二。

^② 《观物外篇》之十二。

镜和水映照外物有本质区别，不只映照万物之形，而能观照万物内在的特性，并且不夹杂关照者的主观成见，不致于“有我于其间”。

第三，“反观”过程的基本特点，是“观之以心”。“观之以心”，是强调人的理性认识的作用，同“观之以目”的感性认识相区别。《观物内篇》写道：“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① 观物方法，如果只是“观之以目”，那就会同镜与水映物差不多，只照见其外表特征，而不及其内在特性；“观之以心”，是用人的理性思维器官，进行综合与分析，由事物的表面，深入到事物的内部。邵雍认为“观之以心”，实际上是“观之以理”。所谓“观之以理”，是指人的理性认识活动，有一定理论、原理、原则为指导。理性认识活动的特点，就在于不纯粹凭人的头脑去冥思苦想，而有“理”作指导。人掌握的“理”越深入全面，他的“心”就越加透彻、明亮，在观照事物时，就能深入内部，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掌握它的客观规律性。“心”是人人具有的，为什么有的能“明理”，有的不能“明理”？区别在于能否“观之以理”。“观之以理”，正是“观之以心”的关键问题。邵雍的论述是有道理的。

总之，邵雍所论述的“观物”原理，特别是“反观”方法，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强调认识事物要从客观外物出发，“以物观物”，而不能“以我观物”，即不要加入主观的成分；第二，不能单纯“观之以目”，那就会同鉴与水照物无差

^① 《观物内篇》之十二。

别了，应当超越感觉，强调理性认识的作用，即“观之以心”，从观照事物之“形”，进而认识事物之“情”；第三，人心虽一，人性各别，单凭“观之以心”，还不能区别认识的高下、深浅、真伪，还要“观之以理”，认识事物的理论指导不同，才是认识不同的根本原因。邵雍言简意赅，基本上说清楚了人们在认识事物过程中所应注意的问题。在传统哲学认识论中，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可能有人认为邵雍主张“观之以心”，是一种唯心主义认识论。这种怀疑不符合邵雍反对“以我观物”的本意，邵雍恰巧是在反对“以我观物”的前提下，强调“观之以心”的，可见其“观之以心”，不认同“以我观物”的唯心主义认识原则等同。邵雍强调“观之以心”，并不是说要把“心”中的先验形式强加于物，“观之以心”是同“观之以目”相对而言的。只是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区别，而不是唯心、唯物两种认识原则的区别。

在邵雍的认识论中，除了“观之以心”容易引起误会外，他在《乐物吟》中的一个观点，同样容易引起误解。其诗云：“物有声色气味，人有耳目口鼻。万物于人一身，反观莫不全备。”^①此诗并非论述认识原则，只是描述人为万物之灵，万物所有的声色气味等特性，无不可以为人“反观”而认识之。这只是说万物的特点，人都能反映、反观，并不是说万物由人心所创造，不是说离开人心万物都不存在了。把邵雍的“反观”论，看作唯心主义的“反思”，有欠公允。

^① 《击壤集》卷十九。

三、观物明理 即象见意

邵雍将“因物”与“任我”对立，在认识过程中，强调“因物”，反对“任我”。“因物”指从客观事物的实际出发，“任我”，指从主观意志出发。他说：“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① 认识的目的在揭示物之理，坚持“因物”原则，十分重要。只有“因物”之理而穷之，才能不为“情”所蔽，掌握物之特性，而融会贯通，达到神明境界。

邵雍认为只有善于“观物”，才能“尽天地万物之道”。老子主张“道法自然”，是坚持“因物”、“观物”原则的典范。所以他说：“老子，知《易》之体者也，五千言大抵明物理。”^② 老子的哲学思想，无非明物理，尽人情，如《易》理一样，乃仰视俯察、远法近取而来。反之，人若不能“因物”、“观物”，则不能烛理。“人而无学，则不能烛理；不能烛理，则固执而不通。”^③ 人不学习，不接触外物，不“因物”穷理，只能固执己见而难通人情物理。

邵雍十分推崇《周易》倡导的“穷理尽性”原则。明“物之理”，知“天之性”，才能通达大道。他说：

《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以谓之

① 《观物外篇》第十二。

② 《观物外篇》第十二。

③ 《观物外篇》第十二。

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谓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谓之命者，处理性者也；所以能处理性者，非道而何？^①

这是说物理、天性，均客观存在，原于自然，无非阴阳刚柔感应变化之道。人为万物之灵，善于观物、因物，穷之而理无不贯，尽之而性无不全，故能以一观万而明乎天地之造化。故邵雍云：“天地万物之道，尽之于人矣。人能知天地万物之道。”^② 邵雍论述了天地万物之道的统一性，他说：“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③ 道指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本源（太极），它不能独立存在，寓于天地万物之中；天地万物为道之衍化，不能离物而穷理，不能离天地万物而求道。在《易》学思想体系中，道即指太极，它是万物之根本，两仪、四象、八卦以至于万物，均由太极化生。太极无本，托之于阴阳刚柔，衍之为宇宙万物。而阴阳刚柔之道，即物之理，尽之于人。观物以求理，是人的特性，人又只能通过观物，才能求得“物之理”，是物对人的限制。离开“观物”原则而欲求理，只是“任我”，非物之理也。邵雍撰《观物内篇》，着重论述了天地万物之理，及人“观物”穷理的要旨。明人黄畿《皇极经世书·注》云：“《观物内篇》，凡十二。自一之六，言天地万物之理，悉体备于人；明圣人以经法天，权变

① 《观物内篇》之三。

② 《观物内篇》之三。

③ 《观物内篇》之三。

存焉。七之十二，即圣之权变，而归之正道；终推其数，亦不外于理也。夫理与数，经世之原也。”^① 这是说，《观物篇》不止是引导人们如何“观物”以穷天地万物之理，而且更注重正确地运用理以通权达变。先天学是讲推数的，推数的目的亦在通理，“观物”的主旨正在于掌握数与理，以为经世的准则。

邵雍反对背离“观物”原则，一味“任我”以论物。他说：“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别有天地万物，异乎此天地万物。’则吾不得而知之也。非唯吾不得而知之，圣人亦不得而知之也。”^② 说吾不得而知之，是表明未经过我的“观物”过程，未能获得关于外物的知识，我不可妄下结论；说圣人亦不得而知之，是表明无论何人，若不经过“因物”、“观物”的认识活动，都不可能获得关于外物的知识。观物明理，这是一条普遍法则，谁也不能违背。

到此，人们必定会提出一个问题，邵雍讲的是先天象数之学，这儿所强调的“因物”、“观物”，又同象和数有何联系？邵雍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可说是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主张太极及其象数为天地万物之本，“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③。识其象数就可以“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④。另一方面，他又主张通过“观物”的原则以求物理，认为理是“物之

^① 《观物内篇》之十二。

^② 《观物内篇》之二。

^③ 《观物外篇》第十一。

^④ 《观物内篇》之二。

理”，不能独立存在，应当“因物”而求之，不可“任我”。为了调和这一矛盾，邵雍提出“即象见意”的主张。即通过象数寻求义理。他说：

君子于《易》，玩象、玩数、玩辞、玩意。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数。象生则言彰，言彰则意显。象数则筌蹄也；言意则鱼兔也。得鱼兔而忘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鱼兔，则未见其得也。^①

邵雍同王弼不同，王弼主张“得意而忘象”，排斥象数；邵雍主张“即象见意”，通过象数以求言意，反对脱离象数以求言之意，认为那样不可能得到言之意。“即象见意”，也就是即象求理，认为这同“观物”求理不相矛盾。他把“即象”看作是“观物”的一种途径。因为物的规定性是由象与数决定的。象和数只是物的抽象。观象明理与观物明理具有同等价值。观象与观物都是明理的途径，只是略有侧重而已。他说：“室中造车，天下可行，轨辙合故也。苟顺义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② 这是表明，闭室造车，只要遵循共通的度数，就可与天下之轨辙相合；做事只要循理，自然合人情。日月所照之地，一理可以通行，只要其理合于度数。这种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观点，尽管合乎常识，但却忘了造车时所依据的度数，绝不是主观规定的，而是车及轨的客观

^① 《观物外篇》第六。

^② 《观物外篇》第十二。

度数在人脑中的反映。所依据的象数，从客观事物中抽出来的，才具有普遍有效性。依照胡乱的度数造出的车，肯定不会出门合辙。也就是说先验的象数，未必合于客观事物之理。在这里，邵雍思想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邵雍的思维发展路向是：“理”，是万事万物的概念化，“理”本身又是先天易学的符号——象数的表现。根据这些象数符号就可以弄清万事万物之“理”。他虽然竭力反对“以我观物”，主张“以物观物”而求物理，实质上还是把先天象数放在首位，“即象见意”，就是通过先天象数去认识事物的意理。是先验决定论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披上了貌似从客观事物出发的外衣。仿佛这种认识路线是符合科学思维路径的，具有更大的迷惑性。邵雍用千言万语强调“以物观物”，反对“以我观物”，当其将“物”落脚到“先天象数”的思想体系时，其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就露出了端倪。因此，当我们评判他的认识论的性质时，不能只看到他用“以物观物”同“以我观物”相对立的巧妙言词，还应深入思考他关于“物”的来源及演化的依据，物之理究竟是客观的东西还是主观的东西。单纯看提出的“即象见意”的观点是不错的；殊不知他所说的“象”，根本不是客观的物象，而是主观的卦象。先天易学是主张观察天地万物，必须从先天卦象出发的。邵雍倡导的先天象数决定论，较之儒家的天命决定论，佛教的因果轮回论有很大不同，要精巧得多。只有追索到他所说的宇宙万物的本源，他所说的“太极”及其所衍化的神、数、象的实质，才能更清楚地看出他的认识论的路线及性质。邵雍开创的先天学，是一套精致的“易外别传”的象数演化体系，是一套“别开生面”的易学中的“数”学体系。这套体系的

确是前无古人的，纯粹由邵雍自出心裁构造出来。在构造这一别致的易学体系时，充分展示了邵雍的抽象思维的才干，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他作了异乎寻常的分析，丰富了人们的哲学思维方法，推进了易学思想的境界，开创了颇有影响的象数学体系。可是这套易学数理学体系，毕竟不是从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只是一种纯粹的易学数理推衍，其根基是极不牢固的。它只能是生长在人类认识发展的大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尽管它十分鲜艳而令人倾倒，在中国易学史上，可说是“阳春白雪”，而和者盖寡，中国思想史上认真研究这一思想体系的人难怪并不多见。邵雍的先天易学在思想史上虽有一定影响，可想而知，并不很大。

第十二章 《皇极经世》 的思维方法

邵雍的《皇极经世》称得上思想史上罕见之伟构。它玄思宇宙，综览世界，通观历史，有一套独特的思维方法。它关于宇宙的结构、世界的变化、历史的年表等种种结论，未必有普遍的科学价值，但其所运用的思维方法，却包含着某些可取的合理内容。其结论大多是臆测的，只具有昙花一现的短暂生命力；其思维方法不失为易学思维的升华，不可否认有其永恒的价值。邵雍的思想体系同他运用的思维方法，既是统一的，又存在很大的矛盾性。他所建立的先天象数学的思想体系，在思想史上未能产生重大影响；他所运用的思维方法的某些特征，今天看来，仍有重要启迪作用，称邵雍为宏观结构思维法的先驱，我看是不为过分的。

一、关于宇宙结构的创造性探索

中国思想史上，玄思宇宙的先哲，大有人在。他们大多把思维的焦点放在宇宙构成的要素上，很少探讨宇宙的结构与层次；做这种探索的哲人，不用说首推邵雍。古代科学家，探讨天体的构造与演化，曾经提出过诸种科学假说，如盖天说、宣夜说、浑天说等，这些假说都具有不同的科学价值，打上了历史的烙印，为人类探讨宇宙问题，奠定了前进的基石，他们的思维方法也是有价值的。邹衍在探讨地球的组成时，提出大九州说。邹衍称中国为赤县神州，内分九州。整个世界由如同神州一样大的九州组成，与神州内的九州有别，故称世界为大九州。大九州中的神州、台州、阳州、戎州等名称，不同于地理学上的名词，它只是在人们的观念中存在。大九州说将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境界提高一步，引导人们不可坐井观天，要想到州外有州，天外有天，中国虽大只不过大九州中的一个小部分。

邵雍在《皇极经世》中，一不详论天体结构，二不详述地球的组成，他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博大胸怀、江山气度，对宇宙的整体结构及其演化过程，作了宏观的透视，层次的剖析。这种结构剖析方法，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邵雍关于宇宙生成模式、整体结构的剖析，既阐发了《易传》中的一些观点，同时又提出了许多创造性假说，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首先，第一次提出东方宇宙模型论。邵雍根据独具东方思维特色的易学象数思维模式，提出了独创性的宇宙发生论。

《观物外篇》描绘道：

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上交于阴，阴下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少，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①

表面看来，这同《易传》的宇宙发生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成大业（万物）的描述基本相似。其实不尽然。邵雍提出“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两个观念，这就同《易传》相区别。所谓天之四象、地之四象，都有其具体内容。

其次，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宇宙发生层次论。邵雍以为宇宙万物生成的基本动因，在于内部的一阴一阳。他说：“阴阳相生也，体性相须也。是以阳去则阴竭，阴尽则阳灭。阴对阳为二。然阳来则生，阳去则死。”^② 又云：“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唱。阳知其始，而享其成，阴效其法，而终其劳。”^③ 这里反复申述了一个基本原理，太极分化为两仪，两仪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缺一不可。阳主始，阴主成，二者紧密结

^① 《观物外篇》第二。

^② 《观物外篇》第一。

^③ 《观物外篇》第一。

合，构成宇宙万物。失去一方则宇宙万物都不能生存。两仪并存，是宇宙发生论的第一层次。

邵雍认为，两仪即天与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天分阴阳，地分刚柔，由此奠定宇宙发生论的第二层次。阴、阳、刚、柔，是为四象，同《易传》所谓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四象的观念有所区别。

邵雍认为天与地，各分为四，即“天之四象”，阳中阳，阳中阴，阴中阳，阴中阴；“地之四体”，柔中柔，柔中刚，刚中柔，刚中刚。天之四象与地之四体，各有本质属相，由此确立宇宙发生论的第三层次，具体说来有如下规定：

阳中阳，日也；阳中阴，月也；阴中阳，星也；
阴中阴，辰也。柔中柔，水也，柔中刚，火也；刚
中柔，土也；刚中刚，石也。夫四象若错综而用之，
日月，天之阴阳；水火，地之阴阳；星辰，天之刚
柔；土石，地之刚柔。^①

由此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八象，错综为用，乃产生无限多样性的宇宙万物。

邵雍还论述了宇宙发生论的第四层次。“二仪生天地之类，四象定天地之体。四象生日月之类，八卦定日月之体。八卦生万物之类，重卦定万物之体。类者生之序也，体者象之

^① 《观物外篇》第一。

交也。推类者必本乎生，观体者必由乎象。”^①又说：“阴伏阳而形质生，阳伏阴而性情生。是阳生阴，阴生阳，阳克阴，阴克阳。”^②这就是说：八卦（即八象）只生万物之类，重卦（六十四卦）才能定万物之体。而万物不止有种类的区别，而其个体的形质、性情也是各不相同的，均由阴阳生克的错综关系所决定。具体说来，基本情况如下：

日为暑，月为寒，星为昼，辰为夜，寒暑昼夜交而天之变尽之矣。水为雨，火为风，土为露，石为雷，雨风露雷交而地之化尽之矣。暑变物之性，寒变物之情，昼变物之形，夜变物之体，性情形体交而动植之感尽之矣；雨化物之走，风化物之飞，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飞草木交而动植之应尽之矣。^③

由“天之四象”日月星辰而有寒暑昼夜之变，由“地之四体”水火土石而有雨风露雷之化。由寒暑昼夜变物之性情形体，由风雨露雷而化物之走飞草木。性情形体与走飞草木相互感应，决定千变万化无限多样的动植物，人亦包含其中，乃动物之最灵者。

不难看出，邵雍的思维方法，具有鲜明的层次观念。宇宙万物的发生过程，存在有序而不可超越的层次，由太极而

① 《观物外篇》第十。

② 《观物外篇》第一。

③ 《观物内篇》之一。

两仪，由两仪而四象，由四象而八卦，由八卦而重卦六十四，再进而衍化为千差万别的动物、植物的个体；“体”虽千差万别，又莫不归属一定的“类”。这一层次分明的思维方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易学史上都是罕见的，不能不承认这是邵雍发展《易传》原理而提出的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方法。在中国思想史上，宋明以前，关于万物发生存在层次性的观念，从来是不明显的，只是在中国药物学上讲药物分类时，对“类”的观念有所发展，但并未涉及不同物类的发生有某种层次。传统医学中，讲疾病的传变，有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思想，这是涉及由量的积累到质的转变问题，与事物发生的层次观念，是不尽相同的。邵雍的《观物篇》，可说是明显地阐发了宇宙万物发生发展的不同层次问题，尽管这一理论纯粹由逻辑推演而来，不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科学考察的基础上，但它对宋明以后思想家的启迪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所列《引据古今经史百家书目》中，有《邵尧夫集》，他关于药物种属分类的方法，首先将药物分部，部下立类，类下分族，族中分个体，这一思想是否受到邵雍“类”、“体”思想的启发，值得研究。

二、万物皆变的变易观

天道有消长，地道有险夷；
人道有兴废，物道有盛衰。^①

^① 《击壤集》卷十《四道吟》。

物盛物衰随气候，人荣人瘁逐推移。
天边新月有时待，水上落花何处追？^①

这是邵雍《击壤集》中的两首哲理诗，抒发了作者对天地人物不断消长、兴衰的感慨，其中也透露了宇宙万物随时变化的自然观，这是邵雍阐发“阴阳相推而生变化”的易理得出的结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处在变动不居的过程中。《观物内篇》之四云：“道德功力，存乎体者也；化教劝率，存乎用者也，体用之间，有变存焉者。”

为什么事物会发生变化呢？邵雍认为事物之中都存在阴阳对立的两极，有阴阳对立就有消长、变化。《川上怀旧》说：“为今日之山，是昔日之原；为今日之原，是昔日之山。山川尚如此，人事宜信然。”^② 事物因阴阳推移而生变化，发展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向相反方向转化，所以说：“人盛必有衰，物生必有死。”^③ 是人们应有的常识，蕴含着“物极必反”的哲理。按照这种观点来看待宇宙万物的阴阳消长变化，是邵雍在《皇极经世》中普遍运用的思想方法。

邵雍特别诠释了《易传》“神无方而易无体”的原理。他说：“神者，《易》之主也，所以无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无体。神无方而易无体，滞于一方则不能变化，非神也；有定体则不能变通，非易也。”^④ 邵雍进而根据有消长则有终始

① 《击壤集》卷二十《首尾吟》。

② 《击壤集》卷三。

③ 《击壤集》卷十八《人物吟》。

④ 《观物外篇》第六。

的原理，得出了天地有终始的大胆结论，他说：“《易》之数，穷天地终始。或曰：天地亦有始终乎？曰：既有消长，岂无始终。天地虽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①

邵雍坚持“人道有兴废，物道有盛衰”的原则，主张人们对待一切事物应有权变态度，不可执泥不化。他说：

变从时而便天下之事，不失礼之大经；变从时而顺天下之理，不失义之大权者，君子之道也。^②

由于“时有消长，事有因革”，不可执经而无权。邵雍发挥孔子的权变观，指出：

时有消长，事有因革，非圣人无以尽之。所以仲尼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是知千万世之时，千万世之经，岂可画地而轻言哉！^③

为人处世，固然不可不守常道（执“经”），可是事物总是在变化中，固守常道往往不足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必须因时制宜，灵活应变，这就是执“权”。既不失大经，亦能执大权，这才是善于因时制变的能手，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所以邵雍指出人们应当有应变思维。他说：

^① 《观物外篇》第九。

^② 《观物外篇》第六。

^③ 《观物内篇》之十。

自帝尧至于今，上下三千余年，前后百有余世，书传可明纪者，四海之内，九州之间，或合或离，或治或隳，或强或羸，或倡或随，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风俗者。吁！古者谓三十年为一世，岂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浃，民之情始可一变矣。^①

这是说，时势变化，三十年为一世，不可能兼世而一其风俗。俗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黄河也会改道，况人事变化日繁，岂可固守常道！邵雍引用《周易》卦象加以说明，指出：“皇帝王伯者，圣人之时也；《易》、《诗》、《书》、《春秋》者，圣人之经也。时有消长，经有因革。时有消长，否、泰尽之矣；经有因革，损、益尽之矣。否泰尽而体用分，损益尽而心迹判。圣人之事业，于是乎备矣。”^② 这是说，从“时”上看，否为消，泰为长，阴阳之消长可见；从“经”上说，益则为因，损则为革，礼乐之污隆可辩。事在于权，业在于变，圣人因时，通权达变，乃可崇德而广业。所以说：“三皇同仁而异化，五帝同礼而异教，三王同义而异劝，五伯同智而异率。”^③ 邵雍坚持执常应变，通经行权，反对泥古不化，因循故道，要求人们在变动不居的世事面前，树立应变思维方法，摆脱“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这一思维方法，浸透在《皇极经世》的字里行间，对于

① 《观物内篇》之十。

② 《观物内篇》之五。

③ 《观物内篇》之四。

中国古代思维方法的发展，有其一定的进步作用。如果对邵雍思想的这一方面不作恰当评价，是欠公允的。反之，如果只看到这一方面，而看不见他思想的形而上学归宿，同样是欠明智的。

三、“四块八段以为《易》” 的形而上学锢疾

邵雍的《皇极经世》显示了一些辩证思维方法，这可说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向上发展，自然科学有较大进步，人们对宇宙的认识有所提高的反映；那时学者们还注意汲取佛教生住异灭思想和道教的宇宙生成学说。在这种思想情况下邵雍对《易》学思想有所发展，是不足为奇的。朱熹对此曾有中肯的评价，他说：“康节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心只管往那上面转，久之理透，想得一举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过到二之半时，便烦恼了，盖已渐趋于衰也。谓如见花方蓓蕾，则知其将盛；既开，则知其将衰；其理不过如此。谓如今日戌时，从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从此推下去，至人消物尽之时。盖理在数内，数又在理内。康节是他见得一个盛衰消长之理，故能知之。”^①

可是邵雍的思维方法，存在一个无可医治的形而上学锢疾。他的思想是始终围绕先天图打圈子的。先天图的基本构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

成原素就是象和数。他可以依据纯粹的象和数，通过逻辑推演，显现出自然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层次性。这种逻辑推演方法，同客观的辩证法、科学的辩证思维相去甚远。他所构造的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封闭体系。在构造这一体系时，尽管用尽心思，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但毕竟是一个主观臆造的思维产物，远不是客观世界多样性的反映。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他如何整齐地设定动植物界的多样性。他写道：

走之性善耳，飞之性善目，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情善耳，飞之情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飞之形善目，草之形善口，木之形善鼻。走之体善耳，飞之体善目，草之体善口，木之体善鼻。^①

很明显，这简直就是以走飞草木为纲，以性情形体为目，以耳目口鼻为属性，进行一种简单的三元组合。形式上十分周延，对照现实的客观事物，则无异文字游戏。什么“草之性善口”，“木之体善鼻”，这类判断，岂不是儿童梦呓。其形而上学象数推演的可悲性，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看一看他关于皇帝王伯与士农工商的关系的格局，更令人啼笑皆非。他写道：

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农也；皇王

^① 《观物内篇》之一。

民者，士工也；皇伯民者，士商也。帝皇民者，农士也；帝帝民者，农农也；帝王民者，农工也；帝伯民者，农商也；王皇民者，工士也；王帝民者，工农也；王王民者，工工也；王伯民者，工商也；伯皇民者，商士也；伯帝民者，商农也；伯王农者，商工也；伯伯民者，商商也。^①

仿此，尚有以飞走木草与性情形体相组合，而有所谓“飞飞物者，性性也；飞走物者，性情也”等等判断；尚有以士农工商与仁义理智相组合，得出所谓“士士民者，仁仁也；士农民者，仁礼也”等等判断，这些判断显然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可言，而就其组合的形式而言，恐怕一个了解九九乘法表构造的小学生，也可以填写出一张相应的表格来，哪有什么哲学意味！

再看邵雍将皇帝王伯同《易》、《书》、《诗》、《春秋》四部经典的价值相联系，本来已够牵强，进而将四部经典同四季生长收藏的农事特点相联系，力图推演出其中的奥秘，用力愈多，结果愈荒唐。《观物内篇》之四写道：

观春则知《易》之所存乎？观夏则知《书》之所存乎？观秋则知《诗》之所存乎？观冬则知《春秋》之所存乎？《易》之《易》者，生生之谓也；《易》之《书》者，生长之谓也；《易》之《诗》者，生收之谓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谓也。

^① 《观物内篇》之十二。

《书》之《易》者，长生之谓也；《书》之《书》者，长长之谓也；《书》之《诗》者，长收之谓也；《书》之《春秋》者，长藏之谓也。《诗》之《易》者，收生之谓也；《诗》之《书》者，收长之谓也；《诗》之《诗》者，收收之谓也；《诗》之《春秋》者，收藏之谓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谓也；《春秋》之《书》者，藏长之谓也；《春秋》之《诗》者，藏收之谓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谓也。

不难看出，邵雍一贯坚持的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用来论述飞走草木的关系，论述皇帝王伯的关系，论述《易》、《书》、《诗》、《春秋》的关系，都只能徒具形式上的组合关系，丝毫也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它们之间的思想内涵，完全不能将人们的思想认识引向深入，更不用说酝酿出新的思想。这是将象数思维引向形式化而产生的悲剧。

邵雍还按象数思维法则，提出所谓“体数”、“用数”、“变数”、“化数”、“通数”等概念。《观物内篇》之十一论述五者之间的关系，而预测出动植物通数的绝对数目，写道：

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体数，一百六十；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体数一百九十二。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用数，一百二十；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用数，一百五十二。以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用数，唱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用数，是谓日月星辰之“变数”；以太阴、少阴、太柔、

少柔之用数，和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用数，是谓水火土石之“化数”。日月星辰之变数，一万七千二十四，谓之“动数”；水火土石之化数，一万七千二十四，谓之“植数”。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变化通数，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六，谓之“动植通数”。

表面看来，这里的体数、用数，或相“唱”，或相“和”，从而产生变数、化数、通数，仿佛是有根据，有定数的，呈现一种科学描述形态。实际上，这些独创的概念，主观设定的定量，以及纯逻辑推演而来的变数、化数、通数，对于人们揭示大自然的奥秘，掌握地球上动物、植物的种类与总数，是没有参考价值的。它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方法，有着本质区别。要想通过这类形而上学象数推演方法去发展、丰富人们的科学认识，只能是缘木求鱼。他的这种思维方法，认为动物只有飞走二类，植物只有草木二类，地球上的一切动植物，都逃不出飞走草木四大类，水里的动物同陆上动物总归为一类，“在水之鳞，飞之类也，龟獭之类，走之类也”。从而臆造出所谓“走木之物”，“草飞之物”等等，说什么“虎豹之毛，犹草也；鹰鹯之羽，犹木也”；“虫者，风之族也”，“禽虫之卵，果谷之类也”，“谷之类多子，虫之类亦然”^①。这种简单的类比，亦多不尽情理。

邵雍按其先天象数学框架，逻辑推演宇宙万物生成过程及进行形式分类的思维方法，暴露出形而上学方法的极大局

^① 《观物外篇》第十。

限性，脱离了《易传》坚持的“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的辩证思维法则。朱熹称它为“易外别传”。王夫之则予以严厉批评。他说：“故《周易》者，准天地之神以御象数，而不但以象数测已然之迹者也。后之为《易》者，如卦气，如游魂、归魂、世应，如纳甲、纳音，如乾一兑二，方圆整齐之象，皆立体以限易，而域于其方，虽亦隅之理所或有，而求以效无方之神，难矣哉！”^① 这里点明的“乾一兑二”，即指邵雍坚持的先天八卦图，主要错误在于用“方圆整齐之象，立体以限易”，违背了“神无方而易无体”的易学原理。王夫之正确地指出，科学地认识世界，应当实事求是，以不断变化着的客观事物为依据，他说：“读《易》者所当唯变所适，以善体其屡迁之道。”这是因为：“上下阴阳之消长升降也无常，则变动不可测矣。……易之为道本如是。以体天道，以尽物理，以日新而富有，故占者、学者不可执一凝滞之法，如后世京房、邵子之说，以为之典要。”^② 宇宙万物的生成与变化，各遵循一定规律，决非千篇一律，人们的认识只能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强制客观事物服从主观设定的框架。邵雍用以规范事物的先天象数框架，并非从客观事物中概括而来，纯粹是一种主观的构想，所以四块八段构造得十分整齐。正如王夫之所批评的，这样整齐划一的思想模式，只能为江湖术士们欺人方术开方便之门。他写道：“邵子之图，如织如绘，如钉如砌，以意计揣度，域大化于规圆矩方之中。……疏节阔目，一覽而尽天地之设施，圣人之所不敢言，而言之如数家珍。此术

^① 《周易内传·系辞上》第四章。

^② 《周易内传·系辞下》第八章。

数家举万事万理而归之前定，使人无惧而听其自始自终之术也。”^① 王夫之的批评是中肯的。邵雍根据先天八卦图，衍伸出六十四卦方图与圆图，列次序，列方位，矩而方之，规而圆之，四块八段，排比整齐，于科学认识无补，对术数小人宣扬宿命论的江湖骗术则有用，形而上学思维方法，难免同唯心主义神学合流，于此可见一斑。

邵雍的易学着重发挥了象数学中的数学思维，认为数的概念是不变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可以分为二，却不能自身包含二，从而导出“破作两片”的形而上学宇宙结构论。当两片四分之后，成为固定思维模式，四块一组所构成的整齐体系，不得不闹出以上所谓“草之体善口，木之体善鼻”；“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农也”；“《易》之《易》者，生生之谓也；《易》之《书》者，生长之谓也”，等等近乎文字游戏的判断，正如王夫之所说的那些“如织如绘，如订如砌”的结构图式，完全不能用以规范生生日新之“大化”。不言而喻，邵雍在《皇极经世》中曾经闪现过的某些运动变化思想，终归被其庞大细密的形而上学宇宙结构论所窒息。本来以邵雍的聪明智慧，渊博知识，在思想史上可以作出更有启发性的理论贡献。由于他不能跳出自己设定的这种思维模式，其创造性思维不可避免地遭到强有力的束缚，只落得“牯牛掉进深井里”的悲剧。这一思想悲剧的意义，只在为那些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妄图主观构造宇宙结构图式者，提供一个发人深思的前车之鉴。

^① 《周易内传发例》。

第十三章 邵雍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一、邵雍的历史贡献

邵雍留下的思想资料，只有 10 多万字。在中国思想史上，却作出了三方面重要贡献：一、阐发新的宇宙本体论；二、开创先天象数学；三、创立新的自然史观和社会史观。

邵雍继承并发展《周易》的太极思想，阐发太极、阴阳、神化原理，论定太极为宇宙本体。他用太极的自我运动，解释宇宙万物的化生。他说：“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此种观点，原于《周易》，超越《周易》。他又说：“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意思是说，太极为一，是宇宙万物的唯一本源，它化生万物。邵雍进一

步论述了宇宙万物演化的具体过程和转化周期。邵雍阐述的宇宙本体学说，丰富和充实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本体论，为朱熹论述“理一分殊”原理，创造了思想前提。

邵雍是一位易学家。他对易学发展的贡献，在根据陈抟传下的先天太极图，创立先天易学思想体系。他绕开《周易》的卦爻辞和《易传》的思想原理，绘制了“先天四图”，即《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他运用“先天四图”的象数图式，进行逻辑推演，把丰富多样的“天地万物之理”，整合为整齐划一的象数序列，以之“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邵雍创立的先天易学思想体系，“包括宇宙，终始今古”，纯属唯心主义框架，却包含着与《周易》大不相同的象数思维模式。特别是《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构思奇妙，符合近代数学原理，经得住二进位制数学的检验，尽管事属巧合，毕竟令人折服。以先天象数学为契机，引发宋代图书学的昌盛，从而恢复了象数易学传统，打破了长期以来偏重义理易学的局面，开辟了义理易学同象数易学并驾齐驱的易学发展新时期。

邵雍生活的时代，历史学相当兴盛，《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历史巨著，相继编撰问世，激发史学理论的创新。邵雍以先天易学解释自然史和社会史，展示其新的历史观。为显示先天易学“弥纶天地，出入造化”的功能，邵雍别出心裁，提出“元会运世”自然发展史，编撰了世界历史年谱，畅论阴阳消长的节律，主宰天地万物的产生及其消灭的周期。为显示先天易学“进退古今，表里人物”的价值，邵雍提出中国历史演变的“皇帝王伯”四阶段说，打破王朝史体系，按四阶段递嬗原理，别开生面编撰了中国历史年鉴。邵雍

的社会演化学说,属于唯心史观。他从历史演变角度,突出王道与霸道,无为与有为,尚义与重利,两条政治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是有意义的。客观上为宋代理学家同事功派之间展开的王霸、义利、理欲之辩,打开了思想闸门。

博学精思的邵雍,在本体论、象数论、历史观诸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理论贡献,《宋史·道学传》将他列入北宋道学五子之一肯定他在哲学上的贡献;朱熹撰《伊洛渊源录》,尊他为宋代理学的先驱,充分肯定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诚属功在必得。

二、后世对邵雍思想的评价

邵雍的人品德行在历史上可说是受到一致推崇。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等政治上的显赫人物同他交情深厚,多方恭维;他虽不同意新政,但王安石对他仍有好的印象;欧阳修对他亦表敬重。在思想界、哲学界,张载、程颢、程颐等把他视为尊长,乐于同他交流学术思想,从生活上对他十分关心,邵雍对这些晚辈学者也十分器重,寄以深切期望。下层民众对邵雍的景仰自不待言。

对于邵雍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先天象数学,历史上的评价则颇有分歧。作全面肯定评价的有朱熹、胡安国、蔡元定、张行成、黄畿等学者,他们的评价得到康熙帝的认可。对之作否定性评价的主要是程颢、王夫之、黄宗羲等思想家,影响到清代乾嘉学派。

(一) 抑之者谓之“空中楼阁”

邵雍的象数学思想在生前并非为人普遍接受,最敬重他的晚辈学者二程兄弟就不大感兴趣。他们肯定邵雍讲的“内圣外王之道”那部分思想,却认为象数易学部分不切实际,“邵尧夫犹空中楼阁”^①。程颢对他的学生说:“昨从尧夫先生游,听其议论,振古之豪杰也;惜其无所用于世。”^②程颐也说:“邵尧夫数法出于李挺之,至尧夫推数方及理。”但因程颐主张“有理而后有数”,故邵雍讲理的主张仍遭其非议,说邵雍的象数学思想“无所用于世”,即对于治理国家、安定社会、发展经济没有直接指导意义。书名称为“经世”,并不属于经世致用的学说,靠这种思想学说去维护封建统治是没有希望的。从经世致用的角度看来,邵雍虽然自以为他的思想足以观物经世,实际上多属空论,二程称它为“空中楼阁”,不无道理。人们的立足点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故评价不能不相左。二程是站在儒家政治伦理的立场上来评判邵雍的,完全忽视《皇极经世》在锻炼人的理论思维能力,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方面的意义。

在二程思想影响下,明清之际的一些思想家,由于对整个宋明理学持批判态度,故对邵雍先天易学思想贬之尤力。批判得最厉害的是王夫之,他在《周易内传发例》中,将其先天易学思想同汉代焦赣、京房易学等同看待,大张挞伐。主要观点是指斥邵雍易学违背周孔之道,乃“京焦之末流”,“释经之大

^① 《二程遗书》卷七。

^②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

蠹”。他写道：“邵康节阴用陈抟之小道而仿丹经，遂使‘天一生水’云云之遁辞，横行天下，人皆蒙心掩目奉之为理数，……是释经之大蠹，言道之荆棘也。”^① 在这一点上，邵雍是受冤枉的。“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观点，出自郑玄，意在建立河图十数与五行的关系，《皇极经世》中并未用河图十数去配五行，《皇极经世》通篇只讲水火土石，很少用五行观念。《宋元学案》转述了有人称邵雍乃“京焦之末流”的观点，全祖望有针对性地指出：“然康节之所以列圣门者，正不在此。”^② 黄宗羲在《易学象数论》中，写了五篇文章，从“历书”、“起运”、“卦气序”、“蓍法”、“致用”五个方面评析《皇极经世》的观点，基本上对之持否定态度。黄宗羲把邵雍的元会运世之说看作历法，并批评说：“康节之为此书，其意总括古今之历学，尽归于《易》。奈《易》之于历，本不相通；硬相牵合，所以其说愈烦，其法愈巧，终成一部鵠突历书，而不可用也。”^③ 现在看来，黄宗羲把《皇极经世》看作一部历书，这是一个大误会，元会运世之说，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宇宙衍化理论而已，用历法的原则去要求它，未免失之公允。黄宗羲的弟弟宗炎，沿乃兄思路，批评邵雍的《先天六十四卦方图》，写了《先天诸图辩》，认为“古人命名立意，有典有则，可观玩，可讽咏。今用横图方制为名号，亦觉俚俗鄙野，大非修辞立诚之旨，五百年来，诗张夏恬，令紫色蛙声夺玄黄钟鼓之席，推倒周公、孔子，压于其上；率天下之人而

^① 《周易稗疏》卷三。

^②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序录》。

^③ 《易学象数论·皇极经世论一》。

疑三圣人者，非二氏之徒，实儒者之徒也”^①。邵雍的易学属“易外别传”，是独创的易学体系，早已明确宣布为先天易学，不属于文王、孔子思想体系。说它是“推倒周公、孔子，压于其上”，这种批评是不可取的，不仅没有触及《皇极经世》的要害，更不应当的是忽视了它在易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二）尊之者谓其“学达性天”

邵雍思想及著作，在宋代就受到不少学者的推崇。邵雍逝世后，程颢为他写了墓志铭，表示尊敬。后10年，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欧阳修之子欧阳棐任太常博士，奏议请赐予谥号，朝廷称颂邵雍思想，议云：“其学纯一而不杂，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浑大，不见圭角，其自得深矣。”乃谥曰康节。到了南宋，邵氏思想大受朱熹赏识，其学乃行于世。朱熹写道：“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量，阴阳终始之变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②表明朱熹完全同意邵雍关于先天易学和后天易学的说法。所以朱子将邵雍所传的先天易学诸图列入《周易本义》，通行全国。朱熹赞赏邵雍所绘制的《先天六十四卦横图》与《圆图》，认为邵雍在图中所坚持的一分为二的法则，找到了阴阳二象形成八卦及六十四卦的本源，如此论易，有着“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他称赞《先天六十四卦圆图》说，“易之

^①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

^②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袁机仲书》。

心髓，全在此处”^①。这表明朱熹称邵雍易学为“易外别传”，正是因为他独创的先天图具有高度的逻辑性，在易学史上是一种独创体系，应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不能因其与传统的易学有区别就抹煞其文化价值。朱熹告诫他的学生说：“邵氏先天之说，则有推本伏羲画卦次第生生之妙，乃是易学之宗祖，尤不当率尔妄议。”^② 在《朱子语类》中有他同学生的一段对话：“问：程子谓康节‘空中楼阁’。曰：是‘四通八达’。方子录云：‘言得四通八达。’庄子比康节亦仿佛相似，然庄子见较高，气较豪。他是事事识得了，又却蹴踏着，以为不足为；康节略有规矩。然其诗云，‘宾朋莫怪无拘检，真乐攻心不奈何’，不知是何物攻他心？”^③ 朱子以“四通八达”四字称颂邵雍易学思想，的确比程子讥为“空中楼阁”的观点高明一筹。不以传统易学为标准去剪裁邵雍易学体系，着眼于邵子易学的独创性及其在易学思维发展中的作用，这才是一个哲学家观察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朱子将邵雍思想同庄子比较，更是跳出易学框架评述其思想特点。朱熹易学思想宗法二程，却能对邵子易学有同情理解，足见其学术思想的包容精神。难怪他与学生还有一段更精采的对话：

问：“近日学者有厌拘检，乐舒放；恶精详，喜简便者，皆欲慕邵尧夫之为人。”曰：“邵子这道理，岂易及哉！他腹里有这个学，能包括宇宙，终始古今，如何

^①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袁机仲书》。

^②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袁机仲书》。

^③ 《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

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个甚后敢如此！”因诵其诗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帝王伯大铺舒。”可谓人豪矣！^①

这段对话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邵雍的思想与为人，在朱熹时代曾有较广影响，为人敬慕；二是朱子评价邵雍思想的着眼点在于它“包括宇宙，终始古今”，“做得大，放得下”，堪称人豪。朱子的确是从玄思宇宙的博大胸襟角度来肯定邵雍思想气度的。故他将邵雍同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司马光合称北宋六先生。写了《六先生画像赞》，其《邵雍画像赞》云：

天挺人豪，英迈盖世。
驾风鞭霆，历览无际。
手探月窟，足掇天根。
闲中今古，醉里乾坤。^②

可以说历代评价邵雍者，朱熹的评价最高，有如异代知音。在朱熹之前，南宋高宗时期，早有二程后学胡安国（1074—1138）主张将邵雍同二程、张载列于文庙从祀孔子。^③明清时期，推崇邵雍思想者亦相继出现，明弘治年间，黄畿著《皇极经世传》，在其序言中称赞道：“邵子之学，其仲尼之学乎！仲尼之道，其伏羲之道乎！”清代国君康熙帝为了提倡新儒学，竭力表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

^② 见洛阳安乐窝村邵雍刻像石碑。

^③ 《道命录》卷三。

彰宋明理学创造者，曾应请为邵雍祠赐题匾额：“学达性天”四字。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三月廿日，钦差官员送御匾到洛，文武官员及乡绅跪迎于郊外，欢呼载道，旋将御匾悬挂于嵩店镇邵夫子祠。这是封建朝廷给予邵雍的极大荣耀。从此，邵雍思想乃以儒学正宗而发生影响，二程的敬重，朱子的推崇，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邵雍思想的不同评价，宋以来如此，至今犹然。原因在于他的易学思想体系，不同于《周易》原本。《周易》研究，自汉以来，存在两派六宗的分歧。魏晋以来，一直是义理派占主导地位，排斥象数派。象数派观点多为道教所因袭，常遭正统儒学的攻击。邵雍承袭陈抟以来的图书之学，有违儒学正宗，予人以口实。不过，邵雍始终善于处理儒道二者关系，骨子里欣赏道家与道教，因其更投合隐者的思想情调，故他 60 岁后常穿道服会见宾客，以示自己的身份。还有《道装吟》四首，诗中写道：“安车麈尾道衣装，里巷过从乃是常。闻说洞天多似此，吾乡殊不异仙乡。”^① 邵雍并非道士，却公然穿道服过里巷，这表明一种不平常的心态。因他又师从李之才，学得一套神秘数术，他又专门从事研究《周易》象数之学，所以人们自然将他同道家和道教相联系。邵雍当然明白儒与道的分界，自己又处处以儒者的思想相标榜，一则讲“经世”之学，一则讲“观物”之论，与人交则口不离孝悌忠信，仁义礼智，宣扬王道，贬斥霸道，稽礼周孔，宪彰文武，他还写了一篇劝世长诗《训世孝弟诗》共 10 首，“子孝亲兮弟敬哥，休残骨肉起风波，劬劳恩重须当报，手足深情要取和”；“子孝亲兮弟敬哥，怡声下气与谦

^① 《击壤集》卷十三。

和；难兄难弟名偏重，贤子贤孙贵自多。”^①诗中不少庸俗之言，却又表露了邵雍遵奉儒家伦常的另一心态。所以欧阳棐在奏议中特别指出：“（邵雍）虽深于象数，先见默识，未尝以自名也。其学纯一而不杂，居之而安，行之而成。”^②程颢在《康节先生墓志铭》中也强调“其学纯一不杂，与人言必依孝悌。乐道人之善，而未尝及其恶。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康熙在表彰邵雍“学达性天”时，郑重为其开脱。指出：“即如邵康节乃深明《易》理者。其所有占验，乃门人所记，非康节本旨。”^③《宋元学案·百源学案》在反映“或谓《皇极经世》只是京焦末流”时，亦当即为之辩解云：“然康节之可以列圣门者，正不在此。”^④这表明编者认为邵雍思想中不无瑕疵，而其主流是纯一不杂，符合儒学正统的。关于邵雍同数术的关系，有待另作论述。

① 见《古共邵氏宗谱》卷六。

② 见《古共邵氏宗谱》卷六。

③ 《谕王道化》。

④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序录》。

结束语

写完邵雍评传，这位思想家的形象，时时浮现眼前，令我夜不成寐。我研究中国哲学四十年，神交古人不下一百。邵雍的确与众不同。他的身上，综合着不同类型学者的特点。他是博学多才的学者，又是独居林泉的隐士；他具有哲学家深邃的思维，又饱含着诗人的灵感，在需要数学推算和几何学构图时，更不乏数学家的精密。不用说，他还具备博古通今的史学素养。九畹兰心凝史慧，一身浩气布春风。这是我心目中的邵雍。

邵雍的一生很平凡，其思想则丰富而深刻。邵雍式的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其思想特点，从不同角度品评，二重性格相当鲜明。

一、邵雍是无愧宏儒、堪称高隐的学术名流。

邵雍身上，儒者气象十分浓厚。他饱学诗书，精通儒门经典，力行儒家纲常，与人交往，忠孝之言，仁义之道，不离于口，一派仁者心胸。他主张分别君子与小人，提倡重义轻利；劝勉孝悌，褒扬忠良。程颢称赞他的“内圣外王之学”，“纯一不杂”，

并非虚美；有人建议让他从祀孔庙，不为无由。邵雍一生，不图名，不为利，责己重以周，待人宽而和；明诚见性，仁慈为怀，以古圣为楷模，不阿谀媚世，不虚假待人，坦坦荡荡处事，堂堂正正做人，典型的儒者风度。宋代君主赐谥康节先生，康熙大帝题匾“学达性天”，对一代名儒的如此褒扬，名正言顺。

邵雍自己说，他是“儒风一变至于道”。他身上同时有道家隐士气派。三次谢绝入朝做官，声称“平生不作皱眉事”，“不作风波于世上”。甘居陇亩，过清贫生活。他看穿历史，洞察世道人情，认为“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无数英雄浪白头”，都不过是匆匆过客。安乐窝中，一部书，一卷诗，一炷香，一樽酒，“闲来四物幸相亲”，“赢得清闲第一筹”。他的至交好友程颢批评他，写了《皇极经世》，“要之不足以治天下国家”，无异“空中楼阁”。邵雍给自己的画像题词，从不隐讳：“弄凡（指太极图）余暇，闲往闲来。”“静、闲、乐”三字，正是其好友对其人生活态度的评价。邵雍集名儒与高隐的特点于一身，如此学者，可谓穷天地盈虚，弄凡唯图；论王霸因革，经世在书。

二、邵雍可谓集经世情怀与玩世态度于一身的洛阳怪杰。

邵雍少有大志，身居畎亩，心忧天下。一生潜心学问，思考哲学，开创先天易学，耙梳古史，撰写《皇极经世》，主张“以物观物，无以我观物”。论皇帝王霸之道，析因革损益之理，观察王朝兴替，品评社会盛衰，总结历史经验，臧否历史人物，有爱民之心，存济世之愿。风华少年，愿投师于门下；达官显贵，乐与之交游。谈今论古，见解独到；指陈时务，恰中肯綮，令人倾倒。

邵雍有经世之才，却从未见实践，恰恰相反，正如当时有人品评的，他是“玩侮一世”，骨子里是个隐逸人物。如他自己

坦露的：“闲窗一觉从容睡，愿当封侯与赐金”。但愿“荣辱不我与”，“只疑身是洞中仙”。他去利欲，任自然，乐得清静无为。“爽口之物少茹，爽心之行少虑”。坚信“虑少梦自少，言稀过亦稀”。他头戴乌帽，身着綵褐，悠哉游哉，俨然道士。“大斚子中消白日，小车儿上看青天”。“花前把酒花前醉”，任人道是“活神仙”。他主张：“洗心去淫邪，须弹无弦琴。”看透了古往今来“无数英雄浪白头”，倒不如“安乐窝中好打乖”。如此怪杰心胸，可说是：“风月情怀，安乐窝中吟今古；江山气度，天津桥畔衍乾坤。”

三、邵雍的一生，充分展现了哲人气质与诗人风范的美妙结合。

邵雍是诗兴盎然的哲人，也是爱谈哲理的诗人。作为哲人，他玄思宇宙，指点乾坤，思想相当深刻。继承陈抟传下的《先天图》，发展自成体系的象数易学，开宋代图书学之先河，创宋明理学一大流派。《皇极经世》提出独创理论，“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运用易学辩证思维法则，注重论述“天道有消长，地道有险夷，人道有兴废，物道有盛衰”。依据太极思维法则，推衍“元会运世”的世界发展史，编制“皇帝王伯”的社会变迁史。坚持“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演绎出“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的物质世界。因其哲学思想从“无名”的太极开始，乐于自号“无名公”。

邵雍为宣扬哲理，写了不少哲理诗，作为山林隐士，更多写的是隐逸诗。凭风月以起兴，借诗酒以自娱。“竹侵旧径高低进，水满春渠左右流”，自我陶醉在山水园林之中。“静处乾坤大，闲中日月长”，在宁静中思考宇宙，在休闲中打发日月。醉后高歌诗千首，赢得亲朋唱和声，长吟自成康节体，风花雪

月动心弦。一诗吟就，传抄百家，洛阳纸贵，何其风雅。

四、邵雍是一位疏离于经验世界之外，潜心于理念世界之中的思想家。

邵雍非佛非道，不是一个出世者。在现实生活中，他同情劳苦大众，听到“世间多少不平声”；他曾经“躬耕以养其父”，“岁时耕种，仅给衣食”，度过窘迫日子。深有感慨于“卿相一岁俸，寒儒一生费”。目睹穷人流落郊野，尝过卖衣沽酒的滋味。不用说，耳闻官场的险恶，目睹世态的炎凉。然而他的哲学思想，并非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得来，更不想用其哲学去干预社会现实生活。他远离现实，研究易学，坚持其先驱者的名言：“但于羲皇心地里驰骋，勿于周孔言辞下拘挛。”^① 玩味一幅先验的《先天图》，凭着“太极”的自我运动，“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表现出异采纷呈的物质世界。凭自己对“太极”理念的妙悟神契，逻辑地推演出一部哲学公理，就可以“包括宇宙，终始今古”。“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的确，这是一种先验决定论，是远离经验世界的玄思。尽管如此，亦未可一概否定，其中却包含一些可贵的奇妙智慧。邵雍精心安排的《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大圆图），其卦序与卦位经得住二进位制数学的检验，使数学家莱布尼兹为之倾倒。邵雍构制的先天图，一度失传，幸好失而复得，受到儒学大师朱熹的赏识，将其列之《周易本义》卷首。邵雍在理念世界开拓的易学新思路，毕竟奠定宋代图书学的基础。《皇极经世》一书，贬之为“空中楼阁”，可以理解；赞扬它“四通八达”，未为过分。称它是“《易》外别传”，名副其实。《四库全书》目之为“术数”之书，是

① 陈抟：《正易心法注》第四十一章。

莫大误会,理当予以正名,恢复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正确地位。一书开奇智,万古见精神。神州大地出现如此思想奇构,足以自豪。易学象数思维模式,在中国思想史上,禁锢达数百年之久,“先天四图”的出现,启动了象数易学的闸门,凿开了航道上的坚冰,从此,开辟了易学发展的新时期,先天易学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有得必有失,厚于此者薄于彼。疏离于经验世界,是邵雍哲学的重大局限;敢于在理念世界扬帆远航,却是其难能可贵的优越性。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国思想史上的人物,有的可信而不可爱,有的可爱而不可信。邵雍却二者可以得兼。说他可信,因其不设堤防,不露圭角,一是一,二是二,不说违心话,不做亏心事,怎么想,怎么说,推心置腹,胸怀坦白,“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他能身体力行。不止可信,他更可爱。洛阳城里,“行窝”二十家,上自显贵,下至奴婢,都称他为“家先生”。姑嫂的纷争,儿女的隐私,未可向外人道者,都可向他坦露,求他开导。一经邵雍指点,陈怨可以消融,隔阂可以解除,在他身上,有着爱的无形力量。如此哲人,说为世间少有,不算夸张。如此哲人,只有在儒道兼综的中国传统文化哺育下,才能成长为典型人物。当然,只有在当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才能予邵雍思想以全面分析,公允的历史评价。

陈抟评传

第一章 “图南”未遂遁玄门

陈抟是我国10世纪著名易学家、道教学者和诗人。他精研易学，注重象数，传授《先天太极图》，对邵雍影响特深，开宋代图书学之先河，为宋明理学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作为卓越的道教学者，陈抟对道教思想及修炼方法有许多新创造，为道教从注重外丹符篆转向注重内丹修证，架上可靠桥梁，形成陈抟学派，被道教界尊奉为“陈抟老祖”。陈抟熟读经史百家之言，博学多才，是有名诗人，其大量诗歌发生广泛社会影响，当时人们就以一睹陈抟风采为幸。陈抟不是一般书生，有雄才大略的经世之志，虽身居名山，而其匡时济世的政治思想，影响五代及北宋的几位君主，深受尊仰，先后赐号清虚处士、白云先生、希夷先生。陈抟自撰楹联云：“开张高岸马，奇逸人中龙”，对自己一生的奇伟精神作了恰当写照。

陈抟，字图南，自号扶摇子。他活了118岁，卒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经推算，当生于唐懿宗咸通十二年

(871)。陈抟出生于唐末乱世，在农民起义的大风暴日子里长大，经历五代离乱，而竟然活了百多岁，若无独到的养生方术，是很难办到的。从这点看，他堪称令人起敬的奇人。

陈抟不但出生年月不为人所知，连他的父母，家世也无人知晓，而今只留下两节民间传说。

《群谈采余》记载：“陈图南，莫知所出。有渔翁举网得物甚巨，裹以紫衣，如肉球状，携以返家。溉釜燃薪，将煮食之。俄而雷电绕室大震，渔人惶骇，取出掷地，衣裂儿生，乃从渔人姓陈。”从这节故事，不止陈抟父母的名字不知道，连姓氏也不知道，本是无父无母从河中冒出的一个肉球。可能是其先人参加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失败后隐姓埋名，故讳莫如深。

《玉壶清话》还记载：“陈抟四五岁，戏于涡水侧，一青衣妪抱于怀内乳之，曰：‘令汝更无嗜欲，聪悟过人。’”这是说陈抟之所以特别聪明，因为吃了特殊人物“青衣妪”的乳汁的缘故。

陈抟的出生地点，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亳州、普州二说较为流行。一说他是亳州真源人，即今河南鹿邑，汉代名苦县，隶属亳州，道教始祖老子的出生地。传说陈抟幼年戏于涡水，与此说相应，此说的根据是《宋史·陈抟传》。一说为普州崇龛人，根据是《宋文鉴》收录陈抟著作《易龙图序》，署名“西蜀崇龛陈抟序”，崇龛在今四川安岳，古称普州。有学者考证崇龛遗址在今四川潼南县龙场瓦子堡。^①陈抟的里籍长期是个谜，大抵古代隐者，浪迹天涯，隐姓埋名，少

^① 胡昭曦：《陈抟里籍考》。

与世人接触，时移世易，故难以考详。二说未有定论，一般都遵循《宋史》记载。

一、志在“图南”时不利

陈抟生活的 118 年，可分前后两大时期，大体各占 60 年。无论前半生还是后半生，陈抟的生活都是神秘的。

陈抟前半生 60 年，唐代末年占 36 年，是他的青少年时代；五代时期占 23 年，是他的壮年时期。后唐年间，“举进士不第”，乃弃儒崇道，转入后半生。这漫长的 60 年间，陈抟时时在兵荒马乱中过日子。他深信乱世出英雄，树立雄心壮志，力图拨乱反正，有所作为。陈抟 5 岁那年，唐僖宗乾符二年（875），中国大地，卷起农民大起义风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大军席卷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广大地区，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仙芝战死后，黄巢自号冲天大将军，率众数十万，先由北而南，破杭州、福州、广州；复渡淮北上，攻克东都洛阳，破潼关，直捣长安，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大齐政权。黄巢本来热心科举仕途，由于举进士不第，贩盐为生，才毅然与封建统治决裂。奋战 10 年，虽败犹荣，名垂青史。这对幼年时期的陈抟，无疑留下了深刻印象。农民大起义失败后，唐朝统治虽仍苟延残喘 20 多年，毕竟元气大伤，再无回天之力。诸州节度使，纷纷拥兵自重，长期争战不休，社会无有宁日。唐亡后，五代十国，政权急剧更替，犹如走马灯。

正是在社会危难之时，陈抟奋志刻苦读书。他自幼聪颖，志趣广泛，熟读经史百家之言，往往一见成诵，琴棋书法，无

不精通。史称：“年十五，《诗》、《礼》、《书》、《数》之书，莫不通究考校。”^①方药之书，也能兼通、应用。陈抟在唐末及五代战乱中度过童年、青少年及壮年时代，正是他增长知识，增长才干的时期。

陈抟长于诗，才华出众，史称“颇以诗名”^②。“唐士大夫挹其清风，欲认先生，而如景星庆云之出，争先睹为之快。”^③这已是他的壮年时期了。陈抟出身寒微，时时想通过科举道路，跻身士大夫行列，发挥其经邦济世才能，干一番惊天动地伟业。他的名字寓有重大政治抱负，取自《庄子·逍遥游》，以鲲鹏为喻，“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陈抟字“图南”，一语双关，不止若鹏之徙南冥（天池），直是励志南面而治天下。

陈抟的雄才大略，究竟曾有哪些举措，已无可考。他前60年的生活事迹，纯是一片空白。只是陈抟家乡亳州一带，留下一些传说。他曾经以一介布衣，在家乡兴修水利，发动乡民，开凿了一条南北河，南接涡水，北通河南商丘地界，取名“陈治沟”，可灌溉广大地域，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在亳州，民间至今流传关于陈抟的其他故事，有《十里荷花出陈抟》、《隐羊山上诵〈老〉、〈庄〉》，《陈抟老祖返故乡》，和陈抟酿造“希夷酒”等。实际上，陈抟并未成家，是在四处游浪中过日子。

^① 《青琐高议前集》卷八。

^② 《宋史·陈抟传》。

^③ 庞培觉：《希夷先生传》。

陈抟在家乡崭露头角小有名气时，公元926年，后唐军人李嗣源领导兵变，杀庄宗自立，称明宗。此人不识字。听说陈抟博学多才，派人召他进宫，向他请教军国大计。陈抟进宫不向明宗行跪拜礼，仅鞠躬而已。李嗣源不加计较，反而敬重。赐号“清虚处士”，还赐给他三位宫中美女。陈抟以一介寒儒，不敢领受，写信辞谢道：“赵国名姬，汉廷淑女，行尤婉美，身本良家。一入深宫，久膺富贵。昔居天上，今落人间。臣不敢纳于私家，谨用安之别馆。臣性如麋鹿，迹若萍蓬，飘若从风之云，泛如无缆之舸。臣送彼复归清禁。”末附诗一首，然后逃之夭夭。诗云：

雪为肌体玉为腮，多谢君王送将来。
处士不生巫峡梦，空烦云雨下阳台。^①

唐末至五代，是一个以武力称霸的时期。神州板荡，人民涂炭；社会希望安定，而安定无期，人民渴望统一，而统一无望。武将支配一切，“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传统文化，科举制度，一律不受重视。尽管如此，后唐长兴二年（931），陈抟仍抱着极大希望参加了科举考试，企图实现其跻身仕途，经邦济世的夙愿。结果，“举进士不第”。这位行年60的老儒生，经受了毕生最大的打击，毅然采取行动，同科举仕途告别，造成他一生中的最大转折，弃儒修道，决心做一名清静无为、抱朴守拙的道士。数十年寒窗苦读，只落得白费心机。图南之志的破灭，陈抟起初十分

^① 《太华希夷志》。所记时间不一。

痛苦，由于他早已为老庄思想所浸润，这份痛苦渐渐置之淡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前半生的神秘生涯，难以揭穿，后半生的陈抟，依旧是一个神秘人物。

二、隐居武当参玄理

科场失败后，陈抟强忍痛楚，变卖全部家财，只怀揣一块家乡的顽石，浪迹天涯。先是游历河南一带名胜，然后南下苏杭。大江南北，处处留下他的足迹。这一段时间，陈抟进一步观察社会，了解人情世故，深深地了解人民的怨气，军阀的霸气，逐步看破红尘。当他正在人生歧途上徘徊时，在山东遇到两位道人，孙君仿和麋皮处士。三人萍水相逢，一见如故，意气相投，“相与谈《易》与《老》、《庄》，七日不辍”^①。二位道人，亦隐居不仕的隐者，年逾古稀，而鹤发童颜，谈道论玄，通达异常，深为陈抟所佩服，使陈抟萌发超脱红尘，皈依道门的念头。他向二位道人坦露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深受二位道人的赏识。他们指点陈抟道：“武当山九室岩，可以隐居。若隐居此山修炼，可成正果。”陈抟马上拜谢道：“二位道长，高尚之人也，有幸相遇，多谢点化之恩。”^②陈抟回乡，把一切家事托付予胞兄陈拊，毅然离家，千里跋涉，去投湖广均州武当山。此时是后唐清泰元年（934），陈抟已63岁。

陈抟来到武当山，方知果然是一座仙山。方圆八百里，共

① 《仙集总龟》。

② 《武当山》，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有七十二峰，主峰天柱峰，海拔 1612 米。“黑谷冥冥，翠壁巉巉，笮栈履空，缆通下岩。径若穷而复永，石欲坠而相衡。……林集孔翠，穴产鸾鶯。息海运之鹏，巢戾天之鹤。虎吟风而振迅，豹隐雾而溟溟”^①。真是“亘古无双圣地，天下第一名山”^②。武当山有三十六岩，各具特色。或峭壁万丈，高耸云端，苍峦突出，祥云弥漫；或金碧障空，瑞光交映，夕阳回景，飞虹绚彩；或竹木交翠，紫云缭绕，松篁花卉，颖秀可爱。武当山下，溪涧纵横，有廿四涧。夏秋季节，河水猛涨，激流奔突，声闻十里；“冬春时分，水流清浅，澄溪浅渚，细鱼轻翔；深潭石泓，碧若翡翠；竹木掩映，杂花缀岸，清奇幽丽。人临其境，尘氛皆去，俗念顿消”^③。相传“真武大帝”住世时，曾在此山修炼 40 年，后得道“飞升”。秦汉以来，被誉为“洞天福地”，历代道客羽士来隐居修持。尹轨、戴孟在此隐居；马明生、阴长生在此炼丹；陈抟来到，不虚此行。陈抟最初隐居九室岩。此岩不在武当山三十六岩之中，属房县，居武当山系南脉，又称九室山，一名烂柯。《舆地纪胜》称，“山下有九室，唐置九室宫。山峦重叠，如墙，如堂，穿云蹑蹬而上，古木苍翠，天风清冷，为房城幽丽奇处。”^④陈抟在武当山隐居 20 余年，除九室岩外，还住过俞公岩、自然庵、诵经台、白云峰等处。其所以一迁再迁，是有原因的。《武当总真集》叙述他迁居诵经台的原因说：“希夷声誉远著，

① 李方叔：《武当山赋》。

② 《武当山》，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 5 页。

③ 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华文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 页。

④ 杨延烈：《房县志》卷二。

倦于迎待，寻诵经台以避之。”该书还说：“白云峰，……陈希夷避名，三迁于此。”可见陈抟虽隐居深山，慕名拜访者仍络绎不绝，不利于静心修炼，只好一迁再迁。陈抟在九室岩修道有得，写过一本书，名为《九室指玄篇》，书名标出撰写之地，表明他对九室岩的依恋。他在九室岩还写了一首名诗，《方舆胜览》记载，“陈图南题诗云：‘万事若在手，百年聊称情。他时南面去，记得此岩名。’”《邵氏闻见录》记载后唐末年，有位张邓公把诗中“南面”二字，改为“南岳”，认为陈抟志大才疏，不当有“南面”之思。此位张邓公名士逊，钧州光化人，曾读书于武当山。此公哪里想到，陈抟此时尚未完全放弃一贯的“图南”梦想。隐居玄门，可能是他掩饰自己，积蓄力量的障眼法。

陈抟亦曾隐居“五龙观”侧，周围有松萝、五龙、青笋等山峰，有飞云、瀑布二涧环绕。背负高山，面临深谷，好一个天然岩洞，乃怡静修炼之胜地，他在此精研《周易》。一天，山中五位白发老者向他走来，施礼道：“闻先生于《周易》用功非浅，我等慕名前来向先生请教易学。”陈抟同五位老者切磋学问，甚是相契。陈抟见五位老者面若红玉，动若仙童，转而向老者请教养生之术，五老说：“我等坚持修炼‘蛰龙法’，仿龟蛇之类，蛰伏不食不动之理。”这“蛰龙法”就是“睡功法”，陈抟以长睡道术闻名，即从五老传授而来。据说，五位老者即五龙观日月池的五条神龙显现。作此神话传说者，是一位元代人，《武当总真集》中写道：“陈抟诵《易》于五龙观侧，感五气龙君，授之睡法。”^①《太华希夷

^① 刘道明：《武当总真集》。

志》亦有此记载。这一传说影响深远，明代武当山道人张三丰，深信不疑，写诗称颂道：“五龙飞跃出深潭，天将此法传图南。”^①

陈抟虽隐居武当山，仍不忘云游四方。大约后晋天福（937—944）年间（一说在后唐清泰三年），陈抟曾西游四川邛州、普州、青城、峨嵋等地。听说邛州天庆观都威仪何昌一道长，道德高尚，精通道法，尤善“锁鼻飞精”术，人称“高公”。陈抟慕名而去拜他为师，留天庆观专习此术。当他学得道门真传道术之后，进一步看破红尘。留诗一首向高公告别。著名诗人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他在天庆观不但读到陈抟的诗，而且还有陈抟自题序言，都刻在石头上。“余游邛州天庆观，有陈希夷先生石刻云：‘因攀奉县尹尚书水南小酌回，舍辔特叩松扃，谒高公，茶饭移时，偶书二十八字。道门弟子陈抟上。’”其诗云：

我谓浮荣真是幻，醉来舍辔谒高公。
因聆玄门冥冥理，转觉尘寰一梦空。

末书太岁丁酉（937），即后晋天福元年。^②这“锁鼻飞精术”，即道家胎息之术，同陈抟在武当山学的“蛰龙法”是同一原理。陈抟所留 28 字诗一首，天庆观道众十分珍惜，特地刻石留念。北宋时当地郡守崔公命进士文与可（字文同）为碑作跋，写道：“陈抟，字图南，后晋天福中来游蜀。闻是州天庆

^① 方春阳校点：《张三丰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4 页。

^② 《老学庵笔记》卷六。

观都威仪何昌一有道术，善锁鼻飞精，漠然一就枕，辄月余始苏，遂留此学，卒能行之。”^①

陈抟在蜀游学访道8年之久。结交道教学者谭峭（号景升），五代时人，生卒年代不详，与陈抟同出何昌一门下。谭峭自幼好黄老思想，钻研道教典籍。后离家学道，遍游终南、太白、太行、王屋、嵩、华、泰岳诸名山，师从嵩山道士10余年，得辟谷养气之术。入巴蜀，为何昌一得意弟子，从学多年，精通“锁鼻飞精术”，成道教名流。陈抟与谭峭，成为师兄弟，二人思想，多有相通处。谭峭后来移居终南山，著《化书》110篇。以“道”为宇宙本源，道的变化，乃万物发生、发展和消亡的根源，认为宇宙万物无时不在流动变化之中。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复归于虚（道）。陈抟《胎息诀》中同样主张：“夫道化少，少化老，老化病，病化死，死化神，神化万物。”^②足见二人同出师门，都十分注重道的变化。谭峭的《化书》写成后，曾被南唐大臣宋齐丘窃为已有，陈抟知道后，予以揭露道：“吾师友谭景升，世宗显德四年（957），隐居终南山，著《化书》。因游三茅，经历建康，见宋齐丘有仙风道骨。……乃出《化书》送齐丘，云：‘是书之化，其化无穷。愿子序之，流于后世。’于是杖跋而去。齐丘窃为已有而序之。”宋齐丘将《化书》改名《齐丘子》，陈抟的揭露很有力，使真相大白。《化书》乃收入《正统道藏》。

陈抟离开巴蜀，回到武当山，潜心易学，修炼道术，撰写著作，声名远扬。前往拜访者日益增多。不难想象，这些

^① 文同：《丹渊集·拾遗下》。

^② 《诸真圣胎神用诀》。

拜访者，有玄门高人，欲与之同参道学；也有社会名流，欲激发其实现图南宏业；更有跃登龙庭的新君主及新显贵，求他指点经世策略，视他为山中宰相。在那“置君犹易吏，变国如传舍”的动乱年月，想过“皇帝瘾”的人不少，正过“皇帝瘾”而唯恐不稳的人也有。无不期望陈抟预测未来，指点迷津，以便趋吉避凶，逢凶化吉。而陈抟本人，亦未泯图南之望，此时“潜龙勿用”，何尝不希望有朝一日“飞龙在天”，大展鸿图。

三、潜修华山悟大道

五代末年，四方鼎沸。后周显德（954—959）间，陈抟离开武当山，迁隐华山。他迁入华山的原因，主要是武当山四通八达，知其下落者，随时去找他，感到不胜其烦，不利于修真养性。华山险峻幽森，攀登不易，利于隐遁。自古华山一条路，“奇险天下第一山”。“远而望之若花状”；《初学记》云：“山顶有千叶莲花。”故名华山。北临黄河，南连秦岭，巍然高耸，鬼斧神工，为道家十大洞天之第四洞天。陈抟迁往华山，还有一个传说：他在武当山九室岩，“夜静焚香读《易》，有五老人至，庞眉皓发，容貌古怪，常来听诵。居日久，抟问之，老人对曰：‘吾侪即兹山日月池龙也。此间乃玄武据临之地；华山乃先生栖隐之所也。’翌日，希夷默坐，五龙忽诣，令先生闭目，凌空御风，终宵至华山，置坐于盘石之上；开目视之，不见五老人去向。”^①五老人即教陈抟

^① 《太华希夷志》卷上。

“蛰龙法”（睡功）的老师。

这既奇且险的华山，曾受到历代著名诗人的称美。唐代诗人崔颢称赞华山确是修仙的最佳去处。诗云：

落落太华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
武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
河山北枕秦关险，驿路西连汉畴平。
借问路旁名利客，何如此处学长生。

宋代寇莱公描绘华山磅礴气势云：

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
仰天红日近，俯首白云低。

陈抟来到华山，的确看到这真是神仙洞府之地，爱不肯离，连称“仙乡”胜境。题诗云：

为爱西峰好，吟头尽日昂。
岩花作红阵，溪水绿成行。
几夜碍新月，半山无夕阳。
寄语嘉遁客，此处是仙乡。

陈抟到华山，初居云台观，闭门独卧，不与外间接触，一卧经月乃至“百余日不起”。“花竹幽窗午梦长，此中与世暂

相忘；华山处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① 明代道士张三丰吟《华岳》盛赞陈抟“高卧处”。

巉巉太华俯全秦，百二河山此地尊。
云起谪仙搔首处，雨过女神洗头盆。
闲从翠嶂寻松实，醉看青天枕石根。
我爱希夷高卧处，应携后进入玄门。^②

《青锁高议前集》记述陈抟在华山的生活情趣：“咏嘲风月之情，笑傲云霞之表。遂性所乐，得意何言。精神高于物外，肌体浮乎云烟，虽潜至道之根，第尽陶成之域。”他在华山注重的是研究《易》理，证悟至道，穷宇宙之变化，探羽化之秘旨，时与高人往还。

后周世宗柴荣，“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笼英杰”。知陈抟有济世之才，密令华阴县令王睦访问陈抟。王睦上山，只见漫山石头，不见一间茅屋，大呼：“先生寝于何处？”陈抟吟诗答曰：

蓬山高处是我官，山即凌空跨晓风。
台榭不将金锁闭，来时自有白云封。^③

显德三年（956），世宗命王睦邀陈抟入宫，陈抟当年已 85 岁。

① 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六，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02 页。

② 《张三丰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0 页。

③ 《太华希夷志》卷上。所记情节不一。

谒见天子，长揖不拜。世宗赐坐锦墩，一派恭维：“有劳先生远来，得睹清光，三生有幸。”陈抟笑道：“山野之人，无用于世，过蒙陛下采录，有负圣意。”世宗封他为谏议大夫，他固辞不受；问他如何整治朝纲，他闭目不答；留宫中月余，只闭门独睡；世宗几次探望，他熟睡不醒；世宗召见，他只进呈《睡歌》。世宗见他似无异志，不会威胁自己的统治，赐号“白云先生”，放他还山。尽管如此，世宗仍不放心，密令华阴县令，观察陈抟动向。显德五年，命成州刺史给陈抟送去帛50匹，茶30斤。陈抟在华山每闻朝代更替，总是愁眉不展，人间何故，则瞪目不答。

其实，陈抟对后周朝廷内外形势，十分了解。明知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局面已达极点，人心思治是大势所趋，国家的统一只是迟早问题。后周显德七年（960），陈抟掌握到朝廷内外某些急剧变化情况，辽与北汉举兵南下，世宗病故，嗣君恭帝年幼，陈抟估计此乃谋取政权有利时机，意图有所举动。史载“抟乘白骡，从恶少年数百人，欲下汴州”，行至华阴，得到消息，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做了宋朝开国皇帝，陈抟听后，从骡背上大笑坠地，人间其故，他说：“天下于是定矣。”^①陈抟自知拨乱济世的“图南”之志，已无实现机会，只得返回华山，隐居修道，最后死了一条图南之心。

陈抟对赵匡胤是了解的，有不少传说。《神仙传》记述道：“初兵纷时，太祖之母，挑太祖、太宗于篮避乱。陈抟遇之，

^① 《邵氏闻见前录》卷七。

即吟道：“莫道当今无天子，却将天子挑担上。”^①是说当赵匡胤和他弟弟是婴儿时，陈抟已知他们将来会当天子。还有传说云：赵匡胤参军前，在家乡闯下大祸，逃往华山脚下，陈抟挑一担桃子下山，赵匡胤吃了桃子，陈抟向他只取一文钱，赵的确一文莫名，只好向他下拜。陈抟赶忙扶起，叹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指点他说，柴荣在潼关招兵，可去从军。赵匡胤从军后，战功赫赫，步步高升，想起挑桃老人指点之恩，来到华山寻其下落，在玉泉院见一老者摆着一盘棋，匡胤与老者对奕，战到天黑，不分胜负，第二天再战，匡胤把战马、佩刀都输光了，老者提出以华山为赌注，立约为证，结果匡胤又输了。就把华山输给老者，那时赵匡胤还未当皇帝。后来赵匡胤果然成了开国之君，方知当年下棋的老者正是陈抟，朝廷下令免去华山的租税，据说就是因有这一公案，当今华山上留下博奕台遗址。另一传说：一天在长安街上，陈抟遇见赵匡胤兄弟二人和赵普在闲游，就约他们去饮酒，到酒舍，赵普因足疲，“偶坐席左。陈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辄居上次’，乃斥之，使居席右”^②。说明陈抟早已看出匡胤兄弟当作天子，赵普只配作下手。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多次诏请陈抟入朝，都被他谢绝了；亲笔下诏请他受封，陈抟回信说：“创业之君，必须尊重体貌。贫道谒见天子，多有不便，若下拜，有违我之野性；若不下拜，则亵渎天子之体，故不奉诏。”

陈抟放弃图南心愿后，潜心修道，钻研易学，深究《道

^① 《古谣谚》引《神仙传》。

^② 《湖山野录》。

德经》、《南华经》，体验内丹秘奥。然而朝廷对陈抟这类颇有影响的隐士，表面上十分敬重，暗中则严加监视，深恐他们同某些政治势力结合，威胁朝廷统治。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谋略，据说也是陈抟授计的。只让其弟赵匡义统领禁军。结果开宝九年（976）仍然出现赵匡义同其兄深夜密谈之后，第二天赵匡胤突然驾崩，留下所谓“烛影摇红”的千古疑案。当赵匡义继承乃兄帝位后，迫不及待地于次月即下令搜索全国数术之徒，规定“知天文数术者，传送禁中，敢藏匿者弃市，募告者，赏钱三十万”^①。太平兴国二年（978）再次下诏：“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民间并不得私习，若有蓄者，限诏到一月，悉从送官。限外不送，及违诏私习者，悉斩。有能告者，赏钱 10 万。”^② 规定匿而不闻者亦重治其罪。陈抟以精通天文数术名重当代，当然在“传送”之列。因其善于应变，终于隐居华山，以遂修真之志。

陈抟在华山，时与高士麻衣道者、李琪、吕洞宾等相往还，切磋道学，精研易理。对易学与道教理论多有心得。陈抟善于把儒家正心、诚意、修身功夫，同黄老清静无为的修炼方法，佛教“即心即佛”的禅理融为一体。将易学与道学结合，摒弃道教符箓，而潜心发明易图。这些思想特点，都是在华山同麻衣道者、吕洞宾等共同切磋形成的。

麻衣道者，是宋代高僧（一说是道士），姓李名和，内乡人。陈抟在普州崇龛同他相识。在华山又相聚。道者长于相术，世俗所谓“麻衣相法”，据说是由于他传下来的。《搜神圣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

^②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九十八。

览》描述此人特点，“麻衣道者，常以麻辫为衣，蓬面积垢秽，然颜若童稚，双瞳凝碧。”“麻衣道者曾与陈抟同在崇龛修道，常游天池（在今四川安岳县境内），陈抟与麻衣道者朝夕相处，辟谷修炼。”^①陈抟对麻衣道者素很尊重，二人虽是一佛一道，但思想相通，情感极深。在华山，陈抟是否收徒，都要先请他看相。有一次陈抟引一位举子钱若水去见麻衣道者，麻衣道者只瞑目烤火，钱向他作揖行礼，他“微开目”看了一眼。陈抟问道：如何？麻衣道者摇头说：“无此等骨。”若水告辞，陈抟不留。告诉他说：“吾始见子，神貌清粹，谓子可学神仙。而此僧言子‘无仙骨’，但可作贵公卿耳！”钱曰：“此僧何人耶？”希夷曰：“麻衣道者。”^②陈抟十分敬重麻衣道者，称赞他：“道德高杰，学通天人，至于知人，尤有神仙之鉴。”^③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连发三诏，召陈抟入京，前两次都被陈抟谢绝，第三次，使者采取威逼手段，陈抟不得不跟使臣入京，适麻衣道者在场。陈抟吟诗一首，同他告别云：

华岳峰前两路分，数间茅屋一溪云。
师言耳聩持知久，人是人非闻未闻。

麻衣道者以诗作答道：

独坐茅庵迥出尘，亦无衣钵日随身。

① 王象之：《舆地圣纪》。

② 《太华希夷志》卷下。

③ 《太华希夷志》卷下。

逢人不话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①

诗中后两句，正是麻衣道者向陈抟暗授机宜，要他“逢人不话人间事”，可保平安“无事”。陈抟“得诗，默喻其旨，相别讫，与天使不久至京师”^②。可见陈抟与麻衣道者相契极深。

陈抟在华山的另一位道友是鼎鼎有名的吕洞宾（798—？），吕也是唐末著名隐士，名翬，号华阳子，河中府永乐（山西永济）人。唐会昌年间举进士不第，浪迹江湖，善剑术，年已过百而童颜鹤发，步履轻疾，顷刻可行数百里，被尊为八仙之一。《宋朝国史》记载：“关中道人吕洞宾，年百余岁，而状貌如婴儿，世传有剑术，时至陈抟室。”他经常与陈抟在华山论道，结为师友。陈抟传授的《无极图》，是从吕洞宾那里得来的。黄宗炎说：“河上公本图，名《无极图》，魏伯阳得之，以著《修真契》；钟离权得之，以授吕洞宾，洞宾后隐华山，授予陈抟。抟刻之华山石壁。”^③

吕洞宾在陈抟居处进进出出，十分随便。一日，华州知州陈尧佐访问陈抟，正谈话间，“有一道士，风姿英爽，目如点漆，真神仙中人也。径入坐次。希夷急避尊位，略谈数语，皆方外之事。须臾，豹囊中取枣一枚与尧佐，却而不受，希夷起接啖之。不久辞去。送于观外。复会坐，尧佐曰：‘此何人？’希夷曰：‘即洞宾也。’尧佐悔愕不已”^④。

^① 《太华希夷志》卷上。

^② 《太华希夷志》卷上。

^③ 黄宗炎：《太极图辨》。

^④ 《太华希夷志》卷下。

陈抟与吕洞宾同隐华山，同参大道，共探内丹秘奥，情深意洽。后来，吕洞宾要外出访友，陈抟同他告别，二人依依不舍。吕洞宾写诗告别，《赠陈抟处士》云：

青霄一路少人行，休叹兴亡事不成。
金榜虽云无姓字，玉京却幸有仙名。
云归大海龙千岁，月满长空鹤一声。
后感清朝圣明主，屡颁丹诏起先生。^①

诗中称道陈抟虽然科举落第，却修炼得道，名列仙班，成为长寿道士，深受朝廷敬重。历史传说吕洞宾比陈抟更长寿，活了140余岁。当他云游四方再次回到华山来看望老友时，陈抟已羽化登仙了。吕洞宾又写一诗，以示悼念：

天网恢恢可是疏，为君箴到华山区。
寒星没后留残月，春雪来时向太虚。
三洞真人归紫府，千年老鹤化苍梧。
自从违却先生后，南北东西少丈夫。^②

陈抟在华山隐居约40年，除与师友论道，就是闭门修炼睡功，一睡数十天乃至百余日。陈抟精道术，善预知人事。留下不少传说。一次，清源王世则随从主人去拜访陈抟，主人已入室，“世则为仆隶，拜于阶下。先生（陈抟）笑而降阶曰：

^① 《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第九化。

^② 《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第九化。

‘侮人者自侮也。’揖世则坐诸生之右，曰：‘将来君冠诸公。’明年，世则果一人及第。”^①有一天，道士贾休复拜望陈抟，见斋中挂有一瓢，心想求之，未敢言，“希夷谓之曰：‘子来非有他意，盖欲吾瓢耳。’命侍者取而与之。”^②休复甚为惊异。还有一位郭沆，家居华阴，尝宿于陈抟隐居的云台观下。一天夜里陈抟叫醒他，命他速速回家。郭沆嫌路远，以为家中无事，不愿动身，陈抟坚持陪他回去。刚走一二里地，果然家中有人来报信，说他母亲死了。陈抟给他一种药，说快快回去，还有救。回家一看，母亲已死多时，连忙把陈抟给的药灌下，一会儿就活转来了。^③陈抟不止能先知，并有救危急的医术。

还有关于陈抟预知终南山隐士种放来访的传说。一天，陈抟命小道士洒扫庭除，说明日有贵客来临。果然，次日种放（字明逸）来了。“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岂樵夫者，后当有显官，声名闻天下。’明逸曰：‘放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希夷笑曰：‘人之贵贱，莫不有命。君骨相当尔，虽晦山林，恐不能安，异日自知之。’”^④后来宋真宗召种放为司谏，携其手，同登龙图阁，论天下事，再拜谏议大夫，改工部侍郎，显达一时。

陈抟预知自己登仙之期。宋太宗端拱元年（988），陈抟告诉弟子贾德升说：“汝可于张超谷，凿石为室，吾将憩焉。”

^① 《太华希夷志》卷下。

^② 《太华希夷志》卷下。

^③ 《太华希夷志》卷下。

^④ 《太华希夷志》卷下。

次年七月，石室成。陈抟欣然策马，迳造其谷，登上石室，大笑再三。对弟子说：“巍岩太华，气清景秀，吾之所归乎！”随后，写了一份长达数百言的遗书，“其略曰：臣大数有终，圣朝难恋，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花峰下张超谷中。”陈抟如期而卒，享年 118 岁。死后，“经七日，肢体犹温，有五色云蔽塞洞口，累日不散”¹。这段山谷，因名“希夷峡”，直到金朝末年，有人见到其灵骨仍在石室中。华山还有“希夷洞”，洞中有陈抟睡像，还有“希夷冢”，玉柱峰刻有“避诏岩”三字，西岳庙保存陈抟所写“福”、“寿”二字。

四、秘传易图启后学

陈抟高卧武当山和华山，达 60 年之久，同当代高人隐士时相往还，同参修真之大道，共研宇宙之玄理，琢磨易图，深悟丹诀，终于创作了一些前所未见的易图，秘传后世。写了数百首诗歌，编写多种诗集。据初步统计，共有 11 种著作。

《易龙图》一卷。《宋史·艺文志》列入易类。此书已佚，今存《易龙图序》一篇，在《宋文鉴》中。

《九室指玄篇》一卷。又名《指玄篇》，《宋史·艺文志》列入神仙类，八十一章，言导养及还丹之事。宋宰相王溥，著八十一章，以解其要旨。此书已佚。

《人伦风鉴》一卷，又名《风鉴》。《文献通考》作《龟鉴》。《宋史·艺文志》列入五行类。刘康国《注馆图书目》列入刑法类。佚。

¹ 《太华希夷志》卷下。

《三峰寓言》、《高阳集》、《钓潭集》，均陈抟诗集。共 600 余首诗。佚。《太华希夷志》中保存其诗歌十余首。

《周易直解》四卷。见《道藏阙经目录》。还有《入室还丹诀》、《趋苦海诗》，王处一《西岳华山志》中提及，均佚。

现存两种著作，《阴真君还丹诀注》（存《正统道藏》）、《麻衣道者正易心法注》（存汲古阁《津逮秘书》，题为陈抟注，未辨然否。）

陈抟的著作因得到范文正公的指教，他的弟子得以及早收集整理。《太华希夷志》：“先生歿后，有弟子曾孙武尊师，因文正范公指教，得《入室还丹诗》于京师凝真院，得《三峰寓言》于太华李宁处士，得《指玄篇》于赤城张无梦，得《钓潭集》于张中庸进士，共三百篇余，乃纂先生集。”^① 陈抟的著作，可能不止 11 种，可惜都未保存下来。师徒传承下来的只有一些易图及其思想。陈抟的易学思想及道教思想，多通过弟子传播，影响后世。“希夷先生好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伯长，修授李之才挺之，挺之授康节邵尧夫，修以象授种放，放授芦江许坚，坚授范谔昌，一枝传于南方也。”^②

陈抟无愧为唐末宋初的一位著名隐士，长寿奇人。当代学者蒙文通先生对陈抟一生的评价十分公允，可谓盖棺论定：“图南不徒为高隐，而实博学多能；不徒为书生，而固有雄武大略。真人中之龙耶！方其高卧三峰，而两宋之道德文章，已系于一身。”^③

^① 《太华希夷志》卷下。

^② 《太华希夷志》卷下。

^③ 《陈碧虚与陈抟学派》，《古学甄微》，巴蜀书社 1980 年版。

第二章 高卧华岳傲王侯

北宋政权确立后，陈抟的“图南”希望彻底破灭，乃一心高卧华岳，做一个超尘脱俗，清虚自守的隐者，结交羽林高人，钻研道教经典，深悟道教理论，精通易图易理。然而陈抟毕竟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主观上想日益远离尘世，从现实政治生活中超脱出来，过清闲山林生活；可是现实的政治纠葛，并不是那么轻易摆脱得了的。朝廷内外的政治角逐，总要灌进耳里；广大民众的痛苦生活，常展示在眼前；当朝权贵从政治需要出发，难免不时找上门来，洞天福地并不那么清静。陈抟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在处理现实政治干扰中，始终注意自己的分寸。他抱定主意，以道抑尊，傲视王侯，同王权政治尽可能保持疏远关系；站在同情民众的立场，必要时说几句公道话；无可避免需要向统治者进言时，不妨从道家价值观立场，略加指点。从这些方面，不难发现隐者陈抟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

一、傲视王侯 坚持政治疏远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两种政治思想传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些在政治上失意的人，惯于表现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隐居山林，同世俗政治斗争保持疏远关系，这是一种在野的思想传统；同时，也有另一面，一些得势的统治者，往往热衷于“举逸民，天下归心”。千方百计笼络在野“游士”，以示自己的宽厚仁德。这也形成一种在朝的思想传统。两种传统的交合，形成隐士同王侯之间的微妙关系。正史的《逸民列传》、《隐逸列传》和稗官野史，都有丰富记载，流为美谈。

陈抟隐居武当山和华山，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前后有五代和北宋的四位君主召见他，力图说服他入朝做官，辅佐君主治国。这些帝王在陈抟面前一个个都十分恭敬。可是没有一位能真正打动陈抟的心，三次都被他巧妙地谢绝了。陈抟遁入道门，自以为游离于现实政治斗争之外，形成与常人不同的政治心态，表现出古代隐者、“游士”的共同特征：“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交于诸侯。”^①“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不慕荣利，不图爵禄，自由自在，无牵无挂。傲视王侯，以道抑尊，充分显示自己的独立人格。

陈抟一生，受到过四位君主的垂青。第一位君主是向陈抟赐号“清虚处士”的后唐明宗李嗣源。这是一位目不识丁的草包皇帝，陈抟当然不屑于同他对话，显示了自己的清高

^① 《战国策·齐策》。

气节。那时陈抟只在社会上小有名气，还未遁入道门。为了避免纠缠，只得不辞而别，溜之大吉。

第二位是后周世宗柴荣。此人可称五代时期一位英明君主。他懂得民间痛苦，进行过一些政治改革，严惩贪官，裁减冗员，整顿赋税，取消豪绅特权；整顿地方组织，以百户为一团，实行联防治安。废除寺院，使晚唐以来混乱百余年的中原地区，开始出现一线澄清的迹象，为中国的统一，打下一定基础。此人明白收揽天下英雄的重要性。于显德三年召见 85 岁的陈抟，表示“得睹清光，三生有幸”。陈抟只笑道：“山野之人，无用于世。”世宗说：“周室初兴，四方未服”，向他请教治世良策。陈抟答非所问云：“总角慕道，壮岁游山，性同猿鸟，心若死灰”，希望放他还山。世宗投其所好，转而请问黄白之术。陈抟不卑不亢指点道：“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① 世宗封陈抟为谏议大夫，陈抟固辞不受。写了一首《叹世诗》以表心志：

南辰北斗夜频移，日出扶桑又落西。
人世轻飘真野马，名场争扰似醯鸡。
松篁郁郁冬犹秀，桃李纷纷春渐迷。
识破邯郸尘世梦，白云深处可幽栖。^②

世宗云：“寡人诏卿来，方期阴阳燮理，整治朝纲，以安庶民。”陈抟闭目不答。陈抟留宫中月余，一味闭门长睡。世宗再次

^① 《宋史·陈抟传》。

^② 《庄子·田子方》：“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与！” 醜鸡，乱飞的小虫。

召见时，他进呈《睡歌》一首。

臣爱睡，臣爱睡，不卧毡，不盖被。片石枕头，
蓑衣覆地，南北任眠，东西随睡。
轰雷掣电泰山摧，万丈海水空里坠。
骊龙叫喊鬼神惊，臣当恁时正鼾睡。
闲想张良，忘思范蠡，说甚曹操，休言刘备；
两三个君子，只争些小闲气。
争似臣，向清风岭头、白云堆里，展放眉头，解
开肚皮，打一觉睡。
更管甚，红日西坠。^①

这首诗一气呵成，音韵铿锵，抑扬顿挫，节奏明朗。阐明了不管电闪雷鸣，大浪涛天，他只是“展放眉头，解开肚皮”，一睡了之的超然心态；阐述了他“不卧毡，不盖被，片石枕头，蓑衣覆地”，与自然打成一片，逍遥自在的豪情逸致；更表明他认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曹操、刘备之类，南征北伐，不过“两三个君子，只争些小闲气”，到头来都是匆匆过客，没甚意思。这首诗充分展示了一位隐者与世无争，“天子所不得臣，诸臣所不得友”，^②力求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与尊严的处世之道。同封建统治者表示疏远的态度，异常鲜明。世宗见无法挽留他，只得赐号“白云先生”，以遂其还山隐居之志。

在历史记载中，第三位召请陈抟的君主，就是宋代开国

^① 《太华希夷志》卷上。

^② 《后汉书·逸民列传》。

之君赵匡胤。宋太祖曾多次诏请陈抟入宫受爵，都被他一次又一次谢绝了。赵匡胤对陈抟仰慕是可想而知的，他希望陈抟能为他进献济世良策之心，肯定是非常真诚的。然而在陈抟看来，“伴君如伴虎”，统治集团内部为了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斗争十分激烈，“愁闻剑戟扶危主”，已是常事。他无意介入那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宁肯做一个超然物外的散淡人。哪怕是赵匡胤亲笔诏书，他也不肯接受，表示不能违背自己的“野性”，去向君主下拜，其“傲视王侯”的性格十分坚强。尽管陈抟从未见过赵匡胤，可是民间仍然流行一些传说，描述他如何从赵匡胤的相貌，早就看出他一定会当皇帝。这多半是某些为了逢迎赵匡胤又想神化陈抟的人故意编造的。其中有一传说，突出陈抟未卜先知本领，说宋太祖召见陈抟，向他请教宋朝的国运前途。陈抟回答八个字：“一汴、二杭、三闽、四广。”太祖不明其意，请他予以解释，陈抟避而不答，表明天机不可泄漏。后来的人猜测，是这位陈抟老祖，预知宋代朝廷步步南迁，由汴州而杭州，而福建，最后至广东崖山而亡。^①这类政治寓言，肯定是宋代以后神化陈抟的人所编造。陈抟傲视王侯，不与之交往，编造者总要说曾经同帝王交往过；不过，虽有交往，毕竟只能使帝王猜哑谜，而莫可奈何。这个故事既不让宋太祖过分失望，又不失陈抟“以道抗尊”的隐者身份。

第四位召见陈抟的是宋太宗赵匡义。这次的召见同前面三位君主不同，历史上有相当详细的记载。陈抟同赵匡义有来有往，打了不少笔墨官司，颇费心思；而前后三次诏请，终

^① 《群谈采余》。

于如愿，使臣们也费尽心机。这可以说是庙堂同草野之间一次唇枪舌剑的交锋。

宋太宗诏请陈抟，连续三次，都在即位之初。太平兴国元年（977）四月，^①赵匡义第一次诏请他久已仰慕的陈抟，他知道其兄在位时，多次诏请均未如愿，于是差遣殿东头供奉官陈宗颜为特使，带着他的诏书和御诗，前往华山云台观宣诏。陈宗颜四月十五日到达云台观。道士钟希晦向陈抟通报说：“皇帝宣师父。”陈抟洗手、焚香，然后答礼，听宣诏。这个诏书写得颇有内容。

朕自即位以来，克服八方，威临万国。遐迩悉归于皇化，华夷亦致于隆平。知卿抱道山中，洗心物外，养太素浩然之气，应上界少微之星。节配巢由，道遵黄老。怀经纶之长策，不谒王侯；蕴将相之奇才，未朝天子，卿不屈于万乘，身奚隐于三峰？乘风犹来，举朝称贺。^②

使臣还带去一首御诗，云：

华岳多闻说，知卿是姓陈。
云间三岛客，物外一高人。
鼎丹为活计，青山作近邻。
朕思亲欲往，社稷去无因。

^① 《太华希夷志》为“至道”元年（995），时陈抟已卒六年。

^② 《太华希夷志》卷上。

这诏书和御诗，包含了四方面内容，首先，宣扬皇帝的功德，“克服八方，威临万国”，天下已太平，有意“举逸民”；其次，称赞陈抟“节配巢由，道遵黄老”，“物外一高人”，上应“少微星”，令人尊敬；第三，恭维陈抟，“怀经纶之长策”，“蕴将相之奇才”，因此期望他能入宫相见，为朝廷提供济世良策；最后，皇帝表示本想屈尊枉驾，学刘备三顾茅庐，奈何已登帝位，不便离开社稷，你若前来，定会“举朝”欢迎。赵匡义料到陈抟不会轻易来朝，态度的确是谦虚而谨慎的。可是他忘了，一方面在谦虚下士邀请隐者，另方面又一再下诏举报“数术”之人，这一点陈抟不会不知道。

果然不出所料，陈抟拒绝了皇帝的第一次诏请。对使臣说：“贫道栖真物外，修炼山间，无意求名，有心慕道，不愿仕也。”同样写了一件回表和一首《谢诏诗》，请使臣带回去交差。这表和诗也是写得十分得体的。《表》云：

伏念山野，生居吴地，长自汉南。成童以习业儒林，壮岁而遍游洞府。性同猿鸟，心若土灰；不晓仁义之浅深，安识行藏之去就。败荷作服，脱箨为冠，体有青毛，足无草履。有意慕羲轩之道，无心诵管乐之篇。《南华》、《道德》频看，黄阁玉堂绝念。数行紫诏，徒烦采凤含来；一片闲心，已被白云留住。苟临轩陛，贻笑圣明。

陈抟《谢诏诗》写道：

九重特降紫泥宣，才拙深居乐静缘。
 山色满庭供画障，松声万壑即琴弦。
 无心享禄登台鼎，有意求仙到洞天。
 轩冕浮荣绝念虑，三峰只乞睡千年。①

表与诗反复申明“不晓仁义”，“心若土灰”；“有意求仙”，“无心享禄”；“浮荣绝念”，只乞长睡。陈抟不为势利所动，对宋朝没有说一句恭维话。同时表明，“败荷作服，脱箨为冠，体有青毛，足无草履”，如此不成体统的山野粗人，来到朝堂，皇帝屈尊接见，岂不贻笑大方。这第一次诏请，就这样委婉地谢绝了。

赵匡义得知陈抟大摆其高道的架子，不买他这位皇帝的账，心中很不是滋味。当年六月，再派使臣张素真去诏请。使臣来到云台观，见山童正在扫地，问道：“师父在否？”答曰：“师父于庵中熟睡正浓。”问，怎么才能叫醒他？山童说：击头边的金钟他就会醒。果然，一撞金钟，陈抟就醒了，整好道服，便问使臣：“为何再来？”使臣说：“陈宗颜来请先生，先生不入朝，皇帝甚为失望，特派我再来请先生。”焚香礼毕，再次宣读诏书。云：

朕伏维先生白云隐士，碧洞高人。悟大道之玄门，达希夷之奥理。朕叹韶光甚速，迅景难留，忽暑往以寒催，渐颜衰而鬓改。虽达治世之略，未谙炼性之机，废寝忘餐，思贤若渴。暂离洞府，跨

① 《太华希夷志》卷上。

鸾鹤以飞来，佇立宫闱，列簪缨以敬侍。^①

诏书同样先称赞陈抟“悟大道之玄门，达希夷之奥理”，令人敬慕。可能经过分析，上次诏书未提炼丹养性之事，故请陈抟不动；这次不妨投其所好，提出“韶光甚速”，“颜衰鬓改”，“虽达治世之略，未谙炼性之机”，恭请陈抟去教他炼丹养性，说不定这会打动他的心。

不料陈抟矢志学道，不慕浮荣，仍然修表咏诗，请来使带回辞谢。他对使臣说：“贫道山野之人，鹿豕同群；登高望远，临流漱齿。松君桂父，吾之友也；云峰霞岭，吾所游也；孰羡浮荣之富贵哉？”请来使住一宿，带表而归，其回表云：

伏念愚拙，深潜涧壑，误蒙天恩。臣无诸葛之奇才，君迈汉皇之厚德。臣山麋之性，野鹤之姿。冠簪独羨乎逍遙，轩冕难禁乎羈束。高卧苍龙之岭，蝶梦悠扬；闲看玉井之莲，诗魂浩荡。餐烟霞于洞口，采薇蕨于林间。杖履徜徉，身心懒散。炼炉中之丹药，远拟登仙；避世上之虚名，屡防嫁祸。赖遭逢乎尧舜，可疏放其巢由，幸尽余生，遐瞻圣代。^②

同时还请使臣带呈七绝诗二首：

坐逢圣代即尧年，草泽愚民也被宣。

^① 《太华希夷志》卷上。

^② 《太华希夷志》卷上。

自笑形骸元懒散，才疏安敢望朝天。

调和四气凭烧药，修炼千方只望安。
黄阁高官无意恋，闲居佳境胜为官。^①

表与诗充分表露陈抟的隐者心态，“形骸懒散”，无意做官，有意避开虚名，“屡防嫁祸”；一心烧炼丹药，以图登仙，高卧华山，比做官强多了。同上次的回表不同，把宋朝称许了两句，说什么：“坐逢圣代即尧年。”他恭维太宗“赖遭逢乎尧舜”，目的是要他效法唐尧榜样，任随巢、由隐居遂志。许由是唐尧时代的高士，隐于沛泽，尧欲以天下禅让于他，许由不受，尧又召他为九州长，许由闻之，以为污其耳，乃洗耳于颖水；其友巢父正牵牛饮水，知颖水为许由洗耳所污，赶忙把牛牵到上游饮水去。事见《庄子》等书。太宗上次诏书中既已称许陈抟“节配巢由”，故陈抟顺水推舟，希望太宗“疏放其巢由”，以成全其隐居求道之志，故恭维宋朝，正是陈抟“欲取姑予”的策略。

太宗的两次诏书，陈抟的两次回表，来来往往，无异笔箭交锋。朝堂欲召请处士，为我所用；处士则力图摆脱权势的骚扰，敬而远之。双方僵持不下，看来还免不了另一番交涉。

^① 《太华希夷志》卷上。

二、勉为帝师 略陈济世箴言

隐士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一种特殊社会势力。他们虽远离朝堂，却以特殊方式接近各阶层民众，往往更能了解国家的弊端，人民的疾苦。常言道“旁观者清”。正由于隐士们能超脱于势利网络，故在必要时能敢怒敢言。高人、隐士常常又成为社会批判意识的担当者，身在山林，心忧天下，观察问题，入木三分，指陈时弊，辄发人之所未发，故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在朝君主，受奸佞小人包围，唯命是从，唯唯诺诺，难有犯颜直谏之士，一新君主耳目。

宋太宗两次诏请陈抟失败后，并不死心，千方百计，非诏请陈抟入朝不可，否则有损这位皇帝的尊严。张素真六月十六日回京禀告，陈抟执意不入朝。太宗“龙颜大不乐”，气急败坏地于六月廿九日，传问百官之中，有谁能言善辩，可去再召陈抟。有人推荐内藏库副使葛守中。太宗马上召见此人，面授机宜，令他前往华山，务将陈抟请下山。七月七日，葛守中带着太宗三请陈抟的诏书和御诗，到达华山云台观。方知陈抟早已离开此地。知观道人杨子真告诉使臣，“先生恐皇帝再来宣，上玉泉观遁逃坐静去了。”使臣让道士引路，直奔玉泉观，要见陈抟。焚香礼毕，向他宣诏云：

朕上承天命，下抚民心；兵销而四海咸宁，化出而八方无屈；位临有众，含脯鼓腹以同歌，道体无为，凿井耕田以安业。知大贤之生世，海晏河清；望君子以救时，风行草偃。身未离于岩壑，名满寰

区；志恒想于蓬瀛，心游寥廓。朕素知轩后博施之德，实歉广成修养之方。地僻虽深，王泽所及，伊尹就征而适亳，孟轲随聘以至梁。命有相从，礼无多让。

同时还交给陈抟御诗一首。写道：

三度宣卿不赴朝，关河千里莫辞劳。
凿山选玉终须得，点铁成金未见烧。
紫袍绰绰宜披体，金印累累可挂腰。
朕赖先生相辅佐，何忧万姓辍歌谣。①

诏与诗可说是威逼与利诱并施的典型。先是美化自己的统治，“上承天命”，“道体无为”，“四海咸宁”，“八方无屈”，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表明自己是个英明君主。接着以官爵利禄加以劝诱，入朝做官，可望“紫袍披体”，“金印挂腰”；最后露出威逼口吻，“凿山选玉终须得，点铁成金未见烧”，意是说，美玉终将弄到手，铁石不烧不成金，这一把火是烧定了的。“命有相从，礼无多让”，望效法伊尹就征为是。本来陈抟读了诏与诗，仍想坚决辞谢。可是既然皇帝已安下机关，使臣就容不得客气。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反复开导陈抟。他说：“宣命三次，先生不可固辞。岂不闻《鲁论》云：‘君命召，不俟驾，行矣。’诏旨岂宜抗拒！又邹书云：‘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可辞也。”接着使臣赋诗一首，再婉转劝说：“华岳

① 《太华希夷志》卷上。

三峰客，幽居不记年。烟霞为活计，云水作家缘。种药茅亭畔，栽松涧壑边。暂离仙洞去，可应帝王宣。”

陈抟权衡形势，认为再僵持下去，难免造成更多麻烦。只好勉强应诏，干一件违心之事。他强忍苦楚，忿忿然吟诗向华山告别。

鹤氅翩翩即散仙，蒲轮争忍名利牵。
留连华岳伤心别，回顾云台望眼穿。
涉世风波真险恶，忘机鸥鸟自悠然。
三峰才欲和衣倒，又被天书下日边。^①

陈抟已是 106 岁高龄的老道士，伤心地告别华岳，冒着酷暑，跟随使臣去京师，亲自领略这“涉世风波”的“险恶”境况。临行写诗向老友麻衣道者请教处理“人是人非”的原则，老友的答诗，教他“逢人不话人间事”，可保成为“无事人”。陈抟心领神会，就上路了。不久到达京师。

陈抟来到京师，既没有什么“佇立宫闱，列簪缨以敬待”，更说不上什么“乘风犹来，举朝称贺。”而是到一个冷冷清清的建隆观安歇。这一夜陈抟实在睡不着，这位“睡仙”，在床上辗转反侧。先是听得禁鼓响，几分凄厉，乃吟《叹世诗》二绝：

千门万户锁重开，星斗排空静悄然。
尘世是非方欲歇，六街禁鼓漏初传。

^① 《太华希夷志》卷上。

银河斜转夜将阑，枕上人心算未闲。
堪叹市廛名利者，多应牵役梦魂间。^①

陈抟初到京师，所听到和想到的，是“是非欲歇”，而“心算未闲”，“名利”纠缠，“梦魂”牵绕。这是非之地，名利之乡，的确不是百岁高龄的隐者所当居住之地。“睡仙”好不容易捱到五更，又听得晓钟敲响。浮想联翩，不免又吟诗一首：

玉漏将残月色沉，一声清响透寒音。
能催野客思乡切，暗送离人起恨深。
窗下惊开名利眼，枕前唤觉是非心。
皇王帝伯皆经此，历代兴亡直至今。^②

陈抟想到的是熙熙攘攘的市民及官吏的“名利眼”、“是非心”，而勾引起来的，却是自己“思乡切”、“起恨深”。凄厉的禁鼓，寒沉的晓钟，一再警醒这位初次面圣的隐者，“逢人不话人间事”。

第二天昧爽，陈抟身穿羽衣，头戴华阳巾，草履垂绦，去见宋太宗。宾客之礼毕，皇上赐坐。开始用诗对话。太宗问：

知卿得道数余年，镇日常吞几粒丹？
可讶鬓边无白发，还疑脸上有红颜。

① 《太华希夷志》卷上。

② 《太华希夷志》卷上。

终宵寝向何方观？清晓斋登甚处坛？
肯为眇躬传妙诀？寡人欲似先生闲。^①

想必太宗为了解除陈抟的疑虑，减轻紧张气氛，先从陈抟的日常生活问起，以示君主对臣民的体贴之心。陈抟当然只得依君主的关心，回答他几个问题。诗云：

臣今得道几经年，每日常吞二气丹。
仙酿酒时添漆鬓，蟠桃食后注童颜。
夜深只宿云台观，晓起斋登法篆坛。
陛下问臣修养法，华山深处可清闲。^②

赵匡义看了陈抟的答诗，十分高兴。在一种宽松的心态下对话。马上改变了话题。当时朝廷正要举兵征河东，前途未卜；陈抟知有不妙，表示劝阻。实际上部队已经出动了。后来，班师回朝，不出陈抟所料，果然毫无战果。

太宗请陈抟迁入御园居住。陈抟到那里，首先显示自己的睡功，“睡百余日方起”。太宗深感惊异，知陈抟善睡非虚，恩礼特厚。一次，太宗从容对希夷说：“先兄太祖，功高德厚，宣先生弗至；寡人功卑德薄，烦先生降临丹陛。”这样说，无非是想陈抟恭维自己。可是陈抟对答十分巧妙，说：“先帝不须贫道来，陛下不免臣一遭耳。”不但没有恭维的意思，反而指出太宗同太祖大有差别，还免不了要靠人关照。

① 《太华希夷志》卷上。

② 《太华希夷志》卷上。

太宗又改换话题，问道：“昔在尧舜之为天下，今可致否？”同样，是想陈抟称赞当今朝廷。陈抟具有博古通今的历史教养，又能言善辩，他随即根据道家政治原则，借题开导太宗说：“尧舜土阶三尺，茅茨不翦，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静为治，即今之尧舜也。”^①这“清静为治”四字，具有丰富内涵，太宗是不明白的。从道家思想来说，“清静为治”就是《老子》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②“治大国若烹小鲜。”^③“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④这些当然都是太宗做不到的。太宗听了陈抟的话，表面上仍称赞他讲得很好。

一次，太宗把陈抟请入宫中谈话。对宰相宋琪说：“陈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利，真方外之士。”还派人送陈抟到首脑机关中书省走一走，看一看。宰相宋琪问陈抟道：“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授人乎？”陈抟回答说：

抟遁迹山野，无用于世。修炼之事不知，无所传授。然设使白日飞升，何益于治？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洞达古今治乱之旨，真有道仁圣之君。正当君臣合德，以治天下。勤行修炼，无以加此。^⑤

① 《太华希夷志》卷上。

② 《老子》第五十七章。

③ 《老子》第六十章。

④ 《老子》第二章。

⑤ 《太华希夷志》卷上。

陈抟拒绝谈论修炼之事，反而开导大臣们当“君臣合德，以治天下”，这是从全国百姓着想。肯定太宗“仁圣之君”，是他在京师观察数月得到的印象，的确非一般无原则的逢迎之词。北宋两位开国皇帝，太祖和太宗，在唐末五代大混乱之后，能够一统天下，保持了百年左右的相对太平，抗击了外敌，发展了生产，全国经济日益繁荣，科学技术有较大发展，陈抟的适当肯定，无可厚非。主张“君臣合德”，就是希望再不要发生五代时期弑君篡权的动乱事件，这也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足见陈抟的政治头脑相当清醒。

一日太宗与陈抟同登东角楼，闲观市肆。见红日已高，而楼下富人刚才起床。太宗写诗道：“人人未起朕先起，朝来万事攢心里，可羡东京富豪民，睡至日高犹未起。”^①这分明是太宗表白自己起早睡晚，为百姓操心。陈抟站在臣民角度回诗云：“昨夜三更梦里惊，一声钟响万人行，多应又是朝金阙，臣自无官睡到明。”^②这本是说为了“朝金阙”，臣民比帝王起得更早，只有自己是例外。太宗读诗，发生误会，以为陈抟是说“自己无官”，所以才不起早。次日上朝，要拜陈抟为谏议大夫。陈抟坚辞不受，作了一首《退官歌》：

道能清，道能静，清静之中求正定。
不贪不爱任浮生，不学愚迷多慳吝。
时人笑臣不求官，官是人间一大病。
官卑又被人管辖，官高亦有人趋佞。

^① 《太华希夷志》卷上。

^② 《太华希夷志》卷上。

或经秦，或经郑，东来西去似绳引。
 直至百年不能歇，算来争似臣清静。
 月为灯，水为镜，长柄葫芦作气命。
 出入虽无从者扶，左有金龟右鹤引。
 朝日醉，长不醒，每每又被天书请。
 时人见臣笑呵呵，臣自心中别有景。^①

这《退官歌》表述了一位隐者的超然气质，只图“清静”，不愿做官。看破世态，做了官很难正定，往往趋炎附势，被人牵着鼻子走。隐者则不同，“月为灯”，“水为镜”，日有金龟仙鹤伴随，长睡不醒，何等自在。宋太宗以为陈抟是要官做，无异以凡人之志度仙人之心。

太宗见他执意不做官，就开宗明义，请他留下济世良策。他说：“先生有济世安民之良策，留下可也。”陈抟答道：“臣总角慕道，壮岁游山，处心淡泊，默悟玄风。济世良策，未暇知也。臣颇好睡，幸放还山可也。”陈抟又写了一首《口号》诗，类似后世《竹枝词》，以表心态。云：

问君世上何事好，无过晓起睡当早。
 庾前乱草结成衣，饥餐松柏常令饱。
 因玩山石脚绊倒，不能起得睡到晓。
 时人尽道臣憨痴，臣自憨痴无烦恼。^②

^① 《太华希夷志》卷上。

^② 《太华希夷志》卷上。

太宗知陈抟坚辞不仕，一心还山。就命百工聚货物于五门前，歌舞喧闹，以夸示万民之富庶，约陈抟登楼观玩。问道：“京师丰盛若是，安肯弃寡人还山，不同治世乎？”陈抟坚持隐者立场答道：“鸟兽栖于林薮，鱼鳖游于江湖，各有所乐耳。”^① 太宗指着人烟辏集之地，问道，“见否？”曰：“见。”帝问：“见甚？”陈抟答曰：“见富者贪生，贫者竞命。”^② 太宗听后默然无语。

过了一会儿，太宗同陈抟走下午门，回到宫中。太宗恳请陈抟授他以济世安民之术。陈抟看情况不给太宗出点主意，是不可能放他还山的，勉为帝师，索纸与笔，为书“远、近、轻、重”四字。太宗不明其意，陈抟为之解释道：“远者，远招贤士；近者，近去佞臣；轻者，轻赋万民；重者，重赏三军。”^③ 此四字箴言乃陈抟研究历史经验，结合现实情况，站在劳苦大众立场，从富国强兵发展国力的愿望出发，提出的四条深中时弊的政治原则，的确具有重要政治参考价值。说明已 106 岁高龄的隐士陈抟，其政治思想是十分清晰明白的，也证明他确有经邦济世的才能。

太宗看了四个字，听了四句话，非常高兴，总算达到了目的。即赐宴于便殿，令文武大臣参加，赋诗送行。并赐给陈抟龟鹤鞍马等物。陈抟辞谢一切贵重物品，只领受茶、药而已。太宗下诏赐封云：

① 《太华希夷志》卷上。

② 《太华希夷志》卷上。

③ 《太华希夷志》卷上。

陈抟，一代高人，累朝逋客，慕我隆平之化，来修觐谒之仪。不有嘉名，何彰贞范？宜赐号希夷先生。^①

陈抟重新回到云台观，继续修真证道。陈抟此次入朝，可说是一位隐士在权势利禄面前的一场重要考验。陈抟淡泊名利，傲视王侯，以道抗尊，高扬修道隐者的独立人格，表现得光明磊落，与某些以入道隐居为入官终南捷径的利禄之徒，形成鲜明对比，为后世隐者树立典范。

太平兴国九年（984）陈抟曾第二次入朝。这时陈抟已113岁。太宗待之甚厚，屡与之唱和诗赋，数月后乃还山。在京师期间，太宗正为立太子之事犯愁，知他善看相，就让他给八个儿子看相，问那一个适合继承王位。陈抟到寿王（即后来的宋真宗）门前，没有进屋就回去了，太宗问他何故，陈抟回答说：“王门厮役皆将相也，王可知矣。”^②于是太宗立寿王为太子，解决了一大疑案。实际上陈抟早知太宗倾向，故投其所好。在京师日久，不少士大夫争相拜访，请他指教处世为人之方，陈抟对他们说：“优游之所勿久恋，得志之处勿再往。”^③人们将其作为座右铭。

十月甲申日，太宗下诏赐号“希夷先生”，^④赐紫衣一袭。派人送陈抟还华山，并令有司增葺华山云台观。第二次入宫

^① 《太华希夷志》卷上。

^② 《宋史·陈抟传》。

^③ 《玄品录》卷五，《正统道藏》第三十册。

^④ 《太宗实录》卷三十一。

乃赐号，似于情理多有不合。考之历史、传说，关于两次应诏入京师，情节多有交错，莫可一是。陈抟傲视王侯的态度，前后一贯，是可以肯定的。

陈抟留京师期间，“闻其风而慕之者，不可胜数”。将出京师，写了一首《辞朝诗》云：

十年踪迹踏红尘，为忆青山入梦频。
紫陌纵荣争及睡，朱门虽富不如贫。
愁闻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
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①

陈抟再次摆脱政事干扰，回华山过隐士生活。

① 《太华希夷志》卷上。

第三章 承传易图留后世

《周易》本由符号系统和文字系统组合而成，具有象、数、理、占诸方面内容。汉人研究《周易》偏重象数，曾经创造了不少易图。由于过于烦琐，走向自己的反面。王弼扫象而言理，南北朝、隋唐易学家踵事增华。义理之学大盛；象数之学几乎湮没，民间暗中流传，不绝如缕。直到陈抟交游八方羽客，渐得易图秘传，经他的整理创造，传下一些易图，经过邵雍、周敦颐和刘牧的发扬，开创了宋明以后的易学图书学派。从此易图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宋元明清时期制作易图的易学家，不下百十人，创作的易图，在千幅以上，陈抟成为宋代图书之学的开山祖师。

陈抟传下的易图究竟有多少，已无可考，其传授世系相当清楚。南宋易学家朱震（1072—1138）在其所撰《汉上易传》中，记述宋代易学传授系统云：“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

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① 种放、穆修是陈抟易图的主要承传者。历史记载陈抟所传易图有三种，一是《先天图》、一是《易龙图》、一是《无极图》。种数不多，影响特大。现在我们可以从邵雍的《皇极经世》、刘牧的《易数钩隐图》、周敦颐的《太极图》考见陈抟承传的易图底蕴及其易学思想。陈抟的易学思想，缺乏文字著述，只有前人引述的少数思想资料。流传有陈抟《正易心法注》，是否可靠有些争议，但它对研究陈抟易学思想有重要参考意义，可以肯定。

陈抟的易图及易学，大体分两大部分，一是象学，一是数学。《先天图》是其象学代表，《易龙图》是其数学代表。兹予以分别论述。《无极图》同内丹关系密切，放在下一章分析。

一、《先天图》与先天易学

陈抟传授的《先天图》，今称《古太极图》，同近世盛行的阴阳鱼《太极图》有所区别，有人称之为“天地自然之图”。如图 1。

这幅《先天图》，几乎失传，是朱熹的学生蔡元定从四川找到的。蔡元定找到后，秘而不宣。朱熹生前未见此图，故其《周易本义》卷前所附九幅易图中，唯独没有《先天太极图》。

^① 《汉上易传·系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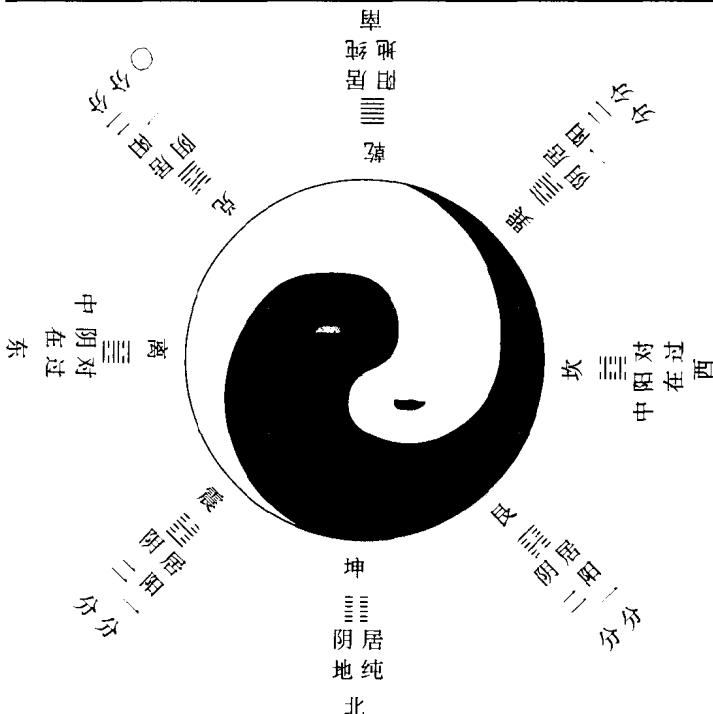


图1 天地自然之图（先天太极图）

这幅《先天图》直到明初易学家赵撝謙才公之于世。他说：“此图世传蔡元定得于蜀之隐者，秘而不传。虽朱子亦莫之见。今得之陈伯敷氏，尝熟玩之，有太极含阴阳，阴阳含八卦之妙。”^① 这幅《先天图》后来成为邵雍传授的《先天八卦图》的底本。

^① 赵撝謙：《六书本义》。

赵㧑谦把这幅图说得十分神奇，称它为《天地自然之图》，说伏羲时代龙马负图，所负的正是这幅图；《尚书·顾命》所说陈列于东厢的《河图》即是此图；《周易》讲“河出图”，“圣人则之”以画八卦，也是此图，称它为“万世文字之本原，造化之枢纽”。赵氏的话虽然十分武断，可是他将此图分为八等分，从其中阴阳比分上看出八卦的卦画结构，的确有说服力。这八分后的《古太极图》，清代学者胡渭在《易图明辨》中有表述。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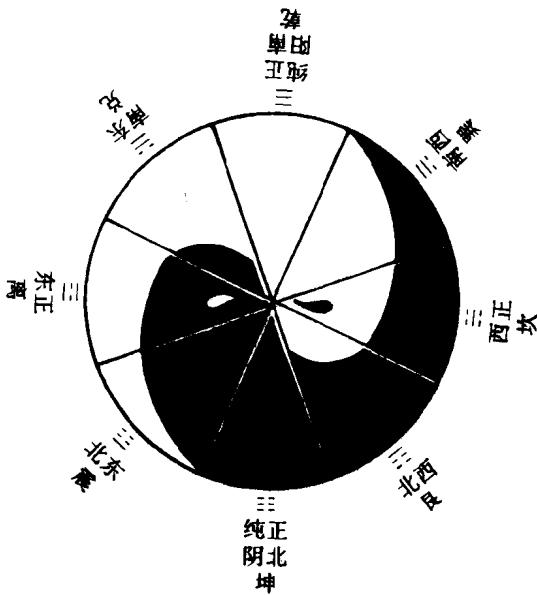


图 2 古太极图

据考证这幅《先天太极图》(《古太极图》)不一定是陈抟首创，其创意之根源在《周易参同契》。《周易参同契》最早提出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四正卦说，写道：“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设位者，列阴阳配合之位也，是谓坎离。”陈抟也认为古代易学思想，没有文字解说，“止有一图”，唯《先天方圆图》。明代学者杨慎(号升庵)引用有陈抟论《易》的一段话，说：“《易》学，意、言、象、数四者不可缺一。其理具见于圣人之经，不烦文字解说，止有一图，谓《先天方圆图》也。以寓阴阳消长之说，与卦之‘生变图’，亦非创意所作，孔子《系辞》述之明矣。”^①《先天方圆图》，即后来的《先天图》，这《先天图》是谁传给陈抟的？明代学者黄宗炎说是麻衣道者。“陈(抟)又受《先天图》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种放，放以授穆修与僧寿涯，修以《先天图》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天叟，天叟以授子尧夫。”^②麻衣道者是一位僧人，他的《太极图》从何而来，已无可考。这主要说明《先天太极图》不一定为陈抟所创制，他只是一位传授者。佛学著作中也是如此记载的：“处士陈抟受《易》于麻衣道者，得所述《正易心法》四十二章，理极天人，历诋先儒之失。抟始为之注。及受《河图》、《洛书》之诀，发《易》道之秘。”^③由于这张图长期以来采取秘密传授方式，外人莫知其来历。因其由陈抟的后传弟子所公开，故谓陈抟乃传授此图的祖师。陈抟本人未立文字，而其后传弟子形之于

① 《杨升庵全集》卷四十一《希夷易图》。

② 黄宗炎：《太极图辨》。

③ 《佛祖统纪》卷四十四。

图与文字，从而开创了易学象数学发展的新时期。饮水思源，追本于陈抟。若无陈抟所传之图，及口头传下的言与意，先天易学就不知何时出现了。

现在归纳起来，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先天图》的基本内涵何在？第二，先天易学的特征为何？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关于《先天图》（《天地自然之图》）的基本内涵。

按此图的构造，所包含的意义，大体可分四个层面。

一、《先天图》的外层为一大圆圈：○。这大圆圈表示无极的宇宙；天地万物，无不包藏其中；圆又表示无穷运转，万物生生灭灭，无始无终，永无休止。蕴涵无极即太极，太极本无极之意。

二、圆圈之内的阴阳二仪，白色象征阳，为动态，黑色象征阴，为静态，一动一静，妙合而凝，动静互含而“长于变”。阴气盛于北方，为纯阴，居坤位；阳气盛于南方，为纯阳，居乾位。黑白两条鱼形作环抱之状，象征阴阳二气𬘡缊交合，是“太极生两仪”之意。

三、阴阳消长表示为渐进过程，其中蕴含八卦之象。阴气极于北，阳气始生，震卦表示一阳二阴；发展到离位而阳二阴一，阴气居中为阳气包围；到兑而二阳一阴，阴呈消亡趋势，到乾而纯阳无阴。阳气极于南，阴气始生，巽卦表示一阴二阳；发展到坎位而阴二阳一，阳气居中为阴气包围；到艮而二阴一阳，阳呈消亡趋势，到坤而纯阴无阳。阴阳二气此长彼消，呈渐进有序的变化规律。故赵㧑谦肯定此图“有太极含阴阳，阴阳含八卦之妙”。此亦包含《参同契》月体纳甲说的阴阳消长过程。

四、阴阳二仪中的白黑二点，俗称鱼眼，白点为阳精，黑点为阴魄。黑中显白点，代表阴中有阳，象征月中含阳精；白中显黑点，代表阳中有阴，象征日中有阴魄。本于《参同契》：“蟾蜍与兔魄，日月双气明。蟾蜍视卦节，兔者吐生光。”此图象对修炼内丹有特殊启迪意义，故周敦颐有诗赞道：“始见丹诀信希夷，盖得阴阳造化几。”

这幅《先天图》，其所以又称《天地自然之图》，正因其阴阳二仪（即天地）衍化中，显露四时、四方阴阳变化的自然规律。邵雍的《先天八卦方位图》（《小圆图》）即由陈抟这幅《先天图》转化而来，成为他整个先天易学的基本图式之一，在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极大。

关于陈抟先天易学的基本特征。

（一）以图解《易》，“辞外见意”。这是先天易学的显著特点。

先天易学主张“不立文字”，只用简单的易图，解释《易》理。认为上古伏羲设卦，本来就是如此。自从周公、孔子系了词，作了传，人们就专在文字上下功夫，致使易图的奥妙反而隐晦。陈抟主张恢复伏羲画卦的本来面目。明代学者焦竑《焦氏笔乘》中，引一段陈抟的话：“羲皇始画八卦，重为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嘿观其象而已。如其象则吉凶应，违其象则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而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复晦。盖上古卦画明，《易》道行；后世卦画不明，《易》道不行。圣人于是不得已而有辞，学者一著其辞，便谓《易》止于是，而周、孔遂自

孤行，更不知有卦画微旨。”^①这的确是“一石击破水中天”的“画前有《易》”论。在宋以前，《易》学家中从未有人发表过如此大胆议论。儒家学者如果坚持此种观点，就是离经叛道了。这种观点，只可能从道教学者陈抟口中讲出来。陈抟所作的《正易心法注》中，还有类似的话，“学《易》者，当于羲皇心地中驰骋，无于周孔语言下拘挛”^②。又说：“羲皇画卦，不作纸上功夫也。”^③陈抟的意图很清楚，欲一反王弼以来扫象言理的传统，主张扫辞而尊象，先把《周易》经、传的权威打掉，将先天易学建立起来。陈抟另辟蹊径，只传《易》图，以象数明《易》，意在重新树立象数易学的权威。

(二) 以“心法”通《易》，意、言、象、数四者贯一。这是先天易学的根本。

陈抟认为《周易》的基本原理，无非阴阳之道。阴阳原理普遍适用于宇宙万物。原理只此一个，而三教九流各有其认识和诠释。由于各自悟性不同，所领悟的道理当然各异。他说：“《易》之为书，本于阴阳。万物负阴而抱阳，何适而非阴阳也。是以在人惟其所入耳。”^④他举例加以说明，《易》道在各方面的应用，都是各自领悟不同的结果：“文王周公以庶类入，宣父以八物入，斯其上也。其后，或以律度入，或以历数入，或以仙道入。以此知《易》道无往而不可也。”^⑤既

^① 焦竑：《希夷说易》，《焦氏笔乘》卷一。此观点亦见于《正易心法注》第四章。

^② 《正易心法注》第四十一章、第一章。

^③ 《正易心法注》第一章、第四十一章。

^④ 《正易心法注》第四十一章。

^⑤ 《正易心法注》第四十一章。

然对易道的认识千差万别，因人而异，就应提倡随心所欲，各悟其理，而不应以周公的卦爻辞与孔子的《易传》为唯一根据。因此他提倡“辞外见意”，即抛开《周易》的卦辞、爻辞和孔子所作的《易传》，尊重易图，别开生面、自行领悟。他称这种学《易》方法为“活法”。他说：“惟苟束于辞，《训》则是犯法也，良由未得悟耳。果得悟焉，则辞外见意，而纵横妙用，惟吾所欲，是为活法也。”^①“束于辞，《训》则是犯法”，这是说研《易》者如果受儒家奉为经典的卦爻辞和《易传》的束缚，则陈抟所写的《正易心法注》，就是离经叛道之论。陈抟将其为麻衣道者《正易心法》所作的解释称为“训”，又称“消息”。《正易心法注》开宗明义写道：“正易者，正谓卦画，若今经书之正文也。据周孔辞、传，亦是注脚。每章四句者，心法也；训于其下，消息也。”^②

陈抟认为伏羲作易只有图，不立文字。图乃《易》之正本，周孔所加的辞、传，均是注脚。故学《易》只须从易图上下功夫，用心领悟；坚持这种“活法”学《易》，才是正道。一味“于周孔言辞下拘挛”，只会受束缚于言辞，如鹦鹉学舌，不可能有新思想，更不可能深悟《易》道。

古代隐者，往往先尊奉周孔之道，几经碰壁，此路不通，乃反其道而行之，从而形成思想异端，否定周孔之道，自行其是，对宇宙、社会和人生诸方面的问题，开始新的思考，另辟蹊径进行探索。他们十分明白，不受周孔思想的束缚，别出心裁，往往就会被正统思想目为“犯法”；可是他们就是有

^① 《正易心法注》第四十一章。

^② 《正易心法注》卷首。

“九死其无悔”的气概，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自诩所坚持的乃是“活法”。陈抟解《易》正是这样的思想典型。

（三）将易学进一步道学化。这是先天易学的本质特性。

陈抟坚持“活法”，“辞外见意”，另辟蹊径，探讨《易》的本源，仿佛坚持了新思想，其实只不过把他推崇的老庄思想奉为正宗，用老庄思想解《易》理，使易学进一步道学化而已。所谓“于羲皇心地中驰骋”，无非是放肆地将道家思想塞进《易》学中去。《周易》本是儒家经典，道家早已接过去，成为“三玄”之一，通过玄学方式，与老庄思想合流；同时，历代道教徒也大量利用《周易》的图象与文辞宣扬道教理论。陈抟所谓的“活法”，道教学者贯彻起来是得心应手的。陈抟抛开《周易》卦爻辞和《易传》思想体系，按照道家思想原则和道教教义的需要，特别是道教内丹术的需要，着力改造《易》学。提出一些改造《易》学的基本观点。一则曰：“人间万事”，“无有定实”。他说：“六子假乾坤以为体，重卦合八卦以为体，若分而散之，则六子、重卦，皆无定体也。……以是知人间万事，悉是假合阴阳一气，但有虚幻，无有定实也。”^① 这实际是把道教从佛教那里接过来的空无本体论，塞入易学，开以佛学思想解《易》之先河。麻衣道者是佛教徒，又成为道教学者陈抟的老师和挚友，一个写《心法》，一个作“消息”。难怪二人一唱一和，自然合拍。二则曰：《易》乃“戒动”之书。《老子》主静，认为“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陈抟解《易》，认为易道“运之则分为四象，静之则总归太极”。宇宙是个太极，人体是个小太极，要依据太极图去

^① 《正易心法注》第二十一章。

“心”悟其理，“只须冥心太无，体认生身受命之处”。“必须以守贞为主。故《易》者，戒动之书也”^①。这同僧肇鼓吹“日月历天而不周，江河竞注而不流”的观点是相通的。三则曰：天下吉凶祸福，“未始有常”。《老子》谓：“狂风不终日，骤雨不终朝”，事物总要发生转化。佛教更谓事物总是成住坏空时刻变动无常。陈抟利用《周易》“反对”说，否定事物有常，他写道：“世虽知有‘反对’之说，不能知圣人密意在是也。盖二卦‘反’而为二，‘对’而为四，既列序之，又以《杂卦》推明其义者，以为天下吉凶祸福，富贵贫贱，其实一体也。别而言之，其代谢循环，特倒正之间耳，未始有常也。”^②《周易》本是讲运动变化的书，主张“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陈抟以道家“主静”思想别解《易》理，认为这才符合“人身未生之前之面目”，他说：“两仪即太极也，太极即无极也。两仪未判，鸿蒙未开，上而日月未光，下而山川未奠，一气交融，万气全具，故名太极，即吾身未生之前之面目。”^③陈抟将“两仪”比喻呼吸之气，“两仪未判”，即呼吸之气未发；“鸿蒙”比喻人的思想，“鸿蒙未开”，即人身尚无思想的状态；“日月”比喻人身知觉，“日月未光”，即人身知觉未萌；“山川”比喻人身运动之体，“山川未奠”，即人身运动之体尚未成形，总之这是一种静止状态，太极虽是“万气全具”，尚处在静止状态时，则“两仪

^① 道教经典《玉诠》引陈抟语。

^② 《正易心法注》第十六章。

^③ 《玉诠》卷五引自《太极阴阳说》。（《玉诠》，作者不详，载《道藏辑要》鬼集五）

未判，鸿蒙未开，日月未光，山川未奠”。这就是所谓“静之则总归太极”。“守贞”、“戒动”，就是要以心承受“太极未判之时一点太虚灵气”。^①

(四)传授易图意在阐明丹道。这是先天易学的终极目的。

研究《易》学，有多方面的意义和目的。或汲取经邦济世的社会政治思想，或继承其革故鼎新的社会变革理论，或借鉴其朴素辩证法思想作为探讨宇宙和生命奥秘的指导原则，或弘扬其“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人道原则作为调协人际关系的指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易学足以满足不同阶层人民的思想文化需要。陈抟倡导先天易学，其主导思想并不在经邦济世，亦不在调协人际关系，而在于指导羽林进行内丹修炼，以期人与自然同一，而达于真人之境。陈抟说：“太极，即吾身未生之前之面目”，炼内丹的静功，要求人体回复到“胎息”状态，也就是“未生之前”的相对静止状态。陈抟《先天图》表达的思想，八卦方位说，阴阳消息说，都是炼内丹所当掌握的。陈抟的《先天图》本来取法“万古丹经王”《周易参同契》，他又曾用先天易学思想注释道士阴长生所写《阴真君丹诀》，周敦颐曾经读到陈抟所写的丹诀注，以诗称赞道：“始见丹诀信希夷，盖得阴阳造化几。”认为陈抟以阴阳消息讲内丹术，是悟得“造化之几”。足见陈抟在武当山、华山，“手不释卷”深研易理，其最终目的正在用以阐明内丹秘奥。这恰是陈抟先天易学的特征之一。陈抟将道教从注重符篆、外丹，转向注重内丹修炼，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道教的发展作了重要贡献。学《易》不离丹道，炼丹必通

^① 《玉诠》卷五引自《太极阴阳说》。

《易》学。正是他创立先天易学的基本目的。

二、《易龙图》与天地之数

陈抟著有《易龙图》一卷，此书不传，遗《易龙图序》一篇，存《宋文鉴》。他用《先天图》描述天地阴阳自然变化之象，又用《易龙图》描述《易传》所说的“天地之数”。前者属象学，后者属数学，引人注目。

《易传·系辞下》第九章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地之数”被说得神乎其神。此“天地之数”奥妙何在？历代易学家都想破译它。陈抟之前，还未见有人画出图来。陈抟共画有20幅图，描述“天地之数”的分合变化，可惜失传了。宋元之间道士雷思齐可能见过这些画，对之略有记述。他说：“由汉而唐，《易经》行世。凡经传疏释之外，未有及于‘图书’之文刊列经首者。迨故宋之初，陈抟图南始创意，推明象数，自谓因玩索孔子三陈九卦之义，得其远旨，新有书述，特称《龙图》，离合变通，图余二十，是全用《大传》天一、地二至天五、地十、五十有五之数，杂以纳甲，贯穿《易》理。”雷思齐说这20幅图，“并无传例言说”、“别无义例辞说”。至于陈抟如何从孔子“三陈九卦之义”，^①得到深刻启发，从而“创意”画

^① 《系辞下》第七章。指三次论析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九卦义理。

出 20 幅《龙图》来，因无文字说明，已难推论。雷思齐说“杂以纳甲，贯穿《易》理”，对天地之数加以“离合变通”，是 20 幅《龙图》的基本内容。

《易龙图》向有争议。朱熹认为那是“假书”；《宋文鉴》的编者吕伯恭（东莱）认为乃陈抟之作，故将其《序》收录。本来《易龙图》已不全，又别无文字说明以予研究。好在有《序》存在，可以略窥端倪。

《易传》说过：“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以画八卦。陈抟的《易龙图》，简称《龙图》，说是古代“龙马负图”的显现。陈抟在《易龙图序》中开宗明义，论及“龙图”发展的过程，“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他写道：

且夫龙马始负图，出于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
今存已合之序，尚疑之；况更陈其未合之数邪？然
则何以知之？答曰：“于夫子三陈九卦之义，探其旨，
所以知之也。况夫天之垂象，的如贯珠，必有差，则
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于万，皆累累然如系于缕也。
且若《龙图》本合，则圣人不得见其象；所以天意
先未合其形其象，圣人现象而明其用。是《龙图》者，
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

《易龙图》形成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天意先未合”，即“散而示之”，成天地未合之数的图形；第二，“伏羲合而用之”，即“今存已合之序”，成天地已合之位的图形；第三，“仲尼默而形之”，可惜未明白地画出图形，以传后世，其实

正是龙马所负之图，陈抟“创意”绘制，可补仲尼之缺。

这《龙图》形成的过程，称为“龙图三变”。元代易学家张理的《易象图说》，载有“龙图三变”的具体图式。大体上是根据《易龙图序》中所示思路绘制出来的，共有六图。

第一变，用两种图式，描绘“天地未合之数”。

《序》云：“始龙图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数。上二十五，天数也。中贯三、五、九，外包之十五，尽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用。……兹所谓‘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数也，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三〕十分而为六，形地之象焉。”^①

所谓“未合之数”，指天数五与地数五分开，用两种图式表述。如图3、图4。

图3，描述未合之五天数，1、3、5、7、9，其和为25。按5数一组进行组合，得5个5。这是天数、阳数，用“○”表示。5个5，排列成十字阵，其中横、竖都是三个5，故称“天三”，每个5均由5个○组成，其中轴线上共有9个○，故称“天九”。横、竖的“天三”其总数为15，称“十五之用”。

图4描述未合之五地数，2、4、6、8、10，其和为30。按6个数一组进行组合，得5个6。这是地数、阴数，用“●”表示。5个6，排列成十字阵。“〔三〕十分而为六”，亦分五位。显示地方的形象。

两图上下并列，天数在上，地数在下。总数为55。即“龙图之未合，惟五十五数”。天数5个5，地数5个6，“皆明五之用”。

^① “〔三〕十分而为六”，原缺“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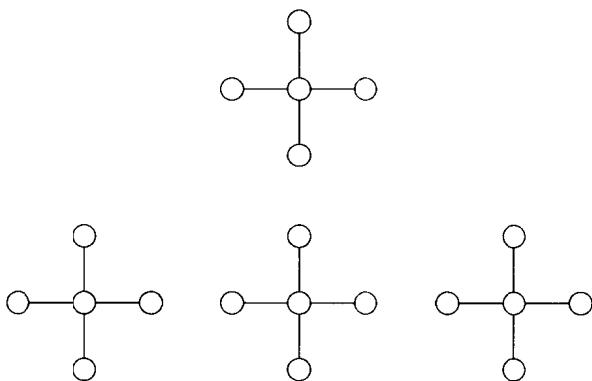


图 3 天数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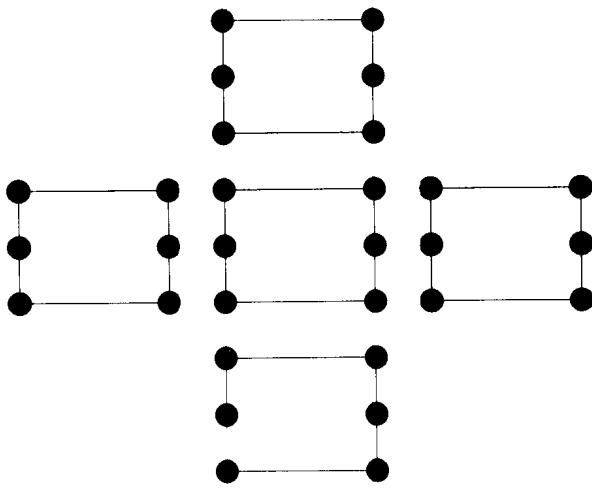


图 4 地数五

第二变，用两种图式，描绘“天地已合之序”。

《序》云：“后形，一、六无位，又显二十四之为用也。……六分而成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则一不配，形二十四；在下则六不用，亦形二十四。”

“天地已合之序”，由天数五与地数五交错配合而成，使10个数各安其位。奇特之处在于，陈抟规定无论天数还是地数，依上二图的5个5、5个6的组合，有的有位，有的无位。这种规定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其图天数与地数交合排列，虽云已合，亦分二图，如图5、图6。

图5，由天数五（图3）变来。其中包含三个天数，天1、天3、天5；两个地数，地2、地4，是为叁天两地，五行中5个生数。天数上5一组，其一不动，去4个阳数，即“在上则一、六不配，形二十四。”左5一组去1存4，右5一组去2存3，下5一组去3存2。中5一组维持原数。“叁天两地”，共去掉天数中10个数。只存15，此谓“并十五之位”。

图6，由地数五（图4）变来。其中包含两个天数，天7、天9；3个地数，地6、地8、地10。由图5中的5个数，各加以5，合并而成。即天1加5为地6，地2加5为天7，天3加5为地8，地4加5为天9，天5加5为地10。图6中的5个组为6、7、8、9、10之数，代表五行成数。两图合并总数为五十有五，乃“天地之数”。天象与地象各有奇偶之组相配合，称之为“已合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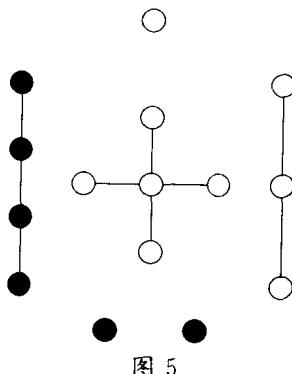


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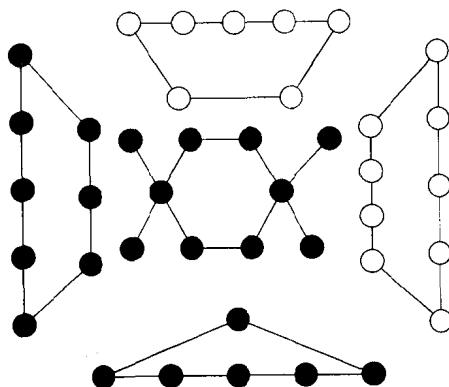


图 6

第三变，用两种图式，描绘“河图”与“洛书”，即完成“龙马负图”的形象。

《序》云：“后既合也，天一居上为道之宗，地六居下为地之本。三干、地二，地四为之用。三若在阳，则避孤阴；在阴，则辟寡阳。大矣哉！《龙图》之变，分歧万途。今略述其梗概焉。”

第三变是将第二变中的两图按一定规则加以合并。合并之后，就是龙马所负之《河图》。如图 7，再予以方位调整，则成为《洛书》，如图 8。两图的名称，北宋与南宋恰好相反。兹从南宋称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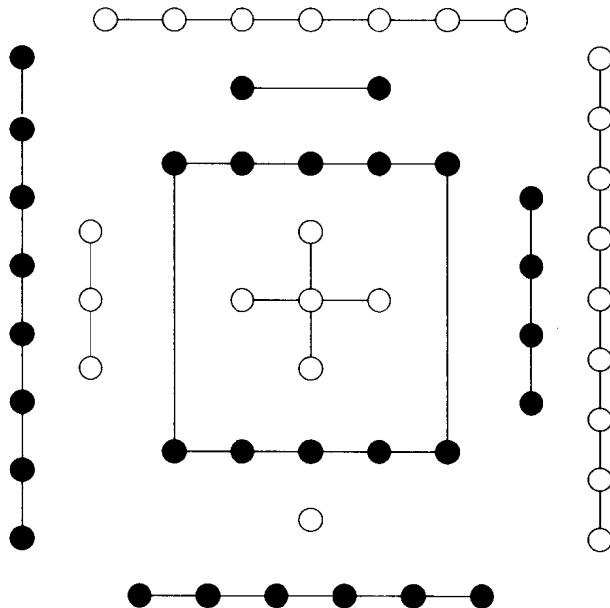


图 7 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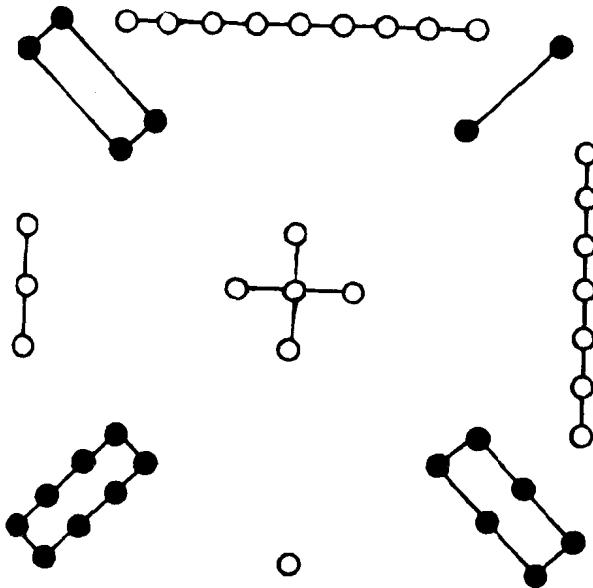


图 8 洛书

《河图》形成的过程是：图 5 的天 1 居图 6 的地 6 之上；即“天一居上为道之宗，地六居下为地之本”。图 5 的天 3、地 2、地 4 亦依上述规则，同图 6 的天 7、地 8、天 9 相配，这叫做“三干、地二、地四为之用”。其中有一补充规定，“三若在阳”，则不能配“孤阴”，“（三若）在阴”，则不能配“寡阳”。这里的“三”，是指天数中的 1、3、5；地数中的 6、8、10。“孤阴”，指地数中的 2、4；“寡阳”，指天数中的 7、9。即是说两图合并时，天数 1、3、5，不与地数 2、4 共处；

地数 6、8、10，不与天数 7、9 共处。这叫做“避孤阴”、“避寡阳”。其实简单地说来，就是五行之生数与五行之成数相配合，汉代早已如此，其歌诀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同道，四与九为友，五与十相守”^①。分居东西南北中五位。

《洛书》的形成过程，是图 5、图 6 相交，图 5 中的 5 不动，图 6 中的 10 隐藏不见，只余天数 1、3、5、7、9，地数 2、4、6、8，共 1 至 9 数。凡奇数（天数），居四方之正位；凡偶数（地数），居四隅之位，乃成九宫图。其歌诀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②由右向左横读其数则为：“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古代将其看作一组神秘数字，最初见于《大戴礼》，用以代表明堂九室的建制。由于无图，这些数字曾经长期未能破译。

不难看出，陈抟经过“《龙图》三变”，而得到《河图》与《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流传的一些神秘数字，这些数字在《黄帝内经·素问》、《灵枢》中，在《吕氏春秋》、《礼记·月令》中，在扬雄《太玄经》中都出现过。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公元前 165 年）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已是文物证据。只在汉唐易学家著作中，尚未以图式出现，所以有人怀疑《河图》与《洛书》是否由陈抟“创意”制作。《易龙图序》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天地之数”的新的解

^① 扬雄：《太玄·玄图篇》。

^② 《黄帝九宫经》。

释，由“未合之数”，到“已合之序”，是一种新的猜测，确有“创意”。

总之，《易龙图》20幅虽不可见，由以上6图，大体可以看出陈抟的用心，无非是诱导人们不安于古圣人对易学的既有解释，要用力去探讨“画前之《易》”。探讨上古有图而无书的漫长年代先贤们是如何思考、创作象数图式的，这些图式如此古老，它究竟反映了古代智者的哪些思想？陈抟的后学者范谔昌，著《太易源流》，论述《龙图》的意义，说：“龙马负图出河，羲皇穷天人之际，重定五行生成之数，定地上八卦之体。故老子自西周传授孔子。造《易》之原，天一正北，地二正南，天三正东，地四正西，天五中央。地六配子，天七配午，地八配卯，天九配酉，地十配中，寄于未，乃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矣。”^①

范谔昌这段话，主要肯定《龙图》不止诱导羲皇画八卦，并定五行生成之数，把五行同八卦看作一个源头；而且“天地之数”的特殊组合，更是古人用以制定时间（子、午、卯、酉）和空间（东南西北中）相统一的图式。陈抟先天易学另一后学者雷思齐，著《易图通变》，进而指示《龙图》在认识宇宙衍化规律中的重要意义。他说：这是羲皇“为天地立心”的良苦用心。“是知数之有生有成，而不知所以生且成者，徒得其貌，而无以得古圣人之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者，千载可为之长太息，则古犹今也”^②。又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① 《易图通变》引。

② 雷思齐：《易图通变》卷三，《河图传》（中）

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于此？其曲尽乎至妙之用者，《河图》法也。”^①这是说，陈抟传授的《龙图》包括《河图》与《洛书》，所构成的五行生克和八卦运化原理，正是古人为后世提供的宇宙生成，万物衍化的巧妙图式，也可说是人们借以探索宇宙奥秘的一张指示图。

由《龙图》的传承，可知陈抟治《易》尤在掌握“物理之本宗”。他在《正易心法注》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挂一而不用之义，学者徒知一为太极不动之义，而不知其义实落处也。何则？一者，数之宗本也。凡物之理，无所宗本则乱矣；有宗本焉，则不当用，用则复乱矣。且如轮之运，而中则止；如辂之行，而大者后；如网之有纲，而纲则提之；如器之有柄，而柄则执之；如元首在上，手足为之举；如大将居中，士卒为之役；如君无为而臣有为；如贤者尊而能者使。是知凡得一者，宗也，本也，主也；皆有不动之理。一，苟动焉，则其余错乱而不能施设者矣。”^②陈抟是用黄老道家贵“一”思想解释太极为“一”，及其不动之理。《先天太极图》、《易龙图》都贯彻了贵“一”思想。邵雍的先天易学，正是阐发这“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矣”的道理。这是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作出的概括。

朱熹对邵雍根据《先天太极图》和《易龙图》所作的阐发，予以充分肯定：“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

^① 雷思齐：《易图通变》卷三，《河图传》（中）

^② 《正易心法注》第三十五章。《道法宗旨图衍义》卷下引（《正统道藏》第54册）。

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终始之变具焉。”又云：“其曰画前之《易》，乃谓未画之前，已有此理。……非谓画前已有此图，画后方有八卦也。此是《易》中第一义也。”^①朱熹的评论，深入到《易龙图》、《先天图》的哲学本体论意义。图书之学在宋代兴起，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从哲学本体论上引人注目的。认定陈抟的先天易学，成为宋明理学的先驱，也是从本体论上着眼。

《易龙图》所涵的《洛书》，无论是否为陈抟“创意”制作，在科学史上的价值，值得大书特书。著名科学史家钱宝琮对此有高度评价。他称赞《洛书》说：“三数相加都得十五，这是很令人惊奇的。 n^2 个自然数排列在每边 n 格的方图里，纵横斜 n 数相加都得相同的和，南宋算学家叫它‘纵横图’，日本叫它‘方阵’，西洋人叫它‘幻方’（magic square）。上面所画的第二图（指《洛书》），是世界上最古的三行纵横图。北宋的《易》学大师叫它《河图》，南宋人又叫它《洛书》，都说是伏羲画八卦时候的奇迹。”^②

《易龙图》失传，《易龙图序》却得以保存，这不是偶然的。当代学者蒙文通对此有过中肯的论述：“观于希夷，鸿蒙受诏酬对之际，正其宗风所在，视林灵素辈之术，非能之而不言，殆有不屑为者。则已厌上来隋唐之旧辙，而极深研几于图书象数，此又新旧道流之大限也。吕东莱编《宋文鉴》，于希夷取《龙图序》一篇，此正宋之道家，所以异于隋唐符

^① 《朱子大全》卷三十八。

^② 《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29—230 页。

篆丹鼎之传者，故东莱取之耳。”^① 陈抟集中精力研究图书象数，创立先天之学，是中国道教思想发展的新阶段的需要，也是陈抟对道教思想文化的重大贡献。蒙先生的观点，为我们研究陈抟的易学思想和道教思想，指明了关键之处。

^① 《陈碧虚与陈抟学派》，《古史甄微》，巴蜀书社 1980 年版。

第四章 参悟内丹指玄机

前期封建社会，中国道教的主要修炼方式是炼金丹。自葛洪以来，道士们将炼金丹作为重要法术加以渲染、传播、炫耀，深受封建贵族欢迎。士大夫以炼丹、服丹自豪。封建统治者受还丹升仙所诱惑，信之如神，大肆服食。服食仙丹的长生术，因受到众多帝王、大臣、文士的信从，声誉日隆。炼丹过程中的某些化学变化，由于可以重复实验，的确相当令人迷惑。然而，事实往往不如道士的理想，服丹者多，而真正长生、成仙者百不见一；事实恰好相反，帝王因滥服金丹而夭亡者，在唐代中期屡屡发生。人们对金丹的长生效应大加怀疑，佛教和社会舆论，乘机大肆攻击，不断予以揭露。道教的威信日渐低落。金丹术在唐代发展到顶峰，同时又将道教引入困境。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道教学者在深思。

炼食金丹长生，此路不通。羽林高人纷纷改弦易辙另谋出路。集中精力在其他道术上下功夫。房中术早已受到攻击，

不再大肆申张了。辟谷、守一、存神、吐纳、胎息、服气、坐忘，成了注意的中心。隋代苏元朗重新解释《参同契》，以之指导内丹修炼的思想，逐步获得唐代道士们的普遍重视，于是内丹术著作，相继出现，自唐末至五代，外丹术日益衰落，内丹术大为兴盛，道教的修炼方术，由注意烧炼五金八石的外丹术，逐步转变为注重心性修炼的内丹术。强调修心养性是延续生命、改善体质、防治疾病的重要法门。在唐末五代社会大动乱的历史条件下，这无疑为广大苦难民众指出了一条自我修炼、摆脱烦恼的宗教途径。陈抟正是在道教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出现的卓越人物。

陈抟在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正徘徊在歧途中，面临着选择生活道路的转折关头，因得到孙君仿、麌皮处士两位高人指引，皈衣玄门，隐居武当山；幸遇五位老人（五条龙）点化，授以“蛰龙法”，将他引入内丹修炼道路。陈抟不满足于一得之功，遍游名山，访谒高道，得蜀中高公何昌一秘传的“锁鼻飞精”之术，由此而内丹功夫进入高层。陈抟是博学深思的隐者，自然不限于仅掌握几种内丹方术，力图从道教理论上探讨人体奥秘和生命哲学。他所传授的《无极图》和写下的《指玄篇》、《阴真君丹诀注》，是他对内丹理论探讨的结晶。

一、《无极图》中悟丹道

陈抟传授下来三种易图。《先天太极图》讲宇宙万物的演化；《易龙图》讲“天地之数”的变通。还有一幅《无极图》，是他运用《易》学研究内丹而悟出的绝妙道理，这幅图可用

以解释生命奥秘，诠释内丹理论，有道教意义，也有哲学意义。

《无极图》的哲学意义，在于此图几经传授，到周敦颐那里，略加改造，成为周氏《太极图》，为阐发宋明理学的宇宙衍化论，提供了一幅前所未有的精巧图式。

陈抟传授《无极图》，主要在阐述内丹思想。这是道教学者所一贯重视的。本来利用《周易》理论与图式解说炼丹过程，《周易参同契》早已开其端；唐末五代以来，更加成为风气。五代彭晓所注《周易参同契》，就有《明镜图》、《水火匡廓图》、《三五至精图》。陈抟以图式代替文字，解说《周易》，解释丹道，本不为奇。不过陈抟传授《无极图》，并将此图刻在华山石壁上，垂之永远，毕竟是一大功劳。关于此图的来历，清代易学家黄宗炎《太极图说辨》中指出：“考河上公本图，名《无极图》，魏伯阳得之以著《参同契》，钟离权得之以授吕洞宾。洞宾后与陈图南同隐华山，而以授陈；陈刻之华山石壁。”根据这一说法，《无极图》首创于汉代河上公，钟离权得到后传之吕洞宾，吕洞宾再传与陈抟，陈抟无比珍惜，唯恐有失，乃刻之华山石壁。这一《无极图》，在促成宋元时期的道教由注重外丹黄白术，转向内丹修炼术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因陈抟在发展道教、传授内丹的历史功绩，羽林尊之为“陈抟老祖”。

《无极图》，如图 9，其重要内容如何？清代学者黄宗炎对之作了一番细致的解释，他的解释分总论及五个层次：

一、总论全图之奥妙。他说：“其图自下而上，以明逆则成丹之法，其重在水火。火性炎上，逆之使下，则火不熛烈，惟温养而和燠；水性润下，逆之使上，则水不卑湿，惟滋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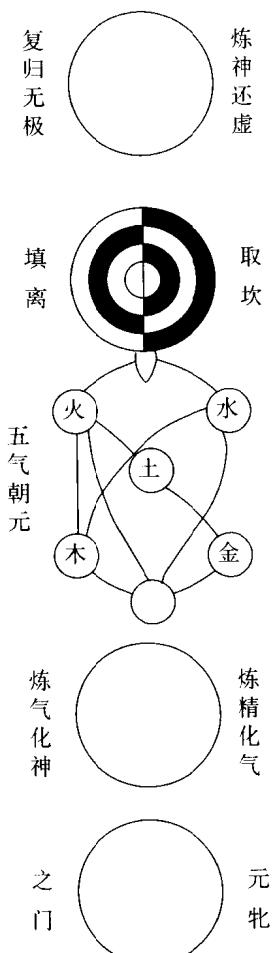


图 9 无极图

而光泽。滋养之至，接续而不已；温养之至，坚固而不败。”

这是说《无极图》当由下而上逆看，蕴涵着“逆则成丹”的道理。所谓逆，也指逆水火之性。火性炎上，逆而使之下，水性润下，逆而使之上。这里的水火，指的是肾水与心火；一上一下，乃可臻于水火既济的生命妙境。

二、释最下一圈。“其最下圈，名为玄牝之门。玄牝即谷神。牝者，窍也；谷者，虚也。指人身之命门，两肾空隙之处，气之所由以生，是为祖气。凡人五官百骸之运动，知觉，皆根于此。”这里说的是方士修炼，由提升“祖气”开始；“祖气”贯通五脏、百骸，人的运动、知觉均根于此。而“祖气”是寄于“命门”的所谓丹田之气。“命门”，指人身两肾之间空虚之处。中国传统医学，十分重视“命门”的作用。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专门著有《命门考》。《本草纲

目》写道：“（命门）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为生命之源，相火之祖，精气之府，人物皆有之，生人生物皆由此出。”^① 李时珍称命门为“精气之府”，黄宗炎说它是“祖气”所生之地，二者是一致的。

三、释下数第二圈。“于是提其祖气，上升为稍上一圈，名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有形之精，化为微芒之气；炼依希呼吸之气，化为出入有无之神。”这是说“祖气”上升，加以提炼，乃发生变化，有形之精，化为微芒之气，依希呼吸之气，化为出入有无之神。也就是化精气为呼吸之气；使呼吸之气化为人的精神。这精气（祖气）是先天具有的，呼吸之气是后天运化的。由于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的交合运化，生命得以延续，精神得以产生和焕发。在《无极图》中，“玄牝之门”用一“○”作代表，表示虚空的玄牝，及所产生的无形之“祖气”。“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同样用一“○”作代表，表明无论“精气”、“呼吸之气”，还是“精神”，依旧是一“无形”虚空的存在。

四、释下数第三圈。“（气与神）使贯彻于五脏六腑，而为中层之左木、火，右金、水，中土相联络之一圈，名为‘五气朝元’。行之而得也，则水火交媾而为孕。”这是说所炼之气，贯通于脏腑，统帅水火木金土五气，凝聚为一体，是为“五气朝元”。五气之中，水火二气最关紧要，居于图中上位。炼气过程即是使火气下降，水气上升；火不燥热，水不卑湿；水火交媾，达到温养之至。由于人体五脏属阴，六腑

^① 《胡桃·发明》、《本草纲目》校点本第三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年版，第1804页。

属阳，五脏六腑本相贯通，交互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呈现网络结构，凝结为一体。关键在于水火交媾，可发生新变化，产生新效应。

五、释下数第四圈。“又其上之中分黑白而相间杂之一圈，名为‘取坎填离’，乃成圣胎。”这是说水火二气交媾，而又不燥、不湿，温养之至，引起质的变化，形成“圣胎”，也就是“仙胎”。“圣胎”的形成，是经过长期修炼，“取坎填离”，水火交济，心火肾水不断交流，达到中和之至的境况而产生的最终结果。《无极图》中，那黑白间杂的一圈，是有规则的，黑色代表阴，白色代表阳。左半部，二白中黑，为阳、阴、阳，乃离卦（☲）之象；右半部，二黑中白，为阴、阳、阴，乃坎卦（☵）之象。二卦相合，表示坎离相交之形，亦水（肾）火（心）相济之象。坎离二卦之中有一小白圈，即是所孕之“圣胎”。

六、释《无极图》最上一圈。“又使复还于无始，而为最上之一圈，名为‘炼神还虚，复归无极’，而功用至矣”。这是说“圣胎”修炼，已进入最高境地，即所谓“神仙”境界。这种境地是虚无飘渺，无形无象，无声无色，无有极限的，下同“祖气”所出的“玄牝之门”相应，故谓之“炼神还虚，复归无极”。达到此种境界，就是道家炼养的最高成就。

由玄牝之门产生的无形无象、无声无色的“祖气”开始，经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进而达到“五气朝元”，这是修炼过程中从无到有的过程；然后，由“五气朝元”，进一步“取坎填离”，“水火交济”，而结“圣胎”，再进而达到“炼神还虚，复归无极”，这是修炼过程中从有到无的阶段。整个过

程可概括为无——有——无的往复过程，故此图名为《无极图》。从无化有，由有化无，就是《老子》主张的“有无相生”原理，也就是所谓“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①《无极图》解析的是一本“无极”经，其思想渊源，导自《老子》。

不难看出，陈抟《无极图》借用并改造《周易参同契》中的一些内容，如“五气朝元图”，本于《参同契》的“三五至精图”，“取坎填离图”本于《参同契》的“坎离交媾图”。不同之处在于，《参同契》主要讲的是外丹黄白之术，《无极图》所讲的却是“内丹”修炼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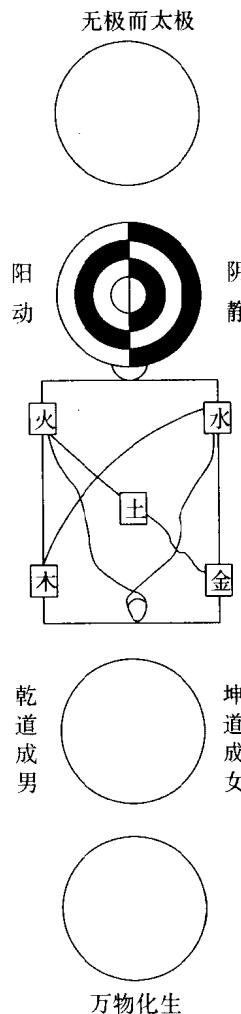


图 10 太极图

^① 《老子》第 28 章。

陈捷的《无极图》传到周敦颐后，从探讨生命哲学进而探讨宇宙衍化理论，将此图改造成为周氏《太极图》，如图 10。这两个图，从图式上看，可以说基本相同；从其所涵内容看，则大有区别。关键在于周敦颐对此图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两者的根本区别，黄宗炎《太极图辨》讲得比较明白。他写道：“周子得此图而颠倒其序，更易其名，附于《大易》，以为儒者之秘传。盖方士之诀，在逆而成丹，故从下而上；周子之意，在顺而生人，故从上而下。”这里所谓“颠倒其序”，不是说将图形颠倒，只是说阅读此图时，与读《无极图》的顺序相反，不是从下而上，而是从上而下，上下次序颠倒。方士讲的是“逆则成丹”，故从下起；思想家讲的是宇宙万物生成次序，讲“顺而生人”，故从上起。黄宗炎的这一诠释，恰中的鹄，使人豁然开朗，易于领会此图要领。

周敦颐的《太极图》是如何揭示宇宙生成次序的？他写了一篇《太极图说》，这篇文章可称千古奇文，只用 248 字，以精炼的语言，揭示极为深奥的宇宙生成原理，令人倾倒。全文如下：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宜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万物生焉，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为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

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自注：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自注：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太极图说》言简意赅，揭示了图中十分丰富的内涵，包含着《周易》全书的要领。历代学者对此图多有解说，心悟不一，详略各别。大体说来，阐述了宇宙万物衍化的四个阶段。

第一层，无极阶段。无阴无阳，无动无静，无形无象，无始无终，唯存“太极”，以为天地之始。故名“无极而太极”。

第二层，太极分化阶段。原初物质之气，分化为阴阳二仪，阳动阴静，形成天地。

第三层，五行交合阶段。从阴阳二气生出特性不一的五行之气，二五之精凝聚，形成化生万物的物质材料，蕴涵万物的共同本性。

第四层，万物形成阶段。阴阳、男女（雄雌），两性交合，产生万物。禀二五之秀气者，乃为人类，与其他物类不同之点在于有知觉、精神。万物与人，物物一太极，人人一太极，原始反终而运化无穷。

冯友兰先生评论周子《太极图说》的贡献云：“周濂溪取道士所用以讲修炼之《太极图》，而与之以新解释、新意义。其解释此图之《太极图说》为宋明道家中有系统著作之一。宋

明道学家讲宇宙发生论者，多就其说推衍。”^①

当代易学家朱伯崑先生更对周敦颐《太极图》的内涵，作了详细解析和公允评价。指出：“这种从宇宙开始到人类的演变过程，即无极——太极——阴阳二气——五行之气——万物和人类，是以前的儒家哲学所少有的，也是对汉唐易学中的宇宙论和李觏的太极元气说的发展。其以无极为世界的本源，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说法，但是从太极元气以下，其对于世界形成的论述，则是唯物主义的。”^②

周敦颐扬弃道教炼丹术，重新解释陈抟《无极图》，而发展儒家的宇宙本体论，这固然是他本人经过深思熟虑，“不由师说，默契道体”，而作出的理论贡献；但推其本始，陈抟传下《无极图》，形象地展示了从无到有，再从有入无的思维模式，对周敦颐产生重要启迪作用，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无极图》之所以能启迪新的思路，当然并非陈抟本意。但陈抟也好，周敦颐也好，都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太极观，这是一致的。无论陈抟的《无极图》，还是周敦颐的《太极图》，都可以说是对易学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在思想文化史上的贡献，都是超越往代的。

二、《指玄篇》里授功法

陈抟传授《无极图》，意在剖示修炼内丹的基本原理及其

① 《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824 页。

② 《易学哲学史》第二卷，华夏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8—99 页。

步骤，从图上看是五个层次；就内丹原理而言，是讲修炼的四个阶段：即“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①。或“得窍”、“炼己”、“和合”、“得药”、“脱胎求仙”五个步骤。可见陈抟不止剖示内丹原理，更注意具体修炼方法。在这方面，他写有两种著作，一是《九室指玄篇》（简称《指玄篇》），一是《阴真君丹诀注》（或称《阴仙丹诀注》）。前一种，《宋史·陈抟传》有记述：“（抟）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导引及还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笺其旨。”《指玄篇》由一位宰相为之作笺注，可见其影响之大。关于第二种著作，周敦颐读到过，并予以称赞。南宋咸淳元年（1265）眉山人杨栋在《东阳楼记》中说：“余曩登平都山，访濂溪周子旧游，乱碑中得小片周子题两绝句。……其一咏《阴仙丹诀》云：‘始观丹诀信希夷，盖得阴阳造化机；子自母生能致立，精神合后更知微。’”^②

陈抟在一首诗中，提倡炼内丹，不赞成炼外丹。诗云：

求仙不识真铅汞，闲读丹书千万篇。
内里明来是至真，外边入者即非亲。

关于内丹的秘奥，他在《指玄篇》中说：“邈元踪迹归玄武，潜有机关结圣胎。”^③ 所谓“圣胎”即指仙胎。《阴真君还丹

^① 黄宗炎：《太极图辨》。

^② 转引自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79页。

^③ 转引自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二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诀》中有句名言：“无质生质是还丹。”陈抟注释道：“从无入有，从有入无，将无质气结为阴气，交感是也。大丹无药，五行真气是也。”^①说明内丹之大药，无非人身内部的“五行真气”，而不是自然物质三黄八石。

元代道教学者俞琰在其《周易参同契发挥》中，引用了一段陈抟总结其内丹修炼经验的话，将炼内丹的过程及要点讲得十分具体。他写道：“眼含其光，耳凝其韵，鼻调其息，舌敛其气，叠足端坐，潜神内守，不可一毫外用其心也。盖眼既不视，魂自归肝；耳既不听，精自归肾；舌既不味，神自归心；鼻既不香，魄自归肺；四肢既不动，意自归脾。然后魂在肝而不从眼漏，魄在肺而不从鼻漏，神在心而不从口舌漏，精在肾而不从耳漏，意在脾而不从四肢孔窍漏。五者皆不漏矣，则精、神、魂、魄、意相与混融，化为一气而聚于丹田也。”^②这说明修炼内丹的诀窍，在于排除一切物质欲望，排除思虑杂念，使精神处于绝对宁静专一状态，让“五行之气”在体内平静舒缓地运化，最后聚于丹田。用内气的力量推动血脉，均匀有序地流行。离形去知，抱朴守一，达到“形神两超越”。这种精神状态，朱熹深有体悟，他在一首诗中有过很好的描述：“空山初夜子规鸣，静对琴书百虑清。唤得形神两超越，不知底是断肠声。”^③

陈抟通过自己依照“蛰龙法”、“锁鼻飞精术”，进行长期潜心修炼，总结一套方法与心得，口耳相传授予弟子，张无

① 转引自《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2期，第95页。

② 转引自《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2期，第95页。

③ 朱熹：《崇春客舍夜闻子规》。

梦（鸿蒙子）、陈景元（碧虚子）、刘海蟾得其秘传。海蟾弟子张伯端（紫阳真人）著《悟真篇》，继承、发展《指玄篇》思想，全面阐述道教内丹理论，宣传内丹修炼方法，成为内丹学重要著作。张伯端在《悟真篇》中称颂陈抟及《指玄篇》云：“梦谒西华到九天，真人授我《指玄篇》。其中简易无多语，只是教人炼汞铅。”^①《指玄篇》并没有许多精言妙语，无非教人“炼汞铅”的新方法。这汞与铅不再是山中出产的矿物，是人体自备的“五行真气”。《悟真篇》写一首诗说得明白：“未炼还丹莫入山，山中内外尽非铅。此般至宝家家有，自是愚人识不全。”^②“五行真气”是人人具有的“至宝”，是炼制仙丹的大药，只有愚人不识身中“至宝”，才到深山去找炼丹材料汞与铅。《悟真篇》中另一首诗，讲得更透彻。“休泥丹灶费功夫，炼药须寻偃月炉。自有天然真火候，不须柴炭及吹嘘。”^③这是说炼丹原来无须泥灶，无须柴炭，不用鼓风，有了五行真气，只在自身具备的“偃月炉”中，调节“天然火候”就行了。

陈抟所说的内丹，实际上是根据道教一贯提倡的内视、吐纳、守一、存神、胎息、辟谷等道术，加以总结，概括而成的一种养生功夫。流传于后世的陈抟睡功，就是这位内丹家独具的一种内丹功夫，能够一睡数月乃至数年，陈抟的后学者，纷纷传授所谓华山十二睡法，先天睡功，小休丹睡法、小搭桥卧功法，大搭桥卧功法、抱龙眠睡功法以至张三丰睡丹

^① 《悟真篇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② 《悟真篇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

^③ 《悟真篇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页。

诀等，都是从陈抟那里继承传授下来的。

陈抟睡功是一种内丹术，具有相当高的层次，其关键之点不离修炼肾水、心火，使臻水火济既。陈抟指出，同样是睡眠，有两种不同的性质，分世俗之睡与至人之睡，二者有天壤之别。世俗之人迷失宦海情场之中，名利声色汨其神识，脂酒膏醴昏其心志，即使在睡乡梦境，亦恶梦纠缠，无片刻安宁。至人则不同，他的睡就是一种修炼。至人之睡，留藏金息，饮纳玉液，苍龙守乎青宫，白虎伏于西室，真气运转于丹池，神水循环于五内，然后神出躯体，出没昆仑紫府，遍游福地洞天，冉冉如祥风，飘飘如白云，履虚如履实，升上若就下。不知岁月之迁移，何愁陵谷之改变。^①

陈抟还留下两首诗，描写至人之睡同世俗之睡，形成鲜明对照，描述了至人之睡所进入的玄妙精神世界。诗云：

常人无所重，惟睡乃为重。
举世以为息，魂离形不动。
觉来无所知，贪求心欲动。
堪笑尘世中，不知身是梦。

至人本无梦，其梦乃游仙。
真人亦无睡，睡则浮云烟。
炉里长有药，壶中别有天。
欲知睡梦里，人间第一玄。^②

^① 转引自《中国十大名道》，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

^② 转引自《中国十大名道》，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陈抟所说的至人之睡，同常人大不一样。后者借睡觉作为短暂休息手段，睡梦中亦难排除世俗烦恼，常被恶梦惊醒，醒来之后，依旧在尘世中挣扎，在名利场中苦斗，为贪欲之心所驱动，睡觉对他们来说，只是短暂的休战而已。至人之睡，则是排除尘世干扰，置身逍遥境界，清清静静，坦坦荡荡，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正如陈抟在《睡歌》中描写的：“不卧毡，不盖被；片石枕头，蓑衣覆地。轰雷掣电泰山摧，万丈海水空里坠；骊龙叫喊鬼神惊，臣当恁时正鼾睡。”

陈抟的《指玄篇》，讲的是内丹秘诀，却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其弟子鸿蒙子张无梦在所著《还元篇》中阐述尤为明晰。“鸿蒙子曰：国犹心也。心无为则气和，气和则万宝结矣；心有为则气乱，气乱则英华散矣。游玄牝之门、访赤水之珠者，必放旷天睨，囚千邪，翦万异，归乎抱朴守静。静之复静，以至于一。一者，道之用也；道者，一之体也。一之道，盖自然而然者焉。是以至神无方，至道无体，无为而无不为，斯合于理矣。”^①治国之道，在无为而无不为；内丹养生之道，亦在无为而无不为。首先，无心于物，保持和气，而结“万宝”。其次，欲“无心”，则当去情欲，“囚千邪，翦万异”；最后，自然而然，抱朴守一，冥合至道。这是《老子》无为、无欲、守朴思想的创造性运用。

归结起来，陈抟是一位隐士、内丹家，也是一位易学家，更是一位博学多才的道教学者。他对道教的贡献大体有四个方面：首先，他用新的观点研究《易》学，不重经、传，而重象数，开宋明图书之学的先河，也树立了道教易学的新风

^① 《道枢》卷十三。

范，为后期封建社会，道教融合儒佛，打开新境界；第二，用新的思路诠释《周易参同契》，改变道教注重符篆金丹为注重内丹修炼，为道教的后期发展打开新思路，注入了新血液；第三，陈抟在传播道教思想和道术方面，采取了新的传承方式，注重图式，注重口耳相传，不以文字为主要手段，强调学道者首在心悟，吸取佛教禅宗的优点，对尔后道教的发展亦有深刻影响；第四，陈抟同现实政治采取疏远态度，潜心研究道学，发展道教理论，同隋唐时期，道教攀附权贵，结纳上层人物，以入道为跻身仕途的终南捷径的作风，形成鲜明对照。陈抟式的道教人物是不可多得的，根据他对发展后期道教的卓越贡献，尊称他为“陈抟老祖”是当之无愧的。

陈抟之后，继承丹道而堪称睡仙者，最突出的有武当道人张三丰。张三丰写有《蛰龙吟》，称赞陈抟睡功，并述其志云：

五龙飞跃出深潭，天将此法传图南。
图南一派传能继？邋遢道人张丰仙。^①

张三丰在《云水前集》中，用四言诗，对陈抟老祖作了极高的评价：

浩浩希夷，守正怀奇。
不夸丹道，不露玄机。
不令人测，只求已知。

^① 《张三丰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华山高卧，吾师之师。^①

陈抟更用一首诗，对自己隐居求道一生，作自我论定：

一气淘今古，阴阳造化奇。
问余名与姓，睡汉老希夷。^②

综上所述，陈抟无愧五代宋初道学大师，当社会大动乱年代，他选择一条特殊的成功之路，在学术上作出重大贡献，其思想成就绚丽多彩。手不释卷，钻研易学，以图象反映独到心悟，开宋明图书学之先河，成为宋明道学先驱；酷爱老庄，行清静无为、抱朴守拙之教，指引道学理论新发展；苦炼内丹，参悟内修理论，创立陈抟学派，经后继者精心阐扬，绽出灿烂之花。陈抟以一代高隐，影响五代宋初几代王朝政治，其高风亮节，化育北宋一大批道教学者、文人学士。写完《陈抟评传》，有感奇人风采，不禁击节赞叹：

佼佼易侠，隐士陈抟。
玄思宇宙，回归自然。
高卧华岳，参悟内丹。
勉为帝师，名列仙班。

① 《张三丰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页。

② 《张三丰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页。

附录

一、易图选粹

《易图选粹》弁言

《周易》是东方文化之瑰宝，它的创作“人更三圣，世历三古”，颇富神秘性。易图，伴随《周易》诞生，发源于上古，张皇于两汉，极盛于宋明，千姿百态，异采纷呈，亦东方文化之奇葩。有人统计，宋元明清易学著作中，共有易图 1240 余幅，洋洋大观，令人目不暇接。有莱布尼茨称赞的“人类文明的最古纪念物”，也有历代易学家奇妙构思的宇宙衍化图式。先哲以为此等玄妙易图，足以“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易图，往往予人们的理性思维以豁然开朗的启迪。图式简明，内涵丰富。既形象，又神奇，既简括，又深邃，直观又直观，抽象又抽象，上总天文，下涵地理，中摄人事，远取诸物，近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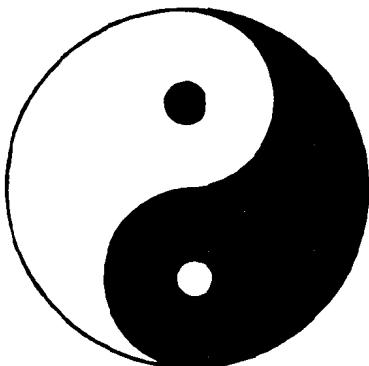
诸身，跨越时间，超越空间，饱经历史长河的冲刷淘汰，积淀于炎黄子孙思维习惯之中，有举一反三之奥妙，起闻一知十之作用。反映大化流行的规律，诱发对立统一的奇智，惊先哲而泣巫鬼，统直觉而启遐思。因象以明理，由体而达用，妙趣迭生，蔚为壮观。

易图的特征，在表述万有变化的整体性，诱导人们的整体思维，三才统一、五行生克，卦气、纳甲、爻辰诸图，无不予人以强烈整体印象；易图注重宇宙万物变化的节律性，原始反终，周期循环，由量的积累到质的推移，按图索骥，一目了然；易图启示事物之间的和谐原则，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消彼长，对称互补，刚柔相济，一览无余。

易图的妙用，在概括自然变化的规律，使人见几而作，“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在凝聚宇宙信息，便于指导行动，掌握它则如鱼得水，违背它则动辄得咎；易图反映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叶落而知秋”，“滴水观世界”，对人们探索自然和人体奥秘有所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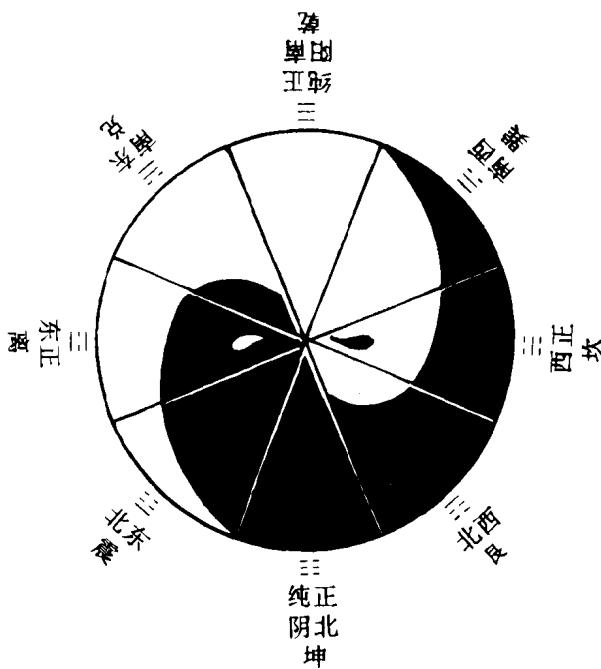
易图乃先哲智慧的结晶。近代易学家杭辛斋先生说得好：“（它）流传远古，意蕴深宏，决非人个所能臆造。”以往，此等易图多禁锢在易学著作中，尘封在道教文献里，东鳞西爪，难窥全豹。今从诸多易图中，严加筛选，去粗取精，选取最最基本者共 22 幅，献诸读者，期其以简御繁，取精用宏，柄要执权，雅俗共赏。

(一) 太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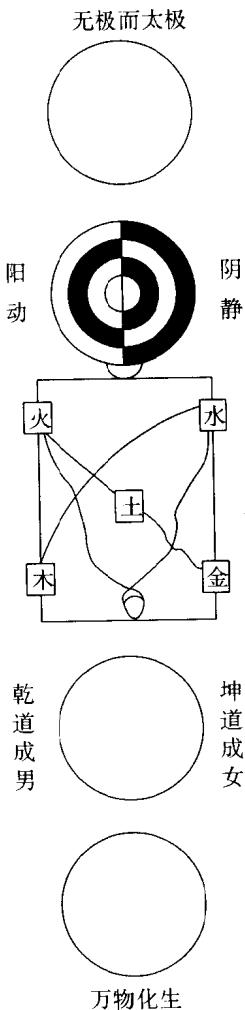
人称“东方魔符”。《易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先哲创造的宇宙衍化模型。《周易正义》：“（太极）乃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阴阳双方，既对立，又统一，永恒流转，生生不息。呈动态平衡的整体形象，堪称炎黄文化之一绝。

(二)古太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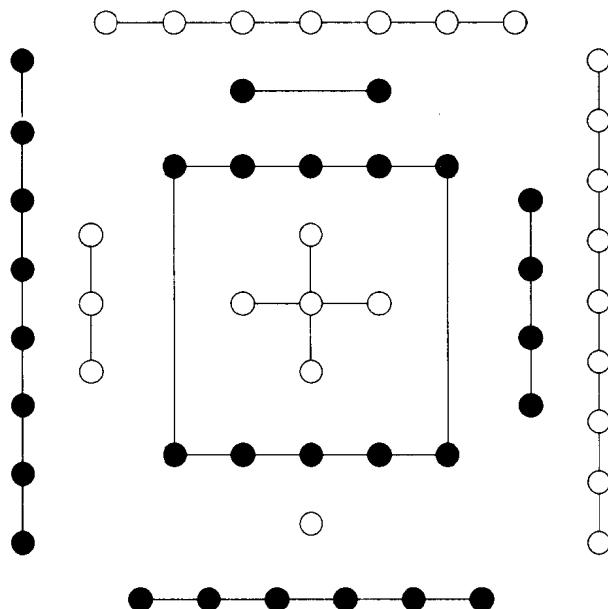
《道学正宗》：“古太极图，阳生于东而盛于南，阴生于西而盛于北，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而两仪、而四象、而八卦，皆自然而然者。”实乃《先天太极图》简称《先天图》又称《天地自然之图》。此图传自陈抟，民间流传较广。有太极含阴阳，阴阳含八卦之妙。

(三)无极而太极图(周子太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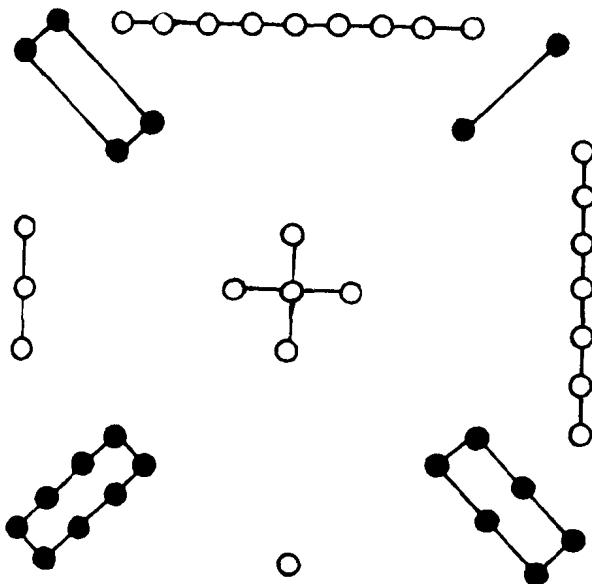
宋代周敦颐(1017—1073)创制的万物化生模式。最初传自陈抟。朱熹称为《周子太极图》，自上而下分五层。显示“太极本无极”；“阴阳迭运”，“五行交合”；太极运化而乾男坤女；阴阳交合而万物化生，人得五行之精而最灵。

(四) 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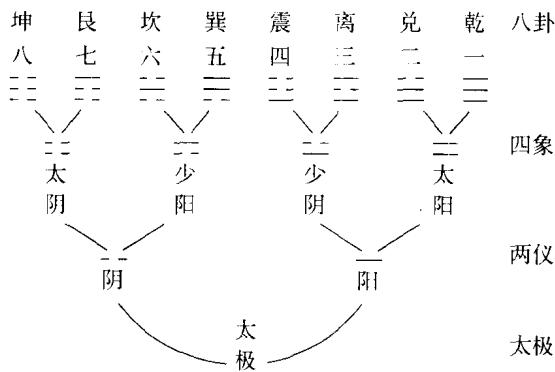
《易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云：“天数五，地数五。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扬雄、郑玄以此图释五行之生成：“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五)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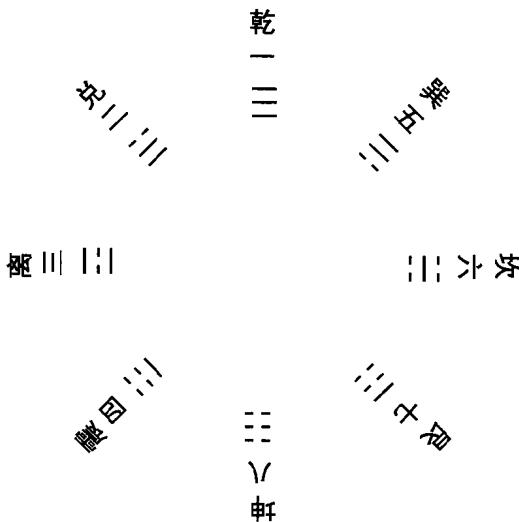
《易传》：“河出图，洛出书。”《洛书》排列：“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又称“戴九履一图”。朱熹《易学启蒙》：“洛书之纵横十五，而七、八、九、六，迭为消长，虚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则参伍错综，无适而不遇其合焉。此变化无穷之所以为妙也。”人称世界最古之“幻方”。

(六) 伏羲八卦次序图(小横图)



此朱熹所谓“伏羲四图”之一。传自邵雍。《周易本义》卷首云：“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又说：“此序既定，又递升而倍之，适得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乃伏羲画八卦自然次序，非人私智所能安排，学《易》者不可不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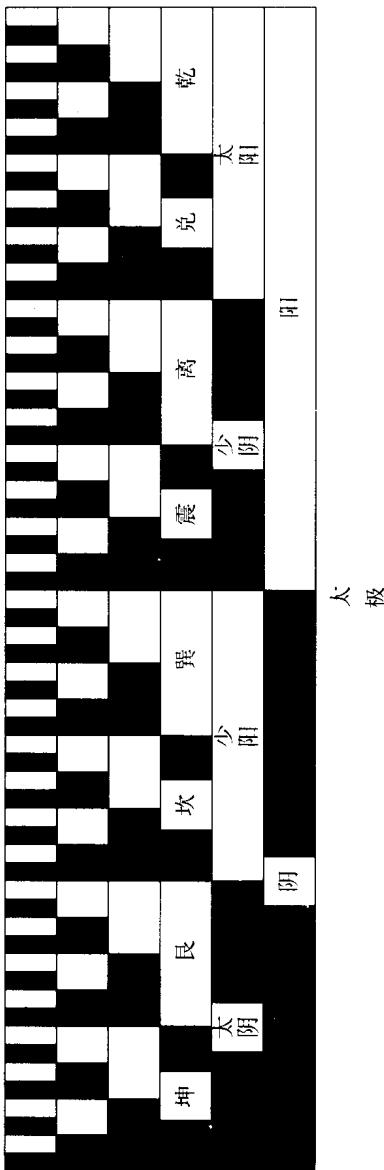
(七) 伏羲八卦方位图(小圆图)



伏羲四图之一。又称“乾南坤北图”。《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尚秉和：“先天方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一阴一阳，相偶相对，乃天地自然之法象。”此图渊源甚古，盖出于道家《天地自然之图》。体现宇宙自然变化规律及时空统一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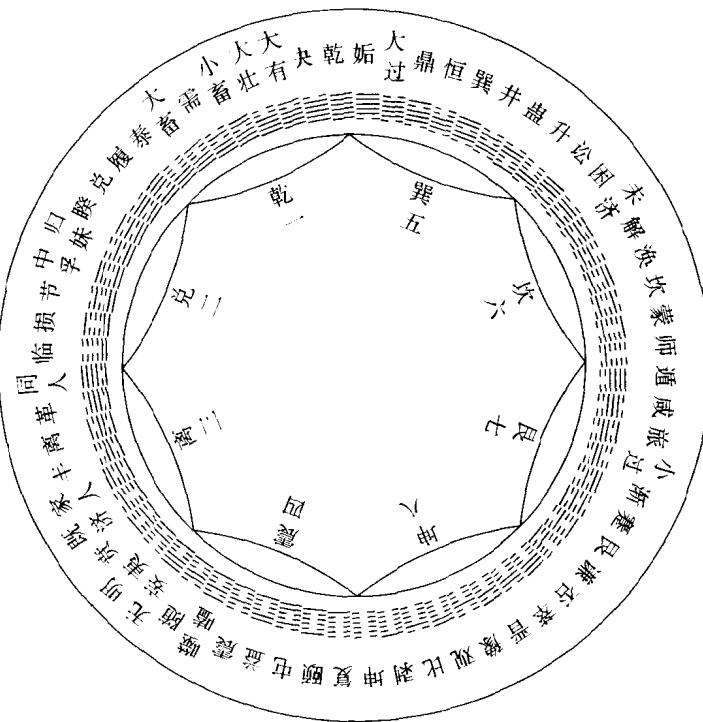
(八)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大横图)

过 济 喻 宽 江 人 乎 休 带 壮 有 备 小 大 人 乾



《周易本义》卷首云：此图太极、两仪、八卦，逐爻渐生，即邵子所谓“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为六十四”。邵子云：“太极之分解，尤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少，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朱子称赞此图坚持“一分为一”原则，显示万物发展皆从一到多，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分解。

(九)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大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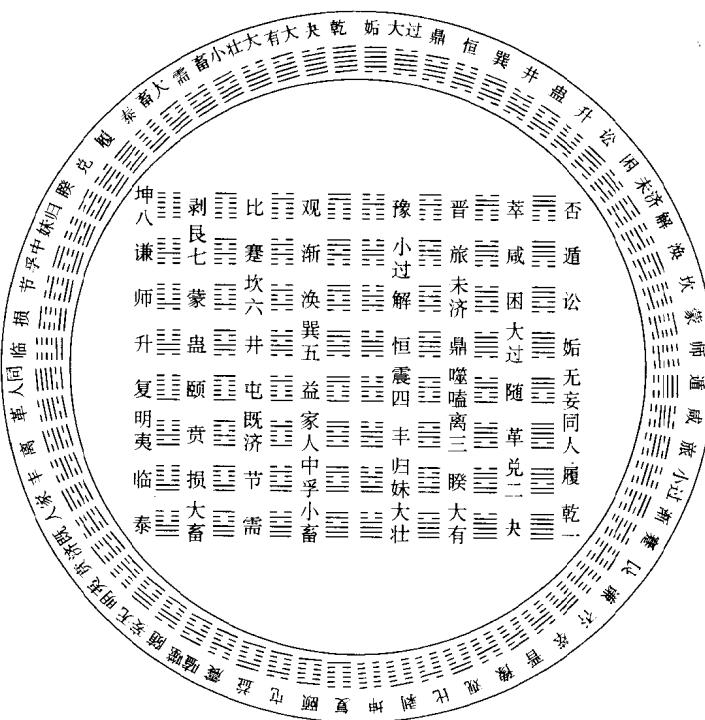
将六十四卦分八宫，每宫八卦，其内卦相同，各宫外卦亦合先天八卦次序。左半圈为阳，从复到乾，右半圈为阴，从姤到坤。乾姤之间，一阴始生，为月窟；坤复之间，一阳始生，为天根。莱布尼兹惊呼此图与其二进制原理“完全一致。”以0代阴爻，1代阳爻，可译出此图0至63的序数。

(十) 伏羲六十四卦方图

坤	剥	比	观	豫	晋	萃	否
谦	艮	蹇	渐	小过	旅	咸	遁
师	蒙	坎	涣	解	未济	困	讼
升	蛊	井	巽	恒	鼎	大过	姤
复	颐	屯	益	震	噬嗑	随	无妄
明夷	贲	既济	家人	丰	离	革	同人
临	损	节	中孚	归妹	睽	兑	履
泰	大畜	需	小畜	大壮	大有	夬	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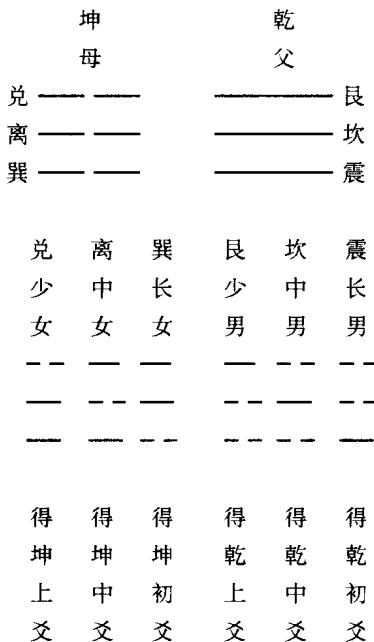
此图由里到外分四层，巽、震、恒、益，为第一层，“雷风相薄”；坎、离、未济、既济为四隅者，为第二层，“水火相射”；艮、兑、咸、损为四隅者，为第三层，“山泽通气”；乾、坤、否、泰为四隅者，为第四层，“天地定位”。斜角线呈先天八卦次序，显示六十四卦各有定位，定位之中又各有对待，表示六十四卦空间网络结构，由 32 个对立之卦组成。

(十一) 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合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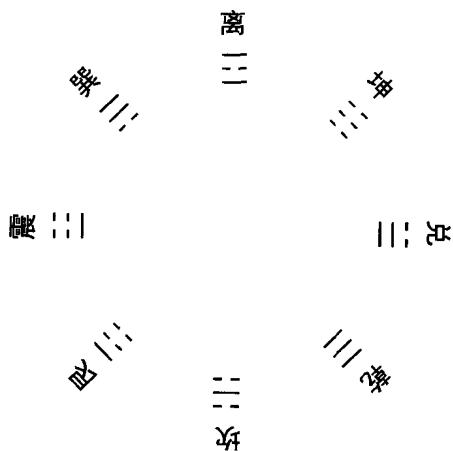
此图创自邵雍。圆图象天，方图象地，天圆而地方。天地相涵，化生万物。圆图代表天体运行周期，即一年360日，主运行；方图代表东西南北四方，即九州之数，主定位。二图合一，显示天文地理之统一。象征“天地𬘡缊，万物化醇”的整体结构。

(十二)文王八卦次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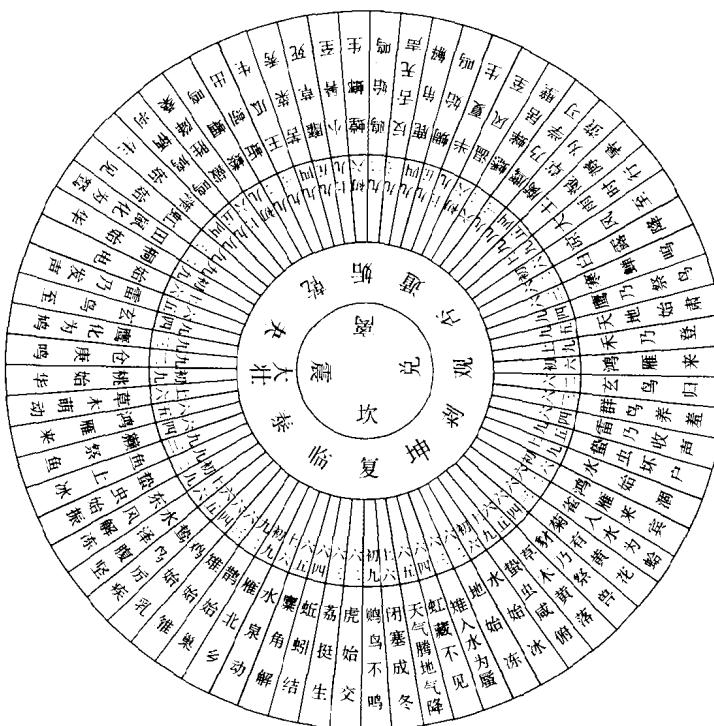
即《后天八卦次序图》。《说卦》：“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坎、艮为三男；巽、离、兑为三女。三男皆阳卦，三女皆阴卦。三阳卦共有三阳爻六阴爻，故“阳卦多阴”；三阴卦共有三阴爻、六阳爻，故“阴卦多阳”。三男三女，对待和谐，启示阴阳刚柔的对立统一而化生万物。

(十三)文王八卦方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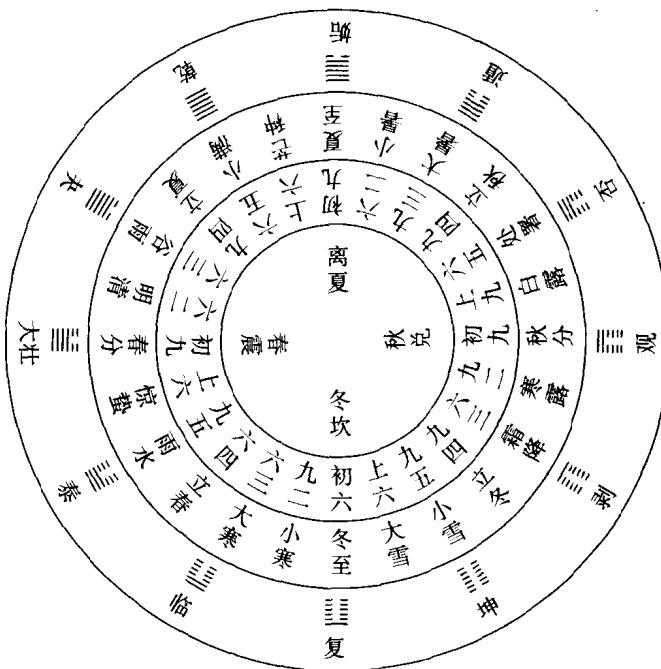
即《后天八卦方位图》。邵雍所传，用释《说卦》“帝出乎震”一节所示八卦方位。朱子云：“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后天之学也。”以震兑离坎代表东西南北，称四正卦，余为“四隅卦”。应称“帝出乎震图”。古代天文仪的设置以此方位为准。

(十四) 卦气图(七十二候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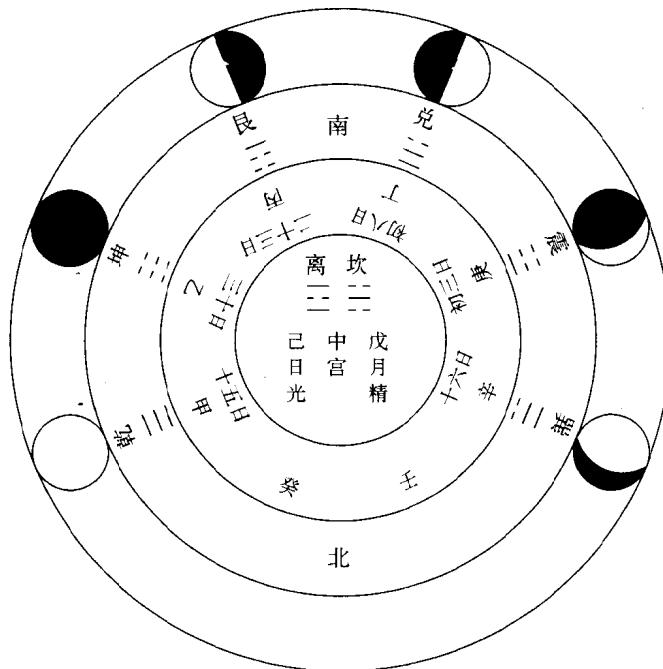
取十二辟卦以表述一年十二月气候变化。创自西汉孟喜，传自京房。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表四时，其二十四爻代表二十四节；以十二辟卦代表十二月，其七十二爻代表七十二候。概括了古代天文、历法、物候知识，显示四时循环周期，及人天统一思想。

(十五)十二消息卦图(二十四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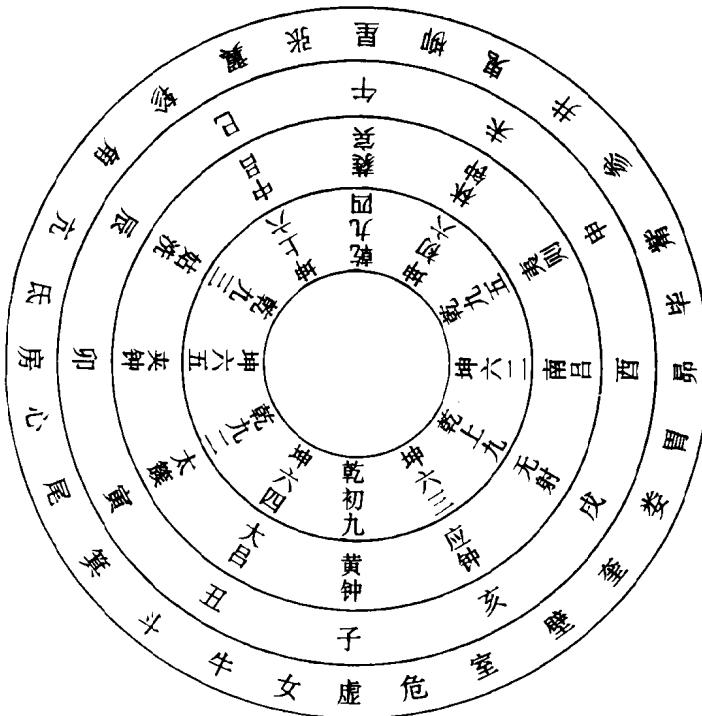
卦气图的组成部分。以十二辟卦代表十二月阴阳消长之节律。四正卦的二十四爻，代表一年二十四节。复卦代表冬至一阳生，从此阳气日长，阴气渐消；姤卦代表夏至一阴生，从此阴气日长，阳气日消。四季阴阳消长呈渐进过程，周而复始。此图对农业生产及人类养生均有指导意义。

(十六)月体纳甲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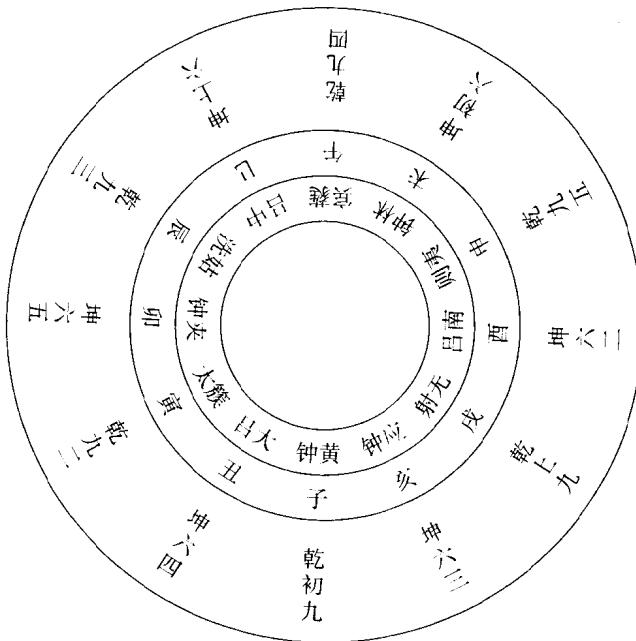
月体纳甲说，乃卦气说的一种形式。将道家内丹理论同月亮盈亏、四时变化相联系，以便掌握自然法则。置坎离于中宫，指“日月为易，刚柔相当”，表示月体凭日照而发光。震表示一阳已生，月起于西方；巽表示一阴已萌，亦配于西方。上弦月在南方，兑乃二阳之象；下弦月也在南方，艮乃二阴之象。北方不见月光，表示乾消坤藏。一月之中月亮盈亏变化过程，一览无余。首见于《周易参同契》。

(十七)爻辰图(二十八宿图)



《易传》主张：“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隋书·律历志》论历法同卦象的关系云：“悬象著明，莫大于二曜；会序循复，无信于四时，……乃至阴阳迭用，刚柔相摩，四象既陈，八卦成列”，足见创历之初衷。爻辰乃以乾坤十二爻对应于十二月（支），将二十八宿之四象，对应于四方。地支按顺时针方向排列，二十八宿按反时针方向排列。子午卯酉对应于虚星房昴。乾坤十二爻交错排列，显示阴阳二气之对立、转化，是星移斗转的原因。创自郑玄。

(十八) 纳音图(“三分损益”图)



汉代以来，律历并称。乐律与历法，均与易学关系密切。乐律学借用易卦象数以表征律吕损益法则。古乐中的十二律制，乃将一个八度音阶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相当于今之十二调。十二律中，六阳律，以乾卦六爻代表；六阴吕，以坤卦六爻代表。六律与六吕由低到高依次排列，以“三分损益”法标算十二律管的不同长度，是古人行之有效的定律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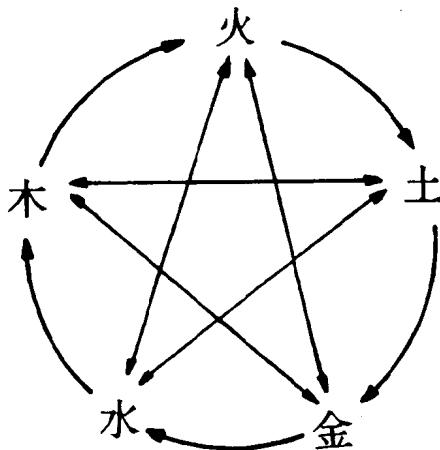
(十九)八宫卦次图

世、游、归	八 宫 卦							
八 纯 上 世	乾 ䷀	震 ䷲	坎 ䷜	艮 ䷳	坤 ䷁	巽 ䷸	离 ䷬	兑 ䷹
一 世	姤 ䷫	豫 ䷏	节 ䷻	贲 ䷗	复 ䷗	小畜 ䷈	旅 ䷷	困 ䷮
二 世	遁 ䷤	解 ䷾	屯 ䷂	大畜 ䷙	临 ䷒	家人 ䷤	鼎 ䷱	萃 ䷬
三 世	否 ䷋	恒 ䷱	既济 ䷾	损 ䷨	泰 ䷊	益 ䷩	未济 ䷿	咸 ䷞
四 世	观 ䷓	升 ䷶	革 ䷰	睽 ䷥	大壮 ䷡	无妄 ䷘	蒙 ䷃	蹇 ䷚
五 世	剥 ䷖	井 ䷯	丰 ䷶	履 ䷉	夬 ䷪	噬嗑 ䷔	涣 ䷹	谦 ䷎
游 魂	晋 ䷢	大过 ䷛	明夷 ䷣	中孚 ䷼	需 ䷄	颐 ䷚	讼 ䷅	小过 ䷽
归 魂	大有 ䷍	随 ䷐	师 ䷆	渐 ䷴	比 ䷇	蛊 ䷴	同人 ䷌	归妹 ䷵

汉代京房创立的易卦系统结构，提出“八宫卦次”。六十四卦分属“八宫”，按乾、震、坎、艮；坤、巽、离、兑次序排列。每宫一个纯卦统七个变卦。变卦的方法即纯卦初爻变，则为一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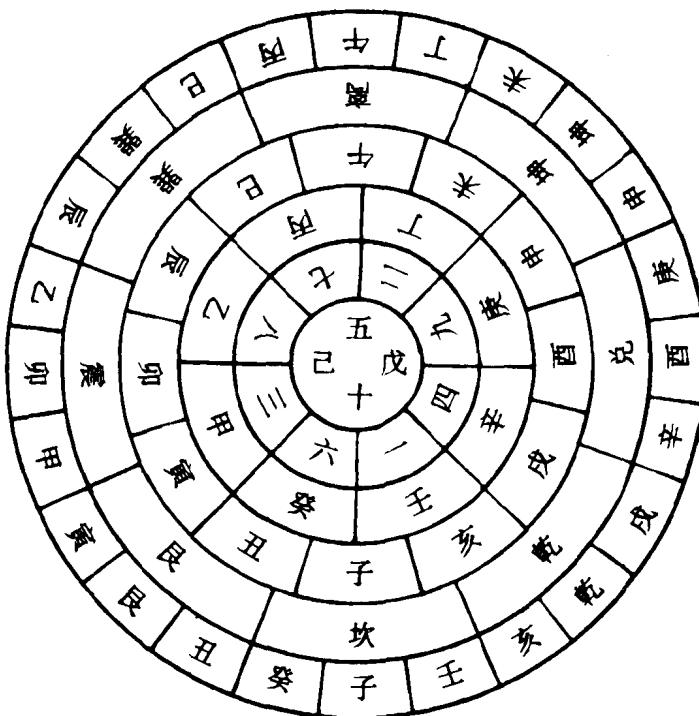
卦；初二爻变，称二世卦；……初爻至五爻变，称五世卦。五世卦之第四爻变回本宫纯卦第四爻，称游魂卦，将游魂卦之下卦变回本宫纯卦的下卦，称归魂卦。此图展示六十四卦之间有条不紊的网络结构关系。

(二〇) 五行相生相克合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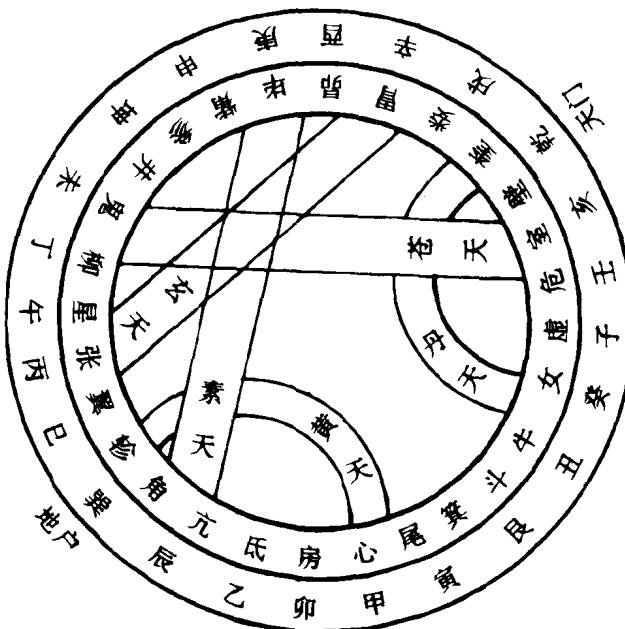
五行学说与阴阳学说，原本独立发展。汉人通过河图将五行与阴阳沟通，从而五行与八卦在许多易图中形影不离。五行按木、火、土、金、水顺序排成圆周，“比相生，间相克”。显示事物之间矛盾关系的多重性，成为一切事物普遍适用的整体结构模型。实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普通系统论图式。中国传统医学中应用普遍。

(二一)八卦干支二十四向图



时间，一日分二十四时；空间，八方分二十四向。时空统一而成二十四时、向图。图由十二地支，八天干，后天八卦之四隅卦组成。以子、午为经，卯、酉为纬，重合后天八卦之四正卦以定四方，与八天干配，戊己归中央，不显于图。以此便于掌握自然节律，使人体生理节律与之相应。古人依此掌握太阳出没时辰。其歌云：“正九出乙入庚方，二八出兔（卯）入鸡（酉）场；三七发甲入辛地，四六出寅入戌藏；五月生艮归乾上，仲冬（十一月）出巽入坤方；惟有十月与十二，出辰入申仔细详。”

(二二)八卦干支五天五运图



医易相通，自古已然。《帝王世纪》：“伏羲画八卦，所以六气六腑，五行五藏，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素问·五运行大论》对运气学说作经典论述：“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黄天之气，经于心尾巳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奎娄。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素问·天元纪大论》：“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二、邵雍年表

1011 辛亥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

邵雍生。时为12月25日戌时。邵雍《生日吟》云：“辛亥年，辛丑月，甲子日，甲戌时。日辰同甲，年月同辛，吾于此际，生而为人。”

祖父邵德新，世居范阳（今河北琢州市）。父邵古（988—1067），母李氏。生雍于今琢州市大邵村。邵古时年23岁，知诗书，明音韵，为人忠厚。为避乱，后迁居衡漳（今河南林县）。雍之幼年、少年时期，在衡漳度过，今林县有康节村。

是年，真宗赴宝鼎县祭祀汾阴后土。

太宗、真宗时三任宰相敢言直谏的吕蒙正卒。

数术家刘牧生。刘牧后师事范仲淹。受《易》于范谔昌，谔昌学于道士许坚，许坚之师为种放。与邵雍易学同一学脉。

四川商户发行“交子”，为世界发行纸币之始。

1012 壬子 大中祥符五年

邵雍2岁。

是年，宋真宗派使臣去福建取早熟、耐旱的占城稻种，发放江、淮、二浙三路种植推广。

政治家王钦若以枢密使加平章事，专主政事，号“枢相”。
真宗诡称“天尊下降”，朝野大事庆贺。
冬，道士张君房除著作郎，专事整理道教经典。王钦若等奉命编纂《道藏》。

1013 癸丑 大中祥符六年

邵雍 3 岁。
朝廷推尊道教，特加封道教祖师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王钦若等领衔编修的大型文化典籍《册府元龟》1000 卷，告成。

1014 甲寅 大中祥符七年

邵雍 4 岁。
抗金名将杨延昭（六郎）卒。
王钦若罢相。抗金名臣寇准复相。
朝廷鼓励研究《易经》。九月，陈彭年、冯元奉命校定《周易》，重新刻板。
是年，河决澶州。

1015 乙卯 大中祥符八年

邵雍 5 岁。
隐士种放（955— ）卒。放字明逸，洛阳人。曾从道士陈抟（871—989）受《先天图》，传穆修。又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放屡隐屡仕，广置田园，乃宋代图书学重要倡导者。

朝廷召道教创始人张天师（陵）第24代孙张正随入京，赐号真静先生，准于江西龙虎山建授箓院。

1016 丙辰 大中祥符九年

邵雍6岁。父亲开始教他读书识字。
河北、江淮蝗虫为害，连云障日。久旱，

1017 丁巳 宋真宗天禧元年

邵雍七岁。戏于蚁穴，云见红日、云气，其母令勿胡言。
宰相王旦（957—）卒。王钦若任相。
周敦颐生于湖南道县。后为北宋道学五子之一，创立“无极而太极”学说，建濂溪学派，以其宅旁有溪如青罗带，号濂溪，颐少年时常嬉游其上。

1018 戊午 天禧二年

邵雍8岁。居衡漳，习童子课。

1019 己未 天禧三年

邵雍9岁。
司马光生于陕州夏县。
王钦若罢相，寇准复相。
是年，河决滑州。

1020 庚申 天禧四年

邵雍 10 岁。

张载生于陕西郿县横渠镇。载少时喜读兵书，好谈兵。年 21 会见范仲淹，始改习儒学，后著《正蒙》、《易余》，创关学，成为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北宋道学五子之一。

科学家苏颂（—1101）生。

北宋文学家杨亿（974—）卒。编著《西昆酬唱集》。

真宗诡称道教神灵庇祐宋朝，将《大中祥符降圣记》赐天下道观。

1021 辛酉 天禧五年

邵雍 11 岁。

北宋垦田数达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余顷，为北宋纳税田亩最高数字。王安石生于江西临川。

天禧中，范谔昌撰《大易源流图》，先定纳甲法，以见纳音数。

1022 壬戌 宋真宗乾兴元年

邵雍 12 岁。随父母迁居共城（今河南辉县）苏门山，于百源湖（今名百泉湖）畔结茅屋而居。

真宗（968—）卒，仁宗即位，年 13 岁，太后听政。

是年，淮南盐税由收粟帛改为纳钱，乃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的契机。

官府准予赐给兗州学田 10 顷，升州县学校领有学田之端。

1023 癸亥 宋仁宗天圣元年

邵雍 13 岁。

宰相寇准（961—）卒于雷州。他力主抗金，封莱国公，著有《寇忠愍公诗集》。

1024 甲子 天圣二年

邵雍 14 岁。

二月，朝廷特准在川蜀设交子务，官办流通“交子”（纸币），禁止商家私造。为世界历史上政府发行纸币之始，实为商品经济发展新措施。

1025 乙丑 天圣三年

邵雍 15 岁。已能诗善文，显露聪慧天资。

前宰相王钦若（962 或 965—）卒。谥文穆。仁宗褒奖其对道教发展的贡献，特将之列为仙官，准予茅山建神像立祀。

1026 丙寅 天圣四年

邵雍 16 岁。约于此时外出游学，西渡河、汾，南游淮、汉，数年乃归。曾于晋北夜行，连马坠山岩，邵雍无恙，只坏一帽。

朝廷采纳范仲淹建议，在泰州筑捍海堰 180 里，防海潮以卫耕地，并由范仲淹总其事。

秘书监致仕胡旦言撰《周易演圣通论》70 卷，以驳正五经，朝

廷赐钱繕写。

1027 丁卯 天圣五年

邵雍 17 岁。

工部郎中燕肃请造指南车（以齿轮转动）。内侍卢道隆上所造记里鼓车。医学家王惟一铸造针灸铜人，以供实习。

1028 戊辰 天圣六年

邵雍 18 岁。

杭州处士林逋（967—）卒，谥和靖先生，著有《林和靖诗集》。

1029 己巳 天圣七年

邵雍 19 岁。母亲李氏约于本年去世。死前望子心切，以致倒诵佛经。

辽军官大延琳利用人民反徭役情绪，起兵称“兴辽”，据东京（今辽阳），年号天庆。次年，延琳被擒。

1030 庚午 天圣八年

邵雍 20 岁。

思想家李觏撰《潜书》成。

数术家李之才及进士第。与苏舜钦等人师事穆修，受《易》及数术之学。

朝廷召信州龙虎山 25 代天师张朝曜入京，赐号澄素先生，令世袭。

道士张君房编撰《云笈七签》122 卷，进呈。

1031 辛未 天圣九年

邵雍 21 岁。其父约于此年续娶。

著名科学家沈括生于浙江余杭。

辽圣宗死，子真宗即位，肖太后摄政。

1032 壬申 仁宗明道元年

邵雍 22 岁。

理学家程颢（伯淳）生于河南洛阳，后与邵雍为忘年交，亦北宋道学五子之一。

李觏撰《周礼致太平记》成书。

数术家穆修（979—）卒。穆修受学于隐士种放，传《先天图》于李之才，传《太极图》于李溉。

1033 癸酉 明道二年

邵雍 23 岁。

宋仁宗亲政。遣右司谏范仲淹安抚江淮灾民，开仓赈灾。仲淹上书言人民负担过重。

理学家程颐（伊川）生于河南洛阳。后为北宋道学五子之一，与邵雍为忘年交。

1034 甲戌 宋仁宗景祐元年

邵雍 24 岁。

河决澶州，久不堵塞，导致河道南移。

1035 乙亥 景祐二年

邵雍 25 岁。同父异母弟邵睦生。

辽兴宗重熙五年，因兵役、徭役繁重，人民纷纷亡命山泽，起而反抗。

1036 丙子 景祐三年

邵雍 26 岁。

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因言事直切，为宰相吕夷简所恨，乃以“荐引朋党”为由，贬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欧阳修等亦株连遭贬。

1037 丁丑 景祐四年

邵雍 27 岁。深研历史，酝酿“皇帝王伯”历史观。

文学家苏轼（东坡）生于四川眉山，后倡导蜀学，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继承家学，著《毗陵易传》。

京师地震。忻、代、并州同时地震，死二万二千余人。

1038 戊寅 景祐五年、仁宗宝元元年

邵雍 28 岁。

李觏著《广潜书》。次年撰《富国》、《强兵》、《安民》诸论。

景祐末，灾异数起。数术家林瑀“依《周易》推衍五行阴阳之变”，“上大好之”。

1039 己卯 宝元二年

邵雍 29 岁。有《闲吟》一诗自述家境云：“欲有一瓢乐，曾无二亩田。”

文学家苏辙生于四川眉山。后著《老子解》。

易学家陆秉撰《周易意学》10 卷，献于朝。朝廷“敕书嘉奖”。其书论《易》，多采《参同契》说。

1040 庚辰 仁宗康定元年

邵雍 30 岁。家居苏门山下，自炊以养其父。雍独筑室百源之上。

数术家李之才（？—1045），为共城令，叩门谒邵雍，雍再拜，愿受业。李之才遂以《先天图》传邵雍；雍始研图书之学。《宋史·邵雍传》：“（邵雍）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三年不设榻，昼夜危坐以思。”

宋咸作《易辨》，以辨王弼、刘牧《易》学之是非；谓刘牧作《钩隐图》，“业刘者实繁”。

曾公亮编成军事著作《武经总要》，其中载有三种火药配方，及开宝二年（969）发明火箭法，咸平三年（1000）唐福制造火箭、

火球之事。

1041 辛巳 仁宗庆历元年

邵雍 31 岁。

易学家徐复传京（房）氏易，为仁宗讲《易》于崇政殿。京房易已久无通其术者，徐复遇隐士得其传，杂以六壬、遁甲。

司马光著《贾生论》、《四豪记》。

1042 壬午 庆历二年

邵雍 32 岁。在此以前，邵雍居共城，刻苦学习，“冬不炉，夏不扇”，“昼夜危坐以思，写《周易》一部，贴屋壁间，曰通数十遍”。

庆历间，邵雍过洛阳，馆于水北汤氏，爱其山水风俗之美，始有定居洛阳之意。

王安石开始仕宦生涯。至嘉祐五年（1060）逐步形成其变法思想。著《淮南杂记》、《洪范传》等篇。

吴秘献刘牧《易数钩隐图》于朝，受朝廷褒奖。由是图书之学盛行。考官以李鼎祚《周易集解》拟题试贤良，应试者多未见其书。

1043 癸未 庆历三年

邵雍 33 岁。约于此年随师李之才去河阳，住于州学。戍边将领知其贫困，赠以纸 100 张，笔 10 支。

李觏创办盱江书院。继续著《周礼致太平记》、《庆历民言》。后又完成《删定易图序记》。

召范仲淹为枢密副使，旋任参知政事。仲淹提出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择官长等十项主张，以谋革新，推行庆历新政。

山东沂州、江苏楚州、泰州、陕西商山，湖北光化、湖南兰山等地驻军士卒及农民纷纷起义。

1044 甲申 庆历四年

邵雍 34 岁。

孙景初刊行希见之李鼎祚《周易集解》。

纳欧阳修、宋祁等人建议，朝廷令州县皆立学校，培养科举应试人才，提高人民文化素质。但入学者往往“以先圣之宫墙，为干禄之捷径”。

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参政范仲淹领刑法，有事急以条上。

宋与西夏议和成，宋册封夏元昊为夏国王，岁“赐”银、绢、茶等 25.5 万，与西夏互市。

1045 乙酉 庆历五年

邵雍 35 岁。

邵雍之师数术家李之才卒。之才从穆修受《先天图》，创卦变说，有《卦变反对图》、《六十四卦相生图》传世。邵雍失其师，甚悲痛。

思想家石介卒。石介为学者孙复（992—1057）弟子，曾撰《周易解》（又称《周易口义》）10 卷。

范仲淹以“朋党”事，罢参政。富弼、韩琦、欧阳修均受牵涉。

1046 丙戌 庆历六年

邵雍 36 岁。馆于洛，爱其山川秀丽，始有卜居之意。冬病，自京师归共城。

周敦颐为南安军司理参军。程珦通判军事，因与敦颐友善，使其二子程颢、程颐事之。敦颐乃以《太极图说》授二程。

范仲淹撰《岳阳楼记》，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047 丁亥 庆历七年

邵雍 37 岁。“悼自之穷处”，有《春郊十咏》，云：“总是灰心事，冥焉昼夜过。”“尽日客不来，至夜门犹闭。”是年作《共城十吟》。

庆历间，养兵 125.9 万，禁军 82.6 万，连年用兵，财政日益枯竭。

河北贝州军卒弥勒教徒王则于冬至日起义，称东平郡王，国号安阳，年号得胜。两月后王则被俘杀。

1048 戊子 庆历八年

邵雍 38 岁。

政府实行盐钞制度，使商人入钱，给以盐钞，于产地领盐，听其销售。

思想家苏舜钦（1008—）卒。舜钦四川梓州（今中江）人，居苏州沧浪亭，诗与梅尧臣齐名。

发明家、布衣毕昇（湖北人）于庆历年（1041—1048）发

活字印刷术，为世界公认中国三大发明之一。事载沈括《梦溪笔谈》。欧洲于1450年始用活字印刷。今湖北英山县睡狮山毕家坳有毕昇墓。

是年，河北灾民数十万流入京师。

1049 己丑 宋仁宗皇祐元年

邵雍 39岁。

是年，随父伊川自卫州共城迁居洛阳。爱其山川风俗之美。门生武涉知县侯绍曾助其行。初寓天寿寺，不为人所知。此后，不少权贵与之交游，居洛凡三十年。

邵雍与二程比邻，欲以数学传二程，二程不受。

广西源州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义，称南天国，年号景瑞，据邕州（今南宁）。

1050 庚寅 皇祐二年

邵雍 40岁。

思想家谢良佐（上蔡）生。

辽规定医、卜、屠、贩、奴隶等不得应进士举。

1051 辛卯 皇祐三年

邵雍 41岁。

一日午睡，见鼠，以瓦枕投之，枕破。枕中有字曰：“此枕当卯年四月四日巳时见鼠而破。”雍曰：“物皆有数。”

1052 壬辰 皇祐四年

邵雍 42 岁。

侬智高破邕州，称大南国仁惠皇帝。宋用狄青为将，次年大破之，收复邕州。智高走大理，不知所终。

政治改革家范仲淹（989—）卒。谥文正。著有《范文正公集》。

1053 癸巳 皇祐五年

邵雍 43 岁。

娶门生王允修之妹为妻，太学博士姜子发为介绍人。邵雍称“贫不能娶”，乃由太傅张穆之为之备聘礼。

思想家扬时生。后著《龟山集》，主张“致知必先于格物”。

著名词人柳永（约 987—）约卒于此年，著《乐章集》，时称“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1054 甲午 仁宗至和元年

邵雍 44 岁。有诗云：“居洛六七年，知己惟二三。”

欧阳修入京，遭排挤去职。仁宗命其主修《新唐书。》

1055 乙未 至和二年

邵雍 45 岁。门生日益增多。

生子名伯温。有诗云：“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为人父。”

鞠育教诲诚在我，寿天贤愚系于汝。我若寿命七十岁，眼前见汝二十五。我欲愿汝成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

文彦博、富弼为宰相。

封孔子47世孙孔宗愿为衍圣公。世袭衍圣公自此始。

召天师道传人张嗣宗入京，赐号虚白先生。迁道教祖庭上清观于龙虎山之阳。

词人晏殊（991—）卒。谥元献。曾任宰相。著有《珠玉集》。

1056 丙申 仁宗嘉祐元年

邵雍46岁。

天章阁侍讲、思想家胡瑗管勾太学。

龙图阁大学士包拯（999—1062）权知开封府，为人刚正不阿，权臣贵戚为之敛手。

1057 丁酉 嘉祐二年

邵雍47岁。

哲学家张载坐虎皮椅讲《周易》于京师。听从者众，著《易说》。一日与二程论《易》，甚折服，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遂撤座辍讲。

学者孙复（992—）卒。复曾隐居泰山，讲学授徒，世称泰山先生，其高足有石介、文彦博、范纯仁等。

朝廷设立校正医书局，集中掌禹锡、林亿等专家学者校正医学著作。

欧阳修知贡举，禁抑险怪奇涩之文。

仁宗封道教尊神玄武为“镇天真武应真君”。

1058 戊戌 嘉祐三年

邵雍 48 岁。时居洛阳履道坊西。

韩琦为相。欧阳修代包拯知开封府。

度支判官王安石上万言书，谓财力日困，风俗日坏，主张变法图强。

1059 己亥 嘉祐四年

邵雍 49 岁。约于此年重返百泉故里，有诗《重阳日再到百泉故居》云：“山河一梦外，风雨十年期。”

朝廷遣官员分赴各路实行“均田”，清查逃税土地，欲均赋税负担。

思想家李觏（1009—）卒。他创立盱江书院，从学者常数百人。世称直讲先生。著有《易论》1 卷，《删定易图序论》6 卷，有《李觏集》。

思想家胡瑗（993—）卒，一生讲学，人称安定先生。讲“明体达用之学”，分设经义、治事两科，“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著《易传》（又名《周易口义》）10 卷。程颐称学《易》者必先读此书。

泉州洛阳桥建成，创世界桥梁史奇迹。

1060 庚子 嘉祐五年

邵雍 50 岁。约于此年前后著成《皇极经世》。年初作《新正吟》。患重病，卧床三月，有《重病吟》。

王安石撰《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变法纲领。

欧阳修等修《新唐书》成。

诗人梅尧臣（圣俞，1002—）卒。与欧阳修同为北宋前期诗文革新运动领袖，主张诗文当反映社会现实。著有《宛陵先生集》。并注《孙子》。

黄河于大名向东决出，在今黄河口以北处入海。

1061 辛丑 嘉祐六年

邵雍 51岁。

哲学家周敦颐在庐山建“濂溪书堂”。

史学家宋祁（998—）卒。湖北安陆人，与欧阳修同修《新唐书》。

1062 壬寅 嘉祐七年

邵雍 52岁。迁入洛阳新居“安乐窝”，开始晚年生活。

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与邵雍友善，集资于洛阳天津桥畔为邵雍购建新居，名曰“安乐窝”。（其地基尚未作契约转让）邵雍写诗答谢云：“嘉祐壬寅岁，新巢始孱功。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宫。槛仰端门峻，轩迎两观雄。……无才济天下，有分乐年丰。”“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

包拯（991—）卒。拯为安徽合肥人，为官清廉正直，世号“包青天”。著有《包孝肃奏议》10卷。

1063 癸卯 嘉祐八年

邵雍 53岁。

仁宗（1010—）卒，嗣子曙即位，为英宗。

王安石讲学于江宁，形成学派。

1064 甲辰 宋英宗治平元年

邵雍 54 岁。

数术家刘牧卒，著《易数钩隐图》，为最早的图书学著作，影响后世。

西夏兵屡次攻扰宋之秦凤、泾源等地。

1065 乙巳 治平二年

邵雍 55 岁。学有所成，声名远扬。

约在此时，洛阳二十家，仿“安乐窝”为邵雍筑“行窝”，待其居游。

朝廷议尊英宗本生父濮安懿王为皇，欧阳修等赞成，司马光等反对，大起争议，史称“濮议”。

司马光奉诏编撰《资治通鉴》，仁宗亲自为之作序。

1066 丙午 治平三年

邵雍 56 岁。

治平间（1064—1067），邵雍与客人散步于洛阳天津桥上，忽闻杜鹃声，云杜鹃自南而北，天下将乱。有诗曰：“几家大弟横斜照，一片残春啼子规。”

朝廷尊濮安懿王为皇。吕诲等反对者均被贬黜。是年天下主客户 1418.1486 万，人口 2050.6980 万。

文学家苏洵（1009—）卒。洵乃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著《易传》未完成，命苏轼完成其书。

是年，开始出版校正医书局所校正的《素问》、《难经》等重要医学典籍。

契丹改国号为大辽。

1067 丁未 治平四年

邵雍 57 岁。

正月初一日，雍父伊川去世，享年 79 岁，临终曰：“吾儿以布衣名动朝廷，子孙皆力学孝谨，吾瞑目无憾。”

秋，邵雍《自况》云：“治平丁未仲伙，游伊洛二川，六日晚，出洛城西门，宿奉亲僧舍，听张道人弹琴。”

参知政事欧阳修受人攻击，罢知亳州。

1068 戊申 宋神宗熙宁元年

邵雍 58 岁。约于此时，“安乐窝”完成契约转让手续。作《天津弊居蒙诸公为买成作诗以谢》。

后母所生弟邵睦（33 岁），少雍 25 岁，事雍如父。四月八日暴卒。雍失去得力助手，有诗二首记其悲痛之情。

神宗召见翰林学士王安石。安石上书主张变法。

是年，开始编撰世界上最早的建筑学专著《营造法式》。

上年及本年，福建、广东、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连续发生大地震。地裂泉涌，有半年不止者。人民死伤甚众。

宋与西夏，发生战争。持续数年，宋军死亡惨重。

1069 己酉 熙宁二年

邵雍 59 岁。

诏举遗逸，吕海等人力荐邵雍，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川团练推官。辞之，不许。既受命，即引病不就，以诗答乡人曰：“平生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幸逢尧舜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

五月，王安石始推新法，建议兴学校，罢诗赋，以经义取士。

司马光与王安石争执。写《论风俗札子》、《体要疏》。安石写《答司马谏议书》。

道士张伯端遇丹家刘操于成都，授以《金液还丹诀》。伯端改名用诚，号紫阳真人。

1070 庚戌 熙宁三年

邵雍 60 岁。

四月，全面推行新法。邵雍之门生有欲投劾而归者，雍以书劝止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

同年，司马光因与王安石不和，退居洛阳，名其园曰“独乐”。时与邵雍游，曰：“光陕人，先生卫人，今同居洛，即乡人也。”俟后，司马光组织“洛阳耆英会”，反对变法。

张载辞官回乡，隐居终南山，讲《易》，撰《正蒙》。程颐上奏反新法，著《谏新法疏》。韩琦请罢青苗法。四月，御史中丞吕公著、御史程颐等，以反对新法罢职。

十二月，王安石初次任宰相，行免役法、保甲保。

李寿翁刊行《麻衣道者正易心法》42 章于当涂。《正易心法注》传为陈抟撰。

1071 辛亥 熙宁四年

邵雍 61 岁。有诗云：“洛阳城里一愚夫，十许年来不读书。”

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策论取士。
贬逐反对新法者多人。苏轼通判杭州。欧阳修致仕。

1072 壬子 熙宁五年

邵雍 62岁。《六十二吟》：“多少英豪弄才智，大曾经过恶思量。”

推行市易法、保马法，颁方田均税法。
沈括提举司天监。括招卫朴造新历。
欧阳修（1007—）卒。修为古文运动代表人物。工诗词。著《易童子问》，谓《文言》、《系辞》非孔子所作。
易学家朱震生，后撰《汉上易传》。

1073 癸丑 熙宁六年

邵雍 63岁。
作《六十三吟》：“行年六十有三岁，齿发虽衰志未衰。耻把精神虚作弄，肯将才力妄施为？愁闻刮骨声音切，闷见吹毛智数卑。珍重至人（按，指陈抟）尝有语，‘失便宜是得便宜’。”是年与大名王仲贤论“学书妨学道”。

哲学家周敦颐（1017—）卒。年57。著有《易通》（《通书》）40篇，《太极图说》1篇。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演化模式。作《爱莲说》。晚年定居庐山下，筑濂溪书堂，创濂溪学派，世号濂溪先生。

1074 甲寅 熙宁七年

邵雍 64岁。

王安石初次罢相，知江宁府。韩绎为相，吕惠卿参知政事，遵行新法。沈括主持新制浑仪、浮漏成功。

思想家胡安国生。

1075 乙卯 熙宁八年

邵雍 65 岁。

作《六十五岁新正自贻》云：“予家洛城里，况在天津畔。行年六十五，当宋之盛旦。……面前有芝兰，目下无冰炭。坐上有余欢，胸中无交战。……荣辱既不入，富贵徒自炫，恶闻人之恶，乐道人之善。”

二月，王安石复相。辽与宋争地界，派沈括赴辽谈判，拒绝割地；另派官员去议和，终以割河东（山西北部）700 里地予辽而达成和议。

六月，颁王安石撰《诗》、《书》、《周礼》“三经新义”于学官。

韩琦（1008—）卒。琦支持“庆历新政”，曾为宰相。后反对王安石变法。

道士张伯端撰内丹名著《悟真篇》。

1076 丙辰 熙宁九年

邵雍 66 岁。

王安石再次罢相，知江宁府。熙宁变法彻底失败。撰《字说》、《老子注》、《解楞严经疏》。其子王雱卒。

张载撰《正蒙》成。

水利家侯叔献（1023—）卒。曾主持引汴入淮工程。

1077 丁巳 熙宁十年

邵雍卒。享年 67 岁。

夏，感微疾，“气日益耗，神日益明”。七月初四日，大书诗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独无愧。”夜五更捐馆。

《自贻诗》云：“六十有七岁，生为世上人。四方中正地，万物备全身。天外更无乐，胸中别有春。”诏赠秘书省著作郎。元祐中谥康节。程颢为邵雍撰墓志铭。

邵雍之子伯温（1057—1134），字子文。时 22 岁。后官至利州路转运副使。著《易学辨惑》、《邵氏闻见录》。《宋史》有传。

哲学家张载卒，享年 58 岁。倡导“关学”，主张“太虚即气”、“一物两体，一故神，两故化”。著《易说》、《正蒙》。有《张子全书》。

是年，黄河大决于澶州曹村，河道南移。

三、参考书目

- 《皇极经世书》 宋·邵雍 四库全书
- 《皇极经世索隐》 宋·张行成 四库全书
- 《观物外篇衍义》 宋·张行成 四库全书
- 《易通变》 宋·张行成 四库全书
- 《皇极经世书解》 清·王植 四库全书
- 《皇极经世书》 明·黄畿注卫绍生校理 中州古籍出版社
- 《皇极经世书》 宋·张行成注 刘周堂点校 海南出版社
- 《渔樵问对》 宋·邵雍 《宋元学案》(上) 世界书局
- 《击壤集》 宋·邵雍 《道藏辑要》星集七
- 《康节说易》(上) 宋·邵雍 中州古籍出版社
-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 全祖望 世界书局
- 《邵康节先生外纪》 陈继儒 花山出版社
- 《邵氏闻见前录》 宋·邵伯温
- 《宋史·道学传·隐逸传》 元·脱脱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太华希夷志》(上、下) 元·张辂 《正统道藏》本
- 《朱子语类·邵子之书》 宋·朱熹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易学象数论》 清·黄宗羲 巴蜀书社
- 《易图明辨》 清·胡渭 巴蜀书社
- 《正易心法注》 宋·麻衣道者撰·陈抟注 《津逮秘书》汲古阁藏本

- 《中国思想史》(四) 侯外庐主编 人民出版社
《宋明理学史》(上) 侯外庐等主编 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下) 冯友兰 中华书局
《中国哲学史新编》(五) 冯友兰 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三) 任继愈主编 人民出版社
《古史甄微》 蒙文通 巴蜀书社
《求真集》 张岱年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下) 萧萐父李锦全主编 人民出版社
《吹沙集》 萧萐父 巴蜀书社
《宋明理学研究》 张立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宋明理学》 陈来 辽宁教育出版社
《易学哲学史》(二) 朱伯崑 华夏出版社
《易学基础教程》 朱伯崑主编 广州出版社
《象数与义理》 张善文 辽宁教育出版社
《周易研究史》 廖名春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象数易学研究》(一) 刘大钧主编 齐鲁书社
《象数易学发展史》(一) 林忠军 齐鲁书社
《中国道教史》(三) 卿希泰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道教思想史纲》(二) 卿希泰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道教史》 任继愈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道教》(一) [日]福井康顺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
《道家、方士与王朝政治》 吕锡琛 湖南出版社
《武当道教史略》 王光德、杨立志 华文出版社
《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第三集) 辛冠洁主编 齐鲁书社
《十大名道》 唐代剑等 延边大学出版社
《隐士传》 高敏主编 辽宁出版社
《洞天羽客》 古都子 黄山书社
《易学大师邵康节》 杜成娴等 花山出版社

索引

人名索引

一至三画

- 一行 214
干宝 117
女娲 191
孔子 33、62、79、91、201、232、
 267
孔颖达 149

四画

- 王莽 202
王睦 288
王充 140
王溥 354
王弼 40、326

王夫之 7、187、202、257、258、261

- 王平甫 57
王拱辰 47
王小波 21
王仙芝 204、279
王钦若 19
王安石 4、20、22、23、53、73
王宣微 46、57
毛奇龄 119
文王 24、117、192、200、210、212、
 327
文与可 285
文彦博 19、49
巴斯加 16

五画

- 石介 19

石守信 5

田秉 49

冯友兰 188

司马光 4、24、47、50、56、61、63、
73、80、110**六 画**

邢恕 58

老子 37、89、149、237、314

列宁 141

达尔文 16

吕公著 50、54

吕洞宾 292、294、295、347

吕希哲 80

吕夷简 23

吕祖谦（东莱）18、333、343

吕惠卿 54

朱震 319

朱熹 80、81、90、93、101、119、
127、148、161、169、186、252、
261、264、266、272、321、342、
356

朱伯崑 119、188

伏羲 117、121、191、212、327、328

刘备 202、302

刘季（邦）69、202

刘牧 144、320

刘海蟾 357

庄子 37、280

汤 65、69、105、192、199

许由 305、308

安审琦 46

毕昇 14

毕达哥拉斯 141

孙复 19

孙君仿 282

阴长生 331

七 画

苏颂 4、16

苏元朗 346

苏东坡 4、20、24

沈括 4

李琪 292

李觏 4

李顺 21

李白 89

李诫 4、15

李溉 321

李世民 203

李时珍 16

李嗣源 281、300

李之才 30、31、32、34、262、320、
324

杨辉 16

杜甫 71

武王 24、64、105、192、200
 武则天 204
 尧 24、91、105、192
 吴克 49
 何昌一 285
 余嘉锡 101
 邹衍 44
 沈括 4
 宋琪 312
 宋齐丘 285
 张载 4、23、25、55、63、76、95、
 133
 张岷 38、43、95
 张三丰 289、360
 张子房 69
 张无梦 298、357、359
 张行成 41、261
 张伯端 357
 张择端 12
 张岱年 119
 陆游 285
 陈抟 32、35、36、87、88
 陈尧佐 294
 陈宗颜 304
 陈伯敷 322
 陈景元 357
 邵古 27、47、48、94
 邵睦 48

邵天叟 324
 邵伯温 39、48、58、96、144

八 画

林亿 18
 林中黄 127
 范仲淹 4、20、22、23
 范谔昌 298、321、341
 欧阳修 4、20、63、264
 欧阳棐 63、264
 周公 24、91、200、327
 周敦颐 4、23、24、76、320、352、
 354
 河上公 294、347
 京房 262
 宗密 188
 孟子 33、79
 郑玄 218

九 画

赵普 5、29
 赵匡胤 4、5、75、290、291、303
 赵匡义 291、303
 赵彊谦 322、323
 胡瑗 19
 胡渭 91、119、323
 胡安国 261、266
 柳永 20

柳宗元 140

荀子 224

项羽 202

钟离权 294、347

种放 32、35、298、320

禹 24、69、192、199

俞琰 355

姜子发 39

洪自诚 64

十 画

秦观 20

秦九韶 16

莱布尼兹 149

格鲁塞特 109

贾宪 15

贾昌衡 63

贾德升 296

柴荣 291、292、301

晁公武 101

晏殊 20

钱宝琮 343

钱若水 293

爱因斯坦 120

唐慎微 16

祖无择 49

神农 117、191

诸葛亮 58

寇莱公 288

陶渊明 89

培根 14

十一画

黄帝 191、193

黄巢 4、204、279

黄畿 180、181、266

黄石公 58

黄百家 128

黄宗羲 154、189、261、267

黄庭坚 4、20

黄宗炎 267、294、324、347、349、

352

曹操 202、301

崔颢 288

章惇 58

商鞅 202

康熙 266、267

巢父 305、308

麻衣道者 292、293、324

十二画

韩康伯 149

葛守中 309

蒙文通 298、343

董仲舒 44

惠子 37

- | | |
|---|---------------------|
| 掌禹锡 18 | 虞翻 149 |
| 程颐 4、55、63、76、78、95、186、
262 | 僧颙修 54 |
| 程颢 4、55、59、63、64、74、76、
80、81、95、142、186、261、
264 | 僧寿涯 323 |
| 焦赣 262 | 谭峭 285 |
| 傅尧俞 73 | 蔡伦 18 |
| 舜 24、91、105、192 | 蔡元定 136、168、261、321 |
| 富弼 47、49、50、52、56、80、110 | 颤项 191 |
| 谢安 30、203 | 穆修 32、35、298、320 |
| 雷思齐 332 | 魏源 73 |
| 十三画以上 | |
| | 魏了翁 103 |
| | 麌皮处士 282 |
| | 魏尔兰 109 |
| | 魏伯阳 294、347 |

词 语 索 引

一 画

- 一故神 25
一分为二 135、136、140、143、145、
149、167、170、246、259、
271
一动一静之间者 125、136

二 画

- 二进位制 149
二则神 132
十二消息卦 184
八宫卦次 41
九宫八风 214

三 画

- 三司 8
三统论 44、69、205
三十六宫 153

大九州 244

小父母 152

乡兵 5

四 画

- 王道 191
开物 178、179
开方法 15
天根 90、153、154
天命论 69
天命史观 206
天地之数 332、346
天之四象 137、138、245
无极 351、352、353
无名公 101、124、271
无极图 36、294、347
元会运世 41、95、173、185、260
五行 336、341
五德终始 44、205
太和 225

太极 25、82、89、124、125、129、
131、139、169、221、238、259、
272、353
太虚 25
太极图 142、323
中天 117
中庸 231
中书省 6
内丹 331
内圣外王 269
反观 233、234
水运仪象台 16
气 95、139、167
气化 95
气本论 95
化数 165
月窟 90、153、154
火药 14、18
爻辰 40、170
文王八卦 21
方镇 5
心 128、129、139、208、228
心法 128、327、329
计相 6
书院 18
以我观物 230、233、241
以物观物 230、233

五 画

本体论 16
节度使 5
龙图三变 334
打乖 80、106、275
占候 16
占城稻 11
四片 149
四象 137
四正卦 115
四分法 148、162
用数 163、164
玄学 41
对待 123、161
加一倍法 142、147

六 画
动数 165
动植通数 166
百科全书 17
地之四象 137、138、245
因物 237、240
岁课 11
先天 117、128
先天图 32、35、36、41、121、142、
271、321、325、331
先天八卦 25、111、112、161

先天易学 26、41、95、125、212、	体用 163
260	体数 163、164
先天四图 260、273	体四用三 163
先天象数学 25、95、243	体用一元 163
任我 237、238、240	私田 10
后天易学 95	佃户 10
行窝 273	即象见意 326
合一衍万 166、168、271	灵龟八法 213
交子 13	纳甲 40、170
交子务 13	
庄田 10	
庆历新政 23	环中 120、121
闭物 178、179	卦值 180
宇宙生成数 256	卦气 40、170
安乐窝 27、45、47、66、72、79、	卦气说 40、161、184
82	奇经八脉 213
安乐佳城 64	枢密院 5、6
观物 226、227、239、240	易龙图 296、331
	易外别传 120、133、241、257、264、
	265、272
	图书学 276、332
七 画	
更戍法 5、23	金丹 345
两税 8	命门 348
两故化 25、133	物理之学 32、33、232
两派六宗 267	性 33、78
投劾 57	性命之学 32、33
运气史观 206	学士院 6
声音唱和 94	学达性天 264
体 162、163、164	

学田 10

官田 10

官庄 10

房中 345

应县木塔 15

诚明 78、79

变数 165

九 画

指南针 14

顺逆 115

保甲法 21

便钱务 13

皇帝王伯 41、43、65、95、105、191、
205、251、270

钧窑 11、14

律吕 180

胎息 331、357

度支 6

洗心 88、89、271

洛书 213、338

洛阳桥 17

活字印刷术 11、14

神 131、133、139、249

神化 140

神生数 249、259、272

祖气 348

逆数 115

客户 10

建隆之治 3

垦田 10

十 画

租佃制 10

徒附 10

康节体 104

十一画

理 95、127

理学 23、92、95

理欲之辩 100

植数 166

职田 10

厢军 5

蛎房 17

御史台 6

深衣 61

盖天说 244

谏院 6

十二画

蛰龙法 284、346、356

筏形基础 17

道 126、167、169、238

道术 285、286、343

道学 17

道学五子 4、24
浑天说 244
象数 95、257、276、319
象数学 170、267、320

十三画

禁军 4
数 95、141、144
数术 27、32、92、93、292
数学 95、131、149

新儒学 24

辟谷 357

十四画以上

熙宁变法 21
澶渊之盟 21
藩兵 5
藩镇 5
霸道 192